

闽学研究

编辑委员会

顾 问：陈 来

编委会主任：陈庆元

编委会副主任：方宝川 谢必震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照南 王岗峰 王晓德 方彦寿 叶松荣

朱人求 朱杰人 朱高正 汤漳平 李豫闽

连 榕 陈 颖 陈支平 陈永森 张品端

张善文 林庆彰 郜积意 黎 昕

主 编：陈庆元

副主编：方宝川 谢必震

编辑部主任：陈 颖

闽学研究

(季刊)

2016年第2期(总第6期)

目 录

· 朱子学 ·

朱熹《琴律说》的理学阐释 郑天熙/1

朱熹书院的祭祀与文化遗产 方彦寿/6

《四书章句集注提要》疏注

——兼重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汉宋观 吴伯雄/10

· 闽学源流 ·

谢杰及其涉琉涉日之著述 兰 英, 张沁兰/15

晚明会元金门许獬略论 陈 炜/24

清初闽学精神与蓝鼎元治台思想探究 卢翠琬/28

· 闽学名家 ·

黄榦中庸体用论发凡 张新国/34

李纲墓祠考述 郑淑榕/41

元儒陈旅的儒学思想

- 以《安雅堂集》为中心 顾海亮/48
- 明末大学士李廷机“百辞不允”考 于英丽/62
- 清侯官李鸿瑞父子著述辑考 刘 繁/67
- 诗评家陈衍与黄曾樾的师生情谊三则 徐金凤/72

· 闽学与诗学 ·

- 浅论丘葵诗歌创作的“唐音”和“宋调” 廖肇禄, 萧庆伟/75
- 金门蔡献臣及其《清白堂稿》 卢忆北/80
- 浅论明代建安版画 黄世团/84
- 施世纶及其《南堂诗钞》研究述评 陈劲龄/89
- 丘复与南社诗人 徐东梅/95

民初晋江诗人吴钟善旅台诗歌刍议

- 兼及寄鸿吟社之始末 董俊珏/106

出世入世为家国 读书刻书亦人生

- 林尔嘉及其藏书 陈红秋/114
- 谢肇淛游踪年表 张明琛/118

· 序跋 ·

- 序两篇 陈庆元/125

王振汉《廉隅清节蒋孟育》序

吴伯雄标点本《莆阳文献》序

Journal of Fujian Studies, No. 2, 2016

Contents

-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Rhyming Rule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ZHENG Tianxi/1
- The Sacrifice Ceremony of Zhu Xi Academy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FANG Yanshou/6
- Zhu Xi's *Explanatory Notes on Four Books: Chapter Focus*
—— Revisiting the Views on *Si Ku Quan Shu: A Notated Bibliography* i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WU Boxiong/10
- Xie Jie and His Works on Ryukyu and Japan LAN Ying and ZHANG Qinlan/15
- An Account of Xu Xie, the Number One Scholar in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from Jinm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EN Wei/24
- Fujian Scholarship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Lan Dingyuan's Views on Governing Taiwan LU Cuiwan/28
- On Huang Gan's Theory of Noumenon and Expression ZHANG Xinguo/34
- An Account of Li Gang's Tomb and Memorial Temple ZHENG Shurong/41
- The Confucian Thoughts of Chen Lv, a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Yuan Dynasty GU Hailiang/48
- An Account on the Grand Secretary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Li Tingji's "A Hundred Times Resignation and A Hundred Times Declining" YU Yingli/62
- A Bibliographic Account of Li Hongrui and His Son from Houguan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Fan/67
- The Teacher – Student Friendship between Poem Critic Chen Yan and Huang Zengyue XU Jinfeng/72
- On the "Tang Rhyme" and the "Song Rhythm" of Qiu Kui's Poems Liao Zhaolu and Xiao Qingwei/75
- Cai Fuyi of Jinmen and His *Manuscript of Clean Study* Lu Yibei/80
- On the Engraving Print of Jian'an in the Ming Dynasty Huang Shituan/84
- Shi Shilun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oetic Manuscripts of South Studio* CHEN Shaoling/89
- Qiu Fu and Poets of the Southern Poets Society XU Dongmei/95
- Wu Zhongshan, a Poet from Jinjia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His Poems Written during His Visit to Taiwan
—— A History of the Jihong Poetic Society DONG Junyu/106
- It's All About Family and Country Whether to Choose a Secular or Monastic Life, While It's All about Life Whether to Engage in Scholarly Pursuit or Printing
—— Lin Erjia and His Collection of Books CHEN Hongqiu/114
- A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Xie Zhaozhi ZHANG Mingchen/118
- Preface to Wang Zhenhan's *Jiang Mengyu*, a Man with Integrity CHEN Qingyuan/125
- Preface to Wu Boxiong's Notated Version of Putian Anthology CHEN Qingyuan/127

朱熹《琴律说》的理学阐释

郑天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本文对朱熹《琴律说》中出现的对三分损益法的观念的固守、对琴弦音色的选取、对同弦三宫的君臣附会三方面作出理学上的阐释, 认为这三个问题不全是乐律层面的问题, 而是朱熹理学体系对格物功夫论的必然要求。朱熹的格物要求从外物的自然原则中看到伦理原则的普遍性, 实现人事社会与宇宙自然界在理上的贯通, 在主体修养上通过格物达到对受形气遮蔽的心性之理的无蔽呈现, 达到圣贤的理想道德境界。对琴律的探究也要服务于这个伦理性目标。

关键词: 琴律; 三分损益; 格物; 伦理

朱熹作为一代旷世鸿儒, 不仅在性命义理的探究和践行上, 总结有宋一代的理学思想, 还兴趣驳杂, 旁涉阴阳、音乐、书画、医药、养生等各个方面, 并均有不同程度的钻研。“朱子力主博通, 又其兴趣横逸, 格物穷理, 范围无所不包, 故其学似不免出于杂”^①, 正是这种驳杂的为学特点, 使朱子迥异于一般严肃刻板的理学家形象。《琴律说》是朱熹的一篇阐述古琴音律的杂文。朱熹对乐律有精湛的研究, 而且音乐活动伴随着朱熹的学术活动贯穿其一生。他“中青年时代侧重于《诗》乐和乐律研究, 晚年则更多涉及乐教、琴律和礼乐建设等方面的思考”^②。朱熹的音乐著述大量散见在其语类、文集中, 只有少部分单独成篇的文字如《琴律说》《乐记动静说》等。《琴律说》全文约 5541 字, 集中论述了朱熹对于古琴徽位的分布、音律的取定、有效音位的选取等一系列古琴音律问题。《宋史》曾载其定律之法、调弦之法以及旋宫诸调之法, 并称赞“其于琴法本融末粲, 至疏达而至缜密, 盖所谓识其大者欤”^③。乐律专业的学者则指出“这篇文章最早提出‘琴律’这个词, 第一次在理论上系统地把古琴运律问题纳入律学研究范畴。因其体现出对纯律徽位有意识地系统运用, 故而应当作为第一部有纯律内容的古代文献”^④。朱熹没有摒弃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去闭门构造其学说, 而是在即事即物的具体考究中, 实现着对性命义理的践履。同时, 他对世间万象的“格物”也就是对其理论的具体实践。朱熹在探索琴律的过程中, 渗透着其理学思想并受其整体支配, 具有独特的理学色彩, 是朱熹整个哲学体系运用于具体的琴律上的表达, 体现其作为理学家看待音律的特殊方式。本文即从朱熹理学思想入手, 分析朱熹探讨琴律中的实际操作处理对其理学思想的呼应与践行, 对其中的矛盾现象作出理学阐释, 并说明朱熹对待音律的态度即是他极为推崇的“格物”理论的一次完美表现。

作者简介: 郑天熙, 男, 仡佬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5 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乐论及美学。

① 钱穆:《朱子学提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 第 223 页。

② 郑俊晖:《朱熹音乐著述及思想研究》,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第 121 页。

③ 脱脱等:《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第 3345 页。

④ 李玫:《传统音乐轨范探索》,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年, 第 188 页。

五千余字的《琴律说》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将古琴的徽位与三分损益得到的十二律一一对应。分为三部分，第一是用三分损益法讨论徽、声、律之间的相应关系。朱熹先给出司马迁从黄钟大数八十一开始三分损益生出十二律，再以四尺五寸的琴长为基础，计算出从龙龈到第七徽左方十二律的位置。指出布徽之法“当随其声数之多少、律管之长短，而三分损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①，批评时下以“四折取中”的布徽之法不知自然之法象，只是机械性的操作，而缺乏理论指导；第二是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并规定七弦散声顺序。对四尺五寸的琴长与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数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说明，依次定初弦为黄钟之宫，次弦为太簇之商，三弦为中吕之角，四弦为林钟之徵，五弦为南吕之羽，六弦为黄清之少宫，七弦为太清之少商，这七音为七弦之散音，“起于龙龈，终于临岳”。此外，还规定每一弦上均有五声十二律相应。第三是对弦上高、中、低三个音区的掐段率划分和有效音位的统计。前述是古琴下准区间的音位（即龙龈之七徽之间），在中准和上准区间也各有五音十二律，只不过中准的数据是下准数据的一半，而上准数据则是下准数据的四分之一（再半）。并认为上准区间的音“难取而用处希”、“促密”。最后计算出古琴中可用音位为113个。^②《琴律说》的第二个内容是以琴弦音色决定取用原则，提倡自然淡和，雅正缓厚的声音，排斥“高”、“促”、“迫”的声音。将琴徽之分布声律与埋管候气法比较，指出其相似的原理及不同之处。第三方面是指出散声的特点，并以琴中音律比拟现实的君臣人伦秩序。

《琴律说》还有两篇附文。一篇是《定律》，给出具体的定律方法，一篇是《调弦》，除给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调弦方法外，还试图说明这种调弦法的必然性。“此调弦之法所以必于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为也”^③。

朱熹十分重视《琴律说》，写成后还与蔡季通书信往来讨论个中问题。“《琴说》向寄去者尚有说不透处……”，“琴中旋宫一事，正为初弦有紧慢，而众弦随之耳……”（《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琴律说》第一方面的内容涉及三分损益。三分损益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生律方法。中国传统音乐将一个纯八度分为十二个乐音，分别命名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这十二个音名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下》。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问律为伶州鸠。《管子·地员》是目前最早记录三分损益的文献：“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徽。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④《史记·律书》中也有“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的记载^⑤。朱熹以三分损益法在古琴上找到十二律的具体徽位，但在具体操作中，朱熹却使用了三倍反生法找到仲吕、无射、夹钟、夷则、大吕等律所在的徽位。如无射，按照三分损益法，是黄钟经由第十次三分损益得来，而这样的无射比两次三倍反生得到的无射要偏高，不符合审美听觉，于是朱熹采用的是三倍反生后的弦长数据^⑥。尽管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朱熹根据自己的听觉实践对三分损益有所突破，但在命名这些成果时却固守三分损益法以黄钟为宫、为君的观念，不肯使用“清角”之名，这种具体操作与理论命名

①③ 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3241页。

② 不同版本数据有不同。李玫在《〈琴律说〉文本解读——兼及常见的校勘问题》一文列出，见《传统音乐轨范探索》第190页。此处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本《朱子全书》。

④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0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⑥ 详细推算参见李玫：《〈琴律说〉文本解读——兼及常见的校勘问题》。

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发生的？也即是，在朱熹已经以自己的音乐实践找到比用三分损益法得来的更符合审美听觉的音时，为何还用三分损益之观念去解释之、命名之？

《琴律说》的第二个内容是以琴弦的音色决定取用原则。朱熹认为上准区间的音（即七徽之左），“气厚身长，声和节缓”，琴曲多在该区域中取音。七徽之声为正声正律，“气已消而复息，声已散而复圆”，虽不及上准之音，“君子犹有取焉”，至于再往上，则“气愈散，地愈迫，声愈高，节愈促”，“愈不可用”，即使俗曲繁声用这些音，“亦非君子所宜听也。”^①在朱熹眼中，古琴的所有音声并非能同等条件地使用，而是存在一定的审美原则予以裁夺。即古琴之音并不是外在于“君子”的，而是与“君子”的德性修养息息相关。为何朱熹会如此看待古琴之音声并予以优劣评判？

《琴律说》的最后一个内容是以音律比附君臣关系。首先，朱熹仍然表示出散声乃通体之全声，“受命于天”，而七徽之声“受命于人”的音声优劣论，在同一弦的三宫中，也有不同的地位：“左阳而右阴，阳大而阴小，阳一而阴二。故其取类，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阳明，故为君子而近君，右者阴浊，顾为小人而在远。以一君而御二臣，能亲贤臣，远小人，则顺此理而国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则拂此理而世以衰乱”^②，并认为这是“事理之当然，非人之所能为也”。为何朱熹要将古琴中的音声对应现实生活中的君臣小人？是不是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是“神秘主义的外衣”？需要说明的是，将音乐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状况相对应是中国传统的音乐观，如《吕氏春秋·仲夏纪》：“乐无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③《诗大序》及《乐记》也有类似的说法。这里提出朱熹将琴音与现实君臣相对应，是想探求朱熹此举与其理学思想的联系。

二

本文认为，前述《琴律说》中的三个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乐律层面上回答，而需要深入到朱熹整个理学思想体系中，联系朱熹对现实世界的万物进行“格物”的理论主张，才有可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朱熹并非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以完全客观的态度，严格区分主客，用分析和类推获取自然界事物的规律和普遍性知识，以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知识性掌握。就古琴音乐来看，他也并非完全将古琴与“君子”的伦常生活彻底区分开，仅仅探索音律的数理知识以取得合理而悦耳的乐音。相反，从以上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朱熹是在伦理世界中审视古琴及音乐的，在他眼里，音乐并非中立的客观事物，而是参与到“君子”伦理生活及个人修身中的与之切身相关的“切己”之物。为什么朱熹会以这样的伦理性视野进入音律的探索？

在朱熹早年的求学经历中，即已透露对客观事物探求的兴趣，他不满足老师李延平教他静坐体悟“未发”，“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窍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④。《中和旧说序》：“余早从延平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而是信守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说法，始终没有放弃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之好，对于延平一脉道南传统的默坐澄心这种浪漫主义的直观体验，遗外求内的修学方法不能契合，而着重从具体事物的分殊出着手，通过对大量的个别事物的“格物”工夫，上升到对“一理”的把握。朱熹对此有两个比喻，一是铜钱穿线：“一便如一条索，那贯底物事，便如这许多散钱。须是积得这许多钱了，却将那一条索来贯穿，这便是贯。如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线索，

①② 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4页。

③ 参见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④ 《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第二书。

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①，以此批评只重心内功夫忽略大千事物的陆学；二是木片箍桶：“如一个桶，须是先将木来做成片子，却将一个箍来箍敛。若无片子，便把一个箍去箍敛，全然盛水不得”。^②这说明朱熹的修养功夫与陆九渊专门在心内用力不同，而是要即事即物地考究世间的万事，认为道理散见在各种具体的个别事物中，必须从这些万殊的具体事物上穷理，才能贯通宇宙的究竟一理。

这就进一步涉及到朱熹的宇宙观和人生论。朱熹是以理和气解释宇宙和人生的，他认为天地人事还没有生成之前只是一个理，这理纯善无伪，而人禀受的理需要有形气作为物质载体，才能成为人性内在的仁义礼智信。他在《大学·或问》中说：“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得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卷一）。由于人的义理之性受到后天形气的遮蔽干扰，人便有善有恶，不能让内在之仁义礼智完全不受遮蔽的发出，达到“与理合一”的状态。这即是朱熹乃至整个理学需要面对的人如何成圣的问题。在朱熹这里，他首先设定人的本来状态是纯善之天理，这天理具足大仁，通过人事显发出和谐的理想道德境界，再指出现实状态的人之善恶是受后天形气的干扰。先天本在之性理并没有丢失，而是因遮蔽而黯淡无光，需要做的便是通过修养功夫去蔽，朗现人性本来之天理，并达到人与天的合一。“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至于一日会通贯彻，而无所遗焉，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吾之所以为性，与天之所以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贯之矣。”（《文集》卷六十七，杂著）

朱熹强调的修养功夫，是继承小程的涵养致知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从他专门补的《大学》中《格物》篇可以看到他对修养功夫的具体要求。“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我们看到，首先，朱熹要求的“格物”，是对具体的万事万物的规律和特点的掌握；其次，朱熹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与构成人的性理二者具有深刻的同源性，格具体之外物的过程，也就是逐渐发明本心，让受遮蔽的心中之众理不断显发的过程，这样，他将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与人生界的伦理之性打通，实现天地之理由宇宙向人生的通透：“朱子理想中之所谓豁然贯通，不仅是此心之豁然贯通，乃是此心所穷之理，能到达与宇宙界与人生界之豁然贯通。”^③最后，朱熹用这种格物涵养的修习功夫，把只在心上着力的禅学和陆学区分开来。他重视对客观事物的即身体察，同时自己身体力行，对阴阳卜筮、医药养生、音乐书画、诗词文赋等各种技艺无不兼及，体现出其学说广博庞杂的特点。

同时，朱熹这种以敞显心中本具之天理，使之发出皆为纯善的仁义礼智为目的的“格物”必然决定其观察事物时的内向性和伦理性色彩。他并没有用完全外在的目光，如西方自然科学家那样分析归纳事物的客观规律，尽管他的格物有“类推”的这种接近西方认识论的方法。朱熹时时注重物与我相通之基础的理，以积累事物间“零碎”的理为基础，最终要以现本心豁然贯通，心之全理无碍流出的道德理想境界。所以格物要注意“切己”，推察事物的道理最终都要返回到自身来，“若只泛穷天下万物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④其次，先在的道德目标和伦理性视角使朱熹的格物完全为人性之善的开显服务。尽管其中也有对客观事物特点的知识性获取，但都给予伦理性的解释，让格物之所得能够致知，亦即能够推进、帮助心中之理的显发，使外物的自然原则与人事社

① 《语类》卷二十七。

②④ 转引自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41、143页。

③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45页。

会的伦理原则通过“理”取得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格物不仅与西方重视知识，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探索的目的不同，而且具体对象上也不能不有差异。朱熹的格物是为了“修身治国”，因此格物对象多为天文、农业、律历等与国家治理有关的知识，涉及到的内容也多为历史、政治、道德及各种典章制度，即使面对某一客观事物，也必须给予道德伦理的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解释^①。李泽厚比较康德与宋明理学的不同，说“前者（康德）是外向的认识论，要求尽可能提供感性经验，以形成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后者是内向的伦理学，要求尽可能去掉感性欲求，以履行那‘普遍必然’的伦理行为”，“前者把认识论和伦理学截然两分”，“后者却将二者混在一起”，认识论“完全屈从于伦理学。”^②

三

回到朱熹的《琴律说》，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都可以在朱熹伦理性的格物致知论上得到解释。首先，朱熹以敏锐的听觉，知道了三倍反生可以得到比三分损益更和谐的音乐，尽管操作上不遵循三分损益的旧路，但观念上不得不依从三分损益法中宫为君的传统观念。因为琴律不仅作为客观事物的规律特点存在，还是朱熹借以敞明人性之理，贯通天人，实现人与理合的途径。朱熹认为音乐和人事有极为密切的关联，“音律只是气。人亦只是气，故相关”（《语类》卷九十二），乐律的正确秩序与和谐的音声直接与社会治乱相系。他多次表达音律要遵守一定秩序，不可犯“臣陵君”的错误观念。“大率乐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声不得过宫声”（《语类》卷九十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同上）。批评嵇康广陵散是“慢了商弦，令与宫弦相似。是臣陵君之象”（《语类》卷二十五）。他对音律有相当的敬畏，“律者万事之根本”。对传统的三分损益的固守，即是对其中君臣有序不得违反的伦理道德信条的肯认，也即是朱熹格物须切己的隐微表达。同样，朱熹对不同音色的琴弦有明显的好恶取舍标准，也是由于朱熹看到音乐的巨大作用，必须使音乐服从于主体内在德性开发的终极目标，于是选取“气厚身长，声和节缓”的声音，将对乐音的审美原则与人性的温柔敦厚的道德涵养联系起来。通过这样的格物，必然达到对心中之理的贯通无碍。朱熹重视音乐对人的熏陶作用，“古人学乐，只是收敛身心，令人规矩，使心细而不粗，久久自然养得和乐出来”（《语类》卷三十五）。在《琴律说》中，他多次强调乐律出自“自然之声气，非人力所能为”，也是提醒在人与自然界有不可违的必然之理，这既是人作为主体需要竭力通过功夫开显的，也是人可以与天地宇宙相贯通的哲学前提。强调乐律的自然性，即是强调世间万物的先在合理性以及人可以通过切己格物涵养省察而不是肆欲妄为达到与天地宇宙相贯通的一致状态。

朱熹对同弦三宫的君臣附会，与其说是“神秘主义”，还不如说是朱熹想要通过琴律达到的乃是遵守君臣有序的伦理性目的而非客观的认识论目的。他希望“君子”通过琴律的探索，了解到这种君臣的伦理秩序存在于天地自然之本然中，并非人事社会的外在强加，而是宇宙人生界通有之理。

尽管对自然事物的“格物”必须笼罩在伦理范围内是朱熹功夫论及整个学说的必然，审美经验异常丰富的朱熹不得不面对大千事物的多样规律与强行纳入伦理言说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琴律说》中，即是他虽然敏锐地发现更多的和谐乐音，却不得不在旧的解释框架下赋予道德性意涵，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格物的伦理道德本性去探索客观的琴律。了解这一点，也就能体会朱熹在《琴律说》中不断赋予乐律的伦理性特点的良好用心，不管是对三分损益的坚守，还是对浑厚音色的推崇，亦或是对同弦三宫的君臣附会。在他眼中，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还是君子用以修身养德的有力工具，对琴律的格物，是了解伦理秩序在自然万物上的普遍存在性，以更好地遵守人事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责任编辑：陈 颖）

^①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57页。

^②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39页。

朱熹书院的祭祀与文化遗产

方彦寿

(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506)

摘要:以朱熹建阳考亭书院为代表的福建书院,在书院祭祀方面影响巨大。开启了配祀孔门四大弟子即所谓“四配”的先河,也开启从祀本学派先贤的先河。朱熹逝世后,朱门后学黄榦、刘克庄不仅在实践层面上将朱熹开创的祭祀活动发扬光大,并且还努力在精神层面上加以总结,将朱熹所确定的祭祀对象、内容、程序等,通称为“沧洲之制”,从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海内外,古老的书院祭祀仪式与新时代的文化元素结合,在精神层面上承朱熹,逐渐形成了祭祀朱子的现代版,在各地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关键词:书院祭祀;四配;沧洲之制;文化遗产

南宋绍熙三年(1192),朱熹承父遗愿,定居于建阳考亭,在此建书院招门生,聚众讲学和著述。书院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1194),改为沧洲精舍。考亭地处建阳城西南面,距城关约五华里。麻阳溪从门前流过,受阻于对面的翠屏峰,水势变得和缓。溪畔原名龙舌洲,朱熹定居考亭后改名沧洲,自号“沧洲病叟”。

从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1192-1200)前后约八年时间,朱熹大部分时间都在考亭讲学和著述。他的《孟子要略》《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一系列著作都在这里完成。蔡元定、黄榦、蔡沈和陈淳等一大批门生聚集在考亭,至今仍有生平事迹可考的弟子还有200多人。^①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聚集在考亭这个当时知名的高等学府,研经读史,寻求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考亭书院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最后形成,并走向成熟。

淳祐元年(1241)正月,朱熹逝世40年后,诏从祀孔庙,朱熹取得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淳祐四年(1244),赐建阳“考亭书院”御书匾额。

一、朱熹时代的书院祭祀活动

在书院发展史上,祭祀、讲学和藏书刻书通常被视为书院的三大基本功能。而以朱熹建阳考亭书院为代表的福建书院,在书院祭祀方面的影响尤为巨大,有两大创举,一是开启了配祀孔门四大弟子即所谓“四配”的先河;二是开启从祀本学派先贤的先河。

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朱熹在考亭沧洲主祀孔圣,并以颜渊、曾参、子思和孟子配祀,此为全国书院祭祀孔圣,而以四位门人配祀的创举。而在此之前,北宋时仅有颜子和孟子两位配祀,左颜右孟;曾子、子思加入配祀则是在宋理宗咸淳三年(1267),晚于朱熹考亭书院“四配”崇祀70

作者简介:方彦寿,男,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参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考”一章,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

多年。

除了主祀孔子和四配之外，朱熹又在考亭将北宋以来的道学先贤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和李侗七人作为从祀。此为全国书院祭祀学派先贤的开先河之举。在《五礼新仪》等典籍的基础上，朱熹与诸生反复斟酌礼仪，撰写了适合书院使用的《沧洲精舍释菜仪》^①，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②。在祭祀活动中任“赞”（司礼）的门人叶贺孙记载了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在考亭沧洲精舍首行释菜礼的全过程。

文中记载由于条件所限，书院大堂狭小而潮湿，所祭先圣先贤，孔圣之外，四配与两宋道学先贤七子均以纸牌子代替而非塑像，但主献官即朱熹却“极其诚意”，气氛认真而隆重。弟子中，叶贺孙、蒋叔蒙为赞，黄榦和徐寓为分奠（负责分送祭品），朱在为掌仪（负责对献官的引导）。最后，朱熹即席开讲，内容是为学之要，表明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与讲学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③

朱熹在书院举行祭祀活动，其目的是要使他的弟子从这些先圣先贤的身上吸取教益，受到文化、道德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举行这项活动，能使儒家的道统学说得到生动活泼的、立体的展现，从而使门人容易接受，取得比讲学更好的效果。经过历代书院祭祀的传承，福建书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仪式。

朱熹之后，书院崇祀孔圣和四配逐渐成为定例。如元初建阳刘应李的化龙书院，就是在大堂中“以奉宣圣四配”。至正十年（1351），同安创建大同书院，前有先圣殿，祀孔子；后有朱子祠，祀朱子。元至正崇安文定书院，左为孔殿，配以颜、曾、思、孟。明成化六年（1470），福建按察副使命通判李明重修黄榦的鳌峰书院，建有道原堂，也是祀奉孔子和四配。清张伯行创建的鳌峰书院，有大成殿，也以孔子和四配为祭祀对象。

二、后朱熹时代的书院祭祀活动

朱熹逝世后，为论定朱子的道统地位，阐扬他的理学思想，并使朱子成为各地书院、祠堂崇祀对象的，是当时学界公认的朱门领袖黄榦。而将此落实到考亭书院的，则是朱门后学刘克庄。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给予朱熹“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④的高度评价，并将前人所创由尧舜开其端，一直到孔子、孟子的道统之传，下延至周、张、二程和朱熹。

南宋宝庆元年（1225）秋，朱熹逝世25年后，刘克庄任建阳知县，在考亭书院内建文公祠，次年（1226）落成。祠中主祀朱熹，而以门人黄榦配祀。此为在朱熹创建的书院中祭祀朱熹的开端，也是对朱熹在考亭书院祭祀学派先贤这一创举符合逻辑的创造性拓展。

朱熹的莆田籍弟子，曾任南剑州知州并创建延平书院的陈宓，有一首《送刘学录之建阳》的七绝：

马蹄千里踏春风，为爱河阳制锦工。

首重儒宗新像设，不妨特地拜文公。^⑤

诗中所说的“首重儒宗新像设”，指的就是刘克庄在考亭书院内设文公祠并张挂朱子遗像祭祀朱

①（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67页。

②（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六//《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页。

③（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95-2296页。

④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7册，第559页。

⑤（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3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4页。

熹。

刘克庄不仅在实践层面上将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的祭祀活动发扬光大，并且还努力在精神层面上加以总结，将朱熹考亭沧洲精舍所确定的“四配”、学派先贤和朱熹亲手制定的祭祀程序《沧洲精舍释菜仪》等，通称为“沧洲之制”，^①从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其表现为，在空间上向闽南的书院推广，在时间上因宋元后学如熊禾、陈普等人的弘扬而代代传承。

他在为泉山书院写的记文中，描述了晚宋朱子理学被推向崇高的历史地位之后，在朱文公的始生之乡，侨居之里，宦游之郡，“与乾淳诸老讲贯切磋之处，往往肖其像，度其书，聚成学之士，敬事而传习焉”的盛况，具体地点“如徽、如建、如南康、如清漳、如潭衡，曰精舍、曰书院，皆奎画扁，或郡文学兼领，或别置师弟子员，规式略如白鹿”（按，泉山书院在泉州）。咸淳二年（1266），知州赵希惊（号见泰）始建，乃利用泉州城东的一座废寺之基而创。书院颇具规模。除了朱文公的“肖像”之外，据载：

前为燕居堂，夫子危坐，颜曾思孟跪侍，两堵则图濂溪、二程、邵、张、涑水六君子，沧洲之制也。堂下则图先贤芸阁吕氏、龟山杨氏、河东侯氏、文定胡氏、籍溪古氏、草堂刘氏、豫章罗氏于右庑；上蔡谢氏、广平游氏、和靖尹氏、韦斋朱氏、致堂胡氏、屏山刘氏、延平李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于左庑，几之制也。为文公祠，以勉斋黄氏、远庵赵氏、西山真氏、复斋陈氏配。^②

所谓“沧洲之制”，指的是遵循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祭祀先圣先贤的书院制度。除了孔子和四配之外，还有北宋六子，以及与程朱理学关系密切的两宋先贤，下及朱子的四位门人，且每人均有肖像，即文中所说的“图先贤”，为先贤绘制图像，张挂在书院，或堂前，或堂下，或左右两庑。

南宋后期，朱子理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后，一直到明清，福建书院多以朱熹为主祀对象，配祀对象则南北略有差异。闽北的配祀对象为四大弟子：蔡元定、黄榦、刘燾和真德秀，此配祀始创于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其时，毋逢辰任建宁路判官，曾将建阳考亭书院重新修复；在书院原祀朱熹、黄榦的基础上，增祀蔡元定、刘燾和真德秀三人，此为朱熹四大弟子排行之由来。明景泰七年（1456），朱子八世孙朱泗上奏朝廷请以这四位弟子配祀，得到朝廷的批准，使闽北朱子祠祭祀四配之习至此最后确立。闽南则将四大弟子中的浦城真德秀换成了漳州的陈淳。长乐吴航书院则崇祀黄榦、刘砥、刘砺、郑性之、郑申之等长乐籍或与长乐有关的朱子门人；古田正学（又名探本）书院祀奉林用中等八位当地的朱子门人，称“八贤”，反映了不同的地域特色。

经过历代书院崇祀的传承，到明前期，各地书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祭祀仪式，通常分为春秋二祭。此举开始于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礼部曾下文各地建祠崇祀。建安（今建瓯市）博士府、建阳考亭书院朱子祠和尤溪南溪书院等，均以此模式举行祭祀。春祭在每年的三月初九即朱子逝世纪念日举行，属家祭；九月十五日朱子的诞辰纪念日，则由县官主持，属官祭。祭礼有一套完整的仪式，有规定的祭品和祭具，分主祭、陪祭，在引赞、捧香、接香、捧帛、接帛、执爵和接爵等助祭者的引导和协助完成三跪九叩之礼。

历代的福建书院崇祀，有专祀、合祀、主祀与从祀的区别。有些书院，以先贤的名号命名，往往就是专祀某位先贤的书院，这在书院的名称上，已可见其端倪。如将乐龟山书院，专祀杨时；沙县豫章书院，专祀豫章罗从彦；延平书院，主祀延平李侗；延平定夫书院，主祀游酢；崇安屏山书院，主祀刘子翥；福州勉斋书院，主祀黄榦等等。合祀的有，延平四贤书院，祀杨、罗、李、朱即所谓“延平四贤”。福州的鳌峰书院崇祀宋游酢、胡宏、黄榦、陈淳，明儒陈真晟、蔡清，称“六子祠”。

^{①②}（宋）刘克庄：《泉山书院记》//《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四部丛刊本。

此后，又陆续增祀杨时、王夔、林之奇、罗从彦、李侗、李郁、胡安国、胡宪、胡寅、刘子翬、刘勉之、蔡元定、蔡沈、廖德明、真德秀为十五子，又补宋李纲、明黄道周为十七子；后并祀六子祠，称为“二十三子”。凤池书院建仰止楼五楹于后，以祀先儒宋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游酢、杨时、王革、李纲、林之奇、罗从彦、李侗、李郁、胡安国、胡宪、胡寅、胡宏、刘子翬、刘勉之、朱熹、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廖德明、真德秀，明陈真晟、蔡清和黄道周，共二十八子。

三、朱熹书院祭祀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驶进了现代，古典的书院祭祀仪式随着书院制度的消亡而渐行渐远。近年来，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海内外，古老的书院祭祀仪式与新时代的文化元素结合，逐渐形成了祭祀朱子的现代版，在各地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之所以提出“新时代的文化元素”，提出“祭祀朱子的现代版”，是因为作为一种礼仪制度，毫无疑问，有其时代性问题。朱熹就曾说过，“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①。所谓“时为大”，说的就是礼的时代性是最重要的，礼仪礼节的一些具体要求不必“一切从古”，而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须是参用今来日用常礼”，也就是说，礼仪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

南宋淳祐元年（1241）正月，诏以朱子从祀孔庙。从明景泰年间开始，在考亭书院所在地的建阳，在建瓯博士府和朱熹的诞生地尤溪，每年都有春秋两祭。

目前，书院祭祀仪式在全国各地保存最好的，应数朱熹的出生地——尤溪南溪书院。明弘治四年（1491），尤溪国子监生林海上《乞朱文公诞辰典疏》，明孝宗皇帝“特允其奏，遂命有司以九月望日（即农历九月十五日朱子诞辰日）致祭，”并钦颁祭品、祭文。从此，南溪书院首开朱熹诞辰公祭之先河，成为朱子诞辰日官方祭祀朱熹的地方。尤溪县从明代开始直至民国初期，公祭朱子大典成为当地一项重要活动，每年都在文公祠里为朱子举行春秋二祭和诞辰日祭祀大典。在《南溪书院志》和历代《尤溪县志》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还记载了当时朝廷钦定的祭器、祭品和明朝首辅徐阶撰写的祝文等。

公祭朱子大典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传统，早已形成一套较为规范、完善和成熟的模式。在基本保存祭祀原貌的基础上，近年来，尤溪县推陈出新，组织人员编配祭典音乐、舞蹈等，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并于2007年10月18日朱熹887周年诞辰日恢复对朱子的公祭，此后每年朱熹诞辰日，都在南溪书院文公祠内举行公祭朱子大典。2011年，尤溪县“公祭朱子大典”被中国节庆创新论坛组委会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公祭大典”荣誉称号。同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海外，每年的5月5日则有韩国朱子后裔的家祭大典；在我国台湾台北、新竹，则有朱氏宗亲的祭祀大典；在武夷精舍，每年8月，有参照书院“释菜礼”祭祀仪式而举行的两岸“朱子之路”敬师礼。在五夫朱子学校，每年新学年开学，均举行模拟书院释菜礼的新生拜师仪式。

（责任编辑：丁翔）

^①（宋）朱熹撰，（清）李光地、熊赐履等奉敕编：《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1页。

《四书章句集注提要》疏注

——兼重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汉宋观

吴伯雄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当前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四库全书总目》秉承乾隆帝不喜宋学的意旨,故而偏袒汉学,刻意诋毁、批判宋学。本文在对《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集注提要》作了注释和疏通的基础之上,重新审视《四库全书总目》的汉宋观,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宋学亦多所肯定,其所批判的只是宋学末流那种空疏不学、空发议论的学风,而对于汉宋两种不同的学风,则持兼收并蓄、公允宏通的批评原则。

关键词:《四书章句集注提要》;疏注;《四库全书总目》;汉宋观;重评

一、《四书章句集注提要》疏注

《四书章句集注提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卷三十五《经部·四书》类,该篇提要对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能够重其大醇,略其小疵,并对汉宋两种学风,给予了精当而公允的评价。兹略检典籍,稍作申讲,将该篇提要分节疏注如下。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①

(一)宋朱子撰。案:《论语》自汉文帝时立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文帝时亦尝立博士,以其旋罢,故史不载。《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然《书录解题》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章。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

疏注:《论语》《孟子》,宋以前并未正式列入儒家经典,《大学》《中庸》也仅是《礼记》中的二篇,虽然有个别学者单独抽出作专门的解说,但并不为人所注意。大规模地重视《大学》与《中庸》,自宋人始。《总目》根据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指出在二程之前,司马光已经专门拈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分别为之注释讲说。但是,有意识地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注释研究,并逐步构建出一套精密的哲学体系的,当属二程兄弟。他们著有《论语说》《孟子解》《中庸解》以及《大学定本》,二程的弟子游酢,也撰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释义》等著作,另外一个程门高第吕大临,也有《中庸解》《大学解》《论语解》等著作,可见二程已经将这四种书结合在一起,传授于生徒。不过,首次将这四种书合为一套书同时刊

作者简介:吴伯雄,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页。雄按:《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章句集注提要》原书名如此,为简观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提要》,简称《提要》。

行，并称之为“四书”的，还要归功于朱子。他为《大学》《中庸》作了章句，即逐章讲疏，而《论语》《孟子》则广采诸家之说，谓之集注，并于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任上首次刊印，当时并不称“四书”，而称“四子”^①。

（二）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于《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

疏注：最初，朱子定著四书的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如此的顺序编排，有其深意在。他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②

他的学生黄榦在给朱子作行状的时候，也重点强调了四书的研习顺序：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道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③

不过，后人因为《大学》与《中庸》二章篇幅小，刊刻时为方便计，往往刻在一起。故现行四书顺序皆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要》以为四书刻印时的编排顺序无关紧要，不必深究，是明通之论。但是，对于朱子编排四书先后顺序的用意，却不可不知。

（三）《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袁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

疏注：古本《大学》自成一篇，并未分经传。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大学》中的文字分为经与传，经即是经典原文，传即是解经的文字。在此理论前提下，朱熹调整了《大学》间的段落。又，朱熹既以原本《大学》为包含经与传，而传中没有对格物致知作解释，故特为补作一节传文。这也体现了宋儒的治学风格，即“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④。

（四）《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于八条目外。既于理无害，又于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

疏注：《大学》三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① 参考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书临漳所刊四子后》，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3895页。

^②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点校：《朱子语类》卷14，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419页。

^③ （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集》卷34：《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

^④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2：《孝经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6页。

为了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朱子对《大学》原文作了大幅度的调整，甚至自己补作了一节传文，这在严谨的学者看来，无疑是不可饶恕的孟浪之举^①（如周予同）。实际上，对于动辄窜改经文的宋元儒者，如王柏、吴澄之流，《总目》经常大加挞伐^②，但对于朱子擅自改易经文的举动，《总目》却给予了额外的宽容。

平心而论，朱子对《大学》段落的调整，确实使得《大学》的内容更显得眉目清晰，他所作的一节补传，也不过是对于“格物致知”四个字的发挥与解释而已，《总目》说“于理无害，又于学者不为无裨”，良非虚言。又说“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确是明通之论。若仅以不该妄改古书为口实，对其大加诋毁，反倒显得拘执。

（五）《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

疏注：本节《提要》主要为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的失误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作辩护。朱子此书，重在微言大义的发挥，而在具体的名物度数考证方面，则往往直接引用前人之注，并未能追源溯流，层层考证。本节《提要》所举的几个问题，是历来非议朱子注释不严密之处中比较显著的例子，兹引证原文，一一疏通解释。

《论语》“瑚琏”一条：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朱注：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③

瑚和琏都是祭祀时用来盛黍稷的器皿，据朱注，夏朝称这种器皿为瑚，商朝称为琏。明人陈士元曰：

包咸氏曰：“瑚琏，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琏。”元按：《明堂位》曰：“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周之八簠。”注云：“皆黍稷器，制之异同未闻。”夫《记》谓夏琏殷瑚，而包、郑注《论语》，伏、杜注《左传》，皆谓夏瑚殷琏，盖相沿而误也。朱子《集注》“夏曰瑚，商曰琏”，亦因旧注之误而未考耳。^④

根据《礼记·明堂位》可知，这种器皿夏朝称琏，商朝称瑚，朱子根据何晏《论语集解》中所引包咸的说法，注为夏曰瑚，商曰琏，未能考证《礼记·明堂位》之文，在考据学中，可谓疏忽。

《孟子》曹交一注：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章句下》）

朱注：赵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⑤

考《左传·哀公八年》经文曰：“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传曰：“宋公伐曹，

^① 参考周予同《朱熹》第四章《朱熹之经学》第七节《四书学》，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② 参考《四库全书总目》卷4：《易纂言提要》、卷17《诗疑提要》等。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3，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④ （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1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12，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412页。

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①这一年距离孟子的时代百有多年，曹国既然已灭百有多年，则不可能再有曹君，既然不可能有曹君，那么曹交根本也就不可能是曹君之弟了。东汉赵岐注《孟子》，以曹交为曹君之弟，必定有误，朱子引赵氏之注，未考《左传》，故为后人所诟病。

“夫子之墙数仞”，见《论语·子张第十九》，朱子注曰：“七尺曰仞。”^②而在《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中，却注曰“八尺为仞”^③，自相矛盾。

（六）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疏注：朱子一生著述宏富，但他自己最看重的，无疑是《四书章句集注》。据说他临死之前，还在修改“四书”的注解。对于他的及门弟子，他也一再强调自己在此书上花费的精力，并要他们务必认真领略。如：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④

《集注》且须熟读，记得。^⑤

某《语孟集注》，添一个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⑥

当然，《四书章句集注》并非毫无瑕疵，在名物度数的考证上，偶尔有所出入（见上节疏注）。这些疏误，大多数比较琐屑，不会影响总体的判断。比如上节所举的几个例子中，是夏瑚商璠还是夏璠商瑚，并不影响前面“器者有用之成材”的注释；曹交是否曹君之弟，也不影响对《孟子》原文大义的把握。至于一切是八尺还是七尺，那就更加无关宏旨了。从严格的考证学角度来看，这些都算是疏误，《总目》的辩护，多少含有一些偏袒朱子的意味。但《总目》从大处着眼，认为对于《四书章句集注》，应该注重其微言大义，而不是斤斤于琐屑的考证之中，这确是高明的宏通之见。诚如《总目》所言：“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对于汉宋学术的得失，《总目》有着极其公允而独到的论断。当然，对于门户之争，《总目》也一再表示了反感，抓住非其所长的考证之学进行攻击，并进而诋毁《四书章句集注》的价值，固然不对；但若刻意掩饰朱子这方面的短处，遮蔽回护，文过饰非，也是纯粹的门户之见。两者之中，前者仅斤斤计较于琐碎的考证，后者则一味以维护朱子圣人的形象为己任，都不能真正领会朱熹此书的真正内涵所在。

二、重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汉宋观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原则，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共通的认识，即认为因为乾隆帝不喜宋学，故《总目》迎合上意，偏袒汉学，对宋学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是通过上文对《四书章句提

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58，哀公八年条。见(清)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63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10，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238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13，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435页。

④⑤⑥(宋)黎靖德编、郑明等点校：《朱子语类》卷19，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第655页。

要》一文的疏注，却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子是宋学的代表，但这篇《提要》却为朱子的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作出了极其公允的评价，认为即使书中部分考证不免疏忽，也并不影响全书的价值。“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整部《总目》之中，类似这样公允的叙述很多，比如《经部总叙》：

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①

将汉宋两种学风各自的优劣得失归纳得十分精当，也十分公允，并无偏袒。的确，《总目》中不少地方，可以见出对某些具有宋学性质的著作的严厉批判，比如王柏（朱熹三传弟子）作《书疑》九卷，对《尚书》全经加以移易补缀，又作《诗疑》二卷，“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②《总目》给予了严厉的指责。但那是因为王柏本身师心自用，自我作古，毫无根据地以一己之观念，随意删改古经，狂妄之极。宋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是敢于疑古，但疑古要有根据，像王柏如此武断蛮悍的行为，其实只是宋学末流，当然应加以批判。

实际上，从《总目》的某些地方的表述来看，似乎的确将汉学凌驾于宋学之上，比如：“先有汉儒之训诂，乃能有宋儒之义理。”^③但实际并非如此，《总目》的本意，只是主张义理应该建立在严谨的考据之上，或者说，考据应该为义理服务。《总目》卷首有二十条凡例，其中一条曰：

刘綯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如成风为鲁僖公之母，明载《左传》，而赵鹏飞《春秋经筌》谓不知为庄公之妾？为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礼之得失乎？刘子翼入唐为著作郎、宏文馆直学士，明载《唐书·刘祜之传》而朱子《通鉴纲目》书“贞观元年，征隋秘书刘子翼不至”，尹起莘《发明》称“特书隋官以美之，与陶潜称晋一例”，是未知其人之始终，可定其品之贤否乎？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④

《总目》主张“说经主于明义理”，而“明义理”正是宋学的特长。不过义理并非由空谈虚论而明，而是要建立在严谨精确的考证之上。比如朱子《通鉴纲目》中书“贞观元年，征隋秘书刘子翼不至”，尹起莘《纲目发明》不考刘子翼生平，就随口发挥，称朱子之所以书“隋秘书”，是为了褒扬刘氏，就像称陶渊明为晋人一样。而两《唐书》的《刘祜之传》皆记载刘祜之父刘子翼入唐后曾受拜为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并非抱义不出，为隋守节。如此一来，尹起莘所谓的“特书隋官以美之”一语的论断，就如空中楼阁，毫无根据。“谢彼虚谈，敦兹实学”，《总目》所要批判的，是未经考证就盲目空发议论的空疏学风，而其所推崇的，则是兼有汉学之训诂考证及宋学之思辨义理的学风。

要之，《总目》诚有对宋学末流蹈空议论的严厉批评，但也时常可见对汉学末流斤斤于琐屑考证的冷嘲热讽。应当注意的是，《总目》汇聚了当时学术界绝大部分精英的智慧，执笔者纪昀博学多闻，议论宏通，这些都决定了《总目》不可能只是简单机械地偏向于某一种学风，相反，《总目》中处处表达了平议汉宋、消融汉宋门户之见的期望。兼采汉宋、合其两长，是《总目》最根本的风格追求，而公允通达、兼收并蓄，则是《总目》一贯坚持的批评原则。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

②（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7：《诗疑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页。

③（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37：《四书参注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页。

④（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页。

谢杰及其涉琉涉日之著述

兰英¹, 张沁兰²

(1.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福建 福州 350007; 2.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谢杰是明万历七年(1579)册封琉球王国副使, 一生之行世, 廉洁奉公, 勤政为民, 著述颇丰。其出使琉球之功绩及其影响, 早已铭刻在中琉历史关系的里程碑上。所著《使琉球录》(合编)、《〈琉球录〉撮要补遗》以及《虔台倭纂》等三部涉琉涉日之著述, 为明万历时期的国人敲响了日本侵略的警钟与陈述御倭的谋略。由此可见, 谢杰对日本侵略野心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与高瞻远瞩, 着实难能可贵。本文主要就其涉琉涉日的《使琉球录》(合编)、《〈琉球录〉撮要补遗》以及《虔台倭纂》等三部著述之叙录, 以期揭示谢杰对当时中日、中琉、日琉等关系的认知及其御倭之谋略。

关键词: 谢杰; 琉球; 日本; 明代

一、谢杰生平事略

谢杰, 福建长乐人, 是一位在中琉关系史上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明万历七年(1579)谢杰以册封副使的身份奉命册封琉球国王。记载其生平事迹的虽然有《闽书》《(万历)福州府志》《(崇祯)长乐县志》《明史稿》《明史》《(重纂)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等等文献, 但大多语焉不详, 甚至连其生卒年亦未见明载。方宝川先生《谢杰及其著作考述》一文^①, 第一次根据民国年间谢铤编《东岚谢氏宗谱》抄本所载之: “公生嘉靖丁酉年(1537)三月二十四日申时, 卒万历甲辰年(1604)四月十四日辰时, 享寿六十有八”, 考定谢杰生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 卒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但王晓颖硕士的《谢杰与〈虔台倭纂〉》一文则提出: “谢杰(1538-1605), 字汉甫, 号绎梅, 长乐江田人。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脑中风去世, 终年68岁。”^②因所注生卒年未标明其出处, 无由知其所据。

据《东岚谢氏宗谱》“邦锡公派下”《谢杰传》载:

公讳杰, 字汉甫, 行一百有九, 号绎梅。由庠生以《诗经》应隆庆庚午(1570)科中式。万历甲戌(1574), 上春官奏捷授行人司行人, 钦赐一品服封琉球国王。复命, 有□(原缺字, 当脱“却”一字)金异域砥节中朝之奖。膺光禄寺寺丞少卿、南北光禄太常寺卿、□□(原缺字, 当脱“顺天”两字)府府尹、通政司通政使, 转都察院副都御史, 巡抚南赣汀韶□(原缺字)桂等府。以剩金十三万奉入内帑, 秩满迁南北少司寇, 奉诰命加封父母及妻。寻升京户部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琉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5BZS10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兰英, 女,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沁兰, 女,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第十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台北: 中琉经济文化交流协会, 2007年。

^② 王晓颖: 《谢杰与〈虔台倭纂〉》, 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侍郎，历九载，乃陟尚书，总督仓场。鞠躬尽瘁，殁于官舍。噫！席广文清白之后，寒酸三十载，宗族逋负艰辛，任之而不为苦。历任卿贰部院华廛三十载，布被蔬食而忘其贵。歿之日，田无百亩，家无千金，榻有布被，宅无楼台。上感主知，下孚舆论。虽南北部院，议溢议荫，推列首名。而家乏担石，莫能赴阙申请。惟荫一子之官，赠溢之议，竟成画饼。则公之清，尚不足以周其身，未免骨肉之不及，情有余憾也。嗟呼！廉吏可为而不可为。乃尔乎！天道有知，公之后当有昌而兴者矣！

公生嘉靖丁酉年（1537）三月二十四日申时，卒万历甲辰年（1604）四月十四日辰时，享寿六十有八。仲子儒梅公奔丧治事，蒙神宗皇帝震悼，钦差太常寺博士姚公若水祔之于途，尚宝寺司丞吴公默扶柩抵家，谕祭九坛。礼部侍郎李廷机就宅致祭。其文曰：“皇帝遣礼部左侍郎署尚书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廷机，祭于原任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谢杰曰：惟卿秉心贞洁，操行端庄，释褐大廷，抗旌异域，夷金能却，君命有光，列寺之游。更闻公之溢牙虔，镇萑符之警，坐消正席仓漕，京抵之储日积。未究厥用，遽瘁尔躬。言念良臣，可无异恤。特颁谕祭，以慰遐思。灵如有知，伏兹宠渥。”祭毕，御葬于闽县光裕里瀛田山，坐乙向申，兼卯酉分金。

该传当为最为详细的一篇记载谢杰生平事迹概况的文献，除了揭示谢杰的生卒年外，明神宗颁谕的祭文、赐葬之地等诸多重要史实，亦弥足珍贵。

另据明何乔远《闽书》卷七七《英旧志·谢杰》记载：

谢杰，幼警敏，有大志，博学能古文词。贫四壁。其举乡试时，已落卷矣。分考官房中夜薨然有声，起视无有，旋复就睡。旋复有声，如是者再。起视之，得杰卷。遂以上主考，得与荐。既登第，授行人，奉诏册封琉球国，作《使琉球录》。^①

明万历七年（1579），谢杰以行人司行人钦赐一品服充册封琉球国副使随正使萧崇业一并往封琉球。在册封琉球的过程中，谢杰利用其自身为闽人的籍贯优势，发挥了许多重要的作用。如在他与萧崇业合纂的《使琉球录》中，萧崇业于所撰的“使事记”中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凡木之伐自山者、输及水者、截为舟者，丝忽皆公帑云。费已不费而丝忽又公帑出，余心内弗自安，时时与谢君商之。舟从汰其什一、军器损其什五、交际俭其什七。先是，诸具物率治之以官。今令平贾，而精黠奸户，故求多于有司，诸具物往往以丑恶相欺售。谢君为闽中人，素晓畅其事，乃一一理条其大小，诏余不然者，辄奉三尺随其后。于是舟之庀也，大都多谢君指画焉。^②

可见在册封正使萧崇业的眼中，作为副使的谢杰的确是发挥了自身优势与不可替代的谋划作用。在琉球期间，琉球国王曾按惯例七宴七酬金，谢杰均推辞不受，且作《却金吟》一诗来记载此事。为此，琉球国人也特建“却金亭”纪念之。谢杰出使琉球的其他情况，在其与萧崇业合编的《使琉球录》一书有着十分详细的记录。日本岩井茂树先生的《萧崇业·谢杰撰〈使琉球录〉解题》一文，^③也对谢杰出使琉球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叙述。台湾张存武先生的《谢杰对琉日关系之认识》一文，^④则专门论及了谢杰是第一位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对琉球、中国的骚扰与威胁的使者。

谢杰出使琉球回国后，擢光禄寺丞、太常寺少卿。万历十八年（1590）七月，任右通政。十九年（1591）四月，转南京光禄寺卿。在历任两京太常少卿时，“南京岁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官代。谢

① 何乔远《闽书》卷七七：《英旧志·谢杰》，明崇祯二年（1629）刊本。

② 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明万历七年（1579）序刊本。

③ （日本）岩井茂树：《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研究》，日本冲绳榕树书林，1999年，第33-50页。

④ 张存武：《谢杰对琉日关系之认识》//中琉文化经济协会编：《第一届中琉历史关系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第381-392页。

杰道:“祝版署御名,而遣贱者将事,于礼为褻。请如哀冲、庄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金书。”^①二十年(1592)七月,累迁顺天府尹。二十一年(1593),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清四弊,陈三策,以汰虔兵之虚冒者,军民按堵,钤阁肃然。往属吏荐者必修谢,故事也。杰榜之署曰:‘贿而后荐,干戈之盗;荐而后贿,衣冠之盗。’识者以为名言。”^②

万历二十三年(1595)六月,谢杰晋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1597)春,因皇帝荒于政事,疏陈十规言:

前此两宫色养维一,今则定省久旷,庆贺亦疏。孝安太后发引,并不亲送。前此太庙时飨皆躬亲,今则皆遣代。前此经筵临御,圣学日勤,今则讲官徒设,讲席久虚。前此披星视朝,今则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岁旱步祷郊坛,今则圜丘大报,久缺斋居;宸官告灾,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涝,多发帑金,今则采矿榷税。前此用财有节,今则岁进月输;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纰,西蜀之扇,关中之絨,率取之逾额。前此乐闻谏言,今则封事甫陈,严纶随降,但经废弃,永不赐环。前此抚恤宗室,恩义有加,今则楚藩见诬,中珰旋出,以市井奸究间骨肉懿亲。前此官盛任使,下无旷陂,今则大僚屡虚,庶官不补。是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③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谢杰召为刑部左侍郎。不久,迁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请全运实京仓以备边储。三十一年(1603),漕粮阻,逾常期。谢杰斋戒吁天。是冬,河冰不合,运舟毕至,众皆异之。

谢杰不仅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而且为人心胸宽广,不记仇。早年谢杰的父亲“教谕廷袞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赋。县令刘禹龙言于御史逮之。杰代讯,几毙”。此时“禹龙家居,未尝修隙,时服其量”。^④

万历三十二年(1604),谢杰以艰繁暴疾卒,鞠躬尽瘁,殁于官舍,享年68岁。歿之日,田无百亩,家无千金,榻有布被,宅无楼台,明神宗封赠其为太子少保,并遣礼部左侍郎署尚书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廷机,就宅致祭,吏部尚书裴应章为他书写墓表。部议祭二坛,造坟安葬,诏准如例。谢杰墓在今长乐营前湖里村,“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严重,今仅存墓前的一对文武石翁仲。

谢杰一生著述甚多,但散佚不少。据方宝川先生《谢杰及其著作考述》一文考录,主要有:《使琉球录》(合编)《〈琉球录〉撮要补遗》《天灵山人摘稿》《天灵山人诗摘稿》《棣萼北窗吟稿》《白云篇》《宫保绎梅公遗集》《蕉鹿集》《杜律詹言》《顺天府志》《虔台倭纂》《太上感应篇增注》《李头陀传》以及《荔支名记》与《荔支名歌八首》等等。本文主要就其涉琉涉日的《使琉球录》(合编)《〈琉球录〉撮要补遗》以及《虔台倭纂》等三部著述,叙录如下,以期揭示谢杰对当时中日、中琉、日琉等关系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与高瞻远瞩。

二、《使琉球录》二卷(合编)

《使琉球录》二卷,是书题:“户科左给事中临安萧崇业编、行人司行人长乐谢杰同编”。

萧崇业(1522-1588),字允修,号干养。祖籍南直隶,洪武年间其祖奉命迁云南,遂落籍临安卫新安所。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由庶常授兵科给事,转工科右给事中,先后封事十余次。万历七年(1579),以户科给事中充册封琉球王国正使,奉命出使琉球。谢杰以行人司行人充册封琉球

① (清)孙尔准等纂修:《(重纂)福建通志·谢杰传》,清同治七年(1868)正谊书院刊本。

②④ (明)喻政等纂修:《(万历)福州府志》卷五十四《名臣谢杰传》,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本。

③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谢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王国副使，随萧崇业同使琉球。

该书系萧崇业与谢杰出使琉球期间共同编撰。首列：《自序（萧崇业）》《琉球过海图》《诏敕》《谕祭文》《谕祭祈海神文》《谕祭报海神文》；卷上：《请留诏敕》《使事纪》《礼仪》《造舟》《用人》《敬神》，卷下：《群书质异》《题奏》《艺文》；末附：《夷语》《夷字》《皇华唱和诗》。萧崇业《自序》称：

于是余与谢君遂以皇上颁制诏之日，熏沐陛辞，同拜文绮、酒饭之赐，乘传而往。凡居闽、居中山，总之四稔近已。其间跋涉之难，风涛之危，虽势或不无，然莫非臣子职分所宜任者，以彼其念尚弗可萌之于心。若复喋喋然恣险说以聒听闻，是犹未免矜孤勤于君父前曰：“今日我上也，无亦重有大咎矣”！则余讵敢哉！

使琉球，旧有录，纪胜图流、规舟秩则，较前录稍益增，兹不具述。余特着人臣奉使之役，在理当勇以赴之；且海上无甚险，以传信于后之忠义者云。^①

该书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万历七年（1579）出使琉球的经过及其在琉期间的活动等等，对研究明万历年间的中琉关系，具有很大的史料参考价值。其中明确著录为谢杰所撰的有“艺文”中的《洒露堂记》以及《皇华唱和诗》中与萧崇业的唱和之作。

谢杰的《洒露堂记》所记的是正使萧崇业为琉球国天使馆之堂命名之缘由：

洒露堂者何？夷天使馆之堂也。洒露者何？谏议萧使公所以名斯也。堂何以洒露名？雨露扶桑，绎唐人之风也。

自夷之有是堂，故弗扁；即扁，弗称其名。比使公至，始得名，名又称。邦人悦，以告不佞。不佞曰：“伟哉！谏议公之名斯堂也！”

……

谏议公以名进士起家，读中秘书，擢居谏省。衔命而东，展采错事，不颜违于咫尺，无色变于风涛。正礼却金，变夷之夏。推其意，不浣秽浊而清明之不已。将雨露者，谁得似君哉！不佞幸在事，敢为赘一喙若此。

《皇华唱和诗》收录了《梅花开洋》《过东沙山》《迎熏歌》《见山谣》《三龙吟》《祭王漫赋（有引）》《封王篇（有引）》《王至使馆（有引）》《却金行》《携觞聊待月》（此诗因有缺页而失题，故以谢杰所作诗的第一句为题）《中秋燕集》《海月咏》《水亭观龙》《膳亭口占（六言）》《九日游东寿寺》《漫兴》《即事》。《皇华唱和诗》前有萧崇业的《小序》曰：“余二人居中山四阅月，辄有属缀，皆与使事相关，非徒流连光景者比也。诗以时次，不论格云。”可见这些诗作亦均为专门记录他们此次出使琉球的经历与感受。言为心声，溢于楮墨。

该书行世有万历七年（1579）序刊本和《台湾文献丛刊》本等。

三、《〈琉球录〉撮要补遗（琐言附）》不分卷

《〈琉球录〉撮要补遗（琐言附）》不分卷。是书题：“长乐谢杰著。”谢杰自注：“《琉球录》，为使琉球作也，业已备矣。然就中有文而烦者、有阙而略者，余为撮其要而补其遗。盖期于简要，工拙非所论云。”顾名思义，该书是他与萧崇业合编的《使琉球录》的补遗之作。

全书分为：“原委、使礼、封舟、用人、启行、敬神、国俗、御倭（附：日东交市记）”等部分。

^① 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明万历七年（1579）序刊本。

末附“琐言二条”,^①且又自注:“琐言,本不欲言,势有不容不言者,故仍言之。”第一条曰“事权”,第二条曰“恤役”。

该补遗之作究竟编撰于何时?谢杰并未言明,尚难考证。刘晓东教授的《〈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一文提出:在谢杰出使的“大约20年后,谢杰又作了《〈琉球录〉撮要补遗》(又称《使事补遗》)一书,以补所缺。”^②同文又说:“谢杰为何在20年后才将此事件揭示出来,其中之原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与‘倭人’的遭遇与冲突,给谢杰的日本认知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倭人的桀骜不敬,以‘堂堂中国’被请求以避‘倭夷’的尴尬,恐怕也是其多年关注日本并主持创作《虔台倭纂》的动力所在。”^③众所周知,谢杰使琉球是在明万历七年(1579),《虔台倭纂》约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倘若《〈琉球录〉撮要补遗》编撰于谢杰出使的大约20年后,那当成书于《虔台倭纂》之后。刘晓东教授“大约20年后,谢杰又作了《〈琉球录〉撮要补遗》(又称《使事补遗》)一书”的说法,惜未进而提出其直接的史料依据。据笔者查检,谢杰在所撰该补遗之后题曰:“以上八条(笔者注:指“原委、使礼、封舟、用人、启行、敬神、国俗、御倭(附:日东交市记)”等八条),多前录所遗;余怀之二十余年,不以告人。今乃复淳淳者,亦‘旧政告新’之意也,览者亮之!”若仅从“余怀之二十余年,不以告人”来判断其在撰写于20年后,似亦不足据为典要,或亦可理解为在撰写后的20余年才公之于众?因为谢杰的补遗之作是附刊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附于使琉球的夏子阳、王士楨合编的《使琉球录》之后而面世的。然而,若是谢杰先前已经撰写,只是“怀之二十余年,不以告人”,那么为何该补遗之作没能与萧崇业合编的《使琉球录》同时刊行呢?笔者窃以为与萧崇业合编的《使琉球录》是按惯例使琉球回国后向朝廷上奏的正式文书,补遗之作似不宜亦无必要同时上奏。此类例子,在此前的册封琉球使著述中也是有过的,如:明嘉靖十三年(1534)与陈侃一起出使的副使高澄所撰的《操舟记》一文,亦未收录陈侃、高澄同编的《使琉球录》,而是见载于萧崇业、谢杰同编的《使琉球录》卷上“造舟”所引。诸此问题,因尚缺足够的佐证史料,亦只能暂付阙疑。

第一篇“原委”,讲述了琉球的得名、地理位置、管辖区域、政权机构、官吏制度、以及与中国的交流史。尤值一提的是,在记载“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的史事中,该篇首次比较详细地提出了:

洪(武)、永(乐)二次各遣十八姓为其纪纲之役,多闽之河口人,合之凡三十六姓,并居彼国之管中。子孙之秀者,得读书南雍。俟文理稍通,即遣归为通事,得累升长史、大夫。今所存者仅七姓,缘所居地狭,族类不能蕃故也。每科、司出使,必以河口土著人充通事,谓之“土通事”。七姓充者,谓之“夷通事”。土通事能夷语,夷通事能华语。七姓言语、衣服与夷无别,仅以椎髻别之。髻居中者七姓、居偏者夷种也。七姓男虽贤,不为国婿;女虽美,不为王妃:盖其祖训然尔。

第二篇“使礼”,记录了明朝册封琉球使所要遵守的礼节,其中包括礼服、册封时的礼仪以及宴会上的礼仪。由此可见,当时册封琉球使的官服为:“科赐麒麟、司赐白泽,玉带则具自备。”尤值一提的是,谢杰在该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封舟抵泚,国相以下跪迎。王时为世子,不迎;以倭舶在近,不免戒心,故尔。至往祭、往封,世子始出郊迎。然迎封拜,迎祭不拜;诘之,辄以旧典为解。余二人谕之曰:“礼可义起,拜封、不拜祭,是重己、不重亲。此自关世子忠孝彝常,使者何与焉!”世子闻言,瞿然亟拜。

^① 《〈琉球录〉撮要补遗(琐言附)》,“琐言二条”,《台湾文献丛刊》本为“言琐二则”。

^{②③} 刘晓东《〈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由此可见,当时由于“倭船在近”,琉球国的世子不敢到码头迎来册封舟的到来,且以“旧典”为借口,世子迎封时跪拜,迎祭时不跪拜。但在萧崇业、谢杰的劝谕之下,世子在迎祭时也跪拜。另外,在宴会上“国相等拜二使则并四拜,二使不还拜。”大大维护了明朝作为宗主国地位的尊严。

第三篇“封舟”,记录了当时所用册封舟的大小,以及所用的材料,以及购买材料,选择船厂等所要注意的事项。如曰:

使夷航海,必资于舟。以余所忆,舟带虚艚长十七丈、阔三丈有奇,舱分二十八,与《录》所载异,造时宜酌之。询之,每舱多用龙骨,欲实而密,令坚致可久。底必须厚,分为二层;钉必须坚,务择精铁。其铁须买之尤溪,价必多给,方得上好;慎勿轻买、轻收……余《后序》中所云“功虽迟,不失为君子正”,《使录》中所云“舟之庀,大都多谢君指画”者,并以此。

除了为后人了解此次册封舟的建造情况提供了详实的史料之外,也再一次强调了他本人在造舟过程中的筹划之功。

第四篇“用人”,叙述了造舟与航海的用人,必须考虑地区特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如称:

航海以船为命,故舟人急焉。造船所急在船匠,行船所急在船梢。船匠有二:漳匠善制造,凡船之坚致赖之;福匠善守成,凡船之格式赖之。船梢有三:伙长司针者、舵工司舵者、阿班司篷缭熬槽及执诸事者……大都海为危道,乡导各有其人:看针、把舵过洋,须用漳人;由闽以北熟其道者,梅花、定海人;由闽以南熟其道者,镇东、南安人。至夷熟其道者,又须用夷人;夷王遣夷梢三十人来接,正为此也……船中择漳人,须试其谙于过洋者;择梅花、定海人,须试其谙于闽、浙海道者;择万安人,须试其谙于闽、广海道者;又不可徒徇其名而浪收也。

可见此次册封的造舟过程与航海途中,既有福建的漳州、福州、南安、长乐梅花人等,还有浙江的定海人,甚至也有琉球人。

第五篇“启行”,详细记录了此次册封行驶的航海路线,且有访寻二父老造船航海的经验之谈。故曰:

《旧录》所不纪、旧役所不知,何二父老立谈片言,历历中款也!夫县丞之引港,军牢之兼用,皆系故事。但载其事而不明其故,以致不知者轻有更张。余因详推其始末,以告来者。庶后人知前事之可循,不敢轻于变易也。

的确为后世的赴琉册封使在造船航海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弥足珍贵。

第六篇“敬神”,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航海水神,天妃最著”。并记述了每到风起时妈祖所示的先征:“使者往还,每值风发,必有先征。或为蜻蜓、蛱蝶,或为黄雀、红灯笼,令人得豫为之计。然亦颇标其奇。信之不笃者,往往受其惊恐。”同时,以此次册封海上遇险一事,描述了祭祀海神妈祖的重要性。“威震殊俗,百神诃护。古语不信然乎哉!”

第七篇“国俗”,认为“琉球虽夷俗,然渐染于中华,亦稍知礼义”。在谈及中华传统文化对琉球的影响时,着重提出了:“书籍有《四书》、无《五经》,以杜律、虞注为经。其善吟者,绝句仅可通,律与古风以上俱阁笔矣。”但同时指出日本对琉球渗透与图谋:“教书、教武艺,师皆倭人,聪警雄俊则不逮倭。器械亦钝朽,具数而已。苟非恃险与中朝之神灵,为倭所图久矣。”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彼国未封之前,岁多凶、船多坏;封后,则常丰、常宁。所以外侮既除之后,知其必请封不已也。”

第八篇“御倭”及其后所附的“日东交市记”,更是详细记录了此次册封在琉与“倭人”的遭遇及其冲突,以及日本对琉球的野心等等。如曰:

夷与倭为邻,而民贫国小,有所不足,辄假贷于倭。每遇封使远临,在他国或至、或不至。倭无不至者,名称往贺,实则索逋于其国也。所居舍馆,去天使馆不二里而近,夷虑我众之不善

于倭, 又虑倭众之不利于我, 每为危言以相恐, 欲迁我众于营中。科使问余, 余曰: “此非故事。但须严禁诸役勿擅与通, 自可无虞。若无故而亟迁, 是避倭也, 岂有堂堂中国而避外夷乎!” 科使如余言, 不迁。久之, 飓风大作, 我众与倭各卫其舟, 致有争竞。倭伤首役一人, 血流淋漓, 众遂大怖, 扶归哀愬, 状颇仓皇。余验其伤, 乃刀背、非刀口, 喜曰: “此急而自救, 非乱而相戕也。宜收众役入馆, 徐敕彼之馆伴往谕, 倭众必不为祸。” 科使然之。少顷, 王亦遣彼众二千余人驰来护舟, 舟各获完, 倭亦随息。盖其时之天幸如此。先是, 辛酉之使, 前导驱倭不退, 以鞭鞭之。倭怒, 操利刀削其鞭立断, 然亦未尝伤人。己卯继往, 戒诸役曰: “我使仪卫入城, 倭夹道而来者, 乐观其盛耳! 势不必驱, 亦不待驱!” 阜辈咸唯唯。比往还, 竟无他衅。盖倭号倭奴, 其曰奴者, 有主之者也; 时无主者, 故不为乱。后之遇此, 当思所以驭之, 严于自治而勿与校可也。余详“日东交市记”。

据《日东交市记》一文所载来看, 的确是对此事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补充。曰:

使节抵夷, 适倭舶通市者先期至。倭故尝入寇, 为中国患。夷知, 辄举以相恐, 仍请迁群役入营避之。营去署甚远, 且非故事。余辈公出, 倭或夹道纵观。又辄斥曰: “疾去! 毋令华人惊”。盖其意欲锢我众以便己私, 姑假倭为词。然往来饰说, 徒示弱耳。余察其有巧, 白于谏议。谏议曰: “足下世海上居, 宜洞倭情”。余曰: “倭性悍而, 遂无他肠。然上下山阪风雨疲劳疾斗操利兵, 中国之人弗能与也。化则盗, 敌则杀; 非化与敌, 固弗盗、弗杀也。濒海诸恶少者欲愚用其力, 亟奇货居倭身为之化嗾, 与华人敌。倭业已鹰犬于人, 遂肆剪戮无少忌, 是直倭罪哉! 世目倭为奴, 倭诚奴也, 固有主之者也。比倭大创去, 又舶通西南夷, 利更什倍, 倭患遂弭。斯其故可知已。今吾以封临, 倭偶以市至, 期与事会无所怨德, 非敌也。又孰为之化者? 可无恐! 第境外无私交, 制也; 宜葺群下勿与通, 足矣”。谏议然余言, 召长史迺谕之曰: “甲午之使, 倭亦尝至, 众弗迁。迁众, 非便, 其勿听! 且胡越一家, 倭人吾人耳, 各事乃事, 其勿拒!” 复号于众曰: “倭者, 国家所弃外, 禁弗与通。诸有辄通倭者, 罪有赦。矧夷伺察甚周, 若属宜自爱, 毋貽僇为使君羞!” 令下, 众奉法凛凛。迄倭去, 无敢与交一谈。倭弗为害, 居亦卒得弗迁云。

谢生曰: 嗟, 使难哉! 方夷之以倭奢我也, 词甚张, 义亦近正, 直其心私耳。于时少为动, 即堕夷术中。乃吾严为禁, 徐为之图。不急倭衅, 不中夷巧, 不违众情, 静重而周悉, 于使事足称不辱。则正大夫之略, 众庶之共也。不倭有余艳焉, 敢漫为之记。

由上可见, 谢杰对此次事件的重视程度。并从此册封团队与“倭人”遭遇与冲突的事件中, 尤其是倭人的桀骜不敬, 以“堂堂中国”竟被请求以避“倭夷”的尴尬, 集中反映了谢杰在琉球期间, 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日本对琉球与中国的威胁的担忧与远见。而从此后的中、日、琉关系的一系列事件来看, 谢杰对日本的相关认知, 均得到了史实的印证。其当时在处理中、日、琉关系的“于时少为动, 即堕夷术中。乃吾严为禁, 徐为之图。不急倭衅, 不中夷巧, 不违众情, 静重而周悉, 于使事足称不辱”等一系列的策略与措施, 也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该书附于夏子阳、王士楨合编的《使琉球录》之后, 行世有明会稽夏氏宗谱活字本与《台湾文献丛刊》本等。

四、《虔台倭纂》二卷

《虔台倭纂》二卷, 分为八目十一章。该书署: “虔镇抚闽长乐谢杰汉甫氏著并叙, 麾下柳邦奇、傅良桥、朱琦、张仕斌、陈信同辑。” 谢杰《序》曰:

匪韬铃所宜，乃为纂于虔台。纂者，略之也。议始于陈子信，辑于柳子邦奇、傅子良桥、朱子琦、张子仕斌，而傅与张尤力焉。余则为广之，广之尤损五之二，则纂与略之谊也，是非缪于与人者。又窃定之凡八篇。海介悠悠，爰有蛮触，故始“倭原”。惟贡及使，初以好合，故“倭好”次之。好必市，纪“倭利”。利必争，纪“倭变”。变必诈，纪“倭巧”。巧必绝，纪“倭防”。防必胜，终“倭绩”。而议附焉。示弗议固弗成也，是纂之次第也。简而不遗，经武所便，聊以辞于军。虽然，倭果终好乎！余纂也，且以覆余瓿。时万历乙未三月朔日虔台主人书于抑抑堂。

“赣州”在南宋以前称“虔州”，“台”则官署之敬辞。由该《序》可以推知，该书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谢杰以右副都御史镇抚南赣时开始主持编撰，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年，1595）。该书虽署谢杰“著并叙”，但实则由多人共同合作完成的。先由陈信提出倡议，后由柳邦奇、傅良桥、朱琦、张仕斌共同辑录，其中尤以傅良桥、张仕斌出力最多，最后由谢杰增删而成。

有明一代，倭寇问题贯穿始终。万历时期正处于明廷援朝御倭战争第一次与第二次的间歇中，基于御倭策略的广开言路，《虔台倭纂》便应时而生。谢杰著述此书的目的，即为万历时期的国人敲响了日本侵略的警钟与陈述御倭的谋略，旨在防倭御寇。因此，该书在许多史实性的内容上，较多引用了《隋书》《宋史》等正史文献所载的与倭寇交战的相关内容，且主要参考了明人郑若曾所撰的《筹海图编》等。

该书第一目《倭原》称：“倭能祸福我，非风牛马之不相及者。不稔其情，孰制其命，故知彼要矣。”该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日本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国家幅员、行政区划，并且约略涉及了日本自古以来的官制、航路、风向、以及嘉靖时期倭寇规模日益壮大的原因。

第二目《倭好》曰：“倭好贡，以好来使以好往，春秋之义，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于倭亦然。”故于该文简叙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历史，体现出作者对于固有的蛮夷观念的坚持。

第三目《倭利》云：“倭挟其利，而又资我之利，则利长在倭矣。掺利权者，可无嘿夺之乎哉。”该文主要介绍了日本的物产及其贸易的需求，以及造船工艺等等。甚至还罗列了日本所需的中国物产，而且标明了它们在日本的昂贵价格。所附之《倭针》，载及中国与日本、琉球三国的来往针路，尤详于作者此次出使琉球时的海上经历。

第四目《倭变》说：“来享来王夷之常也，入寇则异其常矣，异必书。”且“此纪嘉靖以来倭变也。”由此而记载了倭寇的侵犯中国的历史，并以嘉靖时期为分期，认为嘉靖以前的倭寇多为日本人，而嘉靖以来的倭寇则为中国人，此与一般人的见解，确有不同之处。

第五目《倭巧》记：“盗亦有道，倭固盗之剧者，其所取胜率由巧得。反其道而制之，则拙矣。”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倭寇的狡猾和重武轻文，认为：“倭性勇而黠。子生十岁，便教其学弓、学刀，其读书仅取记姓名而已。”特别提到了“蝴蝶阵”“长蛇阵”等陆海战战术，并针对其战术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倭巧虽巧，何所用其巧哉。”所附之《倭媒》曰：“媒者，所以导倭使巧者也，故附于巧之后。谚云：无媒，半路回。倭之能害我中国者，皆我中国人媒之也。”从中揭露了与日本倭寇有关联的中国人，如商人出身的王直集团，海盗出身的许栋集团、徐海集团、叶明集团等等。

第六目《倭防》道：“人亦有言，有备无患。倭之患烈矣，备之者庸可已乎。”其主要谈的是防倭的方法。从地理之险着手，论述边防的建设；从中国之长技着手，论述武器的种类，尤其强调了火器的重要性。所附的《万里海图》《舡式图》与《兵器图》等，一是记录了钦州、广州、漳州、温州、南直隶苏松要地、山东青州周围的地势和防卫情况，二是描绘了各种船只的样式及其制造方法，三是著录了藤牌、佛狼机、鸟銃、炮、火箭等各种兵器。

第七目《倭绩》即为剿倭之绩，曰：“裔不谋夏，古之道也。倭实狡马，启疆则筑，鲸而京观，似非得已者。”大致记载了从永乐十七年（1419）到万历五年（1577）这期间的较大的剿倭战绩。

第八目《倭议》载：“自倭兴议者众矣。众议集绩乃告成，则借箸而筹，揜戈而战，二者不可废一也。”对江南、江北、山东、北畿、辽阳等地的防倭战略地理，以及将才、士兵、阵法、战争食品等等区分与利用的军事理论，均一一论及。谢杰认为不能仅仅在江南、江北、山东、北畿、辽阳单独防御，而是应该合纵连横。并且记载了当时一些军事将领和官员的有关言论。所附之《今倭纪》云：“关白今倭之黠者，专为之纪，别于旧倭也。关白者，倭官号，犹中国之称大将军，即今所封日本王平秀吉也。”颇为详细地讲述了丰臣秀吉个人的成长历史及其入侵朝鲜的事情，其中包括了一些当时日本的政治情况，可谓名副其实的“当代史”。众所周知，明嘉靖末期至万历初期的这段时间，从表面上看，倭寇之害似乎有所减弱，但从丰臣秀吉侵朝的一系列史事来看，更大规模的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谢杰对当时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的真实意图非常清醒，其《今倭纪》即明确指出：“独时朝鲜文弱不治，政多出釜山，倭户所明，是可图也。遂决意北向征调魄运者，累年拟破其国，据为巢穴，而后徐窥中原，此其本谋。”由此可见谢杰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着敏锐洞察力与高瞻远瞩，着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谢杰主持编著的《虔台倭纂》完全是一部基于对嘉靖“倭患”的深刻记忆、面对万历时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现实危机，编纂而成的以“防倭御倭”为主要目的的划时代著作。它不仅保留了众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记录了当时明朝抗倭的“当代史”，也是一部体现了谢杰本人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

该书主要行世有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长乐谢氏刊本和《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等。

综上所述，谢杰一生，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见识卓著。其出使琉球之功绩及其影响，早已铭刻在中琉历史关系的里程碑上。所著《使琉球录》（合编）、《〈琉球录〉撮要补遗》以及《虔台倭纂》等三部涉琉涉日之著述，为明万历时期的国人敲响了日本侵略的警钟，陈述了作者自己对当时中日、中琉、日琉等关系的认知及其御倭的谋略。谢杰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与高瞻远瞩，着实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林日杖）

晚明会元金门许獬略论

陈 炜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许獬(1570-1606),福建金门县人。1915年金门建县之前属同安县,故许獬旧称同安人。许獬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会元,廷试二甲第一名。史称金门珠浦许獬以上八代能诗,然而无科名。许獬的外祖陈氏对他的影响,似大于父祖。许獬以高第授编修,但是他认为如果执掌州县,更加能够发挥才干。许獬生平以“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若干天下第一等事业;干天下第一等事业,不若做天下第一等人品”自励。许獬的《四书崇朱熹批注》十九卷,“遵依皇上准为讲章定衡”;许獬的思想,更偏向于阳明学说中的泰州学派。许獬诗文,反对模拟,他认为诗文必须陶铸百家,而时变世异,诗文也随之变异;许獬制义文,与陶望龄、吴默、汤宾伊并称,为晚明士子所重。

关键词:明代文学;明代科举;四书崇朱熹批注;制义

金门县,建县于1915年。金门建县之前,属福建省同安县。建县时的区划,包括金门本岛(俗称大金门)、烈屿(俗称小金门)、大磴、小磴、角屿、大担、二担(今称大胆、二胆)等岛屿。1949年之后,金门县由台湾地区管辖(其中大磴、小磴、角屿则属同安县,今为厦门市翔安区所辖)。从民初区划的视角来审视1911年之前福建沿海各岛县,金门县中进士的人士最多。明代仅隆庆至崇祯间,“百年以来,起家甲第者几二十人”,而“其魁南宫、授编修者,则自许子逊始”^①。许子逊,即许獬(1570-1606)。獬,初名行周,改名獬,字子逊,人称“钟斗先生”。许獬,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591)会试第一,廷试二甲第一名,授编修。

许獬先世居同安浯洲(今金门县)丹诏村,至五十郎后迁至后浦,遂为后浦人。从五十郎至许獬传十二世,许獬以上,其家族八世能诗,至于如何能诗,能到何地步,未见载述,也未见作品传世。许獬大父惟达,工古文词,有集,具体情况亦不详。父振之,在泮有声,参加过乡试,终落榜,著有《沧南集》,今佚;振之兄弟,起码有三人,详本书《与伯书》。母陈氏。许獬早年聘颜氏女,颜女成年后,病眇,颜父欲易以他女,许獬坚不可,遂传为美谈。许獬有弟三人:二弟鸾,字子采;三弟龙,字子时;四弟行沛,字子甲。三弟龙,疑早卒。獬有女二人,次女适漳州林氏。獬有子三人:铉、钺、镛。至崇祯十三年(1640)有孙四人:元辅、元轼、元辙、元辂。

家族八世能诗,是否夸大,无从考证。但是许氏积累数代文教,才出了个许獬这样的会魁,则是事实。许獬说:“吾祖宗书香积累数世,至于今始发。”^②这里应当说明的是,珠浦许氏的“书香”和同是金门的琼林蔡氏的“书香”,是不一样的。许氏积累数世,到了许獬父振之,才得于参加乡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ZW047)。

作者简介:陈炜,男,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 蔡献臣:《许钟斗太史集序》(《丛青轩集》卷首)。

② 《与伯书》(《丛青轩集》卷六)。

到了许獬才得以参加会试。琼林蔡氏自隆庆二年（1568）蔡贵易登第，万历十四（1586）、十七年（1589）连续两榜蔡守愚、蔡献臣、蔡懋贤三人登第。如果从科举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许獬成进士之前，珠浦许和“书香门第”尚有很大距离。但是，许獬中的毕竟是会元，是二甲传胪，在金门，乃至整个同安县，名声就大不一样了。

从留传下来的文字看，外祖对许獬的成长似乎要比父、祖的影响还要大些。许獬还在孩童时期，外祖父以为獬异于常儿，“日置膝上，日授昔人所为诗若文也者”^①。稍长，外祖父带他出游，遇水，告诉他水名；遇城镇，告诉他城镇名；看到好景物，给他讲景物之所以成为景物的原因；看戏时，则给他讲相关的历史背景。进入学堂之后，许獬屡困于州、县试。“居常负豪气，悒悒不能平。公往抚之曰：‘显晦，遇也；淹速，时也。孺子勉矣！良农能穡，宁不逢年？’”许獬听后，渐自宽慰，不断地淬砺自己。万历二十五年（1597），许獬首次北上春官，外祖远在广东，不得相见，许獬一路上怅怅然如有所失。次年，许獬下第，从金门渡海到大轮山（也属同安县）读书，外祖也陪伴他到了大轮。外祖碰到知交，对许獬的赞许日益不绝于口。这无疑对落第的许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集中书牋有《与外祖》：

公老矣，婆又善病，母未老亦善病。向犹图得便道归故里，具冠服，拜舞堂下，奉觞上寿，为二老人及母氏欢。而今已又难。公素有远志，欲为万里游。游万里，远矣，倘健善饭，能保无恙则可，否则非不肖孙所敢请也。然私心眷恋我公，则与为小儿膝下时无异^②。

集中又有《寄家书》和《与伯书》等书牋，是写给父亲和伯父的，然而比较而言，《与外祖》书娓娓道来，读起来似比后边两通书牋亲切。

许獬以高第授编修，令人艳羨，但是许獬对自己这种修史的官职并不太认同。他认为，自己仍然是个书生，只不过是从未入仕的书生转变成已入仕的书生而已，身份变了，书生的身份没变。还不如外放当个州官县令，能够多少施展一点自己的怀抱：“不佞去书生，还得一书生，既做不得古人文章，又做不得今人事业，悠悠岁月，茫如拾汁。反不若分符郡国，遥借天子之宠灵，犹足有所竖立。丈夫得志行道，须自宰割，安用碌碌随人！”^③这是写给“父母官”同安县令洪世俊信中的一段话，固有安慰洪氏久沉百里不得升迁的劝慰，也透露出他进入馆阁感到的沉闷情绪。“今已官玉堂，称美官矣，而反不若一州一县之得以行其志。”^④这是许獬对伯父所说的话，想法应该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他致洪世俊的尺牋。并非仅仅是劝慰而已。

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万历中期，宦官当道，或许也是许獬不想在京城久待的一个原因。京城如此，地方又是如何？“今矿税满天下”^⑤，“税使横啗，海内骚动”^⑥。许獬和地方官员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宦官四处搜括矿税，他希望出任地方官员的师友多用些心，多多关心民生疾苦。家乡福建，远在海隅，“时闽苦税珙，有奸人劝珙上书分括山海之利，人心皇皇。公贻书温、林二御史，寢其事。泉、漳两郡之民，皆公活之也”^⑦。许獬虽无权直接处理闽地珙税，但借助自己的地位的声望致书温、林二御史，珙税虽未能绝，多多少少起了一点作用。

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授编修，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病归，会元许獬在京城前后四年，似没有更多的事迹可陈。但是，许獬却始终以天下第一人品自励：“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若干天下

① 《寿外祖陈西楼序》（《丛青轩集》卷二）。

② 《与外祖》（《丛青轩集》卷六）。

③ 《与洪舍初》（《丛青轩集》卷六）。

④ 《与伯书》（《许钟斗文集》卷四）。

⑤ 《与汪云阳师》（《丛青轩集》卷六）。

⑥ 《与李按君》（《丛青轩集》卷六）。

⑦ 《许钟斗先生传》（《丛青轩集》卷首）。

第一等事业；干天下第一等事业，不若做天下第一等人品。”^①

明代士子，《四书》和朱熹之注，必须烂熟于心，许獬更不例外。辛丑科次年，即万历三十年（1602），他的《四书崇朱熹批注》十九卷，由名臣李廷机校正，“遵依皇上准为讲章定衡”，正式梓行。许獬对朱熹的《四书集注》的推崇，是没有疑问的。许獬在《肃纪纲正风教以维治安疏》一文中又说：“而上之所以罗士者，又或以博学，以宏词，以诗赋，以对策；射策不尽，以明经。故不可无周、程、张、朱之学。乃今之为周、程、张、朱与为孔、孟者，遍天下皆是矣。师以是教，士以是习，隶之学官，升之司徒，贡之天子。组织而为文章，彪炳而为事业，轩揭而为节义，何莫非学？而乃必于文章、事业、节义之外，别立一理学之名；于传、注之外，别标一宗旨；于学较（校）之外，别寻一师门。果何说也？”^②讲周、程、张、朱之学，在当时的科举取士中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以为周、程、张、朱之学就是孔、孟之学，这就值得怀疑；以周、程、张、朱之学取代孔、孟之学，就更是值得注意。孔、孟之外，另立理学，别标宗旨，乱开师门，便是当今必须“肃纪纲”、“正风教”的重要事项之一（另外两项，一是吏治，一是矿税）。许獬的思想，更偏向于阳明学说中的泰州学派。《丛青轩集》中唯一一篇传记，即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作的。“阳明没，复聚徒讲学如阳明。学者称为‘心斋先生’，或以配阳明，称‘二王’。艮之学，以孝弟为要，以格物为功，不喜仕进及著述。然所著《格物要旨》《求仁方》诸篇，俱为学者所宗。”^③可见许獬对“二王”学说的推崇。

《丛青轩集》是许獬的诗文集，此集和《许钟斗文集》所收许獬的诗文、书牋之外，大多是馆课，馆课都是辛丑科之前的作品，而书牋则主要是辛丑科之后的作品。许獬的诗文，李光缙、熊明遇、蔡献臣之序、池显芳之传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熊明遇云：“载观子逊诗，则逸闲清绮、动与天游；论，则行云波立；策，则气填膺激；表，则刻羽引商；序，则揆权规构；柬，则真挚朗发，俱自成一家言。”^④这里论述了许獬的诗、论、策、表、序、柬数种文体。李光缙、蔡献臣则不约而同地认为，许獬涉及政事的论说文，包罗、陶铸《左传》《国语》，最有特色。

珠浦许氏数世能诗，尽管许獬的诗仍然成绩不那么突出，但是他的诗论、文论还是有可取之处。许獬的诗论、文论，值得引起注意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反对诗文模拟：“窃怪今人书笈学晋魏，诗学唐，文学两汉。近则北地、济南、江左，不患面目不肖，只患模拟太工，愈工愈拙。”^⑤这段话见于《答蔡元履》。蔡复一（1576-1625），字敬夫，一字元履，与许獬同为金门人，年纪比许獬轻，而功名比许獬早，诗名也比许獬盛。蔡复一与许獬论诗，故许獬有此论。此时竟陵尚未兴起，诗坛上影响较大的仍然是李攀龙、王士贞等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许獬认为，当今诗坛，痼疾不在于模拟像不像的问题，而是模拟太过，已经到了拙劣的地步。其二，诗必须陶铸百家，入于古人而出于古人，方能自雄：“陶铸百氏，独出匠心，方能为古人，方能不为古人所牢笼。北地、济南、江左，能为汉唐晋魏，未能不为汉唐晋魏，此其所以终为北地、济南与江左也。足下才气足可自雄，故敢效其区区。”^⑥蔡复一此时只有27岁，故许獬对其寄以厚望。其三，时变世异，诗文亦然：“诗则《三百篇》，有苏、李五言，又有建安，有江左，有盛唐五七言律、排律。时代固然，其无足怪。檠桴土鼓，不可以荐清庙；污樽坏饮，不可以羞王公。商彝周鼎，不可陈于百戏之场；封建井田，肉刑兵车，不可治后世之天下。”^⑦时代不同，器物、经济、兵车等都发生变化，诗歌也由

① 《与李见罗》（《丛青轩集》卷六）。

② 《丛青轩集》卷四。

③ 《丛青轩集》卷二。

④ 《许子逊丛青轩集序》（《丛青轩集》卷首）。

⑤⑥ 《答蔡元履》（《丛青轩集》卷六）。

⑦ 《与李琼方》（《丛青轩集》卷六）。

《诗经》四言转变为苏李、建安五言古体，又由五言古体转变为唐代近体，但是古今诗文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试使古之能文之士，如左丘、屈原、司马迁、相如、扬雄、韩退之之徒复生今世，未始不可以即古文为举业。而即今之善为举业者，亦未始不可即举业之中，而复见左丘、屈原、司马迁、相如、扬雄、韩退之诸作者之精神。惟得其精神，而遗其面目，此真能学古人者。不古不可以为今，不今不可以为古。”^①今人已经不可能回到古人，古人也不可能成为今人；今人不可能做左丘明、屈原、司马迁那样的文章，左丘明、屈原、司马迁也不可能写今天的举子文。古今文学，通的是其精神，变的是其面目，遗其面目，得其精神，才是善学古人者。

许獬的名声，最重要的还不是他的诗古文，而在于他的时文，即制义。许獬同榜进士熊明遇评曰：“国家用制举义取士，束以格体，股引成文。犹记子逊畏圣言题，以颌联擅场。学者称元脉，必曰：‘己丑会稽、壬辰吴江、乙未宣城、辛丑同安，如先辈之称毘陵、晋江也者。’盖支经肯綮，理贯辔策，节奏存乎其间。琳球考击，律吕相宣，韶濩之音也；齐辑勒衔，急缓唇吻，良药之御也。”^②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会元陶望龄，会稽人；万历二十二年（1592）壬辰会元吴默，吴江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会元汤宾尹，宣城人；许獬则为辛丑科会魁，四人之制义当时士子奉为楷模。许獬生前，其制义已有单刻本，又被收入《庆历大小题读本》等制义读本。制义选本、读本往往录有评语，今择数端以见其一斑。韩求仲评《仁言不如（全章）》云：“刻题局文局，宛转相传，而纵横变化，不可端倪。”^③汤显祖评《事君尽（一节）》：“神清骨清，气定格定。”^④顾朗仲评《颜渊问仁（一节）》：“交后血脉，融通中间，筋节调适，尤妙处。在题寔而文松，足深而文活，题腐而文鲜。”^⑤当然，制义文随着时代的变化，评价也会有所变化，入清之后，对许獬制义文的评价，似乎已经不如当年，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库馆臣的提要：“洎登第宦成，精华已竭，乃出余力为之，故根柢不深，去古日远，况獬之制义，论者已有异议，则漫为古调，其所殆可知矣。”^⑥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许獬的诗文集，我们见到的有两个本子，一个是万历四十年（1612）秀水洪梦锡刻本（即万历本），五卷；一个是崇祯十三年（1640）许氏家刻本（即崇祯本），六卷。这两个本子都是许獬卒后所刻，流传不是很广。我们还将对许獬的诗文集进行点校，为学界提供一个较好的整理本。

（责任编辑：丁 翔）

① 《与李琼方》（《丛青轩集》卷六）。

② 《许子逊丛青轩集序》（《丛青轩集》卷首）。

③ 《许钟斗先生稿》（《明清科考墨卷集》卷二十二）。

④ 《许钟斗先生稿》（《明清科考墨卷集》卷五十六）。

⑤ 《许钟斗先生稿》（《明清科考墨卷集》卷一〇五）。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别集类存目》六。

清初闽学精神与蓝鼎元治台思想探究

卢翠琬

(闽江学院学报编辑部,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筹台宗匠”蓝鼎元,是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下的一个典型,对台湾的治理和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他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学和漳州学风的影响,同时也与鳌峰书院的学风有较大的关系。他既形塑于闽学精神,又同时建构着闽学体系。

关键词:蓝鼎元; 闽学; 经世致用; 漳州学风; 鳌峰书院; 治理台湾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号鹿洲,福建漳浦人。蓝鼎元十举科举不第,却因其出众的学识与才华为时人所赏识。雍正元年(1723),选拔贡太学;雍正三年(1725),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雍正六年(1728)冬,因大学士朱轼的荐引而得到雍正帝的召见,条奏六事,雍正皆嘉纳,并授广东普宁知县。蓝鼎元任普宁知县期间,勤政爱民,兴教化、除陋规、善治盗、明断案,深得百姓拥戴,却因数忤监师而被诬入狱,后被郡守胡公以延修府志为名保释出狱。雍正十年(1732)冬,两广总督鄂弥达具折申明蓝鼎元被诬始末,雍正帝下旨命其进京面圣。雍正十一年(1733)年,命属广州知府,并赐賚褒异。抵任方一月,蓝鼎元即因病逝世,终年59岁。著作有《鹿洲初集》二十卷、《女学》六卷、《东征集》六卷、《平台纪略》一卷、《棉阳学准》五卷、《鹿洲公安》二卷、《修史试笔》六卷,皆行于世。陈华国《棉阳学准序》云:“夫子生考亭正学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气,自幼毅然以圣人为必可学,步趋先儒,留心经世,治兵、治民、农田、学校之规画,山川要害、海疆万里之经营。要荒百蛮,雕题鬻齿之情状,靡不了如指掌。尝从军海外,借箸运筹,手到成功。所著《东征》、《平台》,古文时文诸集,《女学》、《修史试笔》诸篇,久为海内钜公所宗仰。”^①说明了其经世之学问根柢及思想、著作之影响。

蓝鼎元主要生活于清初的康熙、雍正时期。当时,台湾刚刚被纳入大清王朝的版图,草创未定,百业待兴。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蓝鼎元以其出色的治台方略,为台湾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影响深远,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筹台宗匠”^②。蓝鼎元卓越的治台理念,与其出身于将帅之家有关系,“蓝氏之族,多将帅才”^③,但其根源乃在于延续闽学而至清初进一步发展的经世致用思想。作为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蓝鼎元与李光地、蔡世远一起,被并称为“闽学的复兴者”^④,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推崇。因此,深入探讨他的理学思想与实学功效之间的关系,颇有意义。

作者简介:卢翠琬,女,闽江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① [清]蓝鼎元:《鹿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45页。

② [清]谢金銮:《蛤仔滩纪略》,转引自[清]蓝鼎元:《鹿洲全集·前言》,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 [清]陈寿祺:《蓝鼎元传》//《碑传选集》,《台湾文献丛刊》,第448页。

④ 高令印:《闽学概论》,香港易通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前人对于蓝鼎元治理台湾的研究，成果不少，主要集中在治台方略方面，鲜少追溯其思想来源。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蓝鼎元学术思想对其治理台湾的影响，而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学和漳州学风的影响，同时也与鳌峰书院的学风有较大的关系。

一、漳州学风与蓝鼎元“明体达用”思想的初步形成

蓝鼎元所生活的漳州，是朱子过化之地。自南宋以来，闽地学术之主流乃是以程朱理学为旨归。正如李光地所说：“吾闽僻在天末，然自晦庵朱子以来，道学之正为海内宗。”^①在清代初年，这一情况更是如此。梁启超说：“康熙间，则安溪李晋卿光地，雍正间，则漳浦蔡闻之世远，亦以程朱学闻于时。”^②梁启超正是以李光地、蔡世远为清初全国最主要的朱子学者而加以介绍。由此可见漳州崇尚朱子之学的风气。程朱理学，在思想方法上本来就重视切己躬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表现出强烈的实践精神。这种精神特质，在明末清初的漳州也得到了鲜明的展现。如著名的学者黄道周，他的一生都在为挽救大明王朝的衰亡而努力，他的许多著作，也是有感于实事而作的。在清朝初年，满清统治者为了应对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实行了严厉的迁界措施，致使沿海特别是厦漳泉一带的社会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残酷的社会现实，迫使士人走出书斋，关心民瘼，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探寻切合实际的治国方略。蓝鼎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并成长的。

蓝氏一族，虽多出将帅，但蓝鼎元却出生于典型的书香世家，祖父蓝继善、父亲蓝斌，都是当地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母亲许氏贤惠端庄，知书达理。蓝鼎元自幼聪颖好学，5岁时便能背诵“四书”“五经”，并“通大意”^③。更加可贵的是，蓝鼎元从小就确立了体用兼修的为学志向。蓝鼎元在《先考文庵先生行状》中叙述了这么一则故事：在蓝鼎元五六岁时的某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带着他“步月中庭”。父亲问他，你长大了要“作何事业”，蓝鼎元说“读书”。父亲又问：你读书为了什么？是为了当官，还是要成为圣贤？蓝鼎元说，“皆欲之”。父亲又进一步教导他说：“奢官弗可必也，得不得其权在人；圣贤可必也，为不为其权在己。”听了这话以后，蓝鼎元立刻体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当即表示要为成圣成贤而努力。又过了几天，蓝鼎元反过来问他的父亲，说：“人为官不得为圣贤乎？”他的父亲回答：“居官正好为圣贤，致君泽民皆圣贤事，如伊尹、周公，俱是圣贤，孔子亦是为官者。但官难期必得，颜子、闵子，不必为官，皆圣贤也。”^④为贤是独善其身，可以只讲求身心修炼；居官则应该致君泽民，兼济天下。蓝鼎元从小就有明确的读书目标：既要“为官”，也要“为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蓝鼎元一生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思想在早年就初步形成了，而且与父亲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不幸的是，在蓝鼎元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也日渐贫寒，他的母亲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双重重担。蓝鼎元深知母亲的艰辛，刻苦自励。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蓝鼎元上学的时候只能携带一罐白盐佐食，受到有些同学的戏笑，他怡然作《白盐赋》以自励。

蓝鼎元兴趣广泛，诸子百家、礼乐名物、文韬武略，都是他关注研究的对象。17岁时，蓝鼎元第一次走出漳浦，从厦门出海，泛舟北上，游历考察了福建、浙江沿海的岛屿港湾形势，扩大了他的视野，增长了见识。王者辅序《东征集》云：“山人（蓝鼎元）闽中儒者……然自童年喜谈兵，讲求

① [清]李光地：《重修蔡虚斋先生祠引》//《蔡文庄公集》附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②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③ [清]朱轼：《行述》// [清]蓝鼎元：《澹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④ [清]蓝鼎元：《澹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经世理物之宜，所过山海要塞、民生区画，靡不镂心默识。”^①他自己也说：“此行所得者多，人莫能喻也。”^②这些经历对他一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康熙四十三年（1704），翰林陈汝咸出知漳浦，他是一位“饶经济才”的有识之士。他到漳浦后，治政有方，对教育尤其重视，开设义学，讲授“五经圣理”。蓝鼎元“既喜经济之学，又好古文辞”，受到陈汝咸的赏识，“招入门下”，“所学益大进”，拔童子试第一。是年冬，进士沈涵督学福州，蓝鼎元与同窗好友蔡世远“俱受知门墙，招入使院。”在诸生中，蓝鼎元尤其受到钟爱，日夜陪伴左右，“三年从游，情同父子”。沈涵更以“国士无双，人伦冰鉴”之语赞誉他的才华和为人。^③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蓝鼎元从小就养成了爱好读书与热心经世致用的习惯，这影响了他的一生。

二、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与蓝鼎元思想的成熟

蓝鼎元经世致用思想的进一步成熟，与鳌峰书院的游学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鳌峰书院是福建清代四大书院之一，是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坐落在福州市于山北麓，即今福州市鳌峰坊内，因其南面正对着于山顶上的鳌顶峰，取“独占鳌头”之意而得名。

鳌峰书院乃福建巡抚张伯行所创建。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著称，被誉为“江南第一清官”。张伯行是一位服膺程朱理学的著名学者，受到康熙皇帝的高度信任。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伯行出任福建巡抚。张伯行来到福建后，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了福建社会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创办了鳌峰书院。鳌峰书院从创办一开始，就与其他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教学的官办学府不同，是“讲学修书之书院”^④而“不为科第人计”^⑤。依据张伯行的指示精神，书院“延九州一郡俊秀之士，读书谈道其中，为明体达用之学”^⑥。从一开始，鳌峰书院就以发扬程朱理学为主旨，并以此构筑了书院的精神内涵。程朱理学不仅重视对心性问题的探索，而且有着非常强烈的实践精神。这种强烈的实践理性精神，一开始就奠定了鳌峰书院以培养具有高尚人格而且有实际才干人才的学风与传统。

为了更好地贯彻程朱理学，巡抚张伯行精心挑选了具有三十多年教学经验、有着精深闽学造诣的漳浦籍学者蔡璧出任首任山长。蔡璧，字君宏，号武湖，教学上主张师法古代圣贤，“以器识为先”，即要养成宏大气度，又要秉持独立见解，“论学以躬行为本，不以空谈性命为高；读书要归于根柢深厚，返求诸身而自得之。”^⑦这些办学思想从一开始就为鳌峰书院奠定了以人格培养为目标、学与行高度统一的学风基础。蔡璧去世后，他的儿子蔡世远继任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是理学大师安溪李光地的得意门生，曾协助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等理学典籍，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理学家。

李光地对蔡世远的书院事业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多次到鳌峰书院讲学，“时来相与往复辩论，要皆黜浮华崇实行，阐发濂洛关闽之旨”^⑧。李光地的学术主张，他自己概括为：“吾学大纲有三：一曰存实心；二曰明实理；三曰行实事。”^⑨而一切学术的归宿，在于“实”，也就是“周当世之

① [清]王者辅：《东征集·序》// [清]蓝鼎元：《澹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22页。

② [清]朱轼：《行述》// [清]蓝鼎元：《澹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③ [清]朱轼：《行述》// [清]蓝鼎元：《澹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④ 许维勤：《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及其对林则徐的滋养》，《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⑤⑥ [清]游光绎等编：《鳌峰书院志》卷六//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 [清]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清]赵三元：《鳌峰书院志序》//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⑨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三：《学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务”，所以，为学贵在“身体力行，见诸行事”^①，力戒空疏。从实用出发，经典而外，天文、地理、形胜、农桑、医药、河渠、兵法、政事、算学无不当在学习之列。这种“身体力行，见诸行事”的学术路线，得到蔡世远的忠实贯彻。因此，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立定远大志向而读书，他教导书院学生“以立志为始，以孝弟为基，以读书体察、躬行克己为要”^②，不要满足于讲论性理和研习时文。经过历代学者们的精心营造，鳌峰书院崇尚气节和学以致用之风气越来越浓厚。

“李光地、蔡世远的讲倡，使鳌峰书院突出人格养成、学行并重的学风更加丰满，并进而沉淀为一种宏器识、端品行、务笃实、尚力行、广博采、求实用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对闽学实践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又是清朝前期有识之士承鼎革之后，反思两宋以来心性义理之学得失的成果的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引起福建知识社会的强烈共鸣。”^③此时，鳌峰书院“人文之盛，见称于东南”^④，迎来了其辉煌的开端。^⑤

蓝鼎元与蔡世远既是同乡，又是同道好友，也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清代学者陈庚焕有云：“虽求其毅然自任，如蔡梁村、蓝鼎元诸公，固不多见，而老师宿儒闻其风者，类多敦厚端谨，重名检耻佻薄。”^⑥可见两人都有很高的学养修为，且广受学人推崇。方苞《礼部侍郎蔡公世远墓志铭》曰：“先是，仪封张清恪公抚闽，延公父主鳌峰书院；而招公入使院，共订先儒遗书。”其时，蓝鼎元也以学行兼优受聘鳌峰书院，并参与编纂大型理学丛书——《正谊堂丛书》。陈寿祺《蓝鼎元传》曰：“仪封张伯行巡抚福建，表洛、闽之学，善礼士，尤重蔡世远及鼎元；致之幕下，益肆力于宋、明先儒之书，周览事务，慷慨多大略。”^⑦“上自濂、洛、关、闽，下逮许（衡）、薛（清文）、胡（敬斋）、罗（整庵）”^⑧，这些理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蓝鼎元靡不熟读而深思，终得濂洛真传。

“鼎元蓬茅下土耳，以大儒开府之尊，忘分而教诲之，岂不为荣；又有万卷足以供探讨，良友足以资讲习，岂不为快。”^⑨在鳌峰书院期间，蓝鼎元不仅得到了张巡抚的亲自教导，更有丰富的藏书可供研读，并得以与更多理学大家相互交流、互相切磋，不仅其理学修为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同时鳌峰书院经世致用的学风，也进一步激荡了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蓝鼎元的思想世界。此间，蓝鼎元才华初露，名声显于全省。蓝鼎元在鳌峰书院的卓越表现，得到了巡抚张伯行的高度认可，并赞誉蓝鼎元“确然有守，毅然有为，经世之良才，吾道之羽翼也。”^⑩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蓝鼎元没有辜负张巡抚的一片期望。

但是，在供职鳌峰书院不久后，蓝鼎元因为家中祖母年岁已高、寡母日渐衰老、弟妹尚未婚嫁而毅然“辞归就养”。张伯行多次去信和派员催促他回书院，蓝鼎元始终力辞，并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上张大中丞书》，张伯行只好作罢。于是，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

① [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三《学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游光铎等编：《鳌峰书院志》卷二//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③ 许维勤：《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及其对林则徐的滋养》，《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④ [清]叶绍本：《鳌峰书院志序》//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十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⑤ 以上关于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的论述，参阅肖满省、卢翠琬：《鳌峰书院经世致用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⑥ [清]陈庚焕：《惕园初稿·闽学源流说》，道光元年（1821）刻本。

⑦ [清]陈寿祺：《蓝鼎元传》//《碑传选集全》，《台湾文献丛刊》，第448页。

⑧ 转引自《鹿洲全集·前言》//[清]蓝鼎元：《鹿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⑨ [清]蓝鼎元：《鹿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⑩ 陈衍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通志列传选·蓝鼎元传》，台北：中华书局，1964年。

一年间,蓝鼎元杜门耕读,奉养长辈、照顾弟妹。虽说蓝鼎元在鳌峰书院的时间不长^①,但鳌峰书院学风对他的影响贯彻其一生,回到漳浦后,他仍然“暇则益肆力宋先儒及许、薛、胡、罗之书。潜沉玩味,以程朱为的,以第一等人物为期,课督不孝等。诱进后学,以敦本行、严取与、慎交游为准绳。盖自庚寅至庚子,杜门读书十有一年。”^② 学问日益精进,为其日后治理台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蓝鼎元筹台方略简述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了朱一贵领导的反清起义。起义者很快攻克了冈山汛,大败清军于棧椰林。下淡水杜君英等闻讯,纷纷率众响应,声势大振。起义队伍几天之内发展到数万人。朱一贵队伍又与杜君英的队伍会合起来,杀死了台湾镇总兵欧阳凯,很快占领了台湾府城和诸罗、凤山等县城。当时的台湾官吏,平时大多无心于政务,贪腐成风,一遇战事,则不堪一击,纷纷夺船逃往澎湖甚至逃到泉州。清政府闻讯,满朝震惊,朝廷决议派遣南澳总兵蓝廷珍带兵入台,配合水师提督施世彪镇压起义。蓝廷珍是蓝鼎元的族兄,系行伍出身,于文墨不甚通晓。蓝鼎元主动请缨,到前线充当蓝廷珍的幕僚,代拟各种奏章、书信、布告等,积极为蓝廷珍出谋划策,为平定叛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起义很快被镇压,后蓝鼎元又主动留在台湾,协助蓝廷珍处理善后事宜。在台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仅妥善地招抚投降的兵众和逃亡的老百姓,而且针对加强台湾的防务以及进一步开发建设台湾等提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方略。这些建议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加强台湾经济建设等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关于治台的一系列主张,除了体现在他代为草拟的奏章中,在他所编纂的《东征集》和《平台纪略》中亦有着详细的记载。关于蓝鼎元治台的一系列主张,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此做些介绍。蓝鼎元高度重视台湾岛的战略地位,充分认识到开发台湾的价值潜力。他说:“统计宇内全局,则台湾为海外弹丸黑子,似无足轻重之数。然沃野千里,台粮精足食,舟楫之利通天下。万一为盗贼所有,或为荷兰、日本所据,则沿海六七省皆不得安枕而卧,关系东南半壁治乱,非浅少也。”^③ 他一再强调,台湾实为东南沿海之封疆要地,非寻常岛屿可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蓝鼎元也提出诸多行之有效的治台建议:

(一) 反对将台湾镇总兵迁移至澎湖,主张添兵设官,增强台湾北部的防务力量

由于台湾孤岛悬于海外,又曾被郑氏占据,成为抵抗清朝政府的基地,当时朝廷人士多“以台湾险远,欲墟其地”,有意采取“守澎湖,徙台湾人民而弃其地”的策略。蓝鼎元对此极力反对,他在《论台镇不可移澎书》中,直截了当指出了部分朝廷官员以为澎湖一区可以控制全台的错误想法,他说:“不知台之视澎,犹太仓外一粒耳。……以澎湖总兵控制台湾,犹执牛尾有毛欲控制全牛……总无所用。”^④ 由于蓝鼎元的坚持,终于说服了闽浙总督满保据以上奏朝廷,提督姚堂、巡抚御史黄淑墩也给予呼应支持,台湾镇总兵最后才没有移到澎湖。现在看来,蓝鼎元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不

^① 蓝鼎元在鳌峰书院的时间,至少应该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四十八年(1709),时张伯行延聘其入鳌峰书院。张伯行《鹿洲初集旧序》曰:“己丑秋七月,告余归里,出所为文一集,请余弁数言简端”,说明蓝鼎元于己丑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即辞别张巡抚归家,《上张大中丞书》中又说:“曩侍执事一年”,可说明蓝鼎元这阶段在鳌峰书院的时间不过一年左右。但辛卯年(康熙五十年,1711),蓝鼎元祖父辞世之后,他应该又曾赴鳌峰书院,因为癸巳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蓝鼎元母亲去世时,蓝鼎元在福州。《先慈节孝许太孺人行状》中曰:“越五日,知不起,乃命驰书之三山,召不孝鼎元。”可知,康熙五十二年的时候,蓝鼎元在福州。其《上张大中丞书》中也曾说道:“今且勉强经营,若得苟完一二,即疾趋赴省,恭承至教,固所愿耳。”由此可推知,在蓝鼎元祖父逝世后,他又曾回到鳌峰书院,直至其母亲去世,这是第二阶段。此后到充当蓝廷珍幕僚之前,蓝鼎元可能未再离家,因为朱轼《行述》曰:“盖自庚寅(1710)至庚子(1720),杜门读书者十有一年”。

^② [清]朱轼:《行述》// [清]蓝鼎元:《滙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③ [清]蓝鼎元:《滙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49页。

^④ [清]蓝鼎元:《滙洲全集》,蒋炳钊、王钊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61-562页。

仅台湾总兵不能撤离，蓝鼎元还主张要进一步加强台湾的防务力量。他说，台湾幅员辽阔，地广而兵少，特别是北部军事力量空虚。因此，他建议在半线（今彰化）添设守备有营，在淡水八里坌设巡检一员，以佐半线守备之不足。又在罗汉内门（今高雄）设千总有员，在最南端的琅峤（今恒春）也设千总有员。这样一来，整个台湾连为一体。蓝鼎元又主张募民为兵，实行屯垦，也可以允许官兵携带家属助耕。这样既充实了军力，又开垦了土地，发展了经济。

（二）向台湾北部拓展，增添县治

当时台湾的府县都设在以台南平原为中心的西南一带，难以对全台实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因此，蓝鼎元建议，在虎溪尾以北，大田溪以南增设彰化县，驻扎半线。又鉴于淡水关系全台形势，建议设淡水厅。他还建议将来在虎溪尾、竹塹埔都可以设县。他的建议后来都得到了实现，“其后增设彰化县及淡防厅，升澎湖通判为海防同知，添兵分戍，皆如其言。”^①对此，连横赞叹曰：“善乎鼎元之言也，天下气运所趋，每每自北而南。而台湾则自南而北。郑氏之时，仅有承天、浊水以北，羈縻而已。及朱一贵平后，半线作县，而竹塹置淡水厅，戍兵保民，以启北鄙，筵筵乎且日进矣。光绪元年，台北建府，而新竹为县，北鄙之富庶几迈台南。前之所谓番地者，无往而不为汉人拓矣。经营缔造，以迄于今，是谁之力欤？语曰：作始也简，成功也巨。乌乎，可不念哉！”^②

（三）主张开禁，让渡台人员携带家眷

在镇压郑成功抗清活动的过程中，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迁界移民，并且严禁大陆人员赴台。统一台湾后，清政府依然坚持赴台的大小官员，均不许携带家眷。对于这一做法，蓝鼎元也给予极力反对。他说，台湾居民多来自闽粤两省，家眷大多留在大陆，他们在台湾无父母妻子宗族之系累，四处流窜，为害地方。蓝鼎元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有室有家。有了家庭之后，这些人必然安守本分，勤于稼穡。于是，他建议，如果此前已经来到台湾而妻子儿女还在大陆者，都要任由她们渡台团聚，而且，以后凡是要赴台耕种者，务必携带家眷，才能发放牌照。蓝鼎元认为，这样，官吏才可安心，有家室者便会致力于生产。蓝鼎元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这一做法不仅增加了劳动力，使得台湾肥沃的土地得到开垦，也加强了台湾的稳定和发展。

（四）主张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反对迁民划界

朱一贵叛乱平定之后，清政府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再一次出现暴乱，不惜实行焦土政策，采取了迁民划界的措施。清政府下令，必须将山中居民尽行驱逐，房屋尽行折毁，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断，不许一人出入。蓝鼎元对此也极力反对。他认为，不仅不能驱赶，而且应该鼓励人民尽力开垦荒地，因为田地一开垦，则刁民无处藏身，就不敢恣意妄为。生番也可由此渐次招抚，化为熟番。蓝鼎元还主张，对于新开垦的田地，万万不可增加赋税。人民有利可图，必然努力开垦耕种，最后，政府所得到的赋税总量就自然增加了。

（五）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处理台湾当地土著——番人

由于生存习俗的巨大差异，汉族人来到台湾后，汉番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蓝鼎元通过深入考察当地土著的生活习俗，提出“理番”的诸多主张。他认为，理番不应看成一项孤立的事情，应该与拓地设县、听民垦荒以及振兴文教等多种措施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逐步把“生番”化为“半熟”，进而化为“熟番”，最后让汉番人民和平相处。蓝鼎元这些切合实际的建议，成为后来治理台湾的官员们学习参考的重要材料，对台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下转第40页）

① 连横：《台湾通史·蓝鼎元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黄榦中庸体用论发凡

张新国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中国哲学的体用论至宋明理学益更精微。而在宋明理学中, 体用论以其内在逻辑依次展现为不同的具体理论形态, 具有与其宏观思潮相一致的理论品格。朱子学及其之后的理学体用论主要造端于中庸“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域。黄榦中庸体用论全面继承和集中展现了朱子学体用论, 进一步诠释和重建了有体有用的儒者之学, 在更深微的理论层次上推进了儒学发展。至此, 道体流行作为一个理论成果对理学向更精细的层面发展并藉此开拓儒学的新样态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道体; 流行; 体用论; 本体论; 形而上学

体用论随着儒学在宋明理学演进过程中实现形而上学的建构与发展而逐步深化。“体”与“用”, 在与其他概念和命题相关联的同时, 逐渐独立化为具有自身内涵与演变方向的学术观念。体用论真正被阐释和标举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道学范式, 至朱子而完成。但朱子后学, 尤其是黄榦通过阐发中庸思想, 真正将这一思想落实为道学话语锁链中的一环, 其意义深刻, 对后来明代心学各种形态的道体流行思想的形成具有思想递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宋明理学自朱子后学即已开始的去实体化学术演进脉络与理学“体”与“用”关系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一研究需要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一、黄榦中庸体用论的理论背景

张岱年先生在论述“中国本根论之基本倾向”时说:“宋代道学家言体, 意义较更精微。”^①张先生所言之“本根论”, 除却其各自理论形态不同外, 在概念指称上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本体论”; 其所言之“体”可指超验的“本体”, 但这种理论形态的出现在理学中是比较晚的。在此之前理学所称之“体”指代的是事物之“体质”。实际上, 朱子在解释“体”时也经常如此说。只是朱子在继承前辈概念的同时, 对其作了形而上学的演绎和推进。这在理学史上具有理论开创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朱子哲学的体用论还兼有继承和创新的两面的话, 朱子后学若干思想家则主要接受和大力阐发为朱子开创的新的诠释范式。黄榦中庸论中所着力发挥的体用论可以看作是对朱子道体流行思想的集中阐发和展示。以至于全祖望在《勉斋学案序录》中说:“嘉定而后, 足以光其师传, 为有体有用之儒者, 勉斋黄文肃公其人与?”^②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朱子门人后学研究”(首席专家及责任单位: 杨柱才教授、南昌大学; 项目编号14ZDB008)。

作者简介: 张新国, 男,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道德哲学。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第8页。

② [清]黄宗羲原著, 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2020页。

宋初，儒家学者对于道之体的思考已经开始。但与朱子及其之后从形而上学对道体进行把握和诠释，宋初学者对道之体的思考还停留在“圣人之道”的“道理”层面，相对具有朴素性。胡瑗门人刘彝回答神宗皇帝问时尝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①。“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固然对于形上学诠释具有开放性，但在此主要还不是形上学意义上的“道体”说，有时还指此时期比较重视的“礼”之体。南宋黄震说：“先生明体用之学。”^②也应在此意义上理解。朱汉民在将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学术理路作对比时说：“正由于理学家采用了体用论的方法和视角，才使得他们通过重新诠释的经典，将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历史文本发展为具有形而上本体意义的哲学体系”^③整体概观，此判断是很有见地的。

相对于宋初，儒学发展到北宋五子时期，在回应佛道和重建儒学的双重作用下，儒学心性论和宇宙论逐渐深入到形而上学层面。张载亦曰：“敦厚而不化，有体而无用也；‘大德敦化’，然后仁智一而圣人之道备。”（《正蒙·神化》）横渠哲学以《中庸》《易传》为宗，其道体思想转手到朱子学中，具有更明确的儒学形上学理论形态，此仅作展示，暂不展开。二程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揜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④此段为二程门人李端伯所录，从文脉来看，为程颢所言可能性较大。与宋初儒学从“有体、有用、有文”论政治维度的圣人之道和朱子学贯通心性论与政治学的形上学体用论相比，作为中间环节的程颢的“易体、理道、用神”道体论以气论性分析比较细腻。朱子对于这种生生之体论道体的理论模式深有继承。陈来先生认为，朱子中和之悟后认为心体之体不是体用对勘的理念论，而是取程子“其体则谓之易”之“变易的总体”。陈来先生说：“这一次中和之悟的意义即在于在对未发的追索和理解上，朱熹已从实践的体认功夫转向理论的心性哲学。”^⑤在其近著《仁学本体论》中论“道体”时，陈来先生依然将此表述为“变化生生流行不已之总体。”^⑥这揭示了其对于朱子后学，乃至明代心学、特别是阳明体用一如的良知流行说影响深刻。实际上，阳明也多称赞明道，并将其与儒门颜子并论。语类中学生问：“‘全体大用，无时不发见於日用之间’。如何是体？如何是用？”曰：“体与用不相离。且如身是体，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只此一端，体、用便可见。如喜怒哀乐是用，所以喜怒哀乐是体。”^⑦子的回答立足常识，贯通超越的道体，认为道之体用元不相离，即体见用，用中含体。而相对于朱子，门人黄榦将其继续推进，以中庸为载体将体用论突破为天地间的道体流行论。这是对朱子生生道体和一体论道体的综合继承和突破。

杨儒宾说：“理学体系虽然复杂，但主流理学派别对先天的本体之肯定及性天相通境界之追求，大概不会有什么出入。他们所提出的重要命题，基本上是为体用论作注脚，这是贯穿理学思想史的大

①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0页

③ 朱汉民：《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④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页。

⑤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⑥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14页。

⑦ [宋]朱熹撰：《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88页。

本大宗。”^①需要交代的是，体用论的哲学化及其演变在理学中并非一开始就是形上学的，而是具有一个缓慢而清晰的演变历程。这个历程的展开符合儒学以新的形态在宋明新时期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构成黄榦中庸体用论的主要理论背景。

二、黄榦中庸体用论的理论含蕴

张立文先生在其“朱熹的体与用范畴”时说：“‘体用’范畴正是在与各个时代思潮相结合的过程中，丰富自身，发展自身，凸现出它的生命力。因此，必须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来研究‘体用’范畴。”^②朱此理论对于黄榦体用论也是适用的。正像历代学者所承认的，朱子中庸论以“诚”为枢纽，为宋代新儒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指出朱子门人后学在这一点上与朱子之同并非难事，而探究门人后学在哪一点上对朱子本人哲学理论有突破显然更加重要。经过仔细分析可发现，作为朱子第一弟子的黄榦继承朱子以“诚”论中庸，而其在本体论上分体用对于在道体流行理论上构成对于朱子哲学的突破和创新，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并直接构成宋明新儒学演变的重要一环。

黄榦在其《中庸总论》中说：“程子以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先生以诚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示人切矣。”^③在黄榦看来，程子以“始、中、末”言一理与万事的关系，在朱子“诚”之体的视域中可以观察得更清楚，进而将诚之道体分体用，显然是在朱子哲学基础上迈出的合乎逻辑的一个新进展。正如朱子所引述：“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④程子所言是对于《中庸》其书之著作目的和价值的贞定，朱子继承此点，并以“诚”对此加以点明。其重要意义在于在从实质上确立了《中庸》对于新时期儒学重建的本体意义。以“诚”论“中”与“和”更是在存有论上对中庸的重要概念加以阐明。黄榦对此理解和阐述可谓详且当。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以“诚”论中庸，并且朱子哲学本身不乏“体用”观念，尤其是在中庸论中也是有的，但直接以“诚”分“体用”，在实体论、本体论和价值观相统一的道体流行意义上论述中庸的，是黄勉斋对于朱子中庸思想的推进和发展。黄榦说：

窃谓此书皆言道之体用，下学而上达，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与“道”，则性为体而道为用矣。次言“中”与“和”，则中为体而和为用矣。又言“中庸”，则合体用而言，又无适而非中庸也。又言“费”与“隐”，则分体用而言，隐为体，费为用也。自“道不远人”以下，则皆指用以明体。自言“诚”以下，则皆因体以明用。“大哉，圣人之道”一章，总言道之体用也。“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之体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圣人尽道之体用也。“大德敦化”，道之体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圣”，则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道之体矣。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用即体，体即用，造道之极致也。虽皆以体用为言，然首章则言道之在天，由体以见于用。末章则言人之适道，由用以归于体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谨独，与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已，是

^① 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从性命之书的观点立论》//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年，第113页。

^② 张立文：《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8页。

^③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

^④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4页。

则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书，所以必言夫道之体用者，知道有体用，则一动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无一毫人为之私也。知道之有体，则凡术数辞章非道也。有用，则虚无寂灭非道也。知体用为二，则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体用合一，则从容中道，皆无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①

对于“术数词章”之学与“虚无寂灭”之道的排击是程朱理学的客观传统，以道的“体用合一”来纠偏救弊、重构儒学也是黄榦中庸体用论的重要使命。其“全夫道之体用”思想宗旨与朱子《大学》“格物补传”中“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内在理路是相通的，只是黄榦的一元论思想对于朱子哲学是一个超越。在《中庸总说》中，黄榦进一步详言上述思想曰：

或者问中庸之书，言道之体用，则既闻之矣。戒惧谨独、仁智勇之德，与夫诚之一言，所以全道之体用者，可得而详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无不善者。将有过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于诚，则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则子思子之所忧也。若昔圣贤所以立教垂世，不过欲人全其固有而无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异，而开导之方，亦各不同。或举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随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隐也。言之缓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学，不可以凌节而实也。子思子袭孔圣之余训，继曾子之的传，览古先圣贤教人之旨，鉴后世学者为学之弊，作为中庸之书，其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则如言道之体用者，亦即明且尽矣。至于学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复包罗而极其详且切也。盖尝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惧谨独，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无不善者而为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简而易行，学者于此而持循焉，则吾之固有而无不善者，将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仁智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于气稟之清浊，物欲之多寡，而有异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终之以勇，而后气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无不善也。未言诚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见天下之理无不实，欲人实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实也。此即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惧谨独者，敬存动察之功。能若是，则吾之具是性而体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仁智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则由性以达夫道者，举合乎中庸，而无过不及之差也。曰诚者，则由人以进夫天，圣贤之极致也。是非其言之极其详乎？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谨独于至微至隐之中，则所谓静存动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继之以仁，曰仁矣而继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则所谓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诚者，本于择善固执之始，而成于无声无臭之极，盖至于所谓大而化之。过此以往，莫之或知也者，岂非又极其切者乎？若不极其详，则学者用心，或安于偏见；不极其切，则学者用功，或止于小成。此子思子忧虑天下后世而为是书也。^②

由此可见，黄榦以“体用”为模式把握朱子中庸诚体思想。而在朱子哲学思想中，首先，体用范畴亦被强调，但体的意义在本源上究竟是高于用的。如朱子尝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③其次，朱子论“诚”更多是指圣人对于道体的实有诸己之德。如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则善而固执之者也。”朱子论此时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

①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6页。

③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①很明显，朱子侧重从圣人达天德，未达于诚者即就自身格致诚正，实用充拓其心之德之功。而黄榦侧重于以朱子思想为基础，在本体论和存有论上演绎中庸体用思想。而实际上，黄榦在比较高的思维预设上标举中庸体用思想，如其曰：

孔子之学，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体，恕即用也。“为天之道，于穆不已”，非道之体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传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传之孟子者也。道丧千载，濂溪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其言太极者，道之体也。其言阴阳五行、男女万物者，道之用也。太极之静而阴，体也。太极之动而阳，用也。圣贤之言道，又安有异指乎？或曰：“以性为体，则属乎人矣。子思以为天命；又以为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又以为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为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天下无性外之物’，属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性无不在’，属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体用，既分为二矣。程子之言‘性即气，气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则何以别其为体用乎？”曰：“程子有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自理而观，体未尝不包乎用。‘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之类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尝不具乎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色天性’之类是也。”或曰：“如此则体用既不相离，何以别其为‘费’为‘隐’乎？”曰：“道之见于用者，‘费’也；其所以为是用者，‘隐’也。‘费’犹木之华叶，可见者也；‘隐’犹花叶之生理，不可见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隐’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体用之未尝相离也。”^②

黄榦在如此高的层次上表彰和诠释中庸体用思想，在理学中并不多见。这一体用一如、道体流行的一元论思想后来以新的样式在新的理学范式中得到复现。在阳明心学中则是“良知流行”，在王夫之新气学思想中则是人的现实实践对道体的开显。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粗线条描述足以显示体用思想中“用”是如何赢得与体一样的位置并最终超越“体”而居于越来越重要的思想层次。黄以方录阳明日：“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传习录下》）刘宗周说：“吾儒之学，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③王夫之在注解张载《正蒙·神化》篇“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时说：“体者所以用，用者即用其体。”陈来先生在阐释王船山关于《中庸》首章思想时说：“船山所说的用，是指对于体的运用、实践。”^④体用模式中用的凸显与理学心性哲学向实践哲学演变的理论趋势是一致的。但总体上，中国传统体用思想与西方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传统的形上理念不同，而是更加关注通过人对于道体的实践领悟和表现道之本体。陈来先生说：“中国的实体论不是关注实体的属性、样式，而是关注实体的发用、流行。而如何处理实体和大用的关系，是直到中国现代哲学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⑤此语切中肯綮。

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5页。

③ [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82页。

④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⑤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05页。

三、黄榦中庸体用论的理论意义

究其实，黄榦中庸体用论的理论意义就含蕴在该体用论思想之中，而将其体用论的理论意义单独加以阐释旨在阐明其对于朱子哲学的突破和推进，即其道体流行意义上的体用思维结构。

如上所述，朱子哲学的体用思想主要是狭义上的内在本质与外在显像和运用。陈来先生在论及王船山“中和皆体”时说：“朱子以内在之根据为体，以外发之表现为用。”^①此语诚然，而黄榦所言之“体”主要是道体流行的统体、整全和总体；言流行，是在强调此体兼用而言。在回复胡伯量时，黄榦说：“道体之说，此更宜讲究。谓但指隐而言者，岂所以为道体之全邪？体字不可以体用言，如今所谓国体、治体、文体、字体，亦何尝对用而言邪？所谓道体者，无物不在，无物不然，流行发用，无少间断。如曾皙者，真是见的此理，然后从容自得，有以自乐。今之局促迫狭，寻行数墨辄碍者，岂亦于此有未洒然者邪？主静、致知两事，相为经纬，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见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②由此可见，黄榦体用论所言之“体”并非狭义上朱子哲学体用对勘的体与用，而是用即在此生生不息的道体流行过程中，用不与体相对。在回复叶味道时，黄榦更明确说：“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则兼体用，毕竟统体的又是体，各具的又是用。有统体的太极，则做出各具的太极。语大语小，则全指用而言，毕竟语大的是全体，语小的是用。天命谓性是未发，毕竟是体；率性谓道是人所常行，毕竟是用。大德而教化，毕竟是体；小德而川流，毕竟是用。若浅看，则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则又觉相似都凑。”^③黄榦依据其体用相对和体用无对互相嵌入的思维结构，予以把握和表述。此一段叙述除了强调其以统体论体用外，与上一层含义也有两点不同：一是，黄榦在体用一如意义基础上，认为统体无形的是体，具体体现到事物之中的道是用。如在回复叶味道时，黄榦曾说：“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之至，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返约哉？”^④二是，生生不息的道体发用并非一个自然过程，而是需要人尽“率性修道”之实功的。如在回复李公晦时，黄榦说：“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发于此身者，则如喜怒哀乐是也；发于此理者，则仁义礼智是也。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混然而无别矣。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其源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对而言，犹易之言气与道，孟子之言气与义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复微而难明，故当精以察之，则喜怒哀乐之间皆见其有当然之则，又当一以守之，使之无一念而不合乎当然之则，然后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⑤按“喜怒哀乐”在朱子哲学中属于情的范畴，情是心之所发。而黄榦在此说“喜怒哀乐”是“身”之所发，心性功夫实落在人身上，其所要彰显的体道行道的实践主体性无疑更明确和具体。这与朱子通过将“庸”解释为平常以在现世尽道德践行之功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黄榦以道体流行无间、生生不息之总体论体，以其体之具体化而见于人而言谓之用，此用

① 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②③④⑤⑥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8、30、29、30、32页。

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是即体显用，即用见体，这对朱子哲学狭义上的体用论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和推进。在回复杨志仁时，黄榦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要当以是观之，塞天地，贯古今，无往不然。仁义礼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以成万物，人以是心而成万事，故曰天体物而不遗，犹人体事而无不在也。”^⑥程颐易传序言中始倡“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学发展到朱子，理的先验性和主导型是愈加突出的。而在体用论上，体相应地被凸显。此学术逻辑在于儒学在通过构建其形而上学而对自身加以重建时，需要不断凸显道体的存有性。此逻辑至少从程颐经朱子到黄榦是一致的，尽管其具体理论形态不一。在理论内涵上，黄榦中庸体用论可以看作是通过发展朱子体用论，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归到程颐体用一源的理论上。这一重要理论发展在担保理学道体存有性的同时，将儒学精神即其价值性一起加以表彰。这种融存有性与价值性为一的理论模式的确将新儒学又推向新的理论高度。从更广的意义来看，黄榦中庸体用论的这一创新为宋代理学向明代心学的演进准备了条件。

(责任编辑：林日杖)

(上接第33页)

四、结语

蓝鼎元虽为一介书生，却能参戎幕而建奇功，他对于治理台湾的一系列建议也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肯定。史家以为：“鼎元著书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①可以看出史家对蓝鼎元的高度推崇。蓝鼎元的治台主张，对台湾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雍正三年（1725）至雍正十一年（1733），蓝鼎元历任内廷校书、出知普宁、潮阳县令、广州知府等，颇有政绩，对以后潮州的影响很大。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蓝鼎元是一个有体有用的儒者，他既有经国济世的思想，又有定国安邦的策略，是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影响下的一个典型，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陈颖)

^① 连横：《台湾通史·蓝鼎元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李纲墓祠考述

郑淑榕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李纲历仕三朝,是南北宋之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艰危之时,许身为国,正言直谏,秉笔直书,却屡遭贬谪,辗转迁徙,足涉多地。所到之处,或促进文学繁荣,或团结爱国志士,或保全百姓,免遭屠戮。自宋以来,多地建有祠堂祭拜、纪念李纲,彰显其名声,铭记其功德。时至今日,历代所建祠堂多有损毁,甚或不存,亦有新创者,然于创建缘由,又有讹误。本文予以稽考叙录,并辩证讹误。

关键词:李纲;墓;祠堂

李纲是两宋之际重要的闽籍抗金名臣,作为一代民族英雄,李纲以其高贵的政治人格,不屈的民族气节赢得同时代以及后人的尊敬。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追随他,在行动上支持他,还修建墓、祠纪念他。自宋以来,修有李纲墓一座,建有李纲祠堂(纪念馆)多处,今将李纲墓及散落各地的李纲祠进行考察,述其修建始末,辨正错讹,并对存废、修缮维护情况加以说明。

一、福州李纲墓

李纲墓仅有一处,在福建省会福州。绍兴十年(1140)正月十五,李纲薨于福州,十二月十四日,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之原,即今福州闽侯荆溪光明湖里自然村大嘉山南麓。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十三:“李忠定公墓,在县(侯官)十九都大嘉山,由桐口入里许。”^①墓冢坐北朝南,掩映在青山绿水间,陵园内有众多名家石刻。墓前有“古社稷臣”石牌坊,神道长约110米^②,旗杆夹、石望柱、石獬豸、石狮、石马、石翁仲分列其旁。清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福建巡抚张师诚应陈庚焕诸人之请,重修李纲墓。十七年(1812)八月十五日,福州士林公祭李纲,主祭游光绎^③。1961年5月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1984^④、1998至2003年三度修缮^⑤,至今保存完好。

李纲墓址原为唐神宴塔基,由此还引发一段公案。世人多以为因葬李纲之故,神宴墓塔方移鼓

作者简介:郑淑榕,女,福建警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文。

① (清)徐景惠主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府志》(中)卷二十三“冢墓”,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页。

②⑤ 曾江:《李纲陵园胜迹》,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7页。

③ 参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④ 张天禄总编、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林伯方(册)主编:《福州市志》第7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02-503页。

山。如南宋四明人赵蔗境有诗云：“如何神宴塔，移作李纲莹，见说山中石，不平空自鸣”^①，清人朱珪《清泉寺》诗亦云：“桓桓忠懿王，神宴来相招。香花供百戏，圣箭通九霄。沙溪避忠骨，移塔凌山椒。”^②考神宴塔之迁徙与李纲墓之安葬，前后相距一百八十多年，赵、朱之说于史无据。

释神宴（863-939），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俗姓李。幼恶荤膻，乐闻钟梵。年十三，出家卫州（今河南淇县）白鹿山受业，后得法雪峰义存禅师，赴闽王之请，为鼓山涌泉寺开山祖师，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奏赐紫袈裟，赐号“定慧大师”，住鼓山三十余年，学徒云集。寿七十七，腊五十八，石头宗第六世，著有《鼓山国师玄要广集》一卷。神宴于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六月十一日圆寂后，王审知亲选墓址，建墓塔，塔址即今李纲墓所在地。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神宴墓塔迁葬鼓山涌泉寺^③。

然，不实之词，事出有因。释元贤《鼓山志》卷：“宴国师葬桐口之沙溪，以显德四年迁归鼓山上方。后第三代了宗大师迁化，复葬于国师塔旧址。则葬李忠定公时所移者，乃了宗塔，非国师塔也。”^④据此，安葬李纲时，确有迁僧人墓塔，只是所迁者为了宗塔，而非神宴塔。了宗大师即神宴法嗣、鼓山涌泉寺第三代住持释智岳。释智岳，福州人，俗姓高。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后游方，未久，寻归鼓山，举似国师神宴。显德六年（959）次补涌泉寺第三世，宋乾德五年（967）迁化，葬于神宴墓塔旧址封树^⑤。

二、各地李纲祠

李纲坟莹只有一处，在福建。但李纲祠堂却有多处，据笔者考证，除福建外，海南、广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皆建有李纲祠。现论述如下：

（一）海南李纲祠

海南李纲祠在海口市东南方向的五公祠内。清光绪十五年（1889），雷琼道台朱采在主持重修苏公祠的同时督建五公祠，以此纪念唐宋时期贬谪至此的五位历史名人，其中之一便是李纲，另外四位是：唐相李德裕，宋相李光、赵鼎，以及宋臣胡铨。堂成，朱采撰联于厅柱：“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上联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之情，下联既表达了对后人的期许，也说明了修葺五公祠的目的意义^⑥。

（二）广东李纲祠

广东李纲祠堂位于湛江雷州西湖公园十贤祠内。十贤祠始创于宋咸淳十年（1274），清嘉庆九年（1804）重修，1984年再修。李纲与寇准、苏轼、苏辙、秦观、王岩叟、任伯雨、赵鼎、李光、胡铨

①（清）黄任撰：《鼓山志》卷十四//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49-50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第957页。

②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鼓山艺文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③（清）纪荫编纂：《宗统编年》卷十七//《续藏经》第147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清）黄任：《鼓山志》，卷二、卷三，第139、156页；《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七，（宋）贖藏主编：《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

④（清）释元贤撰：《鼓山志》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876页。

⑤（清）释元贤撰：《鼓山志》，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3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54页。

⑥罗哲文、刘文渊、刘春英：《中国名祠·海口五公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4页。阎道衡、羊文灿：《见证千年海南五公祠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年版。

等两宋名臣皆在供奉之列^①。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之撰《雷州十贤堂记》，称颂雷州人“敬贤如师，嫉恶如仇”的美德^②。

（三）浙江李纲祠

浙江李纲祠有两座，一在杭州市，一在武义县。

1. 杭州李纲祠

杭州李纲祠在洞霄宫内，洞霄宫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大涤山下。该祠始建年代不详，并祀朱熹。清嘉庆元年（1796），道士张礼恭重修宫、祠，桐乡（今浙江嘉兴桐乡市）人冯应榴为之记。一年后，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宋大樽、何元锡、李堂，拊黄道周于祠并祀之，祠遂以“三贤”名，秦瀛为撰《洞霄宫三贤祠碑》^③。今宫、祠皆毁，仅存遗址。

2. 武义李纲祠

浙江李纲祠位于金华市武义县北香山。该祠原址在武义夏川（今武义夏加畈村），始创于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至1995年，该祠已承七百多年风雨侵蚀，渐趋凋敝，李氏婿、邑人马麟将其买下，迁至今址。2006年，历时十二年，耗资百万，修缮一新的李纲祠正式对外开放。祠内马麟《李忠定公祠堂记》及徐从河《重修宋丞相李纲祠碑》于李纲祠修建、迁址、修缮始末叙之甚详。

（四）江苏李纲祠

江苏李纲祠有三处，一在苏州，其余两处是在无锡。

1. 无锡李纲祠 无锡李纲祠有两处，一在胶山，一在惠山。

（1）胶山李纲祠

无锡胶山北麓有胶山寺，又名兴化寺、弥勒寺。建炎间（1127-1130），因李纲得请以奉先世祀改称崇亲报德禅院^④。李纲去世后，邑人于胶山寺西建李忠定公祠堂，至元，毁于兵火。明正德四年（1509），安国于原址重建李纲祠，明年，祠成，邵宝为撰《胶山重建宋丞相赠太师谥忠定公祠堂碑》^⑤。嘉靖十三年（1534），祠废，十七年（1538）冬至十八年（1539）春，安国子如山再将其修葺一新，并撰《胶山改建宋丞相李忠定公祠堂记》。民国时期，李纲祠尚具规模，然今已无存^⑥。

（2）惠山李纲祠

惠山李纲祠亦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是年，邵宝居乡，建尚德书院，祀李纲，祠成，撰《尚德书院祠李忠定公碑》^⑦。正德十一年（1516），移祠于周忱祠旁。清康熙五年（1666），李纲后裔李廷煌等建祠于日月池旁，“文革”中，祠毁，2005年于原址重建李纲祠^⑧。

2. 苏州李纲祠

苏州李纲祠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系当地官府应李纲后裔之请而建，今不存。秦瀛《李忠定公堂碑》云：“而长洲之祠则肇建于嘉庆五年，为最后，盖公裔之自无锡迁长洲者，请于大府而成之者也。……祠在长洲县二十二都下九图。”^⑨长洲即今江苏省苏州市。

① 牧野主编：《雷州历史文化大观·十贤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② （宋）文天祥撰：《文山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9页。

③ （清）秦瀛：《小峴山人诗文集》文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6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④ 《无锡县志》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页。

⑤ （明）邵宝撰：《容春堂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⑥ 钱建栋：《胶山胜迹》//《无锡史志》，1992（19），第21-22页。

⑦ （明）张恺撰：《正德常州府志续集》卷六，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250-253页。

⑧ 参无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无锡市志》第4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

⑨ 《小峴山人诗文集》文集卷五，第228页。

（五）河南李纲祠

河南李纲祠在开封市，创建年代不详，毁于明季水灾。《祥符县志》云：“李公祠，在县志北，祀宋相李纲，创建失考，明季河水圯。”^①今不存。

（六）湖北李纲祠

湖北李纲祠在崇阳县。

（七）安徽李纲祠

安徽省李纲纪念馆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新市镇。该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由新市镇李纲后人捐资兴建，始创于2009年^②。

以上十祠，杭州洞霄宫、苏州、河南、湖北五祠已毁，其余五祠皆修缮维护完好。五祠中，最早建者为广东雷州与浙江武义，皆成于南宋末年，最迟建者为安徽当涂，系今之李纲后人所为。

（八）福建李纲祠

闽之建州、邵武、宁化、长汀、福州等地都先后建有李纲祠堂。今以修建时间先后为序，逐一论述。

1. 建州李纲祠堂

建州李纲祠位于黄华山，建于绍兴初，为生祠。绍兴二年（1132），韩世忠率军攻打范汝为时，本欲血洗建州，因为李纲的阻止，放弃了屠城计划。建州人念李、韩二人不杀之恩，于城东北黄华山麓建两祠堂，祀李纲与韩世忠。后两祠皆毁于“建州戊子之役”。清人蒋蘅游历至此，见两祠倾圮败落，遂倡议将两祠合并重建，并将《瓠粤铭》镌刻于黄华山。不果，遂作《黄华山歌》，颂扬李纲与韩世忠的事迹，诗云：

黄华之山秀而温，绰如名士垂纶巾。双溪回环襟带合，猗瀾西注蔚人文。
 笃生大儒继濂洛，五星夜聚奎楼分。间气千年有未泄，汉唐以下犹狂獫。
 绍兴之际大狼狽，小丑窃弄潢池浑。十万人家污贼土，豺豕狐貉盈都关。
 小朝廷切畿辅虑，招讨乃命师武臣。天兵忽从海道至，长驱直捣疑无人。
 兹上虽高随可据，俯瞰城中如聚蚕。拉泰山石压壳卵，挽银河水浇阴磷。
 计穷势蹙遂就缚，焦釜岂有潜游鳞。屠城令下谁敢阻，玉石不辨昆岗焚。
 是时忠定福州住，星夜驰赴韩王军。渠魁既歼胁从赦，活亿万命由一言。
 更悯吾民习惨戾，溺女实伤天地仁。至性尚忍残骨肉，大义谁复知君臣。
 尔辈幸免诛戮酷，宜安休养长儿孙。铭辞悱惻比训诂，遗黎流涕思忠勋。
 世变风移成乐土，竟化顽犷为柔驯。山川亦钟灵淑气，居然阙里称南闽。
 何人拓城东北面，时公茂绩垂遗篇。女墙包过山背后，形胜有若建瓴然。
 但惜水沟未修复，不及清献河沦涟。自从戊子遭屠毁，居民十九皆城迁。
 文献缺落故家尽，因讹袭谬嗟荒伦。忠定祠堂萤惑主，靳王香火鄂国专。
 二祠并废诚阙典，何异饮水忘其源。兹山佛殿昔倾圮，辉奎金碧俄重新。
 誠儒谁解考故实，俗子但知祈福田。何不合建二忠祀，瓠粤铭随勒贞珉。
 精爽相依山愈壮，笼葱佳气弥千年。我昔倡议行不果，长歌用告吾黎民。^③

2. 邵武李纲祠

① （清）沈传义、俞纪瑞修，黄舒曷纂：《祥符县志》卷十二“祠庙”，湖南省图书馆藏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② 魏俊、夏曾好：《当涂县筹建宋代抗金英雄李纲纪念馆》，《马鞍山日报》2009年8月24日。

③ 蔡振坚等：《建瓯县志》卷七“名胜”，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81页。

邵武李纲祠有两处，一在市区，一在乡村。

(1) 邵武市区李纲祠

邵武李纲祠，位于邵武市李纲路186号。该祠初名“丞相太师忠定李公祠”，始创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位于军学讲堂东，为邵武军教授、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徐元德所倡建，朱熹撰《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①，后毁。景定年间（1260-1264）移建于城东行春门外，元至正十六年（1356）迁建樵溪五曲，名樵溪书院。明洪武二年（1369），改书院为府学，祠废。正统四年（1439），复建于府学大成殿之东。成化六年（1470），迁建樵溪四曲之滨，嘉靖四十三年（1564），又迁南门下水寨白莲塘。清康熙二十二年（1638），复建于今址。清乾隆三十年（1765）、道光十五年（1836）、1938年均有修缮。1983年，县文管会将其收回重修，翌年竣工，辟为李纲纪念馆。1991年三月被列为福建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②。

(2) 水北镇一都村李纲寺

邵武还有一处李纲寺，祀李纲，在水北镇一都村，系2002年一都村民自行集资修建。

3. 长汀李纲祠

长汀李纲祠在刘氏家庙旁边的东山书院内，初祀文天祥，明万历年间（1573-1620），增祀李纲，春秋致祭^③。今书院与祠俱毁。

4. 宁化李纲祠

宁化李纲祠在县西南大忠祠内，明嘉靖间（1522-1566）始祀，1949年后祠毁，今不存。

5. 福州李纲祠

(1) 桐口大嘉山墓祠

李纲福州祠堂有三处，最早建者在桐口大嘉山李纲墓旁。该祠建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毁于崇祯六年（1633）。乾隆《福州府志》载“在西关外，祀宋丞相李纲。明正德十五年建，即公墓祠也。有公手勒二帝赐诏敕列堂中，明季毁。”^④曾异撰《谒李忠定公墓祠记》：“崇祯癸酉腊，余以送葬过桐口，始得与友人林异卿、赵十五谒忠定公墓……墓旁祠堂新毁。或曰风仆之，或曰人假手仆之……墓去郭近四十里。虽载在祀典，祠之存毁，当事者不必知，即知而不问。”^⑤崇祯癸酉即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

(2) 屏山李纲祠堂

屏山即越王山。该山位于福州市区北端，形若屏风，故名屏山，或平山。闽越王无诸平山南麓建“冶城”，故此山又称“越山”“越王山”。《榕城考古略》：“越王山，在城北，半蟠郭外，周回数里。其南曰屏山，以形若屏扆也。”^⑥

屏山李纲祠始建年代不详，乾隆二十七年（1762），特旨重修。陈庚焕《请申严防护李忠定公祠墓状》云：“今公半亩之祠，在闽县北城越王山麓，神寝仅存，民居杂货。祭金例在，岁祀频愆。”

^①（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1-3782页。

^②南平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南平市文化与出版局编：《南平市文史资料》第9辑《南平文物》，2004年版，第116页。

^③（清）曾曰瑛修、（清）李绶纂，王光明、陈立点校：《汀州府志》卷十三“祠祀”，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

^④（清）徐景熹主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府志》（中）卷十四“坛庙”一，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⑤（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一。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第1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5-568页。

^⑥（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卷上“城榭”第一；（清）林枫、（清）郭柏苍、郭白阳辑撰，张天禄主编，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榕城考古略·竹间十日话·竹间续话》，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陈寿祺《福建通志》卷二十“坛庙”云：“李忠定公祠在西门外桐口，祀宋丞相李纲，明正德十五年建，即公墓祠，有公手勒二帝赐诏敕列堂中。一在屏山，毁。”^①嘉庆十五年（1810），郡人重修。道光九年十月，移建西湖，遂废修^②。

（3）西湖李纲祠

西湖李纲祠堂始建于清道光九年（1829）十月，翌年正月竣工。同治五年（1866）、光绪丁酉年（1897）两度重修^③。几经历史变迁，今仅存“宋李纲祠故址”。该祠倡建者为云南人程含章，林则徐有襄助之功。

程含章（1763—1832），又名罗含章，字象坤，号月川，景东（今云南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人，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曾任福建、河南布政使，广东、山东、浙江、江西巡抚，工部左侍郎。道光七年（1827），因劾浙江巡抚刘彬士，降补刑部员外郎，八年授福建布政使，后以病乞归，十二年卒于景东，《清史稿》有传。程含章是著名的水利专家，有诗文传世。

程含章敬重李纲，不惑之年读李纲传，唏嘘流涕，清道光八年（1728）至道光十年（1730），程含章任福建布政使，恭往拜谒越王山（屏山）李纲祠，“至则门墙倾颓，小屋三间，在蒙茸中，神像薰黑不可识，心窃伤之，亟图修治。”因之，程含章与林则徐议重葺李纲祠。是时，林则徐丁忧居乡，主持疏浚西湖。由是“得西湖荷亭旧址，端正宽平，湖山秀杰之气，四面环拥，甚盛概也。”

福州西湖李纲祠得以修建，程含章功不可没，然诸多方志史料，忽略了程含章的贡献，将之完全归功于林则徐，如：郭柏苍《重修福州西湖宋丞相李忠定公祠堂记》云：“福州西湖李忠定公祠，道光九年林文忠公所重修也”^④。再如张际亮《思伯子堂诗集》：“道光己丑冬，林少穆中丞于西湖建李忠定公祠，落成之日，曾赋诗纪事”^⑤。这些文献中均未言及程含章对于西湖李纲祠堂创建的贡献。这样的表述，既与史不符，又失公允。

福州这三处李纲祠属明清建筑，今西湖尚存故址，桐口仅存“李公祠界”碑，屏山则踪迹全无。

（4）长乐天王寺李纲纪念馆

除以上三祠，长乐天王寺内亦有李纲纪念馆。该馆始建于2002年，今仍在扩建中，倡建者乃寺僧释本法。释本法自云，之所以在天王寺建李纲纪念馆，是因为李纲曾在该寺住过，证据便是李纲的《荔枝后赋》与荔支冈题刻^⑥。荔支冈在天王溪畔，上镌“荔支冈”三字，未落款。冈与寒岩隔溪相对，岩旁为天王寺。曾江《李纲陵园胜迹》一书^⑦3与张端彬《吴航第一刹——天王寺》^⑧《李纲与长乐天王寺》^⑨二文皆持此说。张文属漫谈，考据不严。曾书引《藏楼笔记》，云：“天王寺隔溪潭上横刻‘荔支冈’三字，传为宋丞相李纲书。”《藏楼笔记》撰者为邑人李永选。李永选（1901—1972），字法贤，号俊卿、闲云、寿石，晚年号半文，岱峰（今长乐市首占镇岱边村）人，卒后，邑人张善贵为撰墓志铭。其一生著述颇丰，稿积如山，惜多散佚，《藏书笔记》亦未能免。^⑩张善贵《长乐金石志》卷二“荔支冈”条云：“《藏楼笔记》云：‘天王寺隔溪潭上横刻‘荔支冈’三字，传

① 陈寿祺等撰：《福建通志》卷二十“坛庙”《中国省志汇编》九，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545页。

②④ 何振岱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西湖志》卷八“祠庙”，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193—195页。

⑤ （清）郭柏苍：《葭跖草堂集》（卷中），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光绪戊子年（1888）郭氏丛刻本。

⑥ 转引自曾江：《李纲陵园胜迹》，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⑦ 释本法现为天王寺方丈，释传奋为住持。

⑧ 曾江：《李纲陵园胜迹》，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0页。

⑨ 张端彬：《吴航第一刹——天王寺》，《福州晚报》2009年7月11日。

⑩ 张端彬：《李纲与长乐天王寺》，《福州晚报》2010年1月9日。

⑪ 林乾良主编：《福建印人传》，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陈和栋：《李永选先生小传》，施祖永主编、政协长乐市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长乐文史资料》第7辑，2000年版，第119—124页。

为宋丞相李纲书。纲，邵武人。其所撰《后荔支赋》云：‘宣和己亥，余谪居沙阳。次年夏，始食荔支，尝为之赋。后十二年，岁在辛亥，寓居长乐，于今又四夏矣。备尝佳品，究见荔支本末，作后赋以订之。’‘荔支冈’之刻当在此时。‘辛亥’乃绍兴元年。纲寓居长乐，正张浚、岳飞出为招讨，秦桧参知政事之时。迨绍兴十年卒于福州。’^①因“荔支冈”题刻未有款识，故李永选云“传为”李纲书，李纲的《荔枝后赋》即是其推测的依据。前文已辨，此赋系绍兴四年，李纲居城东报国寺时所作。序文所云“长乐”是指“长乐郡”福州，而非“长乐县”。

天王寺，始创于唐大中七年（853），寺内先后建有烟萝亭、枕流轩、清心亭、松石峰、乐寿台、望江亭。《三山志》云：“（天王院）宾贤里。大中七年置。初，有檀木溯江潮而上，牧童取之，夜中发光。里人林倚梦其木谓：‘我北方毗沙门天王’。遂舍宅为寺。廉帅（杨）公奏，赐额曰‘灵感天王寺’。”^②明隆庆四年，寺僧建经堂、小轩二座。清初，王廷重建。乾隆二十四年（1759），邑人柯琼重修，额曰“寒岩”。道光二十八年（1848），邑人陈声琚、郑向奎尝修^③。

经检索，自李永选，始有将李纲与天王寺、荔支冈联系在一起的著作文章面世，此前的史乘文献中未见记载。李永选撰著之初颇为谨慎，云“传为”，然后来者引用时多忽略“传为”二字，且信者日众，由是有长乐天王寺李纲纪念馆之创建。

小结

因为耿直敢谏，力主抗金，李纲屡遭谗陷、罢黜，一生多在旅途奔波，辗转多地。足迹所至，或赋诗文，吟哦山川风物，或聚士子文人，雅集唱酬，或心怀天下，救民于水火。人们或念其旧，或感其恩，或敬其人，或为激励后来者，修建祠堂祭拜他、纪念他。自宋迄今，全国各地建有李纲祠堂或纪念馆十九处，其中九处在福建。李纲生于秀州华亭，长于江苏无锡，但其祖籍是福建。因为随父任职、访亲、贬官、退居等原因，李纲数次入闽，并最终长眠于闽地山水间。其在闽活动范围广，时间长，其言行对闽人影响更为深远，家乡父老对他的怀念之情自然又更深一层。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张善贵撰辑：《长乐金石志》卷二，油印本，福建师大图书馆，1998年版，第20-21页。

②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五“寺观类”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24页。

③ 参李驹主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长乐县志》（上）卷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元儒陈旅的儒学思想

——以《安雅堂集》为中心

顾海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陈旅为元代福建朱子后学门人, 以辞章之学名闻当时, 集中体现了闽中理学“流而为文”的倾向。在文学理论上, 陈旅提出“天地气运”决定文章盛衰的文学本体论, 发展了传统“以气论文”的文学观。根据《周礼》“乡三物”: 六德、六行、六艺不可或缺, 陈旅提出“道艺不二”的观点, 认为儒者“讲学明道”与诗人“吟咏情性”并不冲突。其笃守朱子理学, 强调理学的“工夫论”: “闲邪”、“诚意”、“慎独”、“思敬”、“谨严”、“学以治心”、“逊志时敏”、“以礼约身”等, 皆未出理学的藩篱。

关键词: 陈旅; 《安雅堂集》; 以气论文; 道艺不二; 笃守朱学

陈旅(1288—1343), 字众仲, 号荔溪, 福建莆田崇福里(今属秀屿区忠门镇)人, 《元史·列传》第七十七有传。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对其生平交游有详述。

(旅)父子彦, 兄震, 皆一时名士。旅幼孤, 资禀颖异, 其外大父赵氏学有源委, 旅得所依, 于书无所不读。稍长, 负笈至温陵, 从乡先生傅公定保游, 声名日著。用荐为闽海儒学官, 适中丞马祖常使泉南, 一见奇之, 谓旅曰: “子馆阁器也。”因相勉游京师。既至, 学士虞邵庵集见所为文, 慨然曰: “此所谓我老将休, 付子斯文者矣。”即延之馆中, 朝夕相讲习, 自谓得友。尝言曰: “自众仲来, 凡问学修己之事, 有益于愚陋多矣。”诸廷臣力荐, 咸以旅博学多闻, 宜处师范之选, 除国子助教。满考, 诸生为请于朝, 乞再任。元统二年(1334)出为浙江儒学副提举。至元四年(1338), 入为翰林应奉文字。至正元年(1341), 迁国子监丞。又二年(1343)卒。有《安雅堂集》十三卷, 虞集为序。林泉生称^①其“学博而通, 识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剧, 有兼人之能; 处患制变, 有济时之智”云。^②

全祖望云: “陈众仲之学, 乃其先世所得于赵南塘”^③。其父陈子彦博通经籍, 与郡人郑铎校勘史学家郑樵的《通志略》写本, 恢复了此书“联比詮次”的本来面目。^④陈旅卒后, 葬于杭州西湖北太学山。^⑤

陈旅以文擅世, 为文典雅峻洁、法度周密, 以力合于先秦古作及唐宋大家, 不徒以阿徇世好。

作者简介: 顾海亮, 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宋明理学、清代学术。

① (元) 陈旅: 《安雅堂集》“林泉生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 李清馥: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六“监丞陈众仲先生旅”,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明) 黄宗羲、(清) 全祖望: 《宋元学案》卷九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3089页。

④ 参(宋) 黄仲元: 《四如集》卷三《通志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浙江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二百三十五载: “元国子监丞陈旅墓, 成化《杭州府志》: 在西湖北太学山。”

“苏天爵辑《元文类》，其时作者林立，而不以序属诸他人，独以属旅，殆亦知其文之足以传，信矣。”^① 陈旅学问道义以当时文坛宗主虞集（1272—1348）为知己，故《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其列入“邵庵门人”^②。友人林泉生对陈旅的“学识才能”、“天资禀赋”、“文学造诣”有过精当的评价。

众仲学博而通，识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剧，有兼人之能。或者处危制变，有济时之智，惜夫用弗克究。而人所知者，众仲之文也，况称其文者，又未原其学欤。贯综该洽，人见其富也；精采振发，人见其丽也；天机之敏，人以为巧；法度之周，人以为密。乃若众仲之学，则封殖深厚，发无不茂，有本者如是也。君已极雄古，皇庆延佑以来，益以醇正典雅相尚，藹乎治世之音，非近代所能及也。且诸名家班班继继，视昔加多，又何盛欤？故国子监丞陈君众仲，亦以文擅世者也。^③

友人张翥评价陈旅说：“其制作，完然一代之雄盛，文人学士直视史汉魏晋以下，盖不论也。”^④ 陈旅天资颖异，学养深厚，故其文学造诣很高，为时人极力称许。

在文学理论上，陈旅提出“天地气运”决定文章盛衰的文学本体论。陈旅谓“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为天地元气之表象。人伦日用中的礼乐制度节文，即取象于元气之推荡流行，并随之而升降。且人为天地元气之所生，贤良之人的诞生，更有赖“山川清淑之气”之所积。“山川清淑之气”对文章创作、风格的影响甚大。在文学创作上，陈旅主张诗文以《诗经》风雅颂为旨归，讲求“平澹”的审美趣味。文辞“奇崛”、“平易”之度实难把握，诗文做到“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甚难。文章的极致是“辞淡而旨醇，貌直而思婉，声约而韵充”。“文章贵奇崛而忌奇崛，尚平易而厌平易”，做到“平易”不失之“奇崛”，有“非学力所能致”的先天因素。但后天的“学道”也十分重要，为文当根植于《六经》。理学家从道统的角度视《六经》之文为载道的工具，对文章辞藻的工巧、性灵的渲达加以贬斥。而陈旅从诗文创作的角度，以研读《六经》作为增进创作者学养，以《诗经》风雅颂作为诗文创作反映现实、服务社会教化的要求。陈旅根据《周礼》所载“乡三物”：六德、六行、六艺缺一不可，提出“道艺不二”的观点。其所理解的“道”更为宽泛、更具实践品格。陈旅认为古人学求其通，“道无往而不著”：文辞、理义、学术、政事皆是“道”的体现，儒者“讲学明道”与诗人“吟咏情性”并不冲突；古人文、武兼通，儒者当讲求“明体适用之学”，不应该局限于纸笔空言。

陈旅为学以朱子为宗，对理学的“理气论”少有论述，而对“工夫论”有更多的表达。陈旅提出“讲学以明理，制行以养气”，与朱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同义。其“工夫论”主张：“闲邪”、“诚意”、“慎独”、“思敬”、“谨严”、“学以治心”、“逊志时敏”、“以礼约身”等，皆未出理学的藩篱。陈旅认为“学”以求“心安于理”，在明体达用的思维下，“己安”并非最终目的，还要“安人”：推之以遗天下之人，以与天地万物共相感通，以达到天下国家大治，也是陈旅所推崇二程所谓“尧舜气象”的道德境界。在陈旅看来，所谓“尧舜气象”就是“为国以礼”。《尚书》“于变时雍”与《论语》“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就是“为国以礼”，君子期许“学”能施用于世，其德便如风偃草，泽被万物而万物不知其所以然。

其子陈籀辑陈旅诗文创《安雅堂集》十三卷。《元史·儒学传》载《安雅堂集》为十四卷，《四库提要》对此有所辨正：“此本仅十三卷，乃有张翥、林泉生二序，一作于至正九年，一作于十一

①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七“安雅堂集十三卷”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明)黄宗羲、(清)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9页。

③ (元)陈旅：《安雅堂集》“林泉生序”。

④ (元)陈旅：《安雅堂集》“张翥序”。

年。目次与焦竑《经籍志》相合，殆本传笔误以三为四欤。”^① 现存元刻明修本《陈众仲文集》、明祁氏澹生堂钞本《安雅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安雅堂集》。

一、以气论文

陈旅为元代辞章大家，在为《元文类》所作序文中，提出“以气论文”的文学本体论观点^②，为其文学理论的特色。人为天地元气之精华，感于物而动，发而著为文章，是古代文论家的一贯说法。陈旅认为，文章制作的工拙、盛衰，亦出于“天地气运”的盛衰。

元气流行乎宇宙之间，其精华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发而为文章焉。然则文章者，固元气之为也，徒审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于天地气运之盛衰，岂知言者哉？盖尝考之，三代以降，惟汉、唐、宋之文为特盛。就其世而论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数百年之久，天地气运难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荣悴概可知矣。^③

三代、汉唐、两宋为天下混一的盛世，文章亦随之而盛：“汉、唐之治不及三代远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风者，亦幸而际夫天地之运之盛也。赵宋巨儒载道之书，与欧、曾、王、苏数子之文，君子于是有所征矣。”^④而天下断裂的衰世，文士囿于气运之衰，文章便不足观：“昔者南北断裂之余，非无能言之人驰骋于一时，顾往往囿于是气之衰，其言荒粗萎冗，无足起发人意。其中有若不为是气所囿者，则振古之豪杰，非可以世论也。”^⑤“其运往治弛，则凡以文鸣者，皆靡然若绪风之泛弱弃也。”^⑥除非是豪杰之士才能不为天地气运所囿：“是气之衰，其言荒粗萎冗，无足起发人意。其中有若不为是气所囿者，则振古之豪杰，非可以世论也。”^⑦陈旅此种说法似受南宋陈亮影响，在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中，陈亮认为，汉唐为承接三代的盛世，社会历史的盛衰由“气”决定。

以天地气运决定的文章盛衰，刘禹锡为《柳宗元文集》所作序文即有言。陈旅引其说云：“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后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⑧陈旅认为，元朝即为继汉唐、两宋之后的“文章盛世”：“我国家混一以来，光岳之气不分，大音斯完中统。至元间，豪杰之士布列词垣难以一二数。”^⑨

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国以来，列圣继作，以忠厚之泽涵育万物，鸿生隼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庞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孰谓斯文之兴，不有关于天地国家者乎？^⑩

元朝四海混一，得天地气运之盛，文章振兴，蔚为大观，堪称文章盛世。^⑪

“天地元气”如何影响文章的盛衰？陈旅认为，人伦日用中的礼乐制度节文，取象于元气推荡流行。在某种意义上，“礼乐”附着于天地元气，并随之而升降。“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为

①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七“安雅堂集十三卷”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始于魏曹丕“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进一步发挥提出“体性”、“养气”、“风骨”等范畴，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旅“文论观”亦有体现：“虽张、苏、萧、李、常、杨之流，气逸辞雄，各自名家，终不能返于古，何哉？无所宗也。”（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宋景濂文集序》）有关元代以“理”、“气”论文从风格论、创作论、本体论的各派别，详参《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第四章“理气之辨：元人关于文学本体论问题的思考”。其认为“元代文论家多以‘气’论文，并由‘气本论’出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3页）

③④⑤⑦⑧⑩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国朝文类》序。

⑥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马中丞文集序》。

⑨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宋景濂文集序》。

⑪ 陈旅对元政权的高度认同，与当时隐逸之儒颇有不同，从他的交游便可领略。可参《安雅堂集》卷十三《元日表国子监》、《圣节表至元六年》、《翰林国史院元日表》、《拟中书省元日贺兴圣宫表》等。

天地元气之表象。

文章何与乎天地之运哉？元化之斡流，神气之推荡，凡以之而生者，则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尝观礼与乐矣，升降、揖让、周旋、扬袂之容，屈伸、俯仰、缀兆、繁瘠、廉肉之节，文之著也。而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圣人之以礼乐为天下也，治与运会，文从而生焉。世之为文章者，盖亦有出于此而已矣。^①

圣人以“礼乐”治理天下，便会化民成俗：“君子之身，礼乐之器也。政教修，礼乐之用行焉。礼乐之用行，民将不治而化矣”^②。天下大治之世，文章便会应时运而生。

人为天地元气所产生，贤良之人的诞生，更有赖“山川清淑之气”所积之厚。

天之生贤，犹农夫之治穡事也。地力不更休，不足以茂嘉谷；山川清淑之气积之不厚，不足以生大贤。天，至仁也，宁不欲数生大贤以惠斯民，顾亦有所甚难者矣。^③

大贤的诞生甚难，有待于天时、地利等因素。

游历名山大川能昌文气^④。“山川清淑之气”对文章创作、风格的影响甚大。陈旅以当时辞章名家柳贯（1270-1342）、黄滔（1277-1357）为例加以论述：

金华有二先生，曰柳公道传，曰黄公晋卿，皆以文章显名当世。予游荐绅间，窃获窥其述作。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杳莫穷其端倪；黄公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视，而部伍整然不乱。金华多奇山川清淑之气，钟之于人，故发为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⑤

山川清淑之气“尽洗尘抱，收清气而养之”^⑥，清静心得到护持，便无所嗜欲：“隐居清澹之乡，日与云烟水石相上下，悠然以忘老，则其诱于外者无所乎入”^⑦，柳黄二公以文章名于当时，即是受益于金华山川之秀。陈旅云：“道有勿行，则教于其乡。言有勿通，则写于孤桐。志气有勿宣，则放荡于山海之间。”^⑧女诗人李静方诗文“菑秀而温妥”，得益于山水清美：“闽中山水清美，钟于妇人女子者已若此，况道德文学之士蔚然为海内之所慕尚者乎？”^⑨“文章贵奇崛而忌奇崛，尚平易而厌平易。”^⑩创作者对文辞的奇崛、平易的度难以把握，文章的极致是“古之作者，辞淡而旨醇，貌直而思婉，声约而韵充。”^⑪柳公之文，如泰山云涌层铺叠涌莫穷端倪，可谓平易而不失之奇崛；黄公之文，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而部伍整然不乱，可谓奇崛而不失之平易。

陈旅认为《诗》三百、汉魏诗是诗文“平澹”的典型。晋宋间陶渊明诗为后世平澹诗之所本^⑫。

①（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马中丞文集序》。

②（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刘粹衷赴旌德令序》。

③（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上赵平章书》。

④陈旅云：“予又窃意天下之水，唯相激然后成文，不激则不能文也。及休沐之，余与豪坡诸公避西山大湖间，风挹水作声势，无异于昔时所见者。迨夫天开风定，向之怒涛舒而为平夷，一碧万顷，云光下映，尘埃不惊，翔禽游鱼，飞泳左右，靡不粲然可观。予方悟水之至文，原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文之妙者，其能越是乎。是知驾风鞭霆喷沙裂石者，乃文之粗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动中矩度者，方为文之至者也。…虽韩愈氏复生，论文之妙，亦不过此涛。但当如司马子长沂淮浮洛，历观海内名山川以昌其文气，则天下文之妙者将在涛矣。（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郑涛序》）”

⑤（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宋景濂文集序》。

⑥⑦（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静观斋吟藁序》。

⑧（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汪先生墓志铭》。

⑨（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静方诗集》序。

⑩（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跋段氏庸音集》。

⑪（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周此山集序》。

⑫陈旅对陶渊明十分向慕：“昔周子谓‘晋陶渊明独爱菊’，又曰：‘菊花之隐逸者也’。渊明为晋处士，若是花之不与鞿艳竞吐，而退然独秀于风霜摇落之时，则渊明可谓菊隐者矣。…然吾闻渊明中岁更字符亮者，慕诸葛孔明也。孔明与渊明出处不同，吾不知渊明所以慕孔明者何故？…盖尝思之，士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物非人而能与人同者，不同乎人而同乎天。”（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菊逸斋序》）

三百篇而下，汉魏诸诗弗可及已。晋宋间则陶渊明为最高。后世之务为平澹者，多本诸此，然而甚难也。盖平则貌凡，澹则味薄，为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此以为甚难也。唐大名家如杜少陵诸人，不得专以是体论之，若韦苏州辈其亦平而不凡、澹而不薄者乎，盖其天趣道韵之妙，有非学力所能致者，鲍溶辈固徒苦耳。^①

诗文做到“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甚难^②，“平易”中不失之“奇崛”，其中有“非学力所能致”的先天因素。陈旅对后天的“学道”也颇为重视：“学道弗明，故其为言不失之奇崛，则失之平易”^③。为文当根植于《六经》：“韩愈氏吐词持论一本之六经，然后斯文焕然可观”^④，陈旅虽称唐宋为文章盛世，其间不乏诗文名家，但除杜甫之外，大多不知以《六经》为本。^⑤友人潘阳刘芳伯为诗即根于经学：“治《易》、《书》、《诗》三经，沉潜理性之蕴，养于其中者有素”。^⑥在陈旅看来，诗文创作当以《诗经》“风雅颂”为宗：“风雅颂不作，诗之变屡矣。大抵与世相为低昂，其变易推也。近世为诗者，言愈工而味愈薄，声愈号而调愈下，日锻月炼，曾不若昔时闻巷刺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于此。”^⑦以“温柔敦厚”诗教为本，友人周此山的诗文便做到“简澹和平”：“夫志得意满者，其辞骄以淫；穷而无所遇者，其辞郁以愤；高蹈而长往者，其辞放以傲。今考其诗，简澹和平，无郁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传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先生可谓有温柔敦厚之德矣。”^⑧发挥诗的讽谏功能，可以达到移风易俗的作用：“闻巷刺草之言，被之箠弦，可以感人心，召和气，易风俗，音之庸也。”^⑨

陈旅“以气论文”，认为汉唐出于“天地气运之盛”，而为文章盛世；那么，理学家“以理论文”^⑩，则认为汉唐“事功霸道”，其间文章于明道讲学无益，为文章衰世。理学家们认为“工文害

①⑥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静观斋吟藁序》。

② 陈旅本人诗文即做到了“平易中不失之奇崛”。五言绝句：“朱萱吐晴日，上有蝴蝶双。感此芳意多，离沈转难忘。”(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一《题萱草图》)由萱草上的“上有蝴蝶双”感发对故人的离情愁思。又“秋气满林壑，野树集汀洲。有客过山寺，听猿卧石楼。”(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一《题秋林烟寺图》)，过寺之客卧听猿声于石楼之上，为秋林烟壑更添潇洒出尘的诗意。七言绝句：“江上群山翠作堆，人家门坎对江开。小楼应有凭阑者，天远归帆似不来。”(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一《题马道士画二首》)以翠峰堆簇之“有”，写远江空濛之“无”；以江上人家门坎对江而开之“实”，揣想凭栏待亲人扬帆归来情思之“虚”，可谓思深而意婉。七律：“君向雷峰塔边住，诗成总在倚阑时。苏堤残柳凝烟小，葛坞闲云度水迟。衲子定回花逸座，故人别后草生埽。相知不似相忘好，谁说庄周与惠施。”(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二《次韵本无上人相别》)将故人离别之情寓于烟、柳、云、水、花、草之间，无愧“辞淡而旨醇，貌直而思婉，声约而韵充。”风情潇洒，堪称名作。

③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跋段氏庸音集》。

④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宋景濂文集序》。

⑤ 陈旅云：“大哉文乎！不可无渊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为盛。宋姑不论，以吴兴姚铉所集《唐文粹》观之，奚啻三百余姓。虽张、苏、萧、李、常、杨之流，气逸辞雄，各自名家，终不能返于古，何哉？无所宗也。”(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宋景濂文集序》)

⑦⑧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周此山集序》。

⑨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跋段氏庸音集》。

⑩ 朱子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五)》卷一三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14页)

道”^①，专意于文辞的工拙，对道德心性涵养有害，对“以文章为事业者”一概否定^②。理学家所认同是以《六经》为首的“载道之文”^③，以文为载道的工具，对文章辞藻的工巧、性灵的渲达加以贬斥，忽略文学本身的特点及功能，从而否定文学的主体性，则失之偏颇。^④理学家从“道统”的角度，将《六经》定为绝对一尊的地位，而对“文统”大肆鞭挞。其对“道”的理解限定于的“道德理性”的范围内，具有形上的特征。而陈旅从诗文创作的角度，以研读《六经》作为增进创作者内在的素养；以《诗经》风雅颂作为诗文创作反映现实、服务社会教化的要求。其所理解的“道”更为宽泛、更具实践品格。根据《周礼》提出“道艺不二”、“道无往而不著”的说法，陈旅将“文辞”、“政事”等都视为“道”的重要方面。

二、道艺不二

陈旅担任国子助教、国子监丞等职，教授诸生，对“学”十分重视。陈旅虽以辞章之学名世，但认为“为学”不应该专以“文辞之葩华”为尚，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变化气质”，这也是为“君师者”担负的职责。

国人子弟之所以学者，非专尚乎文辞之葩华也，训诂之繁琐也，与细儒曲士角分寸于觚翰之间也。醇庞之质，伟茂之器，固将有以成其美；而冀伎之气，僥荡之习，亦欲有以变其故尔。成周之造士也，七年考其小成，九年考其大成。至是，不率教者尽变。不变，王亲视学。又不不变，则为之三日不举。盖学，所以变气质也。不变，则弃人也。为君师者，能不以是为已责哉！^⑤

古人学习的内容是《周礼》所载的“乡三物”。陈旅认为，“六德”、“六行”、“六艺”不可或分，古人“学”的终极追求是所谓的“成人之道”，成周造士以“德行”最为重要。

古者人无不学，学所以求至于成人也。夫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艺，缺一则非成人，况可遗其所甚重者乎？故保氏教国子以艺仪，必先审以师氏之德行。三代圣王治效之隆，往往亦由在官者之有是学也。后世之为学者，歧道艺而二之，以为敦德未足以动流俗，而炫艺有足以徼亟用。为进身之计常有余，于为人之道则不足。^⑥

后世学者以“艺技”眩人耳目，以为进身之用，而不知敦厚“德行”，以救流俗弊端，去“成人之

① 二程云：或问伊川先生曰：“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局限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宋·程颐、程颢：《二程集》，《二程遗书》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

② 朱熹《读唐志》云：“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然在战国之时，若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辩、列御寇庄周苾况之言、屈平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生、贾傅、董相、史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流，犹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盖亦长杨校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朱文公文集》（四）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74-3375页）

③ 朱熹《读唐志》云：“《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朱文公文集》（四）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74页）

④ 清儒章学诚针对宋儒视“文章之学”为异端有批评。“博学于文”、“辞远鄙倍”是孔门教人之法。文辞空洞、流于浮华固不足取，但又理不可托之空言，必待文辞而后达其意。宋儒“薄记诵而厌辞章”，恐有因噎废食之嫌。“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译译而通矣。”（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原道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页）

⑤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汪扎勒图还河阳序》。

⑥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阎主簿孝行诗序》。

道”甚远，这是“歧道艺而二之”的做法。

陈旅对“儒家之道”的理解比较宽泛。“道无往而不著”：“文辞”、“理义”、“学术”、“政事”，都是“道”的体现，缺一都不能体现“道”的全体^①。陈旅云：“夫道之在人也，为事业则著于事业，为文辞则著于文辞，道岂有二哉？”^②古人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因道贯穿其中，而能互为贯通。

道无往而不著也，达则著之于事业之大，穷则著之于其身之所。及以文辞而著其道，则又未尝有穷达之分也。夫德茂者、业富理充者、言从故古之君子，非有意于立功，而功常被于世；非有意于立言，而人谓其言以为法。后世以文辞名者，或不察乎理义；以政事显者，或不明于学术；以穷经学古为务，而文辞、政事之无足观者，亦有之矣。凡若是者，皆不足以语夫道也，何也？道则无往而不著也。^③

相对于理学家形上之“道”（理），陈旅对“道”的理解更具实践品格。君子积善养德、通经博古，无意于立功，却能功被于天下；无意于立言，言却能为万世法。人有“穷”、“达”际遇的不同，达时事功济世，穷时独善修身，“道”都贯穿于其间，并不限于以文辞载道。甚且，文辞审美本身即能体现着“道”：“文辞典实、丰畅，兴致本乎风雅言论，迪乎德义和平之音。正大之气藹然见于编帙之间，读之可以使人息浮靡浇凉之风，此其‘道’之著于文辞者也。”^④

陈旅所谓“道艺不二”，不仅是就文辞而言，还认为儒者当讲求“明体适用之学”，不应该局限于纸笔空言。古人文、武兼通：“古之行于吏治与讲于庠序者非有二道，故在泮有囚馘之献，而谋帅亦有诗书礼乐之选”^⑤，“干戈羽钥”与“诵弦礼书”并习。

昔者圣人之制深衣也，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摛相，可以治军旅。盖士之为学干戈羽钥与诵弦礼书并习也。既学而入官，则无施不宜。后世文武殊科，士之为用，始有不通者矣。夫儒者平日雅雅驯驯，心神智术不越乎笔研文字之间。一旦拥裘函、持弓矛，逐捕奸诈寇攘于山区海聚之出没，亦难矣，故前后之鰥厥官者常相踵。宰相知其然，以为宁使之激厉以效用，不忍使之空老于草野而止也。夫今之为教，虽与古人不同，然明体适用之学亦有可得而讲焉者。士何而为不是之学哉？^⑥

《周礼》“乡三物”的“六艺”：礼^⑦、乐^⑧、射、御、书^⑨、数，是“明体适用之学”的集中表达。君子欲致用于世，对“仪章器数”要熟悉：“士以明体适用为学，于是而有不知其将何以致夫用哉！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盖欲大有为于世也。然微而在下，王朝之仪章器数有不可得而悉者。

① 章学诚云：“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荃葺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原道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8页）陈旅可谓发其先声。

②③④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王文忠公文集序》。

⑤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送李守中下河巡检序》。

⑥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五《送俞伯康巡检序》。

⑦ 陈旅云：“夫先王之教也，莫重于礼。”（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丁氏世谱序》）又：“旅观所著官制之类，盖若《周官》之为书，粲乎纲挈而目张也。有志于天下之务者，其豫考于斯乎？”（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省部政典举要序》）

⑧ 陈旅云：“乐之用大矣，圣人以是箫勺天下，八风从律，沍气不作，神行奸伏，物化刑措，所谓体信以达顺，天地将为昭焉者也。昔舜命？典乐教胄子，而先王之学曰瞽宗、曰成均，官曰乐正、曰太师、曰钥师、曰司成、曰司业，皆以乐言者。谓乐以中和为德，而胄子与所共学者，皆将有长人之责，具是德则可以长人矣。”（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乐清县尹卫侯之官诗序》）

⑨ 陈旅云：“无怀氏封泰山以来，字体之变尚矣。其可考者，古文作于苍颉，大篆作于史籀，小篆作于李斯，隶书作于程邈。以至缪篆、虫鸟、草书、八分等书，又纷然杂出秦、汉之间。因时制宜，盖未始有定画也。皇元因造字以新天下之耳目，谐声以该六书之会，母字四十一，而变无穷焉。故非智融而器疏者，不足以诣其妙。……书于六艺，非小数也。天下之大而号令之行也，书行之。万世之远而事之传也，书传之。（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栢溪州蒙古学正序》）

故见老子则问礼，见剡子则问官名，圣人犹然，况众人之为士者乎？”^① 六德：知、仁^②、圣、义、忠^③、和^④；六行：孝^⑤、友^⑥、睦^⑦、姻、任、恤，陈旅亦有论及。

儒者“学”的终极追求，是行其学说于人君以“经世济用”。陈旅云：“其有得于己者，必行之力，养之深，得以致乎用也。”^⑧ 又：“予闻善仕者必善学，为政不本于学术，则斯民不被仁义之泽”^⑨，又：“《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谓学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为治者必建学以崇教化，而任风纪师帅之职者，不敢不以是为己责也。”^⑩

君主欲大有为于天下，亦须得到儒者的辅佐，元中统、至元的兴盛，便得益于儒者许衡。

周成王能成其德，由周公有以傅之也，是岂过为高论者哉？我世祖皇帝道参元化，明并日月，宜无待乎儒者之助矣。万几之暇，命许文正公与诸儒讲尧、舜、孔子之道，以登中统、至元之盛。^⑪

但自古以来，儒者得遇于世者甚少，千载难遇。

儒者之用心亦苦矣。敝精神方册之间，莫不欲售其说于人主，使四海之人咸被仁义之泽。奈何自孔、孟以来，儒者之每不遇于世，落落也。程正叔氏以名臣荐，身际元佑之朝，似可以行其学矣。崇政说书，恳恳忠荃，卒无所售而去，况其他者哉？然则儒者得以所蕴进纳于其君，实千百载奇遇幸会也。^⑫

程颐、许衡是儒者中的佼佼者，能够售其学说于明君。但对绝大多数儒者而言，欲以渺然之身欲大有为于世，任重道远，甚为难及。

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远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重，而必至其所甚远者焉，亦难矣。是故君子之教人也，必考前言以审其所向，求往行以迪其轨辙。身，吾车也，载之不可不弘；气，吾马也，策之不可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不敬。夫如是，则庶乎重与远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传曰：“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以刚健而致力于学，亦奚重与远之有哉！^⑬

儒者的“身”、“心”、“志”、“气”具备“弘毅”、“持敬”、“刚健”等品质，才能为生民立命，匡生济世。

①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省部政典举要序》。

② 陈旅云：“孔子曰：‘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盖谓好恶者，人情之所同，能得好恶之正者，仁人之独也。然而为仁人者，或位卑势拙，力不足以施其情之所及，则仁之用有弗行矣。是则仁人之所不能者也。今夫临乎民上者，皆得以施其好恶之情矣。而或众论之不齐，识鉴之贸替。私意挽于中，而牵制辄轧于上下也。则其情之所施，又安得近于仁哉！”(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送杨志仁之潮东序》)

③ 陈旅云：“与人臣言，依于忠。”(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乔生孝义诗序》)。

④ 陈旅云：“和以养其德”(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鞞勒允常字说》)。

⑤ 陈旅云：“生事亲有过人之孝。友爱昆弟，同居无间言。闺门肃雍，未尝有疾声厉色，人益重之。”又：“与人子言，依于孝。”(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乔生孝义诗序》)又：“余闻孟子有言：‘事亲若曾子者，可也。’盖谓人子事亲，无非所当为者，则未尝有可止之时也。”(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送张学士之江淮诗序》)

⑥ 陈旅云：“余闻则明为人欺易静舒，与物无竞，交友不以富贵贫贱为轻重。拙于治生，而赈给穷乏，至于岁入不足以出。人叹其迂，而亦皆称善人长者云。”(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汪氏介寿诗序》)

⑦ 陈旅云：“予惟先王之时无穷民。五家为比，使相保也。五比为闾，使相爱也。四闾为族，使相葬也。五族为党，使相救也。五党为州，使相矜也。五州为乡，使相宾也。夫比、闾、族、党、州、乡之人，不必皆亲也。徒以其地之遽近，得相为谋以恤其患。况二族之切于一身者，其可漠然视之如涂人乎？”(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九《义庄记》)

⑧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七《果育亭记》。

⑨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西岩书院记》。

⑩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七《庆元路儒学新修庙学记》。

⑪⑫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经筵唱和诗序》。

⑬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致亭记》。

在“道艺不二”、“道无往而不著”思维下，陈旅认为儒者“讲学明道”与诗人“吟咏情性”并不冲突。

旅尝病夫近世有儒者、诗人之分也。深于讲学而风雅之趣浅，厚于赋咏而道德之味薄，要非其至焉者。其至焉者，无儒者与诗人之分也。^①

“近世儒者、诗人之分”，是针对程颐将“道德”、“文章”相对立的说法^②。陈旅云：“夫言者，德之文，而诗，又言之文者也。”^③在陈旅看来，儒者中不失“风雅之趣”，又能做到“德行高迈”、“明体达用”典型的是杜甫。

当玄宗之播迁也，子美亦走三川。肃宗立，又自郾奔行在所，遂陷贼中，几不自免。后客秦州，入同谷，采橡栗自给。饥寒困惫，而忠义之气形于歌诗，藹如也。惜乎平生抱负不得施诸事业，而一发于诗。世之不知子美者，惟以能诗称之，谁知子美之与孔明，有所甚同者乎？子美以孔明比伊、吕，人固信之矣。自比稷、契，则未有见于当世，无以取信于人。故必有知言君子颂其诗，知其人，而后信之。^④

在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中，杜甫始终忧国忧民，置己之生死于度外。一向自比稷、契，空有一腔经天济世的抱负，志趣与诸葛孔明无二，惜未能施展于事业。郁悒情怀发之于歌诗，忠义之气，得风雅之正。

陈旅担任过“闽海儒学官”、“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其本人即追求“儒者”、“诗人”合一，“道艺不二”的极致境界。在陈旅看来，时贤许谦（字益之，1269-1337）就做到了这一点。

先生沈潜载籍，大而圣贤心学之蕴。细而名物度数文字句读音义之详，靡不究极。隐居终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计，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者，殆若未遑他及。而此诗冲澹醒藉，音节跌宕，而兴致高远，乃若专久于为诗者，是岂可以向所谓儒者目之哉？其庶几吾之所谓至焉者邪。观其诗，想其为人，盖亦一世之豪杰，而而不见于用者邪？^⑤

可谓陈旅夫子自道。

三、笃守朱学

陈旅虽以辞章名家，但在为学路径上，并未出程朱理学的藩篱。^⑥从师承上讲，其师傅古直笃守程朱学说。陈旅云：

（傅古直）为人舒缓而谨审，常揭先哲敬教之言于坐右。其讲《四书》也，尊朱子成说而得会通之旨，究极微妙而皆中正之论。诸经亦因儒先之言而敷绎之，不立异以为高，不骋浮以为博。教人尚忠厚，务实践。见□薄者，心愀然曰：“是何气质之未变也？”^⑦

①（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跋许益之古诗序》。

②二程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宋）程颐、程颢：《二程集》，《二程遗书》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

③（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静方诗序集》。

④（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明美堂记》。

⑤（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跋许益之古诗序》。

⑥陈旅云：“尊己堂铭（朱文公题扁）‘林林生人，玄精之凝。自顶及踵，天命流行。君子之身，敬恭奉承。曰惟事天，动罔或轻。公卿父兄，出入攸事。至于使事，亦若承命。无所不敬，尊己之谓。偃然自尊，反失良贵。拥金如城，高位以媿。亢身为侯，众怒之射。匪德之尊，其尊为危。所以谦者，莫踰其卑。先献顛顛，汪氏之轨。尊己暨何，非己之己。载瞻华榜，思我朱子。神蚪登天，遗蜕在此。惟汪有孙，作堂言言。云屏之山，峙其后前。岂构之复，训迪厥先。尔冠尔裳，母隳而天。’”（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尊己堂铭》）

⑦（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傅先生墓志铭》。

陈旅对“明体达用之学”的强调，应受傅古直“务实践”之教影响。对理学的“理气”本体论，陈旅有所论及。

天运行而不息也，地凝然而不坠也，谁实任之？曰气。谁实任气？曰理。然则惟理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者乎！讲学以明理，制行以养气，此古之人所以大有为于世也。^①

“以理任气”说法本于朱熹，朱子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② 陈旅认为，人与万物同为气所生，但人为万物的主宰，其心不为万物所制，万物的妖秽禎祥出乎人心：“夫人与物，同得天地之气以生者也。为兆物之物而能物夫物者，人也。故夫物之为妖为禎者，皆人心有以致之”，^③ 又云：“制于数者，物也。数不能制者，人之心也。”^④

程朱理学两条修养工夫：“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陈旅所谓“讲学以明理”属于朱子“格物穷理”的范围。朱子云：“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⑤ 陈旅云：“天可得而知乎？曰：天难知而理可寻。霜未陨而裘褐制，日未入而膏烛具，何也？人知燠寒昼夜之必相代而至也。夫既知其必相代而至也，而或戚戚于未至，或用其知力以求其所不必至，是皆谓之不能知天”^⑥，“寻理而知天”就是了解“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即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当然之则”是心中所具之理，又云：“盖万物之理具于吾身，谨之于念虑之微，则可以充之于宇宙之大，又岂但为身谋哉！”^⑦

人身乃血气之所为，人心受到外物的诱惑，便会放任无度、危殆骄肆。“制行以养气”为了“谨之于念虑之微”，存吾心所具之天地至诚之理，以抵制“邪气”对“元气”的攻击。

人不能无过，而过恒生于意虑之所不及。故《乾》之九二虽处无过之地，而《文言传》则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盖谓不可自谓无过而弗谨也，能闲邪则诚存矣。圣人于德之正中者犹议之若是，况众人之未能正中者乎？夫诚者，天地之实理，人与物具是以生，初无有不存者也。有不存者，邪实害之。譬元气之充于人身也，邪气一攻，则元气为之动摇。故善卫生者，惟不使邪气之得以乘其间也。而曰：“吾之体完以固，吾无用夫卫生之道。”吁！是亦不智之甚矣。昔者曾子之言诚意也，曰：“君子必慎其独。”周子之言诚，则曰：“诚无为，几善恶。”曰慎独，曰几善恶，其皆本于闲邪存诚之言哉！思明其毋，自谓言之已谨也。念虑之萌，人所易忽，宜尤致谨于隐微之间乎？^⑧

“闲邪存其诚”、“诚意”、“慎独”，都属于“主敬涵养”的范围。陈旅对理学的“主敬”功夫论十分重视。

敬之于人大矣，吾以之事天。吾身天之所赋也，敬身则事天矣。^⑨ 天理流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吾忠君爱亲而善于兄弟、夫妇、朋友，则事天矣。自屋漏以至于户庭之

①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索士岩燕南宪司经历序》。

②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五十八《答黄道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55页。

③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五《程氏连理木诗后序》。

④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重建杭州开元宫碑》。

⑤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四书或问·大学或问·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2页。

⑥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甘允从甫北上序》。

⑦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八《约斋记》。

⑧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八《存诚斋记》。

⑨ 陈旅云：“辨良材，审度正。手有容，德之柄。慎毋忽，持以敬。立明廷，对休命。”（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为杨友直制木笏铭》）

外，自吾身以及乎事物之众，无非天之所以，则无一息之可以不敬也。吾其可弛焉而不思乎？夫敬者，所以持吾心也。世之人日以其心与世之得失利害相转旋于无穷，忽不自知为禽犊者，亦何其不思之甚也。不思而使人至为禽犊，则思之于人亦大矣。是故君子之于其心也，静而未思则敬以存之，念虑之萌则敬以察之。敬存则体信，敬察则达顺。信体则礼立，顺达则乐作。礼乐具于身，而天地万物之情通焉。吾将为若人于斯世也，如之何勿思。^①

朱子云：“大抵敬有二，有未发，有已发，所谓毋不敬，事思敬是也”^②，陈旅所谓“静而未思则敬以存之”，属于心之“未发”的“存敬”。“念虑之萌则敬以察之”，属于人之应事接物心之“已发”的“察敬”。礼、乐产生于“存敬”、“察敬”。天理流行于人伦日用当中，通过“礼乐”，人与天地万物共相感通。因此，“敬”是人立身行世的根本。

在陈旅看来，人与世间得失利害相转旋，不知“思敬”^③以护持天理之心，使之存而不堕，便不自知间与禽犊无异。“逊志时敏”^④是“思敬”的另一种表达：“盖人身者，血气之物也。志不足以帅之，则骄怠矣。骄则易盈，盈则不足以受学；怠则易辍，辍则遂至于废学。天下之善无穷，春秋代序，老冉冉其将至。不逊志时敏，则虽为学，终无异于众人，且不自知而入于草木禽犊矣。”^⑤以“志”率“气”使人心不为之懈怠是“为学”的前提。

学之于人，大矣。林林而生，蠢蠢而动，其初草木禽犊然。乃有秉德迪道，被服文雅，而美出于其间者，学之力也。昔者圣王之立极于天下也，盖欲使天下之人皆会归于有极，此学之所由起。至商傅说之言曰：“学于古训，惟学逊志，务时敏。”则学之言昉见于《说命》，而为学之方亦未有尚于此矣。^⑥

人之所异于禽兽即在于“学”。要出类拔萃于众人，须“立乎其大者”，须懂得“逊志时敏”的为学之方。“人方恣睢，吾宁儒儒；人方多侈，吾宁顛顛；人甘履巇，则吾倚固而藉夷。”^⑦圣人为庶民树立人伦准则，人类社会的道德教化，礼仪廉耻都源于“学”。^⑧

陈旅云：“朱子之所以为教者，亦不过欲人审义利之几，而进于为己之学耳。”^⑨“学”不是工具理性的知识灌输，而是道德主体“治心”的工夫实践。

学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则其见于事者荒矣。心之为物，至微也；而周流于日用之间，至著也。失于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犹得以议其心。学之未善，常接于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视而弗治，则其存于中者陋亦甚矣，尚得谓之尝有学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为者，

①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七：《思敬堂记》。

②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一）》卷十七《大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72页。

③ 陈旅对儒家的“思”字有系统的论述。“《洪范》‘五事’，曰貌、言、视、听、思，以五行而言，思，土也。君能手貌、言、视、听，其功至于‘睿作圣’，则思之于人，大矣。故孔子于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九者，皆以思言而立教，视《洪范》为加密者。自吾身以至接于事物，皆不可以不思也。杨定省字九思，玄教大宗师吴公告以孝亲进德之说，善矣。盖孝者，百行之本。学本于亲，乃可以进德，而思者所以致知，以为行之之地也。九者而有不思，则视或不明，听或不聪，色或不温，貌或不恭，言或不忠，事或不敬，疑或不问，忿将及难，得有非义。如是，则必至于行亏而身辱，不得谓之孝矣。是故君子于一言一动之微，皆慎思之，以为欲保吾身以事亲也。如之何勿思？”（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跋杨九思字说》）

④ “逊志时敏”出于《尚书》，《尚书·说命下》云：“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

⑤⑥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逊敬斋记》。

⑦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约斋记》。

⑧ 陈旅认为，儒者“为学”就是“尚德”：“汝南蒋完子成有志为学，武夷杜先生名其斋居‘尚德’。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谓南宫适赞禹、稷、颍、羿、羿也。孟子云：‘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子成能学颜子之学，则得其所尚者矣。铭曰：人各有尚，士尚者德。德人之心，众善攸宅。着远之躬行，则道之迪。措诸事业，则物之泽。穷而颜渊，达乃禹稷。颜何人哉，我则矜式。曰高必跻，曰必适。彼言亦言，彼服亦服。始窥其门，终造其域。德崇于身，人反我则。吾铭匪躬，愿于母教。”（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尚德斋铭》）

⑨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六：《婺源州学正余志贤之官序》。

有苟焉之心也。心主敬，则体信；事由敬，则达顺。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则尽焉。是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倡，则人亦将以是心应之矣，恶乎而能成？《鲁颂》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①

“治心之道”在“主敬”。在陈旅看来，孔子况且能够处处“逊志时敏”（学），虚以下人，^②何况凡夫众生。

夫海至下也，则能受百川之入；河江之流不已也，则能达于海而同其大。善逊志者，其海乎！善时敏者，其河江乎！彼归潏而洋洋，潢污而洸洸，又奚足与言夫海与河江。孔子，大圣人也，入太庙每事问。老聃、郟子、师襄之徒，皆不逾于孔子，而圣人每折节而问学焉。其言曰“好古敏以求之”曰“我学不厌”曰“学如不及”，则圣人为学，亦不过逊志时敏而已矣，况众人之为学者乎？^③

学是“为己之学”，在于祛除“冀伎之气，悦荡之习”以“变化气质”，陈旅对溺于“辞章之学”、“训诂之学”者提出严厉批评。

国家初置成均，本教国人子弟，因寢及其余焉。国人子弟之所以学者，非专尚乎文辞之葩华也，训诂之繁琐也，与细儒曲士角分寸于觚翰之间也。醇庞之质，伟茂之器，固将有以成其美；而冀伎之气，悦荡之习，亦欲有以变其故尔。成周之造士也，七年考其小成，九年考其大成。至是，不率教者尽变。不变，王亲视学，又不变，则为之三日不举。盖学，所以变气质也。不变，则弃人也。为君师者，能不以是为已责哉！^④

“学”的重要内容在于“室屋”、“食饮”、“衣裳”、“衽席”的言行准则。人伦日用不能讲求奢华，处处以礼义为主臬，便会心安理得，人有血气之欲，如果没有礼义为之节度人心便会放任无度：“人身血气之所为也，血气之欲无涯，能不为之防与羁乎？故吾言焉，则有言之则；吾行焉，则有行之度；吾室屋以居焉，食饮以养焉，衣裳以服焉，衽席以寝焉，则有室屋、食饮、衣裳、衽席之节。盖礼义者，人之大闲也。入乎是则安，出乎是则危。智者知其然，故常退然不敢以人之所侈者自处也。”^⑤在陈旅看来，生活应安于“淡泊”：“君子之道，如菽粟布帛，人日用之而不知其美。于是必得厚味，而后以为良烹；必得文绣，而后以为珍服。盖嗜欲之为人害大矣。若菽粟布帛者，岂足以甘其心哉，则世之能乐于淡者，盖绝鲜也。”^⑥“入乎是则安”类似说法是“遵道而行”，陈旅云：“王道平平，既锡汝极。遵道而行，乃即安宅。利欲之岐，车覆马踣。”^⑦

以礼约身，不能逐于物欲、放失本心。陈旅云：“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约谓不侈然以自放也。…孔子之道至大也，当时门人莫不有得，而传至于今者，曾子之学也。曾子之学，谨身而已。”^⑧陈旅与“主敬”、“约身”、“谨身”的类似说法是“谨严”。

钱塘方直卿静谨而嗜学，尝学《春秋》，取韩子之言名其读书之所，曰“谨严斋”，盖将以是而治身也。…予谓直卿亦知圣人之所以作《春秋》者乎？先王之为天下国家，以人有欲而易

①（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七《泉州路儒学修学记》。

②陈旅与“逊志时敏”类似的一种说法是“以虚为心之主宰”：“盖是舟非以无主为虚，而虚以为之主也。人之一心，可以载万物而不可以有一物，有一物衡于其中，则物莫能入矣。古之君子能任大事、济大难而不自有其功者，虚以为之主也。夫通天下之不通者，莫如舟。《易》之《咸》极言感通之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言累于私，感则不足以及远。故孔子传《大象》曰：‘君子以虚受人。’是虚也，非谓无主也。无私吾以为之主，则所受者大，而所感者无不通矣。时中器弘而识远，操固而虑审，将以其身为舟，以济夫世之不通者，岂若漆园傲吏之漠然于当时哉！”（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书虚舟说后》）

③（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逊敏斋记》。

④（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旺扎勒图还河阳序》。

⑤⑧（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约斋记》。

⑥（元）陈旅：《安雅堂集》卷九《书淡乐斋记后》。

⑦（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坦斋铭》。

乱也，制为谨严之礼以为之范防焉。礼也者，所以秩人纪而维持乎世道也。陵夷至于衰周，天王与列国君臣以先王之所以为范防者，皆毁裂而弃去之，人纪于是乎大毁。世道于是乎大坏。圣人念周礼之不可以尽废也，乃作《春秋》以救其失，凡出于礼者皆入于《春秋》，故曰圣人之刑书也。夫谨严者，礼之体也。《春秋》救礼之失，又乌得不谨严哉！君子之达而有为也，则欲使斯世之人皆入于礼，毋入于《春秋》；穷而独善其身也，则必使吾身毋入《春秋》，而入于礼。吾有君也，则事君必忠；吾有父也，则事父必孝；吾有兄也，夫妇也，则必尽兄弟、夫妇之道。吾一出言、一举足，凛乎若圣人执笔临吾前而书之。谨乎，严乎，不知《春秋》，吾何以知礼之所存者乎？虽然，重典不刑于治世，厉色不设于雅人。君子以谨严治身，至于动容周旋中礼，则亦无事乎《春秋》？^①

面对春秋时代世道大坏、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将周礼作为维系社会人伦的堤防，于是制作《春秋》以匡时弊。在陈旅看来，“周礼”的本质特征是“谨严”，《春秋》涵蕴了孔子对周礼的传承和理解，是圣人执笔褒贬世道人心的“刑书”，因此“谨严”也是《春秋》的本质特征。君子在人伦日用的举手投足皆当本乎《春秋》，以谨严治身。

以“礼义”节身制欲才能做到“心安”。陈旅对“安”说多有论及。“余尝见世之狙于安者，往往委弛而骄肆也。委弛则隳事，骄肆则傲物，隳事而傲物，则易安为危。君子于是有持危之道焉。譬之水也，为之防以导之，则不至于冲决；譬之马也，为之羈以馭之，则不至于奔放。”^②“学”的最终目的是至于“安”，不仅要做到“己安”，还要“安人”：“君子无往不安。不能安，则虽田野里巷之间皆危地也。……旅闻君子之学，至于安而止也。学至于安，则穷达出处，无不安矣。然则人能教其子孙使致力于学，不谓之遗以安乎？……以学安之，道在是矣。故虽载高位、登要津，皆安所也。……君子岂独遗子孙以安，盖将推之以遗天下之人，此又名堂者之微意也欤！”^③

“推之以遗天下之人”就是“讲学以明理，制行以养气”以“大有为于世”^④。“人”之一身与天地相副，君子作为道德表率感召众人的“善祥之心”，以天地万物共相感通。学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国家大治。

尝闻古之君子知人身有同于天地，而万物之皆备于我也，故常欲以其身橐钥乎天地之和。虽或制于势力之所不及，而睟面盎背足以使人歆动向慕，而善祥之心兴焉。是故居人之乡，则其乡大让；为人之国，则其国大治。此世所谓仁人而有志之士，所以学至于是焉者也。^⑤

在陈旅看来，良吏治理天下不在于施措刑政，而应唤起人心中所固有的良知本心，此谓之“易感之道”。“予惟孟子有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则爱亲者，人心固有之良，最易感者也。先王之感人心，亦惟先施其最易者而已矣。是故以难从者强人临之以三军，而不足以易感者为教表一竖子，而有余世之称能吏者。未尝不急于政刑，而民益顽犷难治者，不知有易感之道焉耳。”^⑥

因此陈旅在道德境界追求上，推崇二程所谓的“尧舜气象”。二程称曾子“暮春浴沂风雩”有“尧舜气象”，而“尧舜气象”也就是“为国以礼”，二程云：“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谓狂矣。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所以为夫子笑。若知为国以礼之道，便却是这气象也。”^⑦ 陈旅云：

①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八：《谨严斋记》。

②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八：《约斋记》。

③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三：《书李氏遗安堂记后》。

④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四：《送索士岩燕南宪司经历序》。

⑤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八：《春风亭记》。

⑥ (元) 陈旅：《安雅堂集》卷九：《陈孝子墓记》。

⑦ (宋) 程颐、程颢：《二程集》//《二程遗书》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页。

昔者孔子使门人言志，曾皙有莫春浴沂风雩之对。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程子谓其言有尧舜气象。旅尝因程子之言而思之，“于变时雍”与“绥来动和”，同一机也。体信以达顺，穷神以知化，鼓万物而万物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近世伊洛数君子，其亦有志于此者乎？邵子之学，不见于施用。佳时出游，士大夫欣然耳。其车音，虽童儿仆隶亦莫不喜其至。使以其学施用于世，又何如耶？程伯子所至而民化，既去而人思之。以忠诚孚于人主而始终不疑。极言新法之非便，而争者不怒。朱公掞以春风言之，可谓善言德行矣。方宋盛时，而二子居天下风土之中，游从往来，托风云卉木以吟咏。其所适何其蔼然，浴沂风雩之惊乎？呜呼！二子皆学尧、舜、孔子之道然也。而世之学者莫不曰学尧、舜、孔子，亦曾及此乎哉？不及乎此，不过得尧、舜、孔子之粗耳。^①

在陈旅看来，《尚书》“于变时雍”与《论语》“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都是“为国以礼”的意思。君子期企其所学能施用于世，其德如风偃草，泽被万物而万物不知其所以然。道学家有志于经世济用，二程施其所学于世，做到所至而民化；以忠诚之心辅佐人君，为人主所信孚。二程“托风云卉木以吟咏”可视为对曾点“浴沂风雩”的向慕，都是为了“化民成俗”。此即“尧舜、孔子之道”的精义。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八《春风亭记》。

明末大学士李廷机“百辞不允”考

于英丽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李廷机是万历年间内阁大学士, 他仕宦生涯中最特殊的经历是入阁六年, 任事仅九月, 近五年的时间在杜门乞休。现存《李文节集》收录了他不同时期所上“乞休疏”约一百七十封, 本文通过解读这些疏文, 探讨李廷机历次乞休的原因、动机、结果, 并借此考察晚明士人的仕宦困境。

关键词: 李廷机; 万历; 乞休疏

李廷机, 字尔张, 号九我, 福建晋江(今属泉州)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生, 幼时沉静寡言, “诵书分明, 作字无卤莽”^①, 乡贤王慎中曾赞赏其“不凡”。嘉靖三十七年(1558), 补郡庠生。嘉靖四十年(1561), 倭乱, 参加乡试后丧父; 两年后(1563)丧母。22岁的李廷机失去双亲, 因取《蓼莪》之章, 号“九我”。

隆庆四年(1570), 李廷机举顺天乡试第一; 万历十一年(1583)会试第一, 廷试第二, 被授翰林院编修, 开始步入仕宦生涯。万历十四年(1586)、十七年(1589), 李廷机两次充殿试掌卷官。万历十九年(1591), 50岁的李廷机丧子, “自是交际遂废, 而以嗣息故, 不欲劳心, 亦不复为应酬之文”(《大学士李先生自状》)。万历二十四年(1596), 迁祭酒, 立教尊高皇帝之制, 一以整齐严肃为主。万历二十六年(1598)六月, 升南京吏部右侍郎, 主京察, 任职期间, 整顿商铺, 疏通河坝, 修葺孝陵周边墙垣, 做了许多实事。三年后(1601), 改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七月始赴任, 进左侍郎。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 会推李廷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闰六月十八日到任办事^②。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 李廷机因同僚攻击上疏乞休。之后, 因多种主客观原因, 他近五年的时间皆杜门乞休, 直到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 李廷机拜疏自去, 方接到圣旨允其休致, 同年闰十一月抵家。归里四年后(1616)卒, 年75, 赠少保, 谥文节。其著述据《明史·艺文志》载^③, 有《易经纂注》四卷、《易答问》四卷、《宋贤事汇》二卷、《春官要览》六卷、《阁臣录》六卷、《汉唐宋名臣录》五卷、《李廷机文集》十八卷。据其《大学士李先生自状》载, 尚有《春秋日讲章》《四书臆说》《家礼》《家训》《仕迹》等, 皆成于寓居真武庙期间。

李廷机去世后约两年(1618), 其友人始编辑刊刻其集, 共十二卷; 其后, 崇祯四年(1631), 门人曹士鹤对原集进行校对增补(见《李文节集》卷末曹跋); 大约崇祯七年(1634), 文集再次重刊(见《李文节集》卷首洪启遵序)。今本《李文节集》(以下简称《文集》)为崇祯年间重刊本, 共二十八

作者简介: 于英丽, 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研究方向: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文学。

① 李廷机:《大学士李先生自状》//焦竑:《献征录》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5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李廷机:《入阁陈谢疏》//《李文节集》卷四,见沈云龙辑:《明人文集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

③ 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卷，所收皆为奏疏、讲章、序记、志传、书信等文，无诗赋之作。其文“覃精极思，镕铸敲推，一字不苟，而气格浑融，体裁庄雅，骨肉调匀，情景稳帖，绝无怒号叫跳、支离险怪之习”（见《文集》卷首叶向高序），可谓是当时馆阁文章的代表作，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考察其仕宦经历提供了直接依据。

李廷机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之后开始步入仕途，到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拜疏自去，宦海浮沉三十年，为官廉洁，无大过。他最为荒唐的政治遭遇是“系阁籍六年，秉政只九月”（《明史·李廷机传》），近五年的时间杜门乞休，从现存《李文节集》所收约一百七十封“乞休疏”中，可清晰了解李廷机历次乞休的情形。

李廷机最早一次乞休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此年，60岁的李廷机接到诏令，由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他并未立即赴任，于十二月起四次上疏推辞并乞休致。从《李文节集》卷一所收四封请告疏内容来看，推辞不就任的理由主要是身体患病。在第一疏中，李廷机说自己“遗精便血，肛脱不收”“满口皆疮，浑身作痛”；第二疏称“连月以来，下血不止，饮食少进，怔忡眩晕”；第三疏述说病情更甚：“自三月以来，日日下血，肛脱不收，脾胃愈虚，饮食日减，奄奄床箠，皮骨仅存。”第四疏直言“病已不可为”，“命危在旦夕”。从这些情词恳切的文字来看，身体羸弱、疾病缠身是实情，以此多病之身去承担机务繁重的礼部侍郎的工作，确实有难度。加之，已入仕多年的李廷机，对官场形势很是了解，万历二十九年前后，首辅沈一贯与阁臣沈鲤不协，沈一贯曾是李廷机的馆师，沈鲤与李廷机私交不错。李廷机此时赴礼部任职，无疑会陷入尴尬境地，甚至会卷入派系之争。他以自身衰病求休致，亦是自保之举。此次李廷机因病迁延两年之久未赴新任，圣旨屡催就职，遂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七月赴任，进左侍郎。

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岁的李廷机“陡然痰涌，昏晕仆地，不省人事。良久始苏，投之汤药，旋即呕出，便血数升，盗汗如雨，自度病势决不可为”（《文集》卷一《乞休疏》），遂于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二日，四次因病乞休，并请皇上点用新尚书，以预机务。这次乞休除了身体原因，尚有其他事由，《奏辩再乞休疏》提到礼科右给事中吴文灿疏论吏部推举添注之误，涉及李廷机，廷机引咎自陈请罪，认为推注之误“皆缘臣衰病昏耗所致，惟有一退可以全己，可以全人”（《文集》卷一）。最终乞休未允，继续履职。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二月，兵科给事中袁懋谦上疏恳请“御经筵以勤顾问并简礼臣以襄巨典事”，弹劾李廷机“负乘”“溺职”，“有臣如此，与无臣同者”（《文集》卷三《闻言乞休疏》），言辞犀利。李廷机杜门待罪近三个月，七次上疏乞休，自言“气质本偏，涵养不足，署部三载，实积愆尤”（《文集》卷三《乞休三疏》），请求皇上点用礼官，放其归家。并再次哀陈自己诸病缠身，难堪重任：“自其壮时，即患内伤、遗精、下血、口疮、胁痛诸症。两年来，加以鼻渊脑漏，积久不痊，比苦焦烦，前症并发，耳鸣目暗，怔忡健忘，饮食作酸，医药罔效。”（《文集》卷三《乞休五疏》）又明确列出此次乞休的三个理由“年老”“被论”“有疾”（《文集》卷三《乞休六疏》）。李廷机此番七次上疏乞休，理由具体而充分，明神宗三次下旨慰留，催其赴部办事，他无奈在五月复出履职。同年九月九日，李廷机再因身体“衰惫”两次上疏乞休，自言“衰惫倍于他日，恍惚健忘，耳鸣目暗，饮食减少，梦寐飞越”（《文集》卷三《衰惫乞休疏》）。加之他独署部事，兼撰讲章，事务繁重，难以支撑。上疏依然未获应允。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殿试供事期间，李廷机“痰涕淋漓，涕尽血出，兼以脱肛宿疾，因劳迸发，站立行走，艰苦难支”（《文集》卷四《患病乞休疏》），调理无效，无法继续工作，遂上疏乞休。候旨期间，南京御史李云鹄上疏言“择相宜慎”，内指不可用者三人，其中就包括李廷机，并指责他“媚嫉”。李廷机再次上疏乞休，并称自己“性不媚善而嫉恶”，对上级、前辈包括馆师沈一贯

皆“耻于攀援”（《文集》卷四《乞休二疏》）。此次乞休连上五疏未获允。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沈一贯、沈鲤致仕（《明史·神宗本纪》），内阁只有朱赓一人署事，阁务繁重，急需补充新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会推李廷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此时的李廷机病体未愈，且刚有李云鹄等人的弹劾，接到圣旨的他四次上疏推辞，推辞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为衰年病体，难堪重任；一为人言纷起，难以应对。在《辞内阁四疏》中，李廷机剖陈了自有新命以来，内心的忧惧不安：“心摇摇如悬旌，肠一日而九回，荣遇转觉忧煎，华靡反为颯脆。”（《文集》卷四）四疏情词恳切，但神宗屡次圣旨慰问褒奖，督促其到任办事。李廷机遂于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十八日到任办事（《文集》卷四《入阁陈谢疏》），次日又因人言求退，据其《闻言引退疏》称，工科给事中王元翰、兵科给事中胡忻上疏，暗讽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在会推时受到“密嘱”而偏袒李廷机，对其攻击不已，神宗下旨对王、胡二人罚俸半年，以此安慰廷机。不久，“姜士昌、宋焘复以论廷机被黜，群情益愤”（《明史·李廷机传》），李廷机三疏辩解并乞休，未获允，奉圣旨再出理事。

万历三十六年（1608）夏，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上疏，历数阁臣大罪十二款^①，涉及李廷机，并劝他及早抽身，“尚可救得一半，不至狼狈”（《文集》卷五《乞休再疏》）。由此导火索，李廷机自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下旬起，因同僚攻击、身体衰病、弟弟病卒等原因，开始连续上疏乞休。同年十月，李廷机以养病为由，“杜门注籍，不赴阁”（《明史·宰辅年表二》），且已先遣家眷离京归乡，表示出必辞的决心。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二月初九日，李廷机乞休已一年零八个月，连续上七十疏未获允（《文集》卷五、卷六），68岁的他移居“极荒极凉”的真武庙，继续乞休待命，而“廷臣犹有繁言”（《明史·李廷机传》）。万历三十八年（1610）五月二十九日，在真武庙寓居近半年的李廷机，痢疾病发，调理无起色，圣旨遣太医院医生前去诊视，但仍未有旨放行。李廷机自叹：“自古及今，人臣求去，未有若臣之难者；待命未有若臣之久者；求去之疏，未有若臣之多者。”（《文集》卷七《乞放疏》）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十二日，李廷机自言连续乞休已近四年，上一百二十三疏，仍未被批准（《文集》卷七《乞放疏》）。而他多年杜门不出，持续乞休未得休，人言纷纭，“诋臣者以为顽钝，疑臣者以为观望，嘲臣者以为怪物，即亮臣者亦以为腐儒，不知时变”（《文集》卷八《乞放疏》），李廷机已经到了无法再滞留不去的地步。万历四十年（1612）二月，他离开真武庙，返旧邸（《大学士李先生自状》），再上辞呈，流露出不等圣命“径去”之意，神宗下旨慰留，“勉之少俟”（《文集》卷七《乞放疏》），但依然未有旨放行。71岁的他口疮复发，至夏秋之际，“唇舌皆烂，粥吃不进，话说不出，日夜痛楚，命如朝露”（《文集》卷八《拟日辞朝疏》），他自知求放无望，万不得已，欲拟日辞朝。

至万历四十年九月初，李廷机连续乞休近五年，在真武庙寓居近四年，据他统计，已上疏一百五十多次，奉温旨三十四道，圣谕七次（《文集》卷八《拟再乞放疏因前本不发不果上》）；但仍未得放行的圣命。李廷机再上三疏求放，并于九月十九日辞朝待命，二十一日终于接到允放的圣旨，并加太子太保，赐路费，差官护送。至此，71岁的李廷机终于换来允放的恩旨，“不觉呜咽流涕，极人生所未有之感，极人生所未有之悲，而又极人生所未有之惶恐蹶踖”（《文集》卷八《辞加官疏》）。万历四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廷机踏上归乡之途，闰十一月初一日抵家。

综合以上李廷机历次乞休情况及其所上约一百七十封辞呈来看，他乞休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三方面：其一是年岁渐高，身体多病。他初次乞休时60岁，末次乞休成功已71岁，历次乞休皆已年高；且他“禀赋虚弱”“终日不离药裹支持”（《文集》卷一《请告疏》），衰年病体难以承担繁重的公务；加之他自幼生长在南方，虽宦居北方多年，依然感觉水土不服，常春患口疮，夏患腹泻，颇为不适，思

^① 《李文节集》作“十三款”，应为“十二款”，详见南炳文《〈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和〈李文节集〉中的李廷机内阁奏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乡之情亦愈加浓烈，告老还乡势在必行。

其二是李廷机不幸被卷入明代晚期派系斗争的漩涡，屡次被同僚攻击，他心力交瘁，欲全身全节而退。万历中后期，朝事懈怠，科道两衙门徇私结党，揣摩猜疑异己，淆乱朝政，党争渐成气候，危及到整个政治生态，辅臣纷纷乞休，躲避纷争，明哲保身。万历二十九年前后，阁臣沈一贯、沈鲤、朱赓主持事务，沈一贯是首辅，他与次辅沈鲤不协，多次借机打压排挤沈鲤及其门生。而李廷机与万历年间的两大首辅申时行、沈一贯都有师生之名：隆庆四年，李廷机举顺天乡试第一，申时行是其主考官之一；之后，万历八年，李廷机又做了申时行儿子的老师，期间与申时行及其家人多有交际，而沈一贯是李廷机在翰林院时的馆师，“言路以其与申时行、沈一贯辈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明史·李廷机传》）。阁臣朱赓亦因与沈一贯“同乡相比”，招来非议。

事实上，李廷机对前后首辅申时行、沈一贯皆尊重有加，但并未有所攀附；他与沈鲤及其门生郭正域等私交亦不错。万历三十一年（1603）七月，李廷机出任礼部侍郎兼侍读学士，适逢楚宗之乱起，妖书案发，沈一贯欲借妖书打压沈鲤及郭正域，正域被逮捕审讯，但始终没有证据定其罪，当时，“诸人承望风指，首鼠持两端”（《明史·李廷机传》），妖书案愈演愈烈，牵连众多，急需结案，李廷机从中调停，与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浚署名定讞生光狱，株连遂绝。在此事中，李廷机并未一味维护沈一贯，而是出力救同官郭正域。妖书案的结果虽未如沈一贯之意打压郭正域，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势下，释放郭正域、定罪讞生光已是最佳选择，沈一贯也并无损失。李廷机身处这复杂的局面与关系中，以折中融通的处事态度，维护了各方的利益。

此事之后，言路并未就此停止对李廷机的攻击；即使沈一贯、沈鲤致仕之后，他依然因沈一贯的关系被数次弹劾。万历三十五年初，南京御史李云鹄上疏指责李廷机“媚嫉”，他具疏回应，并重申自己与沈一贯只是师生之谊，并无攀附之事：“如前首辅沈一贯，乃在馆当年教习臣者，臣即耻为藤萝，而人世何能无瓜葛？况臣废礼久矣，毋论岁时疏阔，即考满到任，两度进京，无一巾一扇以相馈遗。署部三年，即大事未尝请教，间旅进而投帖，此词林之礼；或日久而一见，亦师徒之情。未尝求升，未尝求差，未尝毁一人，未尝预闻一事。”（《文集》卷四《乞休二疏》）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姜士昌、宋焘攻击李廷机，依然是因为他与沈一贯的关系，他再次上疏辨明自己的处境与立场：无偏党，无阿附（《文集》卷五《自辩乞休疏》）。攻击者并不罢休，李廷机不得已入阁之后不久杜门乞休；但他多年乞休未休，亦引来廷臣的交章弹劾。据他统计，至万历四十年，前后弹劾他的人多达百余人，“至二三百疏”（《文集》卷八《陈谢乞放疏》），他曾概述过自己被弹劾攻击的情形：“单本公本，专论带论，或一人而论十余本，或一本而论十余事，重论则以为当诛，轻论亦以为当逐，谓关邪正消长，谓关世道否泰，谓白马清流，祸在旦夕之顷，谓宗社安危，急在呼吸之间。”（《文集》卷八《谢恩疏》）

廷臣如此密集地因李廷机与沈一贯有师生之谊而交章逐之，以其乞休未休而频加指责，实际是万历中后期朝臣间不同派系斗争的缩影。李廷机身处如此复杂的仕宦环境，面对如此频繁地弹劾，周旋无计；且他视名节为毕生追求，遇谗言难以释怀，甚至触碰到心里的道德底线，无奈只得乞休自保。

其三，李廷机为人过于严肃谨慎，处事不讲人情；且不喜交际，虽深得一些前辈、同僚的赏识（如申时行、沈一贯、杨时乔等），但更因此招来诸多非议。《明史·李廷机传》记载他的一些性格特点，如“遇事有执”“性刻深”“颇偏愎，不谙大体”等；同官李云鹄也曾指责其“媚嫉”。这些性格特点甚至影响了李廷机的仕宦交游圈，他虽有不少门生故旧，但官场上的“盟友”却不多。同僚之中，相交最密切的当属叶向高。李廷机长叶向高十七岁，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科进士，且同年入内阁，是明末闽地的骄傲。叶向高曾言：“高以父执事公，公以弱弟蓄余。同官词林，同贰留曹，同人纶扉。三十余年，南北仕宦，无不追随。即论文对局，扬古榷今，无不契合。计海内交游，相知深

而相聚久，未有若公之与高者。”^①可见二人情谊的深厚。李廷机杜门乞休、患病期间，叶向高多次去探望他，与他谈论内阁事务，并为他的处境出谋划策。但李廷机不喜与人结党，虽与叶向高私交密切，但并不互相攀附。且在当时衰颓、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他们二人的力量也不足以对抗逐渐强大的党争，在李廷机归里两年后，叶向高也因言官攻击、奏疏久拖不发等事由乞休归乡。

可以说，李廷机的个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仕宦郊游，导致其身处要职却缺乏良性互助的盟友，面对人言攻击时孤立无援、少人代为辩白，甚至因此受到同僚的排挤，不得已连连上疏乞休。这可视为李廷机乞休的另一主观诱因。

从动机上分析，李廷机早期上疏请辞有时是面对官途升迁时应有的谦辞之举。如万历二十九年因改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而四次上疏请告，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四次上疏辞却新职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皆带有一定的“程序化”，“乞休疏”中也有不少升迁履任之际的谦虚客套之语。但他大部分乞休疏，明面上多因身体衰病，实际上是对攻击者的迂回还击，欲借助辞呈一次次把自己的处境上达天听，以期得到神宗的回应与支持，使矛盾得以化解，甚至寄希望于神宗能改变当前糟糕的政治生态环境，唤起朝臣的辅政热情。

李廷机如此繁复地上疏乞休，明神宗对此并非皆置之不理，仅对其慰留的圣旨、圣谕就多达四十多道，且惩处了攻击他的王元翰、胡忻、姜士昌、宋焘等人，遇之不谓不隆。但他连续乞休，仍不蒙放行，原因也颇为复杂。其一，李廷机最早乞休始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三十六年（1608）起杜门乞休，至万历四十年（1612）蒙恩休致，这前后十多年，正值万历后期，“朝政日弛，中外解体”（《明史·朱赓传》），许多奏疏被留中，无法得到及时批复，导致诸多事情难以及时处理，一拖再拖，阁臣叶向高、朱赓等人所上奏疏也多次未有回应。李廷机乞休后期所上辞呈也大多没有回应。叶向高曾论及万历年间诸多大臣乞休的原因及羁留难去的情形，并建议皇帝及时放行：“十余年来，大臣乞休得请者，百无一二。李廷机、赵世卿皆羁留数载，疏至百余上。今尚书孙丕扬、李化龙又以考察军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复踵祲辙，实伤国体。诸臣求去，约有数端。疾病当去，被言当去，不得其职当去。宜曲体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则听之。”（《明史·李祯传》）这也解释了李廷机数次乞休未果的现实背景。

其二，李廷机乞休的万历中后期，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灾害并至，边患频发；朝廷用人体系混乱，“卿贰久缺，考选久稽，郎曹有积滞之嗟，遣佚无登庸之望”（《文集》卷五《乞休疏》）。诸弊横生，导致“人心日以泛散，政事日以废弛，法例日以动摇，士习日以浇薄”（《文集》卷五《乞休疏》）。加之党争、派系之争异常激烈，人人自危。此种情势之下，不少重臣已无盛世时的辅政热情与抱负，对国事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或引疾杜门，或辞官归里，远离朝局纷争。在李廷机之前，阁臣赵志皋、首辅沈一贯皆曾上八十余疏乞归，朱赓也曾因病上疏二十余次乞休，更有如李祯等大臣，不报知朝廷而径自归里。至万历四十年，“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明史·赵焕传》），人才流失严重。此时大臣求去，若皆允其休致，许多职能部门将无法正常运转。李廷机虽“遇事有执”，但为官廉洁勤谨，明神宗多次赞许其“日讲有年，启沃功多”“勤劳懋著”“清修直谅”（《文集》卷四《辞内阁疏》圣旨语）。在时局艰危、内阁缺人的情势下，对于不结党不营私的李廷机，明神宗不会轻易允放。这必然导致其乞休久拖不果。

再者，李廷机自从步入仕途，一路并未遇到大的政治风波，三十年间升至首辅之位，对于皇帝的知遇之恩，他怀着莫大的感激，尝言“臣每念天地父母之恩大矣，而皇上之恩，过于天地父母”（《李
（下转第117页）

^① 叶向高：《祭李九老》//《苍霞草全集》第五册：《苍霞续草》卷八，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

清侯官李鸿瑞父子著述辑考

刘 繁

(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 要: 侯官李鸿瑞及子彦彬、彦章, 俱为清代福州之俊彦, 既出入宦海文坛, 扬名于当时, 且勤耕笔墨, 遗诗赋文章于后世。但囿于历史原因, 其著述存佚不等, 在各家书目中难窥全貌。笔者遂勾稽各家书目, 欲就其著述之情况作一较为完整的考述, 以补各家载籍之缺憾。

关键词: 李鸿瑞; 李彦彬; 李彦章; 著述; 辑考

清代道咸以降, 福州英才辈出, 其风流文采, 映照左右, 高名显声, 辉耀一时。侯官李鸿瑞及其子彦彬、彦章昆仲亦是其中佼佼者, 他们既出入宦海文坛, 扬名于当时, 且勤耕笔墨, 遗诗赋文章于后世。但囿于历史原因, 他们的著述或存或佚, 于各家书目中难窥其全貌。笔者拟勾稽各家书目, 欲就其编撰辑刊之著述情况作一较为完整的考述, 以补各家书录之缺憾。

一、李鸿瑞著述

李鸿瑞(1761—1817), 字道升, 号砚云, 侯官(今属福州)人。嘉庆三年(1798)中举, 十三年(1808)大挑知县, 试用江苏。此后相继任高淳县令、上海县丞、川沙抚民同知等职。鸿瑞为政, 仁恕通敏, 解诉讼, 明察细审, 而不轻易笞罚; 疏民困, 悉心筹措, 却不加负于人。在官, 好表章名贤, 称颂风雅。主笔行文, 风格似蔡襄、真德秀。嘉庆二十三年(1818), 病卒, 享年58岁。有子二: 彦彬、彦章。^①鸿瑞所撰著述有:

1. 《素兰唱和集》一卷附钞一卷, (清)李鸿瑞编, 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是书末有李彦章跋, 述云: “闽之素心兰闻天下, 顾诗家题咏无及者。盖以花中绝品能揣称之难也。乾隆甲辰徐两松(嗣曾)抚部方官闽藩, 始有七律之作, 工于赋物, 诗成后属而和者数十家。先大夫时为鳌峰书院诸生, 以和诗受知, 拔第一。尝录同时唱酬诸作都为一篇。”^②是集初既为鸿瑞手抄, 时隔四十九年后, 已漫漶不可读, 彦彬、彦章昆仲遂以校录刊行。藏福建省图书馆(以下简称“闽图”)。

2. 《榕亭诗稿》二卷, (清)李鸿瑞撰, 抄本。藏闽图。

3. 《扶荔山房诗集》, 卷数不详, (清)李鸿瑞撰。已佚, 列《(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4. 《川沙治略》, 卷数不详, (清)李鸿瑞撰。已佚, 列《(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作者简介: 刘 繁, 男, 福建省图书馆馆员。

^① 皇清敕授文林郎署江苏川沙抚民同知前知高淳新阳县事诰封奉政大夫内閣中书协办侍读显考砚云府君 [李鸿瑞] 行状一卷, (清)李彦彬撰, 清刻本, 1册。

^② (清)李彦章撰:《素兰唱和集·跋》, 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5. 《吴中田赋考》，卷数不详，（清）李鸿瑞撰。已佚，列《（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6. 《三江指掌图》，卷数不详，（清）李鸿瑞撰。已佚，列《（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7. 《两汉循吏补遗》，卷数不详，（清）李鸿瑞撰。是书为鸿瑞采古遗书及金石文字而作。已佚，列《（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8. 《三吴水利书》，卷数不详，李鸿瑞撰。“鸿瑞尝辑是书，未成，子彦章后官江南，乃续成之”。^①已佚，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及《（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9. 《校官碑考》一卷，李鸿瑞撰。“鸿瑞官高淳知县，谓：‘校官碑出固城湖，属县界。’以不克移置为憾，乃作碑考一卷。”^②已佚，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及《（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二、李彦彬著述

李彦彬（1791—1837），字则雅，又字兰屏，号苏楼，鸿瑞长子。自幼聪明颖悟，年十九便乡试中举，文名噪一时。此后迭主上海县书院及浦城县月城、厦门玉屏两书院讲席。道光三年（1823）成进士，选庶常，充武英殿纂修圣训总校官，后改官刑部。母亲卒于京邸后，归乡守孝。服阙，入都仍官刑曹，补山东四川清吏司主事。总办秋审处，精通例案，谳达政体，部中章奏各稿多出其手。好金石字画，收藏亦夥。道光十七年（1837），辞世，享年四十有六，葬于浦里临水山。^③其著述有：

1. 《虹月船行记》一卷，（清）李彦彬撰，抄本。藏闽图。
2. 《榕亭诗文钞》十五卷，（清）李彦彬撰，抄本。是集涵：荔庄吟草一卷、行云吟草一卷、燕游吟草一卷、窥杜窗草一卷、还朝集一卷、吴门吟草一卷、归燕吟草一卷、永慕轩吟草二卷、虹月船吟草二卷、榕亭文集四卷。闽图藏本，有沈祖牟“嵩斋所藏”钤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据稿本传钞本。另，《（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载《榕亭文钞诗钞词钞》十七册，谓是集“本无卷数，诗分荔庄、行云、吴门、燕游、归燕、虹月船、窥杜窗、永慕轩、还朝、都门各集，古体通畅，今体清爽，视榕园稍肩，随文多寿文祭文，皆骈体，散体杂文十余首，多考据之作”。^④
3. 《心太平室诗存》一卷，（清）李彦彬撰，清抄本。首有叶绍本序，云：“隶事遣词，纤徐详尽，缘情体物，婉约清新，是能兼古人之长而自出机杼者。至其睠怀明发，系念烝黎，实本风雅之旨，缠绵真挚，远绍杜陵，诚足树帜骚坛矣。”^⑤观是集，收诗百余首，而以述行怀古为要，自注中亦有可资考证者。闽图藏本，有沈祖牟“嵩斋所藏”钤印。另有：《心太平室诗文抄》三卷，传抄本，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下简称“福师大图书馆”）。
4. 《心太平室文钞》一卷附词一卷，（清）李彦彬撰，抄本。闽图藏本，有“兰屏公稿”钤印。观是集，虽曰文钞，然诗词文赋诸体兼备，名杂抄似更为宜。集末有祭李彦章之文数篇，于他处未见，或可补史之缺者。
5. 《榕亭诗钞》不分卷，（清）李彦彬撰，抄本。是集涵荔庄吟草一卷、行云吟草一卷、还朝集一卷、吴门吟草一卷、燕游吟草一卷、虹月船吟草一卷、窥杜窗草一卷、永慕轩吟草一卷。闽图藏本，有沈祖牟“嵩斋所藏”钤印。
6. 《兰亭考》一卷，（清）李彦彬撰，稿本。闽图藏本，有“曾藏林汾貽处”“御园奉赋秘殿书

^{①②}（清）孙尔准等修，（清）陈寿祺等纂：[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六十八，台北：华文书局据同治十年重刊本影印，1987年，第1400页。

^③ 欧阳英修，陈衍纂：[民国]《闽侯县志》，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据民国22年刊本整理，1995年铅印本，第406页。

^④ 陈衍等纂，魏应麟续纂：（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民国十一[1922]至二十七年[1938]间修印本，卷六十六，第十三页。

^⑤（清）叶邵本撰：《心太平室诗存·序》，清光绪间抄本。

史院缀文云司乘宪”“兰评公稿”等钤印。

7. 《编年记事》一卷, (清) 李彦彬撰, 稿本。藏闽图。

8. 《兰亭年谱》不分卷, (清) 李彦彬撰, 稿本。闽图藏本, 有“御园奉赋秘殿书史院缀文云司乘宪”“兰评公稿”钤印。

9. 《皇清敕授文林郎署江苏川沙抚民同知前知高淳新阳县事诰封奉政大夫内阁中书协办侍读显考硯云府君 [李鸿瑞] 行状》一卷, (清) 李彦彬撰, 清刻本。藏闽图、福建博物院。

10. 《玉堂清课》, 卷数不详, 李彦彬撰。已佚。

11. 《山谷年谱》, 卷数不详, 李彦彬撰。已佚。

12. 《文字窗集》《补藤篴集》《昌其志斋集》卷数不详, 李彦彬撰。已佚, 列 [道光] 《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及《(民国) 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三、李彦章著述

李彦章(1794—1836), 字则文, 一字兰卿, 鸿瑞次子。嘉庆十三年(1808)中举, 年方十五。十六年(1811)成进士, 先以内阁中书用。是时, 翁方纲主持风雅, 彦章以所学拜其门下, 为入室弟子。又与谢启昆、吴嵩梁、陈用光、梁章钜、刘嗣绾、顾莼、程恩泽等人论文赋诗, 名动京华。二十三年(1818), 任归安王以銜副手, 典江西乡试。十月, 丁父忧。道光二年(1822), 服阙, 补官。此后相继任广西思恩、庆远府知府、江苏常镇通海道、江苏按察使、山东盐运使等职。彦章主政地方, 首重文教。于思恩任上, 重建书院, 兴修义学, 并厘定规程, 奖拔寒俊。于民事, 则体察情形, 宽徭薄赋, 兴修水利, 推广双季稻。经营关务, 则兴利除弊, 开源节流, 在任三年, 便府库充盈。政事之余, 彦章也雅好文事。在任时, 或与同僚赋诗酬唱, 或同友朋鉴赏金石, 或在当地兴修古迹, 或为景致挥毫题词, 凡关风雅, 无不津津乐从。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 因病卒于任上, 享年四十二岁。^① 虽天不予年, 但彦章笔耕不辍, 著述颇丰, 经勾稽有:

1. 《榕园全集》六种, (清) 李彦章撰, 清道光二十年(1840)李以烜刻本。全集卷首有吴兴叶邵本序, 云: 彦章“天才亮特而又博学多闻, 下笔千言, 捷于风雨, 尤长于考据纪事, 征引繁富, 规划详明, 灏气流行, 有汪洋浑涵之概。而古今体诗亦穷力追新, 雄深雅健, 不堕纤靡齟齬之习, 盖近人诗文中可称一家。惜其年不永, 不获尽展其长也……兰卿之文, 可入著作之林, 而实政在民, 讴思俎豆, 尤为千秋不朽之业”^②。藏国家图书馆(下简称“国图”)、闽图、福师大图书馆等。是集涵以下6种:

榕园文钞六卷。卷首有高澍然序、评词及自序, 高序云: “榕园文钞, 李兰卿自彙官粤西后所作, 其治人事神、兴农育士、弭盗招徕土司之设施, 咸于此可考, 盖君经世之书也”, “其意恳而思周, 词质而气厚, 初无意为文, 凡有作求信于民而已。”^③ 自序云: “杂取年来各体文字汇录一编, 姑借以为自镜之书。”^④ 是书卷一、二为记、题记、石刻; 卷三为自序、题后、序; 卷四为跋考; 卷五为纪事、说、札、策问; 卷六为祭文。

榕园诗钞十六卷。分: 槐忙吟草一卷, 首有叶绍本序; 归楂杂咏一卷, 首有筠潭居士题词; 都门

^① 欧阳英修, 陈衍纂: [民国]《闽侯县志》, 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据民国22年刊本整理, 1995年铅印本, 第406—407页。

^② (清)叶邵本撰:《榕园全集·卷首序》, 清道光二十年(1840)李以烜刻本。

^③ (清)高澍然撰:《榕园全集·榕园文钞·序》, 清道光二十年(1840)李以烜刻本。

^④ (清)李彦章撰:《榕园全集·榕园文钞·序》, 清道光二十年(1840)李以烜刻本。

旧草二卷；不署名集三卷；榕园集诗钞一卷，卷首有魏敬中序及自序；恋春园诗草二卷；出山小草二卷；江山文选楼集一卷；双石斋诗草一卷；载酒堂集二卷，共收诗一九五三首，蔚为壮观。叶绍本评其诗云：“才调婉丽，出入于中晚诸家，而神韵悠然，若孤桐朗玉风神四映，又如凤箫独奏天籁纤徐焉。”^①是集内容或纪师生情谊，或咏山川胜迹，或题金石书画等，“与杨雪椒先生绛雪山房集可相伯仲，而自注中时有足资考证者”^②。

润经堂自治官书六卷。首有自序，云：“润经堂者，知广西思恩府事李彦章治事之堂也，……因思汉书有言经术可以润吏事，故以二字名其堂，亲理文书终日起居于此。”^③卷一、二为思恩府书院义学事宜，卷三为思恩府保甲事宜并录汪文端公书，卷四至六为告示等。

榕园楹帖一卷。前有弟子李馨等联句序，后有庆江书院弟子姚人鹤等跋，凡彦章为书塾馆阁、名胜古迹等所撰楹联者都汇为帙，付梓行之。

榕园识字编一卷。“分辨似、正讹、正贴通用三类，颇简明有益于学子。”^④

江南催耕课稻编一卷。卷首有陶澍、林则徐序，是书收文凡十篇，“首纪列圣纶诰，以著朝廷之重本，而时地品类以及种艺之法，以次递详，且所列江南早稻诸种，皆今之苏州松江太仓府州志及长沪吴县昆山常熟上海诸县志所详载者，则诚物土之宜，而此邦父老之所传习，视他书所纪，尤信而有征。”^⑤

2. 《榕园唱和集》九卷，（清）李彦章撰，清刻本。是集涵桃花庵、载酒堂、小红桥、四并堂、补柳亭、双石斋、岚漪诗屋、四并堂唱和二集等诸集。福建省图书馆藏本，各卷卷端有“李彦章印”“榕园居士”“四并堂工手栽花”“三十六湖长”等铃印。是书所收皆为彦章履职时，与同僚贤达、名士俊彦等雅集唱和之作，于考彦章行迹、郊游颇有裨益。藏闽图。

3. 《梧村藏稿》，卷数不详，（清）李彦章撰，清道光年间刻本。藏邵武市图书馆。

4. 李兰卿杂著六种六卷，（清）李彦章撰，清嘉庆间刻本。是集包括：槐忙吟草一卷、榕园集诗钞一卷、出山小草二卷、恋春园诗草一卷、归楂杂咏一卷、都门旧草一卷。续修四库提要以为：“其为诗学中晚、兼及剑南，体格甚卑，榕园张镫南唐宫词诸绝句，差有风人之旨意，余均七言近体为多，率应酬之作也。”^⑥藏中科院图书馆。

5. 《李兰卿宫词》一卷，（清）李彦章撰，（清）杨浚辑，冠悔堂丛书本，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6. 《李兰卿随录》一卷，（清）李彦章撰，稿本。藏闽图。

7. 《槐忙吟草》一卷，（清）李彦章撰，稿本。藏闽图。

8. 《菰庐诗草》不分卷，（清）李彦章撰，稿本。藏中科院图书馆。

9. 《薇垣归娶图诗》四卷，（清）李彦章辑，清咸丰九年（1859）刻本。首有翁方纲序、题字及华冠赠图，后有李以烜跋，并附彦章《出守思恩述怀四首即以留别都下诸公》初稿一卷。翁序云：“兰卿老友未冠成进士，橐笔薇省，品学才地有声京师，供职二年，始以癸酉八月乞娶，得请一时公

①（清）叶邵本撰：《榕园全集·榕园诗钞·卷首序》，清道光二十年（1840）李以烜刻本。

② 陈衍等纂，魏应麟续纂：《（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民国十一年〔1922〕至二十七年〔1938〕间修印本，卷六十六，第十页。

③（清）李彦章撰：《榕园全集·润经堂自治官书·序》，清道光二十年（1840）李以烜刻本。

④ 陈衍等纂，魏应麟续纂：《（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民国十一年〔1922〕至二十七年〔1938〕间修印本，卷十五，第六页。

⑤（清）林则徐撰：《榕园全集·江南催耕课稻编·序》，清道光二十年（1840）李以烜刻本。

⑥ 王云五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十五册，第935页。

卿士夫图画歌咏以荣其归。”^①彦章在时，录诸公卿诗为副本，未及付梓而歿。彦章妻七十寿辰时，子以烜将其付梓刊行。藏闽图。另有清抄本，藏国图。

10. 《苏亭小志》十卷首一卷，（清）李彦章辑，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是书又名《苏祠小志》。祠址旧在苏州城东定慧寺啸轩，以宋苏轼而传。清时顾沅重葺祠宇，李彦章广稽群书，凡有涉于定慧者并名流歌咏，辑为《苏亭小志》十卷，未及付梓。苏州图书馆藏四卷本，《中国祠墓志丛刊》据之影印。国图、中科院图书馆藏有完帙。

11. 《[福建福州]李氏家乘》一卷，（清）李彦章辑，清抄本。是集为彦章手辑有关李氏家乘著作，记人多取碑志，纪事则用编年。藏闽图。

12. 《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清）翁方纲撰，（清）李彦章校，清光绪三至四年（1877 - 1878）李以烜刻本。是集最早为李彦章校刊，后经彦章子以烜据手稿补正六十一条。此集后有以烜跋云：“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先大夫编校未竟，身后刊成。今据先生手稿暨先大夫原校残帙重加参改本也。”藏国图、闽图、陕西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等。

13. 《庆远府志》二十卷首一卷，道光八年（1828）刊本，英秀、李彦章等修。“此志乃继乾隆《李志》（即李文琰所纂府志）重修，始事于李彦章、钟禄、恒梧三守，及英秀任乃克告成。其书体例，为类十二，曰地理、曰沿革、曰建置、曰食货、曰经政、曰学校、曰营伍、曰职官、曰选举、曰人物、曰艺文、曰时事，为目六十有四，纪载郡事则核，邑事则简。”^②藏广西图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

14. 《榕园学矩》《西邕讲授》，卷数不详，（清）李彦章撰。已佚，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

15. 《思恩府志》《思田方言》《思田草木状》卷数不详，（清）李彦章撰。已佚，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

16. 《浏河志》《练湖志》《三十六湖志》，卷数不详，（清）李彦章撰。已佚，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及《（民国）福建通志·艺文志》存目。

综上所述，李鸿瑞及其子彦彬、彦章父子三人谨从“立德、立功、立言”之古训，勤于政事而不废笔墨，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为方便学界对李氏父子之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就其著述的存佚情况作了一番辑考，不当之处，望祈正之！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清）翁方纲撰：《薇垣归娶图诗·序》，清咸丰九年（1859）刻本。

^②陈光贻撰：《稀见地方志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905-906页。

诗评家陈衍与黄曾樾的师生情谊三则

徐金凤

陈衍与黄曾樾一同被列入《福建名人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刊行），名实相符。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今福州）人，文学家、著名诗评家。26岁考中光绪举人。曾为台湾巡抚刘铭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客。历任学部主事、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厦门大学国文教授、福建通志局总纂等职，是清朝“同光体”（“同光体”指同治、光绪以来“不专宗盛唐”的诗派）诗派主要代表人物。《石遗室诗话》为其主要理论著作。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文集》《近代诗钞》，编纂有《福建通志》等。黄曾樾（1897—1966），字荫亭，号慈竹居主人，原籍永安，生于长乐，教育家，“中西、文理、古今贯通”教授，年少时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读书，旋即留学法国五年，获工程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林森县（今闽侯县）县长、福州市市长。新中国时期，长达十七年任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慈竹居诗稿》《陈石遗先生谈艺录》《埃及钩沉》等撰著。笔者于1954年考入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受业于黄曾樾教授。他为我们讲授欧美等外国文学一年，编印教材发给学生。授课时根据所需，讲述其早年赴法国巴黎留学及途经地中海等诸多情形，令人印象深刻。黄老师还亲带学生瞻仰中法马尾海战的烈士遗迹，深感他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主义者。

黄曾樾拜陈石遗门下为诗弟子

黄曾樾从巴黎回国以后，于1927年经由林庚白（“同光派”诗人，亦入传《福建名人词典》）介绍，入陈石遗门下为诗弟子，成忘年交。林庚白（1897—1941），福州人，曾师事于陈宝琛、陈衍，长期从事古体诗歌创作，对国学颇有造诣，为“南社”健将。1941年到香港拟办报业，被日本侵略军杀害于街头。黄曾樾师从陈衍十年，往来密切，或送诗请益，或相会南京，或晤于沪上，或同游华山，即使是黄荫亭因公赴欧美考察邮政期间，通讯亦未中断。他参加“说诗社”，聆听老师教诲，努力钻研诗文，诗艺大有长进，颇得石遗先生赏识。陈衍所著《石遗室诗话》在当时风行海内，影响甚大。黄曾樾有11首诗作被收录于《石遗室诗话》正编。当正编出版之后，社会上闻知石遗先生还将续编诗话时，许多人争先投诗，以得石遗先生一言为荣。黄荫亭是陈石遗的高足，先生对其爱护有加，续编里又入选黄曾樾17首作品。在《石遗室诗话》正、续编里共选录这位青年诗人作品28首（含选句8首），其中七言绝句有：《到南平》《到家》《归舟》《看菊》《秋夜》《龙门》《喜养清弟至》《不寐》《九月三日再诣随梅斋赏桂花已尽谢余馥未销欣然有作》《郊行》《口柬子木》二首、《檐前古树》；五言律诗：《游摄山》；七言律诗6首：《怀石遗师时游华山》《夜永》、“一事自哀年少日，坐看沈陆作诗淫。”（选自《登鸡鸣寺》）、“感时意共虫声乱，干禄心随夜色寒。”（选自《对月》）、“月华未是无情物，不闲炎凉入我怀。”（选自《宵寒》）、“为语云端征雁道，投林总让暮鸦先。”（选自

《雨花泉》)；五言古诗二首：《秋夜》《哭赖静轩》；另有选句四句：“不为叹老嗟卑语，却乏掀天拔地辞”“何须迟暮伤怀抱，绝好贫交话性情”“绝怜灞上真儿戏，逆使辽东化鹤远”“蛩声到枕非无意，为报秋风又一年”。陈衍对当代诗人、学者赞辞较少，然而对黄荫亭的诗作却评价颇高，称道“永安黄荫亭曾樾，弱冠毕业法兰西里昂大学，而夙耽旧学。其师法国老博士某，甚器之，使著《中国周秦诸子哲学概论》(即《老子、孔子、墨子哲学思想的对照研究》，笔者注)，著录巴黎图书馆，得赠哲学博士，中国人所未有也。”认为他“诗工绝句”，以“七言绝句为上，七言律、五言古次之”；“笔意倜傥不群”“音调多凄恻”“多沉着不犹人语”“风格清逸，摭情尤多挚切语”等评说屡见诗话。

《陈石遗先生谈艺录》刊行

拜师期间，黄曾樾协助陈衍编纂《福建通志》。师事先生三年，写成《陈石遗先生谈艺录》，1931年由中华书局刊行。此系上海中华书局仿宋版印，为海内稀本。上有林庚白序言及作者自序。黄曾樾在自序中说道：“丁卯孟冬初弦，由董纯丈介谒先生(陈衍)于文儒坊三官堂之匹园，呈诗文为贽。师年七十有二，精神矍铄，长身颀白，貌清癯，望之如六十岁之人。谈论精彩焕发，娓娓不倦，乐育之意，睥面盎背。嗣后每遇休沐，常随杖履，其说诗旨趣，大抵散见于所著书中，有所请益，必为畅言。退而录之，以备遗忘，随闻随记，无有汇次，名曰谈艺录，纪实也。”该书计述陈石遗先生的艺文评论48则，每则开头均冠以“师云”，恭恭敬敬地署上“门人黄曾樾笔记”，严格以师生关系规范自己。《谈艺录》中评述自汉魏六朝、唐宋直至清朝和近代相关作家的诗歌。主张作诗“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学文学当取资大家，小名家佳处有限，看一遍可也”。写诗求工，“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陈石遗关于宋代杨万里(诚斋)诗的一则评论尤为精彩：“作诗当求真自己语。中晚唐以逮宋人，力去空套。宋诗中如杨诚斋，非仅笔透纸背也。言时折其衣襟，既向里折，又反而向表折，不过一曲折而已，诚斋则至少两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折又向左，诚斋则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总而向右矣。”写诗贵含蓄，忌直露，“一波三折”才有深意、有诗味。陈衍老先生“一折、再折、三折”的写作技巧论一出，即为后人所津津乐道。黄曾樾于《谈艺录》后记云：“从先生学诗时，将所闻于函丈者，随时记录之。其已见于先生著作者，均不记。”由此观之，《陈石遗先生谈艺录》可视为是《石遗室诗话》的一种补充，是诗话的参照读物。《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云：荫亭“尝记所请益于余者，为《石遗室谈艺录》。”可证陈石遗是认可《谈艺录》的。此书虽只是薄薄一册，学术价值却甚高。当代著名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陈祥耀教授盛赞该书云：“以先生(黄曾樾)古雅精练的文，写陈衍先生精彩独到的诗论，其价值无愧清代郎廷槐之作《师友诗传录》、何世基之作《燃灯纪闻》，见重士林，是千古必传之作。”(引自陈祥耀《读黄曾樾教授的两种遗著》一文)这里还须提及一事，同为当时年轻学子的钱钟书也看过此书。199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钱钟书著《石语》(陈衍石遗说)。《石语》为作者于1938年重新整理1932年阴历除夕同陈衍的长篇谈话稿。书中说及“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至以‘泥金捷报’入诗(按：参观黄曾樾记《谈艺录》)。岂不使通人齿冷!”钱钟书特别提醒读者将《石语》与《谈艺录》相互启发参读。黄曾樾比钱钟书年长13岁。钱钟书是在读过《谈艺录》后而写《石语》的。两书完稿时间相距8年，出版时间相距65年。二书同记陈石遗先生的文艺评论，一个写于留法返国以后，一个写于法国巴黎客寓，历经岁月沧桑，实为文坛可资谈助之轶事。

黄曾樾叹服陈石遗博极群书

早于黄荫亭从师之前，陈衍在诗坛上已有很大名声。1923年陈衍和鲁迅先生同被邀请为厦门大学教授，鲁迅称他为“大诗人”。陈衍收黄曾樾为及门弟子，当时一位是名噪一时的本土大诗评家，一位则是取得洋博士后迅即归国的年轻诗人；黄曾樾推崇老师为诗界“泰斗”，陈石遗先生视黄荫亭晚辈为杰出俊才。老师爱才心切，学生勤学好问，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得诗功而愈现。黄曾樾所撰《晤石遗师沪上》一诗，即抒写以毛诗（《诗经》）请业、师为畅言情景。黄曾樾写《陈石遗先生逸事》一文（见《福建文史》2009年第1期）忆及“先生云‘《文选》、《水经注》、《说文》、《史记》，为必须读之书。’”显现石遗先生何等重视国学优良传统。黄荫亭深深为陈石遗先生之博极群书、极强记忆力所折服。“石遗先生博极群书，吾闽学者推为读书种子。精力过人，髦年不衰。丁卯年冬里居，一日，为曾樾讲《尔雅》，曾樾苦聱牙难读，先生笑曰：我尚背诵。因命曾樾执卷，随意翻一页告以首句，先生昂首，洒洒而诵，无一字讹。已而，叶长青来问《礼记》‘深衣’，手执《皇清经解》，遥坐据书而问，先生问答，博引繁征，如倾江倒海，并言某说见某书，皆随口而出，长青无以难而去。先生回首，复为曾樾讲《尔雅》如初。其记忆力之强，有如此者。”陈衍虽博学强记，但每遇疑惑，必查书，其做学问的精神深刻影响后人，为众多年轻诗人、学者奉为圭臬。黄荫亭《展石遗先生墓》（三首之一）曰：“北辰星自拱，旗鼓漫阴晴。寂寞登龙地，凄凉泣凤声。江河知不返，邱龚太无情。十载论奇字，侯芭愧此生。”黄曾樾怀念陈衍诗作流传下来的有20首，师生情谊既深且笃。“同光体”诗派对黄荫亭诗歌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林庚白在《谈艺录》序言中说道：“有志与旧文艺者，人手一编，余知其于诗古文辞入门之途径，必有获也。信惟荫亭足以传先生，亦惟先生孳孳于商量旧学，若此其笃。”黄曾樾诗作和《谈艺录》无不体现出陈衍“同光派”的诗学思想艺术。陈石遗与黄荫亭深挚的师生交谊是现代闽省诗坛之一桩传世佳话。

（责任编辑：林春香）

浅论丘葵诗歌创作的“唐音”和“宋调”

廖肇禄, 萧庆伟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丘葵是南宋末年的一位遗民诗人,其著作《钓矶诗集》因流传不广,遂不为人所知。现存丘葵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于中年和晚年,中年时期适逢南宋灭亡,因此颇多故国黍离之悲;晚年因隐居金门小嶝屿,常常徘徊于残山剩水之中,诗歌蕴含无可奈何之感。纵观诗集,发现其诗歌有“唐音”和“宋调”的倾向,今从其诗歌中“宗杜”“宗晚唐”“宗宋”等倾向,探讨其“平淡”“清雅闲淡”的艺术特点,并论述其“以俗为雅”的背景。此外,还对“理学诗”特点进行探述,探讨丘葵诗歌中理学诗的渊源。

关键词:南宋;丘葵;诗歌;唐音;宋调

众所周知,唐诗与宋诗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诗歌的两种基本典范。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就曾说道:“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①丘葵在其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了学杜、学晚唐诗风的创作特点,并继承了宋初“平淡”、理学家邵雍的“击壤”的风格特点。本文拟探讨丘葵诗歌创作中“唐音”和“宋调”的创作倾向。

一、丘葵诗歌创作的唐音

南宋末年,文坛衰弊,场屋时文大行其道。以散文来看,文风虚浮之极,文章与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脱节,士大夫高谈空洞陈腐的性命义理,文坛后期更是出现艰涩难懂、旨意隐晦难明的古文变体。以诗歌来看,随着道学的兴盛,“后生束于科举,不复为诗,间有切切从事其间者,父兄师友争尤之,以为用意不专。前辈风流尽矣。”^②在江湖诗人的衰靡风气笼罩下,宋末诗坛一直处于卑弱浮靡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

其实,梳理一下南宋诗坛的嬗变过程,我们知道南宋诗坛初期是被江西诗派主导的,除江西诗派之外,王水照和熊海英著的《南宋文学史》认为当时还有一个与江西诗派疏离的不黄不杜、独学晚唐的小诗人左纬。左纬和其他南渡诗人一样,亦遭变乱,但其并不模仿杜甫,诗歌能不矜气格,不逞书卷,以清浅疏淡的词句抒发真挚深婉之情。但其诗歌亦有格局窘狭、意旨浅薄之弊端。左纬的诗歌发南宋学晚唐诗歌的滥觞。丘葵与左纬遭遇较为相似,丘葵遭逢过宋亡之离乱,丘葵的恩师吕大奎就被南宋泉州叛臣蒲寿庚杀害,亲朋好友更是有许多在战乱中丧生。丘葵学唐主要体现在在学杜和学晚唐两个方面。

作者简介:廖肇禄,男,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萧庆伟,男,闽南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与词学。

①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② 刘宰:《书碧岩诗集后》//刘宰:《漫塘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四。

丘葵学杜主要表现在:

首先,喜欢用杜诗韵。如《与所盘诸君会石幡还和杜老曲江韵三首》,三首诗和的都是杜甫《曲江二首》其二的韵,分别是“归”“稀”“飞”和“违”,也就是《广韵》中的“微”字韵。在《过野塘用杜老韵》中,邱葵用的是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九中“云”“文”“纷”的韵,也就是《广韵》中的“文”字韵。

其次,喜欢学习杜诗的句法结构。在《呈大口宗丞求笔戏》中,邱葵用了杜诗常用的结构。此诗既在语言上,又在结构上模拟杜诗,是用杜老幽默戏谑的笔调之意。全诗是想表达自己具有虚静的人生境界,能瞬间到达上古那种虚宁的社会中。颌联极似杜诗,大意是王维的诗歌境界并非只在画中才有,现实世界中就有这样一种宁静的画面存在。苏晋虽已沉浸在佛禅中,但却具有了虚灵的心境。如果用A代表“王维不是画”,用B代表“苏晋已长斋”,那么颈联对应的则是A,尾联对应的则为B。这种结构在杜诗是很常见的,叫走马对法,杜甫《房兵曹胡马》就是这一用法的典型代表。颈联还用了《庄子·人间世》里“虚室生白”的典故,表现的是诗人到达了至虚至静的境界。就像《庄子注疏》所载:“观察万有,悉皆空寂,故能虚其心室,乃返照真源,而智慧明白,随用而生白道也。”^①颌联不仅是描述了大地宁静,秋天黄叶飘落的现象,还表达出时光和心境之幽。整首诗充溢着恬静安详、虚静的色彩。

第三,喜欢翻用杜甫的诗句。在《到郡城忆江钓》一诗中,首联“谁使入州府,被人嫌我真。”就是化用了杜甫《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中“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之句。《赠云岫上人》中的“屋老带松烟”则是翻用了杜诗“春阴带草堂”句,此一境界与“玉绳低建章”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归侍》一诗中,则是全面地学习杜诗。首联的“谁与语悲辛”就是借鉴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到处潜悲辛”,颈联“天寒负米客,日暮倚门人”则是由杜甫《佳人》中“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演变而来。只不过邱葵在翻用杜诗时加入了二十四孝中子路负米之典,表达诗人负笈外地、无法归养的慨叹和愧疚之情。《赠浮曦柳秀才》中“残杯冷炙成何味”,是将杜诗“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杂糅起来,但是句子的情感却是同样深挚的。类似引用杜诗的还有《秋夜》其中“失群孤雁千山影,无数寒虫四壁音”一联,此联借鉴的是杜甫的《孤雁》一诗(关于丘葵学杜的接受和传播,请参看笔者《邱葵〈七歌效杜陵体〉析论》)。

丘葵不仅学习杜甫的艺术手法,还学习晚唐诗歌。晚唐诗风的兴起从南宋初年的左纬开始,到南宋中兴时期的陆游、范成大、姜夔、张镃等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学习晚唐诗歌,是想借晚唐诗风来矫正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当然,孝宗皇帝个人喜爱晚唐诗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的杨万里和叶适都偏爱晚唐诗的“异味”,在这样的背景下,晚唐诗风继宋初以后再一次复炽。其后的“四灵派”可以算是晚唐诗风的典型代表。永嘉四灵专学姚合、贾岛。再之后的江湖诗人或宗晚唐,或宗江西诗派,或兼取二者,或二者不取,呈现出杂糅的诗风。钱钟书认为“南宋江湖诗派,盖出入于晚唐、江西二派之间,然不无偏至”^②,丘葵继承了晚唐诗歌的“清”,清人陆心源曾评价丘葵的诗“其诗清丽芊绵,不染元人靡靡之习。”^③今以《独步芝山》为例。原诗如下:

平生独往愿,颇得山林趣。轻阴春漠漠,澹日随行履。独嫌影趁人,特入深深处。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诗歌体现出清雅闲淡的特点。诗人通过疏淡的笔调抒写出山林田园的乐趣,无一丝绮丽荼靡的色调。诗歌境界清空,有疏淡有味的韵致,尤其是尾联,颇有深婉不迫的气韵。江

^① 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2页。

^② 钱钟书:《容安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54页。

^③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20页。

湖诗人也有不少描写恬逸情致的诗歌,诗情总体上也可以说是“清淡”,但由于他们自身处境和心境的原因,诗歌中常常带有一种寒酸之气、清苦之味,这与丘葵诗歌中的“清淡”是完全不同的。丘葵诗歌中的“清”还包括清新,在《溪桥看月》一诗中可以得到佐证,现录诗于其下:

当空一明镜,团团水中见。常恨溪头风,吹来皱水面。水面皱尤可,月碎成万片。

把月亮比作明镜古已有之,但诗人把背景设在溪边。月亮投射的光影映照在水面,经过微风的吹拂,瞬间碎成万片,可知诗人作诗心态之闲适。这首诗语言活泼,清新可爱,跟一般的宋诗不一样,有唐人风神之韵。

关于陆氏所说丘葵诗歌中含有“丽”的一面,本文认为此评价有待商榷。统计清代道光汲古书室版丘葵《钓矶诗集》发现,丘葵作五律115首,七律108首,五言古诗和七言绝句各21首,七言古诗14首和五言绝句各14首,警学遗言51首。也就是说丘葵最擅长的诗歌体是五律和七律。丘葵晚唐体诗风的诗歌多是中晚年时所作,题材大部分为诗友之间的交游唱和,或是山水田园景物的描写,或羁旅行役,同时还包括一些忧国、伤时、悯农的政治题材,而羁旅行役和悯农的题材相对较少。如果说对山水田园的诗歌可以用“丽”来概括的话,那忧国伤时的诗用“丽”来表达显然不妥。综合上述可知,丘葵学晚唐诗风仅仅用简单的一个“丽”字来概括是不准确的。本文认为丘葵这类诗歌呈现“清雅”的特点,此一论述原因详见下文的“宋调”部分。

丘葵作诗喜欢字斟句酌,学习晚唐贾岛、姚合等人的苦吟。其诗集中曾多次出现作诗需推敲的论述,如“僧中无贾岛,得句自推敲”(《秘藏院》),为了觅句,甚至旁人路过都不知。如“觅句心将呕,旁人过不知”(《倚仗》)。“一吟三叹息,双字几推敲”(《读石隐淡吟稿》),“坐久灯花落,吟成砚水枯”(《偶成》)。因此丘葵的诗歌很多都是“意新语工”。请看《出院门闲步》一诗:“出爱前村景,归穿薄暮烟。鸟飞虚碧里,人在落红边。近晚山容淡,新晴稻色鲜。殷勤一溪水,清到院门前。”这首诗歌有陶诗之淡雅,用清雅之词抒写真挚的情感。诗中用虚碧代指天空,用词新颖。诗人用“穿”“飞”两个动词描摹出动静结合的山村景色,表现出诗人的闲适之情。丘葵的诗歌虽然字斟句酌,有苦吟的倾向,但是他把真情实感融入其中,无丝毫书卷气,诗歌富有“精意”和“兴味”,读之耐人咀嚼。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很多,如“吟成无与语,独立数归鸦”(《步院前溪》),“雨过山仍绿,春归花尽红”(《送陈判之邑庠》),“欲行还小立,旅思重依依”(《早过后浦庄》)。

综上所述,丘葵诗歌“唐音”的一面主要是学杜诗和晚唐诗。丘葵不仅学习杜诗爱国爱民的思想,而且还学习杜诗的诗艺。这一方面的诗歌主要体现在中年时期,也就是丘葵遭遇南宋灭亡的时期。学习最多的还是晚唐体诗风,丘葵晚唐体诗歌具有清雅的特点,这与丘葵本人高洁隐逸志趣有关,诗歌常常清新淡雅,具有真情实感,境界清新脱俗,语言含有蕴藉之致。同时,丘诗也沾染了晚唐“苦吟”的一面,因此意新语工,读来工整蕴藉。

二、丘葵歌创作的宋调

丘葵诗歌中的宋调主要是继承了宋人“以俗为雅”的诗学倾向,同时还喜欢用散文语、诗歌多议论,诗风有宋人“平淡”之美,这种诗歌的“平淡”美和唐人的“平淡”是不一样的,丘葵的“平淡”是经过岁月漂泊之后的平淡,可以说是返璞归真的平淡。与梅尧臣的“平淡”又不尽相同。以下将作具体的论述。

丘葵诗集中有不少是描写隐逸生活、情调孤高的诗歌,并且屡以梅、兰、竹、菊、白鹭等物象入诗,如写梅花:“西风杀群卉,麋鹿觉凄怆。野菊亦憔悴,萧条不堪赏。主人庵中梅,的皪为谁放。当兹肃霜月,数枝春盎盎。真如得道人,形槁神独王。”(《同景仁芝山赏梅》)如写兰:“阶庭根暂托,

只与绿苔亲。自少枝条分，不争花卉春。经寒青瘦硬，出掩紫鲜新。风雨时吹洗，含薰待主人。”（《入忠轩书院咏兰》）写竹的如下：“此君无媚色，耿耿合予衷。外直形容瘦，中虚忿欲空。炎凉多变态，潇潇独清风。幸免斧斤患，苍然保令终。”（《对竹》）写菊花的如：“东篱曾手种，赖以制颓年。白发经秋别，黄花入梦圆。一场蜂蝶后，老圃霜雪前。不是耽幽隐，渊明地自偏。”（《和瓠斋菊花》）写白鹭的有：“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闲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绿秧青草外，枯叶败荷滨。口体尤相累，终朝觅细鳞。”（《白鹭》）这些都是高雅有品质的物象，这与丘葵的个人经历有关。清雍正《福建通志》记载：“丘葵，字吉甫，同安人……德祐间，科举废，绝意进取。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经世书》《声音既济图》《周礼补亡》。景炎间，蒲寿庚以城降元，益自韬晦。元遣御史马伯庸来征，匿不就。复遣达鲁花赤賫币至其家，力辟。伯庸悉取其书以去。”^①丘葵之后曾作一首却聘诗，这首诗在当时很有名，现录于其下：“皇帝书徵老秀才，秀才懒下读书台。张良本为韩仇出，黄石特应汉祚来。太守枉劳阶下拜，使臣空向日边回。床头一卷春秋笔，斧钺胸中独自裁。”丘葵的坚贞不屈受到当时士人的称赞。

丘葵为什么喜欢咏梅兰竹菊等高雅的物象？丘葵的诗中为什么经常出现静坐、读书、谈诗等文人雅趣的现象？除了与丘葵归隐江湖的高洁志趣有关外，还与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倾向有关。宋诗与唐诗不同，宋人审美态度的世俗化为宋诗的“以俗为雅”提供了审美观念的基础。莫砺锋认为：“宋人的文化氛围（主要是禅宗思想的流行）使得士人能身处俗世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这就是宋诗‘以俗为雅’的文化背景”。^②宋人生活中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述道：“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③黄庭坚亦有类似的言论，如在《书嵇叔夜诗与侄履》论述道：“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以俗，俗便不可医。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④宋人的这种临大节的道德标准在苏门中得到了具体的表现。陈师道一生为衣食奔波，却因不肯穿从品格不高的赵挺之处借来的衣物而受冻致死。黄庭坚因修《神宗实录》事遭到勘问，却能不畏强暴，据理力争。这样的人理想使宋人在俗世中能够保持高洁的品质，尤其在当时文坛上有名的诗人实践下会更有影响力。

丘葵的诗歌具有“平淡”的特点，这种“平淡”诗风可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来阐述。内容方面，请看丘葵五言古诗《跋巨然晓山图》。原诗如下：

秋曙已生白，朝曦尚浅红。是诗天地气，正在贞元中。千峰虽历历，众树犹濛濛。群动又将作，平秩一日东。洒然人欲尽，天理将昭融。闲窗自展玩，妙处谁能穷。

这是一首题画诗，宋人有很多这样的诗歌，苏轼、黄庭坚都曾作过。本诗看不出是题画诗，初觉乃山水诗，其实不然。诗人用平淡细腻的笔调书写出画里的景色，给人一种以假乱真的感觉。语言平淡，色调鲜明，诗句明白晓畅。这首诗歌用平和淡泊的情感表现出山水的多姿。丘葵的“平淡”主要体现在山水诗中，这种平淡融入了无奈、孤寂之情。试看《初夏》一诗：

一信楝花风，一年春事空。池荷还揭揭，樱笋又怱怱。空叹时光换，谁知造物工。尽将枝上色，并作石榴红。

这首诗有不对偶的弊病，首联并不是很工整，但并不妨碍诗歌的情感表达。此诗通过春去花落的事物来表达一切毕竟成空的无奈之情。这种无奈时时有孤寂的倾向，如“乾坤空纳纳，何处著吾驱”（《日

① 孙尔准：《福建通志》，南京：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卷四十五。

② 莫砺锋：《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07页。

③ 苏轼：《苏轼诗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④ 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履》//《山谷题跋外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入)。所以只能在残山剩水中寻找心灵的慰藉,如“知心唯白鹭,相忆伴经纶”(《到郡城忆江钓》),“诸僧空院出,老子独山栖”(《六月寓章法寺》)。丘葵正是历经南宋灭亡的惨痛事实,元人的不学无术、践踏学问,所以才会常常“无复谆谆诱,空令咄咄书”(《哭吕朴卿先生其二》)。这都与元朝统治者的落后思想有关。

艺术方面,丘诗继承了北宋梅尧臣“平淡”的一面。钱钟书评价梅尧臣的诗,认为:“‘平’的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①。莫砺锋则认为梅尧臣早期诗歌的“平淡”是具有清丽淡雅的,晚年的“平淡”则融入了枯涩、劲峭、老健的风格因素。统观丘葵的诗作,其诗歌也具有清雅的“平淡”美,晚年也有一部分诗是愤慨激越之作,后来隐居海岛,生活于残山剩水之中,因此晚年融入了枯寂的冷色调。像《过野塘用杜老韵》中的“何日营茅屋,来兹避世纷”,《送谊上人归城》中的“故人如见问,为说志渔矶”等诗明显带有孤独无奈的意味。可以说丘葵的“平淡”具有清雅、枯寂无奈等特点。

《钓矶诗集》有51首警学遗言,这类诗歌很能体现丘葵道学的思想,具有说教的成分,集中发挥了宋人议论化的倾向。自宋初石介、孙复等人倡导道学起,至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五子,道学队伍逐渐壮大。朱子理学在理宗朝被确定官方地位后,道学更盛。理学家喜欢重道轻文,常常在诗中说教。南宋后期以前,道学家作诗大部分不精,流传下来的诗集只有邵雍的《击壤集》。到了南宋后期,在朱熹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理学家投身到诗歌的创作中去。诗人们出于虚荣,也常常喜欢引道学饰身,理学家邵雍的《击壤集》遂成为诗学的模范,同时出现了一个效法邵雍的“击壤派”,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之为“康节体”。理宗朝真德秀著的《文章正宗》和宋元之际金履祥著的《濂洛风雅》是道学诗的两本重要著作。《文章正宗》正集和续集较系统地表达了道学家的文学观,祝尚书认为“是以道学思想为指导的对文学史的梳理阐释”^②。

纵观丘葵的警学遗言诗,确实有较多的说理成分在,甚至是注入理学的理、气等观念。如“莫把三才别立根,此身亦自一中分。四时环绕天包地,万片卷舒山出云。道在灵台常泼泼,气归云海自泫泫。百年保合太和内,老学无成恐有闻”(《一中》)。诗中处处是理学术语“一中”“气归元海”“太和”和“保合”,如果不知道这些术语,很难弄懂诗歌意思。而且理学诗境界狭小,意境也比较平庸,语言不够工整,文辞也比较寡味。题材上,要么瞻仰理学先贤,要么讨论理趣,又或者拾起周敦颐称赞过的莲,真似钱钟书在《谈艺录》说的那样“意境既庸,词句尤不讲究……宽腐不见工巧”^③。丘诗中也不全是“宽腐”之作,也有平淡的诗存世。如“独行不愧影,独卧不愧衾。乐哉抱吾驱,守此一片心。此心寂不动,众欲无由侵。孔昭在潜伏,所贵惟一钦”(《题竹西独宿寮》)。这首诗,诗人通过平淡之语表明自己的修身养性。语言简练,文辞淡雅,不似警学遗言,这样的存世精品并不多见。

丘葵的诗歌具有时代的气息,从江湖诗派脱胎而来,又兼取四灵学习晚唐的艺术手法,不仅学习盛唐大家杜甫的诗艺,也学习本朝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的诗歌,可谓是兼取百家,融于一身。丘葵本身的学术涵养使其能很好地运用前人的艺术成果,促使其诗歌呈现出“唐音”和“宋调”。丘葵的诗歌整体上是具有唐诗风神雅韵、清淡闲雅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宋初梅诗的“平淡”、意新语工及宋诗议论过多的特点,这些无不说明南宋末年诗歌呈现出晚唐体和江西诗派融合的趋势。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② 祝尚书:《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

③ 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金门蔡献臣及其《清白堂稿》

卢忆北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明代中叶之后,同安浯洲(今福建金门县)平林蔡氏科第连绵。蔡献臣(1563-1641),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第二,次年登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与蔡复一(同安浯洲人)齐名,人称“同安二蔡”。著有《清白堂稿》《同安县志》等。献臣敢于直谏,处事严谨,秉公执法,为官清廉,几经浮沉。其诗“明净简远”,文“切理阐绎缔约”、“根极理趣,脱落浮华”。

关键词:明代文学;金门县;蔡献臣;《清白堂稿》

蔡献臣(1563-1641),字体国,号虚台,又号直心居士,“同安二蔡”之一^①,时人称之为“江南夫子”,同安县翔凤里平林(今福建省金门县琼林里)人。献臣为父亲蔡贵易之独子,因此父母对其成长倾注了许多心血与精力。

平林蔡氏先祖五代由河南迁往闽省兴化府仙游县,为北宋名宦蔡襄一支。后部分族人从仙游县迁往同安西市,南宋初,又有部分族人迁往浯洲定居。献臣高祖雍,字文周,号素庵。曾祖绩,字宜勋,号安所,以孙贵易贵,赠贵州左参政。祖父蔡标,字宗德,为平林蔡氏第一位闽省举人^②,为广州通判,后任台州府知府,调职广西梧州府知府,未及上任,便卒于京师;以子贵易贵,赠贵州左参政。标有四子。长贵成,生员。次蔡贵守,生员。三子贵易,即献臣之父,字尔通,又字道生,号肖兼。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先后任江都县令、嘉兴府崇德县尹、浙江乡试同考官、南京户部陕西司主事、浙江司员外郎、礼部祠祭司郎中、宁波知府、贵州按察副使、贵州布政司参政、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司。蔡贵易为官清廉,知己苏浚评价他的品行时,颜其堂曰“清白”。标四子贵迈,早卒。

蔡献臣从小就由父贵易亲授课业,十岁时随父至崇德任所,亲身体会做官之辛劳。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第二,次年登进士,为南京刑部山东司主事,先后任南京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车驾清吏司郎中、南京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在朝廷期间,蔡献臣的奏疏坦直,敢于直抒意见,不畏权贵,甚至当神宗皇帝之面与郑贵妃论辩典章制度仍神情自若。神宗欣赏蔡献臣的正直,升他为湖广布政司右参政,后又升为常镇兵备大参。蔡献臣做事极为严谨,秉公执法,一旦发现法令典章有纰漏、世风有不正之处,立即采取措施。《驳人命首抵从徙议》《常镇小约题言》等,都是他振纲纪、厚风俗的左证。

万历三十八年(1610),蔡献臣被察降调,告归回乡,时年四十八岁。两年后,时任同安知县的李开春聘请献臣据旧志重修《同安县志》。蔡献臣多次推辞,于是李开春整理出东山书房,成为献臣

作者简介:卢忆北,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二蔡:蔡复一、蔡献臣。

② 蔡标,字宗德,又字懋修,号兼峰。

写志的处所。他们一同订义例，商讨古今事实，历时三个月完成。县志共有十卷，十七目。从同安的典章制度谈到风土人情，无不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首目《舆地志》的“海道潮汐”中，蔡献臣提及了沿海百姓熟知的谚语俗句，如“月上水长头，月落水分流”、“长半满，汐半竭”等。^①而在《物产志》的“货属”中，详细叙述浯洲、烈屿等的晒盐法。《风俗志》中也记载了“同安风俗之蠹”，其一为赌，献臣介绍了赌徒的身份及赌具、赌法；其二为侈，他描写了人民衣食住行方面的奢靡浪费。写作上，他撷取《春秋》之大义，巨细均采，超群出众，承先启后，该县志受到了乡中学士儒生的肯定，同时它也成为后世研究同安与金门地方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万历四十三年（1615），蔡献臣遭污蔑逐渐昭雪，他得以重返仕途，获补浙海右参议，期间作《赴任就道夙疾陡发恳乞天恩允放以安愚分疏》《申严保甲以清盗源行宁波府》《定卑官委署例以示体悉杜营钻事行府》等，这些公文记录了他针对海道治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久后升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吏部拟升献臣为光禄寺少卿，他在赴任途中抱恙归家。天启二年（1622），在邹元标等人推荐下^②，复官光禄寺少卿，时年六十岁。后一年，遭他人谗言参劾，蔡献臣多次上疏乞求归乡，皇帝批允。

回乡后，蔡献臣心存魏阙，关心时事。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频繁表露心迹，为自己被人诬陷一事进行申辩。后又屡次复官，屡遭逆罔阻挠，虽挂名长达十年之久，然而实在任上仅六个月。晚年，他并未在家颐养天年，而是致力于为地方百姓做事。同安大旱，他再度往豪山祈雨；写募疏倡议重修太武严海印寺；七十六岁高龄时，感到同安社会风气的变化，便致信县令，出谋划策，旨在改变现状。崇祯十四年九月（1641），蔡献臣逝世，享年七十九岁。献臣有四子：长谦光，以父荫起南京国子监生；次定光，贡生；三子学光，授恩贡；四子孚光，授恩贡。

蔡献臣主要生活在明万历年间，在朝廷为官的经历，使他活动范围遍布北京、浙江、贵州、福建等地。身为朝廷官员，他的奏疏往往直陈所奏之事，毫无避讳，时而尖锐地指出皇帝行为不妥处，时而在明知会得罪权臣的情况下还固执己见。《清白堂稿》收录的第一篇奏疏《恳乞励精图治以光圣德以释群疑事》，年仅二十七岁的蔡献臣显现出了非常人的胆识，不避出位之罪，谏言神宗应该“日御臣工，日揽机务”^③。又上《拟南京九卿恭候圣躬万福因轸时艰输忠悃疏》，希望神宗能“鸡鸣而起，辨色而视朝，退御讲幄，或临便殿，召儒臣与辨论经旨，召辅臣与裁决章疏。”^④如此具体而又锋芒毕露的“教育”神宗，蔡献臣因而被司寇王元美称为用世之才。

众所周知，矿税是万历年间民不聊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万历三十年（1602）蔡献臣上《拟九卿请信救谕疏》：“罢矿税、释干连、补台省、复言官。”^⑤《拟礼部论黄河水竭疏》一文，他借天地异象，再次写到“自矿税使出，而四方民力竭矣。”^⑥上为国家君主建言献策，下为黎民百姓谋求福祉，一直是蔡献臣为官之准绳。同年，献臣因敕封琉球一事公事公办，得罪了刑部给事中曹某。曹怀恨在心，迁为吏部尚书后，借机参劾蔡献臣，使其降调。明末朝中党派林立，想要在纷杂的政治形势中站稳脚跟，首先要有自己倾向的党派，即浙党或东林党等党派。这对于蔡献臣来说难如登天，更别说升迁了。他在《不党论》中明确申明自己的立场：“夫以邹南皋之正气仁体，顾泾阳之挺立深诣，岂树党者哉？”^⑦第二年，发生了楚宗人朱华越与楚王朱华奎交讦一事中，献臣主张依旧例勘楚，“会集多

① 详见《清白堂稿》卷八之《同安县志》，抄本。

② 邹元标，字尔瞻，江西人，时任福建按察使。

③④ 《清白堂稿》卷一，抄本。本篇作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

⑤⑥ 《清白堂稿》卷一，抄本。本篇作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

⑦ 《清白堂稿》卷八，天启刻本。

官，遂一勘问，务求真确，定限本年九月内回奏，前来请旨处分。”几年过去后，其《勘楚纪事引》一文道：“至于今，则无人不言勘矣。”^①可见当时蔡献臣堪楚的提议是正确的。

远离阙廷，在地方任职时，他恪尽职守，凡事亲力亲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时任浙江海道右参议的蔡献臣，“尝驾一叶轻舟，视师于惊风骇浪之中。”^②虽身为文官，却在倭寇入侵时临危不惧，带领官兵穷追倭夷至外海，直到倭奴负伤逃遁。蔡献臣一向视海道治理、海上防御为沿海地区安宁之根本。如《论澎湖戍兵不可撤》《申严保甲以清盗源行宁波府》《外洋攻击倭船申文》《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铕城议》^③等奏疏，都对此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措施。

《清白堂稿》中的两卷奏疏充分反映了蔡献臣一生的政绩。不论仕途之路如何跌宕起伏，他都能泰然处之。政治的漩涡没有让他与逆珰沆瀣一气，小人的打压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从其祖父起传下来的良好的家学渊源，仍十分鲜明地体现在献臣身上。为官如此，做人作文亦如此。

前文已提到，献臣自十岁起，便跟随父亲四处为官，早年继承家学，制举义。他称父亲的知友苏紫溪先生为自己的“导师”，后又师从陈礼泉^④、唐荆川^⑤等人，早年就以文学魁于乡。蔡献臣认为，写文章“必以气为主，以理为骨，而气以健达冲和为最，理以明白晓见为最”；文章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行，“若气唱而理彻，则其人必光明正大人也，必终身有受用人也；若气滞而积，理艰而晦，虽或苦心千状，丽词万迭，则其人必奇僻肺肠人也。”而作科举文就应该像前辈大方之家一样，“精炼简要，愈淡愈浓，墨卷神情焕发，体格庄整”^⑥。其实，蔡献臣独到的作文见解用于今日，也未尝不可。在治《诗》方面，他强调“为《诗》者，意非必强探也，以吾意会之而已；言非必强解也，以吾言达之而已。至于因意得言、因言得意，使读之者涣然释、怡然顺，忽不觉其跃然以喜。‘葩经’家颇有意味乎？”^⑦

蔡献臣的诗歌创作，五言古诗《里妇词》，是收录于《清白堂稿》最早的诗篇，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时年蔡献臣二十五岁。有记载的最迟的一首诗歌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收录《清白堂稿》的诗歌有两卷（卷十二上、卷十二下），形式多样。从古诗到律诗、绝句、排律应有尽有，共计五百九十五首，其中七言律诗所占比例最大。题材主要以咏物寓志、岁时感怀、旅途抒况、哀挽亲友、钱行离别等题为最多。由于献臣恭敬孝顺，自父亲仙逝后，创作了许多诗文，字里行间透露着对父亲的怀念。万历四十四年（1616）秋，献臣邀友人共游四明的阿育王寺、观金塔舍利寺时，看见父贵易做太守所栽的两棵婆罗树、重刻的东坡碑，以及他亲手写的题记，不禁睹物伤怀，便做了一首七言律诗悼念父亲。天启二年（1622），耳顺之年的蔡献臣遭魏忠贤的排挤，闲住在家，是日为父贵易冥诞前夕，又恰逢元宵灯节前夕，上元明月被愁云惨雨所遮避，显得朦胧不清，黯淡无光，应验了时局的迷离不清。献臣自然感触良多，故作五言古诗《壬戌上元前夕》。诗歌情感真挚，直抒胸臆，这正是蔡诗的一大特点。此外，蔡献臣为宦的经历及寿至古稀之年，使他的交友范围广泛，结识的友人甚多，故赠别、悼亡诗的数量大。诗如其人，这是对蔡献臣所作诗歌最好的概括，故前人将他的诗风称之为“明净简远”。

而蔡献臣的文章创作在早年就令人刮目。《虚台蔡先生文集序》中，王志道称赞他的文章：蔡献臣抗厉守高，仰慕西汉刘邦称之为“社稷之臣”的汲黯，故“其文直心必达”；他在风格上崇尚东汉

① 《清白堂稿》卷七，抄本。本篇作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② 《赴任就道夙疾陡发恳乞天恩允放以安愚分疏》//《清白堂稿》卷二，抄本。本篇作于万历四十八（1620）年。

③ 此三篇皆收录《清白堂稿》卷二，抄本。

④ 父亲在南京时，曾聘请陈愈佳先生教授经书。陈愈佳字曰猷，号礼泉，改号溪南先生，浙江海宁人。

⑤ 唐荆川，即唐顺之，字应德，号荆川。

⑥ 详见《浙学道钦条演义行十一府》//《清白堂稿》卷三，抄本。

⑦ 《诗经任学稿》自叙//《清白堂稿》卷五，抄本。

李膺，故文章“简切趋峻”；他为人沉毅，仰慕北宋的范纯仁，故“其文情至恳恻”；他又以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为宗，故“其文微参性命而显证事物”。蔡献臣授业于杨太史贞复之门，对理学的探索极早，所以蔡献臣能将理学思想与文苑合二为一。

那么，在蔡献臣自己看来，对于好文章的评定标准又是什么呢？在《题目郭德周〈松风轩草〉》^①中他写道，“夫天下真经济，惟真文章者能之，故曰与政通也。今世举子家，言必推橐李，而葵阳、如冈二学士，尤以雅练奇杰称雄寓内。”在他为友人写的多篇序文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将符合“切理阐释绰约”、“根极理趣，脱落浮华”标准的，称为好文章。这与王志道的描述不谋而合。《清白堂稿》刊刻本中卷八的几篇论是蔡献臣古文功底扎实深厚的代表，简洁省净、条理清晰似韩文，且未磨灭自己的个性。

蔡献臣的著述颇丰。万历十八年（1590）献臣将不忍丢弃的《诗经制义》付梓，这是他写作的开始。此书是他从总角随父游南都以来，研习《诗经》的制义文。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金陵坊间刊行了他为诸生时所作《解颐草》，即为《诗经制义》。尽管书已亡佚，所幸《清白堂稿》还存有《诗经制义》的自叙，我们仍能看到他对《诗经》的深刻理解。另外一本集子为《诗经仕学稿》，刊印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其中收录的诗包括：《诗经制义》中的四首、贬官在家闲居时所写的《诗义》二十首、乡试、会试的试卷以及《诗经制义》中的八首。蔡献臣出书的目的，不单是因为“敝帚千金”，更期望自己如同西汉的匡衡，解《诗》能让读者开怀解颐，而不是“钩吻攒眉状”。

自万历三十八年（1610）蔡献臣被察降调归乡。居官二十年，回家后又读书于东山草堂，考览宋儒诸书。文集方面，有任官南京时所撰的《金陵稿》；担任礼部主客司郎中、礼部仪制司郎中等期间所写的《燕台稿》；为常镇兵备大参所作的《吴中稿》，以及《东山稿》，共计有文章111篇。蔡献臣将这些作品收集整理成《仕学全稿》，并于万历四十年（1612）刊行。而今全书亦不复可见，只存有该书的自序。他的这篇序，提出制义文应该犹如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认题真，神力到”，才能在作举业之文时，得心应手。万历四十五年（1617），时任浙江提学副使的献臣又刊印了《钦条演义》一书，分给提调师生。内容涵盖了诸生做人、读书、制义等方面的内容，全文收录至《清白堂稿》卷三（抄本）。另外，蔡献臣的文集还有《四书肤证》十卷、《仰紫堂问业选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仪曹二难存稿》[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卷、《致良知四书摘》[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大部分的书稿都已亡佚，只有序因为收录于《清白堂稿》而被保留下来，因此《清白堂稿》的文学价值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清白堂稿》卷五，抄本。本篇作于明崇祯九年（1636）。

浅论明代建安版画

黄世团^{1,2}

(1.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台湾艺术大学, 台湾 台北)

摘要:中国古代版画主要是以文本中的插图形式出现, 版画依书的版式而有不同, 可谓与文本具有密切的关联。建安版画是中国古代文本插图的代表, 也因为如此, 直接影响到明代这一时期版画的发展。在中国美术史上, 明代的绘画是呈现着衰颓的现象, 然而在版画方面, 却有着辉煌的成就。雕版印刷术促成了中国版画的发生与发展, 建安版画的踪影可在当时宗教、小说、戏曲等文本中窥见并且与之紧密结合, 又能“兼容并蓄”衍生出极为丰富的艺术形态,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 充分展现出中国古代版画独特的艺术质量。

关键词: 明代建本; 建安版画; 插图; 上图下文

建安(今福建建瓯地区)为宋元明刻书中心之一, 世称其刊印书籍为“建本”^①。从历史脉络来看, 建安版画原是为“建安本”、“建宁本”图书刊印中的版画。因在宋、元、明, “建本图书”的兴盛, 当时的书商为仿效文人以古为雅号的情趣, 会在书坊称号前冠以“建安”。清人叶德辉于《书林清话》中写到:“左图右书, 左图右史之制。文不足, 以图补之, 图不足, 以文叙之。宋刻书之盛, 首推闽中, 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刻书印刷业的兴盛与普及化所致。陈铎在《建本与建安版画》一书中提到, “建阳”在古代隶属于“建安郡”, 在宋代已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 建阳麻沙、崇化成为“建安本”的主要刻书集中地, 进而形成历史上的“图书之府”。

因此, “建本图书”主要集中在建阳麻沙、崇化两地生产。宋时, 福建建安一带出版了大量配有插图的书籍。这些插图多为上图下文式, 不仅图文并茂, 而且形象生动, 深受大众喜爱, 随着建本图书营销各地, 建安已然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图书刻印中心之一。^③古籍版本学家顾延龙(1904-1998)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写到:“建阳书林之业自宋迄明六百年间独居其胜”。可见, 建安版画在图书的普及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 笔者试图以“前言”、“宗教版画”、“小说版画”、“戏曲版画”、“结语”等五部分来论述明代建安版画的概况。

一、宗教版画

中国现存有年代的最早版画, 是唐咸通九年《金刚经》(参见图1)。可以说佛教吹开了版画艺

作者简介: 黄世团,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台湾艺术大学助理教授。

① 《华夏经纬》, <<http://big5.huaxia.com/zt/whbl/05-008/589601.html>>, 上网日期: 2016年8月19日。

②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年12月, 第53页。

③ 陈京荣:《明代戏曲版画研究》, 温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 2015年, 第11页。

术之花。^①从扉页的佛教绘画中能窥见刀法极为纯熟峻健，线条亦犹劲有力，从刻线中可以看出毛笔的运用，既是肥瘦得中，又是浑厚流利，释迦及其弟子和天神等的形象，更具有中原画风的特色。^②《中华印刷通史》对此描述：“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犹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③这些词汇形容的是超越纯然物性的趣味，此画虽然本身具有宗教功能，然而在经过时间沉淀，已从功能性转变为鉴赏性。



图1：《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唐咸通）

可见《金刚经》为佛教艺术提供了相当厚实的基础。明代万历年间建阳书坊《南海观世音普出身修行传》“西岳行香”（参见图2），采用建安版画最常见的上图下文版式，绘镌均显稚拙，属早期建安派版画风格。这些作品，其故事或取自佛经，或与佛教经籍、传说有关，仍属佛教版画范畴。其典故乃出自第一回“庄王往西岳求嗣”篇叙金天大吴氏十一年，有西域王灵人，姓婆名伽，表字罗玉。自十七岁起兵，二十岁登位，国名兴林，年号妙庄，掌管三十六载。东至佛齐国，西至天竺国，南至天真国，北至遏罗国，地方三千里。文有赵震，武有褚杰，君明臣良，刑清政理，万民乐业，四海无虞。当时大赦天下。于是，立宝德皇后伯牙氏为正宫，谁想王与皇后年俱四十并无子息，三宫六院俱亦乏嗣。庄王对皇后曰：寡人百战千征，千辛万苦才取得一个金瓯天下，指望子孙承守，传位无穷，今日妃嫔虽多，并无太子，朕心十分烦恼，不



图2：《南海观世音普出身修行传·西岳行香》（明万历）

① 陈铎：《建本与建安版画》，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②③ 于洪：《凝聚与争执：从版、画、人的角度论版画创作》，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4页。

知子童有何高见？伯牙皇后奏曰：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想是当年我王东征西讨，杀人太多，恐乖天和，所以致我夫妇四十已过，尚无一子传后。妾近闻得西岳华山圣帝十分灵感，凡有祈祷皆获果报。我王何不发一道旨意，差礼部掌礼官悉怛喃、支都二人前去那殿上，命僧道广建罗天大醮七日七夜，仟过生前罪愆，求嗣继后。^①

为了宗教目的插图多为上图下文式，不仅图文并茂，而且形象生动，带有木刻韵味、线条简明、朴拙有力，可见仍具有艺术原创性在其中。

三、小说版画

在建本图书中，小说最能表现建安版画的特色，形式多样，影响层面广。古小说体版画启蒙时期的代表作始于宋代，大致为北宋仁宗时期。明万历至明末是中国戏曲插图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仅数量巨大，且质量上乘。以徽派为主的金陵、武林等戏曲版画流派繁盛起来，它们绘刻的版画多是单面或双面的整版插图，建本版画受此影响，一改传统的版画样式，万历中后期绘刻了大量单面方式戏曲版画。但是，建本戏曲选集及小说版画依然保留其传统旧版。^②

就制作工艺、刻法讲究来说，福建的建安派历史最为久远，如《三国志传坪林》（参见图3）书内均为小图，但卷首都冠有单面大图一幅，这种单面大图与上图下文式的交错使用在当时还不多见，后来才为更多书坊采用。^③由此可见建安版画有吸收外地徽派风格的长处。虽然小图依然保持“古朴稚拙”，但大图已可见绘刻刀法秀丽与粗犷两者兼备，其人物线条纤细，木石支干皴法则绘刻浑厚，形成独特的版画风格。

明万历《新镌京本全像西游记》（参见图4）亦可见其风格保留建安式但在描绘上已有些微变化。这是建安版画“上图下文”内容最完整、版画数量最多的一部。此本扇页版画题图十分精彩，流畅的用线和圆脸笑貌已融进了徽派版画精致风格，与以往的“朴拙”相去甚远。可见仍然想保有建安风格之下引进其他风格，才能不断延续。郑振铎曾言：“古小说版画的大繁荣局面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第一页”。^④



图3：《三国志传坪林》（明万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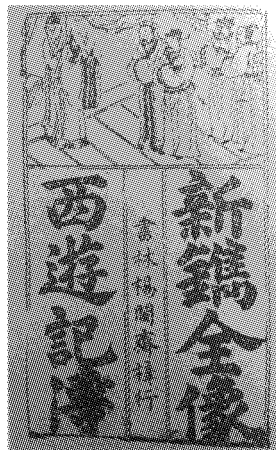


图4：《新镌京本全像西游记》（明万历）

① 钧德书院《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随意窝》（2009年4月），〈<http://blog.xuite.net/ag100100/twblog/95227727>〉，上网日期：2016年8月17日。

② 陈京荣：《明代戏曲版画研究》，温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11-12页。

③④ 陈铎：《建本与建安版画》，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第99、85、106页。

四、戏曲版画

在版画中若要将文学底蕴透过文字与图像共同呈现的话，笔者认为明代弘治本的《新刊奇妙全像注释西厢记》（参见图5）值得探讨，如何藉图像衬托意境，此刊本保留许多园林与人物的绘刻。蒋星煜在其《弘治本的〈西厢记〉的体例与“岳刻”问题》一文开头便言明“弘治本的《西厢记》是现存最古的《西厢记》版本。研究此书体例，对厘清明代《西厢记》的演变，以及元人杂剧何时分析等等，可以提供具体而又足以信赖的依据”。^①

自20世纪20~30年代由鲁迅大力提倡版画艺术开始，才渐渐有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版画。现存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完整的《西厢记》插图本，由王实甫印，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为孤本，正文部分及部分附件全部上图下文。图版阔大，占据整个版面的四成。刻工精美，版式大方。全书有幅图，把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淋漓尽致地绘于画面上。^②从其古朴粗犷的风格看，与闽派建安风格相类似，而与徽派版画细腻、繁缛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卷首》九个附件所载诗词，都是对《西厢记》故事主要情节的描写、吟咏，生动传神。本书最后的牌记，设计独到，内容为刊刻此书的缘起、特点，是研究版本和明代刻书珍贵的参考资料。^③周芜更在《中国古代版画百图》中提到此刊本雄伟壮观，所绘人物服饰、建筑家具、山水景物，以及绘刻作风都与万历以后的版画不一样，是明代中期版画的代表作品。

从此可知，唱与图合目的是为了读者方便观赏，显然是为了迎合大众。建安版画图本采用上图下文的版式绘刻图书插图就是针对一般民众的，因为民众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看图才能明白文意，不论是小说还是宗教儒家经典。《新刊奇妙全像注释西厢记》书后写到：“本坊重写绘图，参订编次，大字魁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始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④明代，因为各地版画流派的兴盛，建本出版商为占得市场一席之地，大量采用单面或双面整版插图来吸引大众的眼睛。^⑤正所谓：“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书必有图，古人著书有左图右书、左图右史之，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籍优良传统”。^⑥

杨之炯《蓝桥玉杵记·凡例》指出：“逐出绘像、盛服端容”是为了让扮演者“照扮官服”。郑振铎曾言：“盖戏曲脚本之插图，原具有应用之意”。“应用之意”包括舞台演出的指导，为演出提供服装造型、道具等借镜，是戏曲演出的样板。



图5：《新刊奇妙全像注释西厢记》（明）

① 彭喻歆：《北京坊刻版画之奇葩——明弘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版画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中国美术史组硕士论文，2008年，第1页。

② 赵前著，任继愈编：《明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第53页。

③ 《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udn网络城邦》2014年6月，〈<http://blog.udn.com/tuvw987/13791782>〉，上网日期：2016年3月20日。

④ 周芜编著：《中国古代版画百图》，台北：兰亭书店印行，1986年9月，第53页。

⑤ 陈京荣：《明代戏曲版画研究》，温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12页。

⑥ 陈铎：《建本与建安版画》，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4页。

五、结语

不管是宗教、小说、戏曲，版画插图的产生是为了以图释文，说明读者对小说内容的理解。插图的创作是一种再创作，这样的再创造不是对文字的复述或对作品的图解，而是经过了概括和构思，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版画插图的创作必须以文本为基础，传达相对准确信息的释义转换。比如《三国志传坪林》人物复杂，场景宏大，版画插图就需要整合繁杂的信息，用生动有序的方式表现，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内容。故笔者认为除了传达故事的圆满结局之外，亦不可忽视版画插图。另一方面，通过对插图的欣赏，帮助读者更形象地理解内容所描绘的事件、人物的性格特征，把内容中的文字形象变成具体的视觉形象，以补充文字不足。

探讨文与图之间的关连是述论明代建安版画的研究重点之一。文章是综合视、听两项的特点，它的积字成句，积句成篇，是视觉的范围。它的语调、节奏、协韵，是听觉的范围。文学又可做为艺术的总代表，然“文”的发展却是藉版画复数性的功能才相得益彰。因为文字是语言的记录，而图像是版画的基本元素，版画艺术也是以传达感情与表现意象为目的。两者的关系虽不能说很理性客观的密合，但在表现意象上是殊途同归的。

再者，艺术的表现形式不限于绘画的形式，文学也是艺术的表现，它让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用文字变成能欣赏，能够心灵交流。版画插图是“肉”，文章是“骨”，肉不离“骨”的附着就是小说的实质。版画插图可以是客体也可以是主体，插图创作既依据文章又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视觉形象的再创造，图像的艺术之长可弥补文字艺术无法表达的情境，用图像艺术再现文意情境，使观者相信虚构的真实。然插图离文太近则显得呆滞，离文太远又如“骨”、“肉”分离。版画作者只有深刻理解文章，紧紧把握文章的精髓，才能创作出挣脱文字局限又能不偏离文章内容意境的插图。

(责任编辑：陈 颖)

施世纶及其《南堂诗钞》研究述评

陈劲龄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施世纶是清康熙年间著名清官, 其事迹在俗文学中广泛流传。但其诗人身份却鲜为人知, 广受学界关注的亦是与其有关的“施公案”和“施公戏”的研究。施世纶生平事迹详载于地方志及《清史稿》中, 其著述丰富, 但如今可见的较为完整的仅有《南堂诗钞》。整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有利于推进施世纶及其《南堂诗钞》的研究。通过研究专人专书, 亦有助于丰富福建地方文学的全貌, 有助于完善清诗史。

关键词: 施世纶; 《南堂诗钞》; 综述

施世纶(1659-1722), 字文贤, 号浔江, 又号静斋, 福建晋江人。其为官清廉, 恤民惠政, 曾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清官之名于清代就已在民间广泛传播, 有《施公案》小说传其事迹, 院曲盲词也皆有演唱其政绩者, 但其诗人的身份如今却鲜为人知。施世纶是平台将军施琅之子。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施世纶以荫生初授泰州知州, 后累官至漕运总督。关于施世纶, 目前学界多关注的是与之相关的“施公案”和“施公戏”的研究, 对其本人及其诗文创作关注的不多。在今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或清诗史中几乎不见, 只有零星的论文涉及。经笔者搜集整理, 对施世纶其人及其《南堂诗钞》的研究主要分为: 施世纶生平、著述的著录; 序跋及诗话; 今学人的研究。下文将分别介绍论述。

一、涉及施世纶生平、著述的文献

雍正刻本《南堂诗钞》前有同乡友人林之濬所撰《浔江施公传》, 对施世纶生平、性情都有详细记述, 称施世纶著有: 《南堂集》八卷; 《南堂诗钞》十二卷附词赋一卷。

《乾隆福建通志》卷四十五“人物志”三有“施世纶传”略记其主要事迹, 著录施世纶著有“《南堂集》八卷, 奏疏、词赋、诗钞若干卷”^①。《乾隆晋江县志》卷九“人物志一·列传”有“施世纶传”, 所记与《乾隆福建通志》无异, 是袭乾隆志之说。《乾隆泉州府志》卷四十五“国朝列传”有“施世纶传”, 该传详载施世纶生平, 据此可推算施世纶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 卒于康熙六十一年五月(1722), 享年64岁。“晋江县志”、“泉州府志”对施世纶著述的著录皆与《乾隆福建通志》同。《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百二十八“国朝列传”, 亦有“施世纶传”, 此志所载施世纶生平事迹最细, 并对施世纶之弟、之子均有介绍。《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列传”六十四有“施世纶传”, 内容与前志无异, 记载了施世纶廉政爱民, 受民拥戴的事迹。

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重修刻本《浔海施氏族谱》, 详细记载了浔海施姓家族的起源及谱系,

作者简介: 陈劲龄, 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元明清文学。

^① (清) 郝玉麟等修, (清) 谢道承、(清) 刘敬与纂: 《乾隆福建通志》, 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卷45, 第53页。

其中载有施世纶父母、兄弟、妻室、生儿等情况。

(清)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一“名臣·施襄公·事略·子世纶”载施世纶事迹,著录:“《南堂集》八卷,奏疏若干卷。”^①

(清)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卷二十三载施世纶事迹及清人诗话对施世纶诗的评价。

(清)袁枚《随园诗话》提及施世纶有诗句“爱山移舫对,隔水问花多”^②。

赵尔巽等著《清史稿一百四十八卷 志一百二十三 艺文四集部》著录:《南堂集》十二卷,施世纶撰。

章钰等编《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著录:施世纶撰《南堂集》十二卷。

孙殿起著《贩书偶记》基本上是一部清代以来至抗日战争前夕的著述总目,但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一概不录。本书卷十五“别集类”著录:“《南堂诗钞》十二卷附词赋一卷,晋江施世纶撰,雍正间精刊。世纶即《施公案》之施公也。”^③另外,纪事本末类有施琅著《靖海记》一卷,后有施世纶跋。

1938年,郑贞文撰《闽贤事略初稿》载施世纶的生平事迹,注明其生卒年:1659—1722,遗著有《南堂诗钞》。

1995年,王思治、李鸿彬主编《清代人物传稿》,据《清实录》《清史稿》所载,整理施世纶事迹,称施世纶著有《南堂集》行世。

2008年,孙文良、董守义主编的《清史稿辞典》著录:“《南堂集》:书名。清施世纶撰。十二卷。为作者诗集,又名《南堂诗钞》。因其室号为南堂,故以名集、有雍正间精刊本。”^④

2008年,陈笃彬、苏黎明著《泉州古代著述》,书后附有《泉州古代著作一览表》著录施世纶著有:“《南堂集》、《倚红词》、《奏疏》、《浔江诗草》、《浔江二集》、《浔江三集》、《南堂诗钞》、《词赋》。”^⑤

2012年,孙克强、杨传庆、裴喆编著《清人词话》,著录:“施世纶(1658—1722)字文贤,一字南堂,号浔江,又号静斋,福建晋江人,后入汉军镶黄旗籍。以父施琅之功,袭靖海侯。……为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的主人公。善诗能文,著有《浔阳诗草》、《南堂诗钞》、《南堂集》等,《倚红词》一卷。”^⑥是书称“施世纶袭靖海侯”一事有误,袭靖海侯者为施琅第八子施世范。

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5·康熙朝卷》选施世纶诗2首,并辑录了部分有关施世纶生平、著述情况的诗话。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3》载现存施世纶著《南堂诗钞》现存版本有:1、清施世纶撰《南堂诗钞》十卷,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今藏于复旦图书馆;2、清施世纶撰、清施廷翰辑《南堂诗钞》十二卷词赋一卷,清雍正四年(1726)施廷翰刻本,国图、四川、中科院均藏有此本。《台湾文献汇刊》及《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的《南堂诗钞》均据清雍正四年施廷翰刻本所印。另晋江施琅纪念馆展柜有“施世纶撰《南堂集》”,但“这部《南堂集》现分别藏于晋江和台湾的施氏后人手中,故展柜所示《南堂集》并非全部”。^⑦

① (清)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易孟醇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316页。

② (清)袁枚著:《随园诗话》,王英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③ 孙殿起录:《贩书偶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67页。

④ 孙文良、董守义主编:《清史稿辞典》(上),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50页。

⑤ 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古代著述》,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443页。

⑥ 孙克强、杨传庆、裴喆编:《清人词话》,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

⑦ 笔者走访了晋江施琅纪念馆,纪念馆展柜内确有“《南堂集》、《浔江诗草》、《倚红集》”等,但并非原刻本古籍,是仅有封面的纪念馆陈列品。

二、清人对施世纶及其诗的评价

(一) 见之序跋

施世纶之《南堂诗钞》，生前就得到了诸多好评。今存《南堂诗钞》，前附原序八篇，原跋五篇。从他人所作之序跋可见时人对施世纶诗的肯定。

《南堂诗钞》序附有黄虞稷、郑缵祖、孙在礼、邓汉仪、黄仙裳（两篇）、高素侯、阮旻锡（释超全）所作的一共八篇序，作为《南堂诗钞》原序。这八篇序多是应作者施世纶之请而作，都对施世纶其人及其《南堂诗钞》作出了点评。

黄虞稷序谈及因朋友介绍而结识施世纶，甲子年（1684），黄虞稷才得见施世纶之诗一二章，便心异之。后得见全稿，黄虞稷慨然而叹，认为施世纶之诗“渊然、穆然，冲融有大雅、比兴之遗，得温厚之旨”，称他是“真当世之诗人”。^①黄虞稷论诗：“夫诗，岂易言哉。不本于风雅，则其源不正；不出乎性情，则其境不真；不博通乎经传子史，则其学不大。”^②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黄虞稷认为诗不易作，学诗必须宗其源，熟谙《诗经》风雅。而且诗缘情，出乎性情之作才能有真情、有境界。他肯定学问对创作的重要性，精通经史子集既是个人的学识修养，也是提升诗的思想境界的前提。黄虞稷认为施世纶作诗满足了这三个要求，且施世纶“静如镜，灵动如烟”，是“本温柔敦厚之意以敷政”^③，可以媲美江文通、韦应物、赵信陵等先贤。

郑缵祖在序文之始，同样先阐明了自己的诗观。首先，他认为韩愈“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观点，给后世诗坛造成了“多学为幽忧感愤凄切无聊之辞”的不良影响。郑缵祖认为韩愈的观点在于强调有感而发的诗易作，而今人忽略了情感的真切，只是一味追求苦吟，是曲解了韩愈之言。施世纶“性沉静”、“好读书，能为古文词”^④，且最喜杜甫的诗。杜甫诗，常常寄托了忧国忧民之意。因此，郑缵祖认为施世纶是继承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气质，认为施世纶的诗“以激昂其气哀怨其音，何以其音铿然，其气迥然，神苍骨秀，调高逸绝”^⑤。

孙在礼评价施世纶：“敏而裕，廉而不别”、“言论斐妮”；其诗则“泓然以清，蔚然以秀，其风神格律，几几乎登作者之堂”。^⑥认为施世纶兼具良吏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泓然以清”意指深邃清澈，“蔚然以秀”意指茂盛秀丽。即施世纶的诗内涵深邃，但又不古奥奇崛，就如水深但清澈见底；文辞华美但又不失秀气，没有繁冗浮夸之感。这是对诗歌意境、辞藻两方面的高度评价。孙在礼描述施世纶“恂恂然，弱不胜衣，以廉静之才出入风雅之林”^⑦，一方面是说施世纶恭谨温顺有儒雅之风，一方面又指出施世纶身体之消瘦。虽然仅有一句话，但似乎已勾勒出施世纶的形象气质。孙在礼对施世纶的交游也略有提及：“于听政之暇，与孝威、仙裳诸子，览其山川风物以托诸咏歌。”^⑧孝威、仙裳即邓孝威、黄仙裳，二人均为江苏文人，且同为明遗民，也分别为《南堂诗钞》作序。此外，孙在礼还写到施世纶曾经遣使到民间采诗，以观民风，体现了施世纶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诗歌创作的题材，与黄虞稷所序相互映证。

邓汉仪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高度评价了施世纶的人格。施世纶待人谦和，不以贵凌人。作为良吏，他“时时循井里，察问父老民间诸疾苦，廉以律身，而正以率物，刚以制暴，而慈以恤孱”^⑨。其次，略述施世纶诗的内容和风格：“凡登临、羁旅、宴饮酬赠以及悯俗忧时，具有韦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2辑·第12册·南堂诗钞（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6、7、10、11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2辑·第12册·南堂诗钞（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2、13-14、15、16-17、18、22-23、25、27-29页。

苏州、元春陵之遗意。其质处皆华，淡处皆古，高处皆秀，恺切而深中人心。公自有天然入妙，而非粉绘糜曼。”^②邓汉仪高度评价了施世纶诗，并将施世纶诗大体分成了登临、羁旅、宴饮酬赠、悯俗忧时四类，几乎涵盖了《南堂诗钞》收录的诗歌的内容。

黄云前后为《南堂诗钞》作了两篇序。在第一篇序中，黄仙裳首先阐明了自己的诗观。他认为“情因志生，诗由情作”，而施世纶立志“凡人品、文章、政事皆必欲占第一流”^③，他爱好写诗，且诗必有为而作。这就说明了施世纶赋诗是有感而作，出于真情，而非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与黄虞稷观点一致。据黄云的描述，施世纶虽居官位，但他生活简朴，极富雅致。他勤奋好学，熟读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文，因而“为诗雅健苍秀”^④。第二篇序是写于诗钞刻成之后。在这一次的序中，黄云称施世纶三集诗刻成，现今可见的《南堂诗钞》共有诗十二卷，分为前后两集，因此，与黄云所说的三集不符，恐现今所见的《南堂诗钞》并非黄云作序时所见的诗集之貌。黄云在这一篇序中，再次称赞了施世纶的深沉好学，厚积薄发。施世纶以古代圣贤为师，为官议事借鉴古制；作诗承袭诗经之风，温柔敦厚。黄云父子与施世纶交往密切，黄云的这两篇序除了对施世纶的诗做了评价，还谈及其诗集的刻印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高裔序也称赞施世纶“工诗有吏才”，“为人清正，无所挠屈而恤民疾苦甚般”^⑤。并言闽地山水甲东南，自宋至明，人文争胜，清朝初年海寇扰境导致闽地人文稍衰。施世纶为靖海侯施琅之子，高裔在序中称赞了施琅收复澎湖之功，认为施世纶诗“清韵和厚，鼓吹风雅”^⑥，将重振闽之文风。高裔认为施世纶诗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君生于闽，又熟习将军英略，周旋旌旗壁垒，溟渤万里，蜃市川岳楼台，极天下之奇观”^⑦。这一句话包含了几层含义，首先施世纶生于文化底蕴深厚的闽地，浓厚的人文气息浸润了他。其次，施世纶生于侯门之家，施琅一生戎马，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其子自然耳濡目染。第三，施世纶随父周转多地，所见广博，丰富的游历是他创作的源泉。

阮旻锡认为，文学成就高的诗人，在政治上的成就多为文学所掩盖，比如韦庄、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施世纶治学勤奋、手不释卷——“穷经核氏，性喜吟咏，不事交游”^⑧，为政素有美名——“以廉能称，不避权要，一以慈爱为本，其治郡最久，除奸去蠹，严若神明而清操凛然”^⑨。阮旻锡惋惜施世纶虽为名臣之列，其诗“高峻如泰华之峙，浩荡如江海之流，巍峨有大人气象，堂皇具清庙遗音，而丰姿秀擢，才情横放，则风水相遭，云烟变幻而不可穷极，大抵得杜韩苏陆为多”^⑩，却不得世人所见。阮旻锡对施世纶诗评价之高，几乎能与唐宋大家媲美。另外，阮旻锡在序言中提及施世纶刻有《浔江集》，且在金陵、湖南、京都亦有集，可见施世纶著述丰富，惜今多已佚。

除了以上八篇序外，还有五篇跋，分别为黄泰来、徐乾学、王復、王文谟、宗元鼎所作。

黄泰来即黄云之子，其跋称赞施世纶“廉吏而诗復臻”^⑪。施世纶以荫知泰州，黄泰来述及此事时，说施世纶起初“意甚不乐”^⑫，因泰州素有洪涝之灾。后来听闻泰州曾为富饶之地，且人文可观，还有黄云父子可与之酬唱，便欣然而往。在泰州期间，与宾客酬唱，吟兴不倦。黄泰来除了赞许施世纶为政公正不阿、体恤爱民，还认为其作诗缘于性情——“以实心行实政，以真情为真诗”，其诗成就之高，甚至令人以为李杜复生。黄云、黄泰来父子与施世纶交往最密：“余父子奉教于公最久……公之与余父子交为最奇”^⑬。

徐乾学跋徐认为施世纶诗“不坠忠厚和平之意”^⑭。

王復是生于乾隆的后学，按其自述，是在宗元鼎处，得以一览施世纶的诗集。到了乾隆年间，王復所闻依然是施世纶“清官”、“廉政”之美名，而其诗集流传不广。但王復认为施世纶之诗自成一派，可以观民风，也是对施世纶诗之“真”的肯定。

王文谟之跋仅有二十几字，谓施世纶诗集“清標特立，一境不染，湛然，脱洒尘虑”^①。

宗元鼎之跋应是写于施世纶知扬州期间，时扬州久旱，宗元鼎慨叹施世纶之贤，祷雨而甘霖立至。于其诗，并无评价。

施世纶之子——施廷翰于卷末另作了一篇《南堂诗钞·跋》，在该篇跋文中，他交代了其所刻《南堂诗钞》的版刻源流，并评价其父之诗“皆不假雕饰，独出心裁，不特山水清，佳旷怀高寄，时以为然也”^②。

（二）见于诗话、诗选

现存《南堂诗钞》雍正四年施廷翰刻本，有藏书者写于书前，交待得书经历的一段话：“丙寅秋仲，余客港口桃花乡，偕曹梅生表兄相聚。月余，从残篇断简中搜得此集，细阅之余，不逊陶谢诸诗。独写性情，空诸倚傍。询及原版已被匪贼所废矣。”^③从这段话可见藏书者对《南堂诗钞》的喜爱，认为施世纶之诗是直抒胸臆之作，而无所造作模仿，清新脱俗不逊色于陶谢。

清查为仁《莲坡诗话》之评价：“晋江施世纶南堂先生，历官漕督，清名著天下。《南堂诗钞》二十卷，如璞玉辉春，蟾珠浴月，琅然可诵。尤工五言……”^④

清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卷二十三载《听松庐诗话》评施世纶“吏才强干，而诗情乃婉丽如此”^⑤。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是一部清诗汇编集，选录了清代几乎全部著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品及其有关资料。此书选施世纶诗十首，并附诗话：“文贤，襄壮子，起于世阀。当官廉直，所至革羨金，劾贪吏，除蠹役。摘姦发伏，以严明聪察为治。民国二百年来歌颂之，比于包孝肃、海忠介。诗雅健苍秀，邓孝威为作序，谓其‘质处皆华，淡处皆古，高处皆秀，剀切深中人心云’”^⑥

综观《南堂诗钞》及清人诗话序跋所言，施世纶为官廉洁纵然受人钦佩，但其诗成就颇高，同样值得人们欣赏品读。前人对其诗风评价不一，多集中在质朴和厚、雅健苍秀、婉丽、情真等几个方面。

三、今人的研究成果

施世纶在俗文学系统中形象鲜明，今人关于施世纶的研究，集中在与其相关的《施公案》小说和“施公戏”两方面。杨子坚《“施仕伦”与“施世纶”》，专门就《施公案》中的施仕伦与清官施世纶的人物关系作了研究，认为施仕伦即施世纶，并非影射人物与原型的关系。翟勇《“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的传播与异化考论》，对施世纶史记形象、传播形象进行了比较，说明了施世纶形象在传播过程中被异化的倾向，与包公形象的演变具有相似性。文章搜集了丰富的笔记材料和部分交游情况（与孔尚任），推进了对施世纶历史形象的还原。海众《孔尚任的一篇佚文》，就孔尚任与施世纶之间的交往做了研究。孔尚任在《湖海集·陈庵记》中暗示了对施世纶“前恭后倨”，但交恶之前，二人与陈忠靖同选了《晓堂幼诗》，并分别为此书作序，可见二人非泛泛之交。作者以文献作证，对施世纶与孔尚任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八卷有吕英凡整理撰写的施世纶

①③ 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2辑·第12册·南堂诗钞（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②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1册·南堂诗钞十二卷附南堂词赋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01页。

④ （清）郑方坤编辑：《全闽诗话》，陈节，刘大治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4页。

⑤ （清）张维屏编撰：《国朝诗人徵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6页。

⑥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第1-10册），闻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53页。

生平事迹小传，记叙了施世纶为官期间的重要事件。晋江衙口施琅纪念馆所印发的《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是供游客参观所用的人物介绍简册，后有厦门大学施伟青教授所作的施世纶生平介绍。该文以时间为轴，对施世纶生平的几个重要阶段进行详细的论述，并认为施世纶能为清官的缘由有三：良好的家教；儒家民本思想的熏陶；勇于把民本思想付诸实践。史书、笔记对施世纶记载丰富，但目前还未见关于施世纶生平的研究论文或年谱等相关成果。

施世纶除了清官的身份外，其诗人的身份较少被关注到。一是施世纶在政治方面的成就过于显著，二是康熙诗坛盟主王士禛“神韵说”的领袖地位以及遗民诗人群的广受关注。施世纶并不附属于某一流派，其诗文集流传欠广。因此，关于施世纶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不多。翟勇《顺、康年间泉州诗坛风貌初探》，是对清顺治、康熙两朝泉州诗坛的研究。作者将施世纶与丁炜同归为“清绮诗风”一类，辑录了诗话、《南堂诗钞》序跋中前人对施世纶诗的部分评价。王政尧《〈南堂诗钞〉与施琅收复台湾》一文，摘录出《南堂诗钞》中有关施琅收复台湾的诗篇，对这些诗歌的内容做了分析。除此外，该文还对《南堂诗钞》的成书、刻印、版本等方面做了简要的研究和说明。

施世纶为施琅仲子，施琅一生戎马，康熙帝钦祠匾额“熏德齐班马范曹”，今人学者对施琅的研究著述颇多，成果丰富，多涉及的是施琅收复澎、台之战，以及台海关系的历史问题等。施伟青《施琅评传》，对施琅一生从“投身海上”到征台成功的经历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评述。该书后附有森田明撰、施伟青译《明末清初的福建晋江施氏》一文，该文根据台湾的施氏族谱对施氏先祖进行较为详实的考辨。

四、施世纶及其《南堂诗钞》研究意义

小说、戏曲中的施世纶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施青天”美名堪比于宋之包拯、明之海瑞。但其历史原型还鲜少被学人关注，其诗人的身份往往被忽略，有关施世纶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充实。王渔洋继钱谦益之后主盟康熙诗坛，他的“神韵说”影响了一代诗风走向。施世纶政治地位颇高，就其诗歌交往、唱和对象来看，施世纶与江南遗民处士有着非常密切的往来，与康熙诗坛主流诗人虽有往来，但交往并不如前者深入。因此，通过研究施世纶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主张，理清施世纶与康熙诗坛的互动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窥探当时主流诗观对诗人创作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和完善清诗史的全貌。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历时长，自唐始，发展至清，已进入了总结提高期。施世纶一生均在外为吏，但其与闽地乡贤、文人仍有密切的往来。从施世纶所著《南堂诗钞》亦可见其多次往返闽地的所记见闻。因此，对施世纶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进行全面的梳理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清初福建文学的发展情况。施世纶《南堂诗钞》中收录了有关施琅收复台湾的诗作，以及康熙帝南巡等事，也是我们了解清初社会风貌的宝贵资料。施世纶贵为一代之清官，其刚正不阿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南堂诗钞》中不乏借松、梅等高洁傲岸形象抒情咏怀之诗，也有关怀百姓疾苦的时政诗。但占绝大部分的是其表现日常生活、感怀四时变化的作品，且作品中多流露出悲伤、孤寂的情绪。向外的坚毅与向内的寂寥无疑形成了一对矛盾体，通过研究《南堂诗钞》，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施世纶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家庭生活，内心做出的审美选择和心理补偿。

(责任编辑：陈颖)

丘复与南社诗人

徐东梅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丘复是清末文学进步团体中为数不多的南社成员之一, 一直以来很少有人关注。本文主要探讨丘复与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成员的关系; 以及南社解体后, 在闽地成立的南社闽集诗人的文学交往互动, 进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丘复其人及其诗歌中体现的南社文人气节。以此说明丘复具有思想的进步性与革命性的特点。

关键词: 丘复; 南社; 南社闽集; 交往互动; 南社气节

丘复(1874—1950), 原名馥, 谱名奈芳, 光复后改名复, 字果园, 又字瘦樵。以荷花诞辰日(6月24日)出生, 别号荷生, 又自号念庐居士, 人们敬称其为荷公先生。福建上杭县蓝溪乡曹田村(又名东溪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两次进京会试不第, 遂畅游山川大邑, 广交各地名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 与同宗丘逢甲交谊最契, 诗文唱和至多。辛亥革命前夕, 经丘逢甲引荐、叶楚仓介绍加入南社。1916年被选举为全国参议院候补议员, 1924年补正为参议员。^①1925年, 广东嘉应大学敦聘为文学教授。他一生尽瘁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教育兴学活动, 在上杭先后创办丘氏总祠、师范传习所、明强中学等, 且诗文著述颇丰, 其诗集、文集及志乘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贡献。

一、丘复与南社

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三人发起, 于1907年开始酝酿筹备, 正式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清宣统元年乙酉十一月一日)的苏州虎丘张国维祠, 并在那里开了第一次雅集。人数从第一次雅集的十七人逐渐扩展至辛亥革命后的千余人之多, 是清末民初不可忽视的文学进步团体。

南社之“南”与陈去病有直接的关系。1903年, 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 思想就发生了大转变, 将他的字改为“巢南”, 取自《古诗》“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之意。民国后他解释: “南者, 对北而言, 寓不向满清之意。”借用诗中胡、越来影射当时南北对峙, 反对北庭之标志。也有“操南音, 不忘本也”之意。^②“社”这一名词由来已久, 《说文解字注》中说: “地主也, 从示土”。《周礼》“二十五家为社”, 指的是祭神的地点。后来“社”由地而引申为社会组织。晋代的惠远莲社, 是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源头。而属于文学性质的结社, 当始于中唐, 作为“大历十才子”

作者简介: 徐东梅, 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诗文。

^① 李诤林:《南社交游台湾考》,《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

^② 《南社长沙雅集记事》,《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参看孙之梅著:《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之一的司空曙在诗中曾提及有“结社”“洛阳旧社”等词语。结社到了明末时期蔚为大观，社团种类驳杂，大多成为文士发起的社团，如：文社、诗社等。据考证，明代文人社团的数量远在三百家以上，发展到明代，结社演变成了多元的形式与目的，如：嘉靖到万历初年，结社主要是以文会友为主；崇祯年间，结社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到了宏光以后，结社加入了社会革命的成分。^①明末清初两个重要的社团是复社和几社，南社之“社”则主要来源于这两个文学社团之“社”。虽然明末社团与南社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意欲完成的共同目标都是反清排满。因此，巢南之“南”与复社、几社之“社”遂合成为南社之名。

南社有着明确的宗旨。柳亚子宣称：“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因为民族主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产物，赵宋、朱明的末代，更有鲜艳的血史，在文学界上占着重要位置。所以我们的提倡，就侧重在民族主义那一边。”^②因此，南社奉行的宗旨是“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以提倡民族气节为口号，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而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唐音”，主要是为了反对在晚清文坛占统治地位的北方遗民文学，以崇尚宋诗为主的“同光体”。南社共经历四个阶段：反清阶段、反袁阶段、解体阶段、另建阶段。

南社的核心机关刊物为《南社丛刻》。自1910年2月开始出版，不定期出刊。丛刻分为文录、诗录和词录三大部分，至1923年12月停刊。民国陆续出到22期，后来还有23、24期为未刊稿。《南社丛刻》成为辛亥革命至民国初年进步文艺报刊的旗帜。

1909年（己酉）丘复受两广方言学堂监督丘逢甲之聘，到堂任教。是年，南社成员叶楚伦^③南下汕头，任《中华新报》主笔并与丘逢甲相识。1911年3月，在丘逢甲的再次邀请下，丘复担任两广方言学校国文教员。这一时期，丘复在丘逢甲的引荐下，结识当时身在潮州的南社社员叶楚伦，并由其介绍于6月12日正式加入南社，在南社入社书的序号为160。在南社中，以柳亚子、陈去病、叶楚伦、蔡寒琼等社员都有密切的文学互动，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刊刻在《南社丛刻》中。

二、丘复与南社人的文学互动

（一）与旧南社成员的交往

本文以1909年11月13日成立至1923年解体的南社定义为旧南社，将1923年5月柳亚子等人重新组织的南社定义为新南社。南社没有明文规定社团活动的具体时间，通常约定俗成以每年春秋两季召开雅集作为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旧南社共举办了18次正式的雅集和4次临时性雅集。此外，南社组织活动的地点也不固定，几次雅集的地点除了第一次在苏州虎丘、第二次在杭州之外，其余的均在上海愚园举行。丘复自1911年入社后，大部分时间活跃于闽粤之间。虽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参加过一次的南社雅集，但却一直与南社成员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诗文、书信往来。在南社中，与丘复有过交往的社员众多，过从甚密者也不乏其人，本文主要从丘复与南社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以及有着频繁书信往来的蔡寒琼、叶楚伦等的交往互动为例作单独分析。

1. 丘复与柳亚子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16岁时，因信仰天赋人权学说，故以“亚洲的卢梭”自称，遂改名人权，字亚卢，后简称亚子。出生于江苏吴江北库镇一个世代书香、广有田产的

^① 赵霞：《陈去病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60页。

^② 柳亚子著，柳无忌编：《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101页。

^③ 叶楚伦（1883—1936），江苏吴县人，同盟会员，曾任汕头《中华新报》主笔、《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等职。南下汕头，任《中华新报》主笔时与丘逢甲结识。

地主家庭。最初受父亲的影响，赞成维新图强、醉心变法的康梁维新改良思想。后来因为1903年章太炎、邹容的革命宣传和拒俄义勇队、《苏报》案等一系列事件影响，由改良转为反清排满的民主革命思想。1909年，与陈去病、高旭发起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是南社的灵魂人物。对于柳亚子的为人性格，陈去病这样评价：“柳貌恂恂如十八九好儿女，而甚口吃，性复下急，语辄缪纠不可吐，人多意解之。顾极诚恳，凡欲有所为，必尽其愿乃止。否则狂号痛哭，谓且凌侮已。”^①从中看出柳亚子由于身患口吃，所以不善言谈，而性格又急躁，充满文人气质、名士脾气之中又带有执着和坚持的可贵。

作为南社创始人之一，丘复与柳亚子有着密切的往来。丘复自入社以来，由于道路遥远、交通不便之故不能参加南社雅集。在辛亥十月中旬（1911），其跟随丘逢甲任广东组织临时政府代表赴南京参加临时政府会议，寓居上海，居处一月半。民国元年（1912）丘复再次去上海，恰逢南社于上海愚园举行临时会议，讨论为社友周实丹复仇之事。此次临时会议，是丘复加入南社三年以来，第一次参与的南社会议。3月13日，南社举行第六次雅集，席间，社友们提议为周实丹、阮式编辑遗集。柳亚子在《感言》中说道：“今日为南社雅集之期，狂客骚人，联镳并至……南社社友，夭折者一人，岳女士麟书是也。殉义者一人，周烈士实丹是也……孰杀我南社社友周实丹者，亡清伪山阳县令姚荣泽也。仇首未枭，死者不瞑目，生者将何以为情乎！”^②丘复也积极响应柳亚子等人的号召，并撰写《〈周实丹先生遗集〉序》表达其哀愤之情。同年十月，南社于上海愚园举行第七次雅集，到会者有柳亚子夫妇、胡朴安等35人，席间柳亚子建议修改条例，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收到高旭等人的反对及嘲讽，第二天柳亚子便发表通告，宣布脱离南社。丘复因在福州参加福建省临时会议，未能参加此次雅集，便作《壬子十月南社诸子雅集沪上予阻冶城不得与会有作》，其中“高会应知多雅论，海天翘首梦魂遥”，向往与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1914年9月10日（甲寅），丘复撰《与柳亚子书》，先是对柳亚子寄赠《流霞书屋》《阮烈士遗集》及南社友人寄达《南社丛刻》第九集、《蛻翁诗词刊存》表达感激之情，继而阐发其阅览这些书卷后的感慨之意，最后表明来信的原因是为了乞求柳亚子与陈巢南老友各为《天潮阁集》作序一通。^③次年，又撰《致柳亚子书》，同样先是感谢柳亚子赠送《养余斋诗》四册、《分湖小识》二册、《徐江庵诗》一册，接着诉说时局的变幻，作为一介小民只能缄口结舌的无奈之举，最后道明此次来信的目的是乞求柳亚子为其新建的念庐居所、愿丰楼作《念庐记》及《愿丰楼记》并附寄其近作数诗，烦请柳亚子先生吟正。在这两封信中，丘复均尊称柳亚子为社长先生、社长阁下。

其中的《徐江庵诗》，最初是由南社成员蔡寒琼于京师得到郭频伽手写江庵诗卷，并驰书告知柳亚子。柳亚子看到后，将其家藏别本江庵诗二十余首合谋付梓，并征同社友人题咏。丘复在收到柳亚子的《徐江庵诗》后，亦积极题咏了三绝句，其三写道：“乡邦文献喜如新，好事屯田有后人，画幅平分诗合刻，不妨散作万家春。”表达了丘复对于乡邦文献得以保存的欣喜。

民国之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柳亚子应邀任总统府秘书。但此时南北议和已经拉开帷幕，

^① 《高柳两君子传》，原刊《民立报》1913年7月。参看柴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2页。

^② 柳亚子著，柳无忌编：《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页；1911年11月17日（旧历辛亥九月二十七日）那天，满清的山阳县令姚荣泽，把在淮上起义的阮梦桃、南社成员周实丹两人乱刀杀死，声称他们是土匪，要把两家的家属抓起来，强迫他们认罪。

^③ 《天潮阁集》共七卷。此书刻于清康熙年间，出自刘坊友人周维庆之手。道光年间有进士莫树椿的重印本。民国五年又有丘复的再刊本，并请南社巨子柳亚子写有序言。1953年丘海山重印此书的愿望未能实现。阁名“天潮”，隐藏“大明”两字，正与李元仲“但月轩”取“明一人”之义合。先生祖、父二世殉忠，其不忘明室也固宜。据重印《天潮阁集》附录邑人雷一枝言：“此阁旧址在中下街马氏井巷。”丘复证实集中《秋夜纪游》确如雷一枝所言。

时局迅速逆转。三日后，柳亚子便称病辞职，此后政潮变幻，阴谋尽露，险象环生。先是暴民围攻议会，继而胁迫中央。柳亚子作七律《感事》前后八首登于《民国日报》，气势雄浑。其中后感事第三首之第二联“孔雀有文宁掩毒，神狐善变总伤人。”读之令人痛慨。柳亚子辞职后，去了上海，以《天铎报》为阵地，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率先打出了鲜明的反袁旗帜。与此同时，丘复亦作《感事十首》《续感事二首》，同时联想到当时自己家乡上杭的流血事件，对当今奸恶横行的社会“愁心易感声何恶，好事多磨梦不真。且起中宵提剑舞，不知谁是救时人”^①的感叹。此外，在南北议和时，柳亚子见时局无法逆转，便有了退隐之志。在其返乡归里途中，南社社友陆子美在同邑芦墟演出，柳亚子索陆子美画《分湖旧隐图》，并亲自撰《〈分湖旧隐图〉记》广征题咏。自1914年至1920年，共征集图画21幅，诗词序跋234篇、题端38幅，共计293件。^②而丘复也收到了柳亚子的索题信件，并作《题〈分湖旧隐图〉后》。其中写道：

吾友柳亚子，粤自胜溪，言迁梨里。非周彦祖之坏车散马，去家已十许年；等梁伯鸾之居庾赁舂，著书且数千卷。乃睇怀桑梓，点染丹青；远寄邮筒，索题敝帚。盖其胜溪老屋，旧在分湖之滨，托兴烟波，自称‘旧隐’。兹图乃其友陆子美解衣所作，取意而成者焉。

在这一题咏中，可以看出丘复是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之作，同时，他虽为柳亚子穷途客子而感叹，但是并不赞成他归隐分湖：

吾知亚子于此，不胜增今昔之悲，非徒作濠濮间想矣……嗟乎亚子！锦绣神州，炎黄古国。卧榻之侧，鼾睡由人；刀俎而前，鱼肉视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国步多艰，恐难隐去。^③

由此可以看出，丘复与柳亚子文学互动愈来愈密切，从丘复写给柳亚子的两封书信以及柳亚子寄的书刊称呼可以看出，最初的两人只是纯粹社长与社员的普通往来。在其后的交往中，丘复对柳亚子均用“吾友”“亚子”代替，没有了之前的生疏与客套，也能由此感知两人关系的更进一步。

此外，在丘复的诗文中还有《柳亚子不通音问十年。予季子默庵近自桂林来书言：亚公在桂，交近作及〈南明史〉编纂意见书及拟目寄呈，感赋》其二：“我和亚子却因陈，相见无多契合深。校印《天潮》劳日夜，一编珍重表遗民。”两人因陈巢南而相识相知。其三：“巢南已逝亚卢在，落魄西南署羿楼。唤醒复讐兴汉族，公羊大义炳千秋。”^④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感慨。柳亚子于1942年6月7日自香港抵达桂林，在桂林的两年时间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丘复仍对柳亚子能复兴汉族，彪炳大义寄予厚望。可见，柳亚子对于丘复而言，除了是朋友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南社社长，是丘复希冀能一展大义，恢复汉族的精神寄托对象。

2. 丘复与陈去病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又字巢南。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七（1874）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出身商人家庭，有“江湖任侠之风”。是南社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一生最突出的特点是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晚年则致力于教育事业。1933年10月4日病逝，葬于南社创始地虎丘。陈去病在南社的活动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丘复与陈去病相识于1910年（庚戌），是年春天，丘复北上会考，于会考之际，游南京孝陵，后抵浙江。陈去病时任教于浙江高等学堂，两人会晤于浙，相谈甚欢，言及孝陵瓦，丘复《愿丰楼杂记·孝陵瓦砚》称：“孝陵瓦色黄而质幼洁，据老友吴江陈巢南言，亦可为砚，不亚于铜雀。予庚戌游孝陵，未之知也，至浙晤巢南始言及之。”^⑤并于中秋相约同游杭州西湖，丘复在《〈西湖纪游〉

^① 丘复《感事十首》其九中写道：“百无聊赖此间身，拟作华胥大国民。雨后田蛙鸣阁阁，月明村犬吠狺狺。愁心易感声何恶，好事多磨梦不真。且起中宵提剑舞，不知谁是救时人。”

^② 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35页。

^{③④⑤} 丘其宛点校，汪梦川、刘永华审订：《丘复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36、507、1259页。

庚戌二月，十首仅记其四。是年中秋有〈重游〉十首，既全不记忆矣。春游偕雷君史修，秋偕陈君巢南》记载了此事，可惜诗文没有及时记录下来。还因为两人均生于1874年，这一特殊的渊源，更增进彼此情谊。

1918年（戊午）是两人交往唱酬活动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年，丘复于夏秋冬三季均在潮汕，而陈去病时任浙军秘书，夏间南来汕头，以书约游，两人得以有机会相见。丘复描述了当时久别重逢的情景：“故人喜相见，握手难为情。忽忽七载别，时局如棋枰。”^①自从上次在杭州初识到现在转眼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而时局越发的动荡不安，“战云塞四野，弥漫粤闽郊。”陈去病从“投身入戎幕，慷慨赋同袍。”到“转战入八闽，攻围四面包。”^②面对如此时局，能够再次重逢是何等的难能可贵，故此两人同住在汕头大风报社，常谈至夜分，直到“一声东方白，喔喔雄鸡鸣”才止。可以说陈去病在潮汕的这段时间里，丘复是与其联系十分紧密的南社友人之一。丘复在一段文字中记载了重九节陶芳园雅集的情景：

建社十年，春秋雅集均在上海或虎丘西湖，今年闽粤军兴，同人云集潮海，由是巢南陈子乃有重九登高之约。清晨，余自潮州来会。旅汕同人不下三十人，而百举以病阻，良牧返议院，余列戎行、参军幕者，或赴前敌，或因事不能至，至者或不能久留，于是登高之约改为雅集，计与会者十二人……^③

在雅集中，社友分韵赋诗，丘复有《旅汕南社同人重阳雅集陶芳园分韵得‘园’字》《南社雅集分韵已成七律二章，再用岑嘉州潼关使院早春寄王同州‘园’字韵得五古一首》《与巢南夜话用岑嘉州集‘园’字韵二首示巢南并南社诸子》。此次实乃南社旅汕同人在岭东地区举办的第一次雅集，也得益于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去病的邀约才能实现。丘复诗云：“南社十年多旧雨，岭东雅集算今番。”“年年嘉会赴愚园，鸿雪因缘认旧痕。风月新词思柳永，东南盟主重陈蕃。”^④诗中“柳永”指的是南社灵魂人物柳亚子，“陈蕃”即为陈去病。丘复称其为南社的东南盟主，足以见得丘复对于陈去病的推崇。重九节后，丘复与陈去病一行还相约由汕入潮，同游潮州的城东韩江楼、城南，到浮垅见田别业赏菊等。丘复均有诗记载。期间两人亲眼目睹当地人民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思想、闽粤战乱的情景，旧恨未消又添新愁，不禁悲从中来，慨叹国家民族的出路。1919年1月1日，陈去病召集临时雅集于广州南园，当时社员在粤者达200余人，但到者很少。以后多次拟发起雅集，均未成。丘复在与陈去病分别之后，虽未再相见，但仍有书信往来，如《寄柬巢南并示一厂》云：“一别元龙二月余，不知消息近何如？”^⑤对于友人的近况时时牵挂于心。

由于陈去病常年奔波于政治与教育事业，辗转各地区，离开潮汕后，两人也鲜少再有文学互动。只有在陈去病先莹坊表落成时，丘复作《吴江陈巢南建筑先莹坊表落成，值尊公百龄冥诞，张筵速客，折柬相招，并征诗文。予以道远未获观礼，而二十余年老友不可以无求也，爰作五言三十二韵，以志盛举》：

古今豪杰士，崛起多孤儿。世传欧阳公，为有陇冈碑。立身彰母教，子行毋敢亏。立坊表母德，子职尤应为。陈子吾畏友，瑜策生同时。我家闽西桥，君住吴江湄。三世孝友著，军府旌褒辞。轻财重任侠，桥木南山萎。因之家道落，兼复门祚衰。贤哉儿节母，有孤腹遗子。……多财善积散，天性好博施。^⑥

^{①③④⑤⑥} 丘其宪点校，汪梦川、刘永华审订：《丘复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5、833、147-149、153、282页。

^② 赵霞：《陈去病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页。1908年陈去病受聘于绍兴府中学堂，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会葬同盟会人士秋瑾。在任教期间，陈去病也以秋瑾事例教育学生，因言论大胆而屡被责难，几个月后，因聚众祭奠秋瑾而遭通缉，不得已而南下广东暂避，而后由越入闽。

诗中对于陈去病是遗腹子的身世，家境贫寒却世代仗义疏财的侠者之风深表敬佩，并再次提及两人生于同甲的特殊情缘。

在丘复六十寿宴时，陈巢南也有书信寄达。直至陈去病逝世，丘复作《去岁陈子巢南寄示六十述怀诗，旋闻谢世，久拟哀挽未就，便检故纸得遗诗，怆然有感，次韵追挽》，表达了他的震惊与遗憾之情。至此，两人的往来酬唱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从以上交往可以看出，丘复与柳亚子，更多的是社员与南社社长之间的纯粹交往。柳亚子身上独有的贵族公子特质及其作为南社灵魂人物的头衔，决定了丘复对于柳亚子更多的是一种敬畏、钦慕之情。从丘复在每次的书信往来，以及对柳亚子的称呼中亦能体现出来。而他与陈去病却不同，两人身世、家境相近，又生于同甲，这一特殊的渊源，无形中拉近了彼此内心的距离。陈病常年为革命奔走，在居旅潮汕期间，两人得以相见，再加上陈去病的理论主张与丘复的十分契合，在丘复的诗文、书信中，可以发现常用“吾老友”“好友”来称呼陈去病。所以，相比较柳亚子而言，丘复与陈去病的交往，更多的是志同道合，是可以同榻而卧、促膝而谈的好朋友之间的酬唱。

此外，在南社社友中，丘复除了与南社主要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保持密切文学互动外，还以蔡寒琼、叶楚伦、林百举等社员交谊甚笃并有诗文往来，如《寄怀社友蔡寒琼即用阮移〈坐雨〉原韵》《蔡寒琼索觅王大王碑诗以答之》《林西园议长惠赠王大王木刻，再乞一纸寄寒琼，即叠前寄寒琼韵成长歌奉谢，并寄寒琼广州》《寒琼丙子生朝得刘三题坐蒲团小影诗，和韵寄潮同作》《荷花生日诗，社友蔡寒琼自京来约，次刘三韵同作》《题社友金山高吹万哀思录》《寄柬巢南并示一厂》《汕头诸友酬和予诗，赓续一绝，惟社友蔡子润卿、林子一厂、宗人天羽俱在汕，俱能诗，性好吟咏，竟无一字酬和，诗以调之》《挽叶楚伦》等。

（二）与南社闽集社员的交往

1. 南社闽集考证

南社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即另建阶段。1923年5月，柳亚子与叶楚伦等八人发起组织新南社，这是柳亚子与旧南社的分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勇敢行动。次年一月，傅尊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目的在于“保存南社旧观”。陈巢南在《越社叙》中有一段话，南社“将由越而闽而粤，以迄乎南海之南，北海之北，则天下事倘有济乎。抑又南社之庆也”。^①后来果然有南社闽集的出现，发起者为朱剑芒。^②1939年，他任福建监察院审计部驻外稽查兼福建审计处第三组主任。当时抗日军兴，福建省会内迁永安，永安成为当时东南的文化名城，一时文人荟萃，诗友如云。而在福建任职的朱剑芒，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报上称他为“爱国老诗人”。几位诗友经常聚集在永安风行印刷所经理罗稚华印刷社后面的寓所“燕尾楼”，彼此也以社友相称。在朱剑芒的《南社感旧录》发表后不久，散居于福建各地的南社社员，要求他出面组织南社闽集，此事终于在1943年旧历端午节，于福建永安正式成立，并公推朱剑芒为社长。朱剑芒即席赋《南社闽集第一次雅集呈同座诸君》七律一首：

日月重辉世运新，客中高令际芳辰。好凭南国人文盛，再续东吴社事频。我向开天温旧梦，谁从尘海话前因。卅年一部沧桑史，聊佐当筵酒几巡。^③

当时在永安参加南社闽集的有：朱剑芒、罗稚华、朱大炎、林霭民、陈瘦愚、高伯英、潘希逸等共十七人。与南社虎丘雅集成立时的人数恰好相同，不知是巧合抑或是有意为之。这些社员来自江、

^①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页。原刊《南社丛谈》第四集。

^② 朱剑芒（1890—1972）原名长绶，字仲康，由于慕名古代侠士朱家而改名慕家，别号剑芒，江苏吴江人。1914年加入南社，入社号为427。

^③ 《永安文史资料（第8辑）·抗日战争时期永安史料专辑》，第139—143页。

浙、皖、赣、湘、桂、粤、闽八省。其他的社友亦有唱和之作，如潘希逸《南社闽集第一次雅集步朱剑芒社长韵》：“挥毫珠玉羨清新，手盥蔷薇拱北辰。文物东南凭谁聚，年光今古去来频。龙睛破壁惊神韵，鸿爪留泥证夙因。况是端阳逢竞渡，临江酹酒几逡巡。”此外，潘希逸还有“南社曾经创闽集，东南八省会群贤。”^①的诗句，说明当时南社闽集的情况。1944年7月7日，朱剑芒与朱大炎、罗稚华三人，为了宣传民族精神而创办了《长风报》，由朱剑芒担任主编。然而，仅仅在南社闽集成立几个月后，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抗战胜利，下半年福建审计处复员到福州。迁到福州后，南社闽集在福州城北龚氏花园环碧轩中举行了一次雅集，朱剑芒成七言一绝：“盍簪结契在东南，莲社重开兴特酣。至竟文人崇气节，瓣香相与拜苏口。”^②但此次到会社员仅十余人。不久朱剑芒调任上海审计处，罗稚华回厦门，南社闽集也就因此星散了。朱剑芒在《我所知道的南社》中也回忆了当时南社闽集成立原因、主要成员、第一次雅集情况以及后来解散过程：

这时亚子已从香港逃难回到国内，留居桂林，经几次通信，才知道在福建的社友只剩福州林秋叶、上杭丘荷公、丘潜庐三人。最初仅与荷公通信联系，当时有十多位同住的诗友（大都是闽南籍，也有来自江浙及其它各省的），一再要我组织南社闽集，在永安这座山城辟一爱好文学者的活动场所。最初我因国难如此严重，自己尚在度流亡生活，又没有亚子那样才力和声望，也不足以号召。还想到南社结束已久，今天再来个继承南社的组织，那真是所谓开倒车了。后来在接近日德意法西斯集团日暮途穷，即将全面崩溃，再没有空袭警报，彼此经常叙集在罗稚华的寓所燕尾楼，又谈到组织南社问题。大家认为，从敌寇侵略中国以来，不少知识分子丧失气节，甘心当汉奸，做顺民，留下了历史上极大污点。我辈在流离迁播中，虽没有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力量，而洁身自好，始终保持清白，也是可贵的。南社以提倡气节为主，在此时期，将一心一德的同志组织起来，相互砥砺，还是有必要。这些话打动了，也就高兴起来，因之一九四三年旧历五月初五（当时称为‘诗人节’，系纪念屈原投汨罗江的一天），在永安桥尾成立了南社闽集。

他虽为吴江人，但在1941年流浪到福建永安县。1943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旨在危难之际扬民族不屈之精神：

当时参加的共有十七人，和旧南社在虎丘成立时的人数恰恰相同。十七人中除我之外，只有南平陈瘦愚曾参加“南社湘集”，所以就公推我和罗稚华当了正副社长。南社闽集正式成立，只隔四个多月，日本投降，所有这个临时省会的机关团体都迁回福州，大家也就离别了永安。几位不在工作岗位的社友即各自回乡。自迁到福州后，新社友还是陆续参加，又发展了二十余人。这时南社旧友丘荷公虽年老病废在家，也来信愿意参加。……但我留居福州，虽也有一年半的时间，由于胜利后的处境还是惶惶不安，工作又特别繁重，实在没有心情。稚华回到厦门，为了整顿风行印刷厂业务，不能常来福州，所以南社闽集的活动，更难进行。迁到福州后，只举行一次雅集，参加的也不过十数人。至于编印社刊，也因征集到的稿件不多，也没有重要作品……及至一九四七年，我全家重回上海。^③

南社闽集为南社之延续，社员多为福闽官员、文人名士。自从日本投降，南社闽集由永安迁到福州后的这段时间里，社友因为诸事而不能继续发起雅集，使得南社闽集只活动了一两年就以解散而遗憾告终。丘复在他的诗歌中写道：

① 潘希逸：《孟晋斋诗存》，泉州：泉州市曙光印刷厂，1985年。

② 马以君编辑：《南社研究第7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5-137页。

③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25页。原刊载于内部发行的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一、二辑中。

燕江社事又重新，畅饮蒲觞恰及辰。座上朱陈盟好旧，楼头催李赋诗频。山川咫尺难随步，坛坵东南雅善因。报国文章尊气节，相期忠义拜张巡。

采采陔兰不羨仙，题图回首十三年。输君远路群英会，比我长风二妙篇。旧好新知交有道，伤离感逝见无缘。当时革命凭文字，磨盾今应草檄传。^①

1945年（乙酉），在上杭老家的丘复，已近古稀之年，却常为兴办学校之事奔波。加之在上杭距离永安有五百余里，所以就没有参加此次聚会，但他始终热切关注着南社闽集的开展状况，而且与南社闽集一些社员保持密切的诗文往来。

2. 丘复与陈瘦愚

陈守治（1897—1990），字瘦愚，号乐观词客，晚号乐观翁，福建南平人。参加过福州逸社、上海乐天社等共计39个社团。在晚年时期写了些诸如《回忆南社湘集及闽集》类的回忆性文章。他作品中有关南社的诗词，大部分收在《南社丛谈》《南社诗选》之中。19岁开始学习古典诗词研究和词的创作。他提倡词学革新，主张在“婉约”“豪放”两大词派外另立“平易”一格。其创作的词稿近万首，散见于海内外报刊、专集。出版有《神交唱和集》《愚窝诗词话》《愚窝诗词年刊》《瘦愚三十初度唱和集》《陈瘦愚词选》等30多本。在晚年自称“南平第五词人”。^②曾编有《愚窝诗友录》，但在文革中被抄，不知下落。他曾以种兰图、奉姑课子图、乐安楼填词图等广征友人题咏。也是一位一生酷爱文学之人。

在南社闽集社员中，陈瘦愚是与丘复交谊较密切的社友之一。丘复曾三次题咏其奉姑课子图。^③从两人的诗文唱和中，能够感受到陈瘦愚对丘复的钦慕，尤其看重丘复在文学上清澹宏博的造诣。在1945年（乙酉）丘复生日，陈瘦愚阅报得知，便以二律见寄，在诗前序云：“读报知乙酉观莲节念庐雅集，醪金治筵，为主人寿者六十余人，因作两律寄之，亦以见倾倒之忱尔。”并在诗中写道：“手栽桃李三千树，身历沧桑七二年。如此诗尊如此寿，蓝溪人共颂神仙。”^④除此之外，陈瘦愚还寄书信，表示愿侧弟子之列，拜丘复为师。并在之后的书信诗文往来中均用“吾师”尊称丘复，而以“弟子”自称，如《念庐吾师以愚愿附弟子籍，赋诗寄祝，次韵奉酬，藉表拳拳之心》诗云：“弟子礼当爵设丰，远思曲踞奉诗翁。古言事应如君父，我道仰之似华嵩。”“愿作念庐诗弟子，笠山而后有愚窝。”

同时，丘复对陈瘦愚也有着极高的评价。在其表示愿以师徒相称时，丘复回复：“岂有明珠鱼目混，那堪老马虎皮蒙。君诗早迈高常侍，十子闽中首数鸿。”^⑤他认为高达夫五十学诗，而陈瘦愚今年亦五十，但是诗名却远播海内。从两人的诗文互动中可以看出两人特殊的情谊。

3. 丘复与丘潜庐

丘潜庐（1877—1970），原名日华，后改为翊华，字海山、灏山，晚年自号潜庐老人，还曾刻有“圣湖吏隐”四字石印以见志。上杭中都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幼年秉承庭训，用功读书，21岁赴福州肄业于鳌峰、凤池两书院，23岁又于岳麓书院学习。早前加入南社，入社书序号为203，并与南社柳亚子、高吹万等人奉为师友。晚年，与朱剑芒、林之夏、丘复、陈瘦愚等人组织南社闽集。丘潜庐诗作颇多，诗风平和，用韵较为通俗却不乏韵味。常与诗友唱和，颇得山水友朋之乐。因丘复与其都曾加入南社，并组织南社闽集，在思想、政治倾向上相契合，再加上两人的上杭丘氏同宗之缘，使得两人交谊比他人更为深厚。

^{①③④⑤} 丘其宪点校，汪梦川、刘永华审订：《丘复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7、311、469、610、528、533页。

^② 《南平市志·人物传》：他追溯南平历史，有词作流传下来，属于南平籍的仅4人，即北宋状元黄裳、南宋冯取洽、冯伟寿，南宋探花潘方。

在诗文唱和方面，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交流。丘潜庐先后供职于台州、杭州、甘肃、西安、福州、平和等地区，又喜畅游山水，广交友朋，足迹广布大江南北，故友朋至多，见闻至广。但是他始终与丘复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并常常向其提及一些有趣的见闻或者向他人乞得书法、绘画等惠赠于丘复。这在丘复的诗歌中常有提及，如：《海山惠赠〈张亨甫诗钞〉、章氏〈新方言〉，诗以奉谢》《海山自余姚榭局寄赠阳明、舜水、梨洲三先生遗像，即题一律，用志景仰，并呈海山》《海山以予寄撮景并述近搜得明代乡贤遗著，喜有五叠予韵之作，爰再叠前韵二首酬之》。丘复在诗歌中描述称：“与君万里遥论古，一切惟应付六如。……何人更有关心甚，参订归来盼望如。”^①对于丘潜庐热心搜集古人遗著并不远万里寄答的书信充满感激之情。同时，丘复在其诗文中也表达了“羨君足历西南北，到处题诗留足迹。”的羡慕之意。

丘潜庐常年为政事奔波于外，几乎很少回家乡上杭，丘复与其能够相见的机会极少，几乎只能通过书信才能了解对方的近况。但在时局如此动荡不安、通讯极其不便的年代也丝毫没有阻断两人的联系。由于丘复比丘潜庐年长三岁，所以，在诗文、书信中，两人除了一起探讨诗文创作、论古谈今，心系国事的交流外，丘复更多的是对丘潜庐流露出一种宗族兄弟般的敦敦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切怜爱之情。如：1913年（癸丑），丘潜庐出任平和县时，丘复写了《送海山出任平和序》，在序中，丘复认真帮其分析了闽地局势^②，他认为治理平和有三难，即：“一胥差，二夫役，三械斗。”并详细剖析了治理之本为裁胥差，减夫役，以及兴学校、广宣讲。并写道：“君平日读书，蓄道德，能文章，光复初，在浙台军政分府，又富有经验。予所计划，知君皆优为之，惟愿始终一致，无负初志而已。”希冀丘潜庐不要忘记初心，同时还告诫道：平和“于汀为共道，与上杭尤为接近。朝下一令，暮行一政，三四日之间已达于故乡人士之耳目。好自为之，毋使故山泉水笑人也！”^③以长者殷切之情，发自肺腑的勉励他做个有谋略、有担当的贤德之官。而在丘潜庐遭裁撤，政治失意之时，丘复又能及时以宗族兄长之态宽慰：

平生愿学信天翁，得失无须判楚弓。为国宣劳侷犬马，随人觅食笑鸡虫。不矜察察才非拙，自守兢兢句更雄。留得书生真面目，羞甘污合与流同。^④

认为他已经为国尽了犬马之劳，所以并没有什么遗憾。况且，人最为可贵的是保持一颗初心，只要不与世俗腐败之人同流合污就可以心安自得。可见两人的交谊非同一般。丘潜庐对丘复更是崇拜、敬重，在丘复有困难之时更是竭尽全力的帮助。丘复在《寄谢海山》的小序中写道：“海山宗兄闻予节省一部分友朋所赠寿筵费，将购田为明强中学奖学基金，自全县寄国币二百元为助，既感且愧，书此寄谢。”^⑤丘潜庐得知丘复需要帮助时，在自己都“留移寄食艰糊口”的艰难处境中，毅然从广西不远千里寄送资金支持丘复所创办的明强中学教育兴学，这种友谊实为可贵。丘复亦是对丘潜庐赞赏有加：“宗人海山大令，为予三十年前道义之友，素以言行相砥砺，书札往还，不作世俗语，其诗文畅所欲言。”^⑥两人不仅同为上杭丘姓同宗，更是同为南社闽集成员，无论在地缘、亲缘还是诗歌创作、思想政治见解方面而言，都有着难以名状的志同道合之感。

三、丘复诗歌中的“南社”气节

南社“以作海内文学导师”自命，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总体而言，是一个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革命的一个文学团体。作为南社的一员，丘复有很多体现这一因素的诗文。

^{①③④⑤⑥} 丘其宪点校，汪梦川、刘永华审订：《丘复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3、918、304、510、995页。

^② 丘复认为，十闽地势，可分为上下游。下游民风强悍，其人勇于私斗。而平和隶属漳州，即为下游。故此地为凶险局势。

（一）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诗文

在辛亥革命之前，南社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清排满，为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主题是“排满”“革命”，提倡民族主义。围绕这一主题，南社成员的活动有凭吊、纪念宋明的皇陵、遗迹等，更多的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以及无奈之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丘复受其父之命，出游结交名士、览形胜，以开眼界。是年，重九后一日，于汀龙会馆喜晤丘逢甲先生，两人之后开始频繁往来。丘复的思想多受丘逢甲的影响。自丘逢甲出游南洋后，思想发生极大转变，由之前的改良维新转而成为支持革命的同盟会朋友。丘复也因丘逢甲而认识很多革命志士，并于1911年6月加入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这一时期，丘复的主要活动其一是：收罗、重刊上杭地区宋明文人的遗稿。如：仿明李颖《杭川风雅集》而重新编撰《杭川新风雅集》三十卷；整理校勘明刘坊《天朝阁集》、明李鲁《烬余集》^①、明末李世熊《物感》《史感》等。其二是：凭吊、纪念宋、明的皇陵、遗烈，借此抒发思想情感。对于满清大都用胡、贼、寇、盗等蔑称，以此激发人们的忠义阳刚、勇武不屈之气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面对“政乱于内，兵乱于外，寇盗蔽野，流亡塞途。以地言则无乐土，以时言则无宁岁”的时局，丘复自言只能“世乱而以诗自娱”。^②因此，丘复写了很多体现“南社”气节的诗歌。对于宋明遗烈的咏叹，丘复有《过明娄贤妃墓》《樵舍镇怀古》《登望湖亭》《过宋故宫》《登宋殿故址》《游吹台》等诗歌。南社诗人们曾在金陵凭吊明孝陵，拜谒明故宫、秦淮河、莫愁湖等，都曾洒下他们一腔热泪。丘复亦写下了《过明故宫》《莫愁湖》等颇具南社气节之诗篇。

丘复在《除虱》云：“区区一微物，何难宽容彼？余则曰不然，除恶当如是，不见汉黄巾，始固米贼耳。及其势蔓延，所向皆披靡。又不见明季，流寇张与李。”^③借除虱比拟除寇，他认为要将人们对虱子的愤恨用在除寇上，万不可掉以轻心。1899年（己亥），丘逢甲于潮阳和平里写下著名诗篇《和平里行》悼念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④同年，丘复有奉和之作，并云：“夷祸横流溢九州，何时得享和平福。”对文天祥的忠节表示敬佩，同时联想到当今夷祸横流的现实，自己却不能像文天祥一样上场杀敌，只能“长夜挑灯把剑看”的无奈与悲叹。在《痛哭》中丘复更是：“痛哭时艰泪不干，惊闻胡骑满长安。”对于乱世不能有所作为，只能痛苦的悲哀。在1907年（丁未），革命志士秋瑾^⑤被害后，南社人陈去病与秋瑾好友徐自华组织秋社，将其营葬，迁葬，南社人写了一批悼念秋瑾的诗文，表达哀愤之时，以期唤起人民的革命斗志。丘复在《西湖纪游》其三云：“苏小坟前宿草稠，西冷桥下水悠悠。游春遍作悲秋感，风雨无端起暮愁。”秋瑾的不屈意志、女侠风范在诗作中得到阐发。而第四首为吊南宋爱国将领岳飞之作：“节近清明上岳坟，人来携得纸钱焚。醍醐灌顶当头棒，铁像无知哪足云。”^⑥夷夏之辨的民族观念渗透在南社诗人的创作与游历中，也是丘复在辛亥革命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活动重心。

（二）辛亥革命之后的诗文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国建立。南社诗人有过短暂的欢愉，但随着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南社成员宋教仁、宁调元等均死于其屠刀之下，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人民不聊生的乱世之中。这一时期，南社成员由怀念过去转而开始直面现实、直

^① 李鲁，字弘庵，上杭人。登天启甲子贤书。唐王称制闽中，召为职方司主事，唐王蒙尘汀州，乃殉节于漳南道署前。有《烬余集》留存。丘复《书〈烬余集〉后》有“生民自古谁无死，报国惟公信不虚。”之句。

^{②③⑥} 丘其宪点校，汪梦川、刘永华审订：《丘复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0、29、103页。

^④ 黄志平，丘晨波主编：《丘逢甲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322页。

^⑤ 秋瑾（1875—1907），近代女民主革命志士，提倡反清革命。曾参加过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1907年她与其他志士组织光复军，事泄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写实事，反清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反袁、反复辟、反专制，呼唤民主共和的实现。南社成员哭悼的诗歌犹如血泪交进的悲河。丘复大义凛然，积极参加爱国志士的活动。1913年宋教仁被害，南社人由悲痛惋惜转而长歌当哭，连篇累牍的书写祭文挽诗。丘复《哭宋钝初》云：

可怜中国人心死，如此人才忍杀之！今日哭公无限恨，令人倍忆晋锄麴。

誓将政党造共和，诡论偏教积怨多。甘堕奴圈吾已矣，沉沉其奈国民何！^①

宋教仁这样的爱国志士竟被杀害，丘复在诗作中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对这个黑白颠倒的社会的愤恨与无奈。更是感慨道：“忽忽百年人易老，茫茫前路海犹波。平生梦想今安在？国体共和尚未和。”对于共和政体的失望之心溢于言表。

在帝制极盛、洪宪改元之时，丘复作为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只能靠诗歌阐发其痛：“民国居然有五年，尚留残梦付梓篇。平生结想今安在？已死余灰正复燃。”^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袁世凯复辟不及百日竟猝死。面对时局的大反转，丘复在《悼袁世凯》云：“流血纵横真满野，断头侥幸未登台。聪明反被聪明误，留得他年吊古哀。”在诗作中对于袁世凯的复辟梦碎、最后丧命的喜悦，以及对人世的感慨。继而又道：“人心不死魔王死，还我共和庆更生。愿与国民同保护，永消霾翳放光明。”^③希冀民主共和重新带来光明前景。民国十三年（1924），当丘复增补为全国参议院正式议员时，因不耻曹锟贿选，未赴任就职，而南下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秘，并写下了许多充满浩然正气之诗文。

可以说，丘复在以上诗作中表现出了一位南社诗人的浩然正气和思想的革命性与进步性特点。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②③} 丘其宪点校，汪梦川、刘永华审订：《丘复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6、115、122页。

民初晋江诗人吴钟善旅台诗歌刍议

——兼及寄鸿吟社之始末

董俊珏^{1,2}

(1.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闽东南地方文化研究所, 福建 福清 350300)

摘要: 吴钟善是清末民初闽南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他曾应台湾板桥林氏之聘, 于民国初年客居台湾三载, 期间与林鹤寿等结成寄鸿吟社, 盛为联吟唱和。寄鸿吟社在日据时期台湾貌似繁盛的汉诗创作风潮中独标一格, 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和爱国内涵。吴钟善的旅台诗歌, 以如椽大笔怀古伤今, 讴歌英雄烈士, 描摹风土人情, 构成了一幅全面展示台湾历史与现状的宏伟画卷, 不仅无愧为寄鸿吟社诗群之冠, 更堪称台湾近代诗史的扛鼎之作。

关键词: 吴钟善; 寄鸿吟社; 台湾; 板桥林氏; 《寄鸿吟社诗草》; 《东宁诗草》

一、吴钟善生平与文学创作概况

吴钟善(1879—1935), 字元甫, 号顽陀, 又号桐南居士、荷华生, 室名守砚庵。福建晋江(今晋江市)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乡试副贡。光绪二十九年(1903), 应经济特科试, 中二甲第五名。宣统二年庚戌(1910)以州判分发广东, 入民国后不仕。他出身名门, 其父吴鲁是科举时代福建最后一位状元, 也是杰出的爱国官员, 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和书法家。在良好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自幼天资颖悟的吴钟善迅速成长为传统士大夫阶层中的佼佼者。但在晚清至民国政治的云谲乱象之中, 他并未获得一展才略抱负的机遇, 只能穷老乡里。尽管如此, 吴钟善依然凭借自己在诗词书画及篆刻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而擅一时胜场, 成为近代闽南文坛独领风骚的大家。吴增在为吴钟善所撰的墓志中, 对其卓尔不群的文学艺术成就和高洁淡泊的人格性情, 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 其言曰: “我泉自唐宋以迄于清, 以古文名家、以诗词名家、以金石书画名家者, 往往而有, 然率业有所专, 优于此者或绌于彼, 若兼各家之长为一家数, 归老山海间, 寂寂无所知名而不悔者, 厥惟我友顽陀征君一人而已。”^①

吴钟善一生著述, 知见者有《守砚庵诗稿》十四卷、《荷华生词》二卷以及《守砚庵文集》四卷, 另有《守砚庵题跋》一卷。吴氏词宗常州派, 古文则大抵祖述桐城。相比较而言, 他在诗歌创作上用力最勤, 成就也最高。《守砚庵诗稿》录诗一千余首, 起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迄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 按时序完整地展现了作者毕生坎坷困顿的心路历程。吴钟善在《守砚庵

作者简介: 董俊珏,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近代诗文研究。

^① 吴增:《清故征君顽陀吴君墓志铭》, 见吴钟善:《守砚庵文集》卷首, 晋江吴氏桐南书屋藏版, 1941年嘉年印刷铸字有限公司出版。

诗稿自序》中说：“余性好游，翘首平生，无足自慰，独车辙马迹所及，几半天下，方在襁褓，便与鞭丝帆影缔胜缘。”^① 苏镜潭为吴氏作家传，既说他“所至得江山之助”，又提到他“家富藏书，穷日夕而探讨之，造诣遂益精进”^②。吴增所作《守砚庵诗稿序》则谓其“行洁而数奇……中年厄于世变化……所遭多艰，时有身世之感，抱无穷之隐痛”^③。总括起来，吴钟善的诗歌之所以在艺术上有突出的成就，大致得力于其走遍大半个中国（还曾到过日本）的漫游经历，广博而深湛的学术积淀，以及由动荡时势、坎坷命运所触发的深沉复杂的人生感怀三个方面。吴钟善论诗主性灵，接近于清人赵翼的诗学主张，而不嫌于同时代同光体等流派之以门户声气相标榜，可以说是一位能自立于流俗之外的诗人。就诗歌的艺术风格而言，他的诗初学李白，中年以后转而祈向于白居易、苏东坡而强调自抒性情；其怀古伤时、自叹身世之作，则时有杜诗的沉郁厚重。苏镜潭《守砚庵诗稿序》这样评价吴钟善的诗歌：“其气醇以庄，其格谐以苍，渊渊乎如鸣琴流水，穆穆乎如响玉清风，信能跻古人之堂奥，而非今世所称诗人之诗也。”^④ 所言虽不免友朋之私，但在整体上还是点出了其诗歌艺术的高妙所在。

民国初年客居台湾的三载时光，在吴钟善四处漂泊的一生中，尤其关键。这一时期，吴钟善不仅在文学观念与诗歌艺术技巧上走向全面成熟，而且还与林鹤寿、苏镜潭等结成寄鸿吟社，既盛为联吟唱和，亦且以诗作热烈讴歌郑成功等民族英雄，弘扬爱国精神，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拟就吴钟善羁留台湾期间的诗歌创作作一较全面的观照，既以呈现吴氏诗歌的艺术风貌，亦藉此展示他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旧体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对寄鸿吟社这一在当下学界尚欠关注的创作群体的基本情况，略作钩稽，以就正于方家。

二、吴钟善渡台与寄鸿吟社之倡立

民国七年(1918)，已由胜代状元之佳公子一变而为闽海乡间之穷学究的吴钟善，受生计驱迫，应友人张羹甫之邀，携长子吴普霖东渡台湾，授读于张氏之婿林忠家。林忠字伯铭，系台湾名门板桥林氏家族的成员。板桥林氏自清代乾隆年间迁居台湾，迭经数辈人的创辟经营，至清末遂成台湾首富。政商合一是板桥林氏的家风，但其家几代人又都不失儒者本色，尤好与文人学者游处。从道光年间开始，吕世宜、谢颖苏、许筠、郭名昌、陈衍等众多福建士大夫群体中的翘楚人物纷纷渡台，成为林家的座上宾，从而在百余年间，形成了一道以板桥林氏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对台湾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吴钟善踵武乡贤而至，同样在近代以来的闽台文化交流史上踞有重要一席。

林忠之父林彭寿，号萍叟，是板桥林氏三房林维得的长子，继其仲父维源而成为整个大家族的监护人，统管家政。他是一位很有政治抱负的爱国志士，亦娴于诗文。吴钟善到台时，林彭寿已去世三年。吴钟善读其遗诗，深为钦慕，于是应林忠之请，为其画像题赞。赞辞中有“维我与君，通家世好”之句^⑤，可知吴钟善之父吴鲁与林家已有交往。吴鲁宣统三年(1911)自京师归里途中，曾于当年岁末寓居厦门鼓浪屿林彭寿从兄林尔嘉之菽庄花园，吴钟善彼时亦随侍在侧。林氏一门风雅，酷嗜艺文之人才辈出，而林彭寿之胞弟鹤寿、嵩寿及从弟柏寿，尤为出类拔萃。林鹤寿(1884—?)，字兵爪，“风姿高彻，倜傥绝伦”，“书无不读，举凡经史百家，皆能得其精蕴，工词翰，旖丽高华，

① 吴钟善：《守砚庵诗稿自序》，《守砚庵文集》卷三，晋江吴氏桐南书屋藏版，1941年嘉年印刷铸字有限公司出版。

② 苏镜潭：《吴钟善家传》，见吴钟善：《守砚庵诗稿荷华生词合刻》卷首，晋江吴氏桐南书屋藏版，1941年菲律宾宗元印书馆承印。

③ 吴增：《守砚庵诗稿序》，见吴钟善：《守砚庵诗稿荷华生词合刻》卷首，晋江吴氏桐南书屋藏版，1941年菲律宾宗元印书馆承印。

④ 苏镜潭：《守砚庵诗稿序》，见吴钟善：《守砚庵诗稿荷华生词合刻》卷首，晋江吴氏桐南书屋藏版，1941年菲律宾宗元印书馆承印。

⑤ 吴钟善：《林萍叟画像赞》，《守砚庵文集》卷二，晋江吴氏桐南书屋藏版，1941年嘉年印刷铸字有限公司出版。

涵情绵缈”^①。虽然是富甲一方的贵介公子，并因其兄彭寿晚年多病而成为林氏家族财政的实际掌控者，林鹤寿却并无纨绔习气，且尤其喜欢与文学之士交游，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以诗文负重名”的文人圈子，成员除了吴钟善、吴普霖父子之外，还有龚亦癯、陈蓁、苏镜潭等。林鹤寿与他们“唱和不间，而执礼之恭，供张之盛，决非寻常阔阅公子所克能”^②。

民国七年（1918）十月，在台北林氏坊桥别墅之方鉴斋，林鹤寿、林柏寿昆仲与龚亦癯、陈蓁、苏镜潭以及吴钟善、吴普霖桥梓等，结为“寄鸿吟社”^③，推年齿最尊的龚亦癯为社长，“拈韵分题，联珠迭唱，虽无开榜次名之趣，却有斟酌推敲之乐”^④。吴钟善将自己与社友唱和的诗作辑为一卷，命名为《寄鸿吟社诗草》，并作自序一篇，详细记述了寄鸿吟社结社缘起和具体的活动情况：

戊午以后，寄居东宁者三载。主人林氏，富而能文，贤而好客。撰辰卜胜，澡虑延欢；烛醉既酣，琴话方永。晓黛嚬入，吊旧国之青山；夕瞻娟来，抚古春之红树。人民未改，城郭已非，感慨系之矣！道同于内而气相求，情发于中而声成文。爰立吟社，命曰寄鸿。匪卜渐陆之吉，用贞冥冥之踪。夫其坐对天涯，兴怀之致一；境捐世染，尔汝之形忘。或再集于一辰，或分题于午夜。或联珠而迭唱，或属物而命篇。搜奇抉怪，程铢律黍。一字之窘，铄心判目；一篇之出，吹毛索瘢。金谷之罚罕逃，颌下之珠谁探？五音迭奏，韵于一堂；羣山出云，蒸为同气。锲而不舍，春也再华。

根据以上文字，首先可知，寄鸿吟社这样一个文学社团，是带有显著的反日民族情绪的，他们的诗作不同程度地表达出对中华故土台湾被日本所吞并的愤慨。其次，寄鸿吟成员人数虽不多，但雅集唱和却非常频繁，且创作态度相当认真严谨。也就是说，寄鸿吟社的文学活动，既有明确而厚重的思想主旨，也有严肃的艺术追求。吴钟善的《寄鸿吟社诗草》中多有以“秋扇”“秋衾”“秋磻”“寒烟”“寒寺”“寒月”等为题的篇什，且大都是与林鹤寿、陈蓁等社友次韵赓和之作，这就是所谓“联珠迭唱，属物命篇”，从中可见这一文学社团创作之盛。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吴氏《寄鸿吟社诗草》所收的诗多属藉咏物而唱酬，但并非游戏之笔，更没有堕入一般唱和诗卖弄才学、堆垛辞藻而内容空泛、情感寡淡的恶趣之中，而是往往渗透着“人民未改，城郭已非”的沧桑感触。试以一首《秋草》为例：

夕阳一意好温存，黄欲黏天望已昏。杜宇倦来啼尽血，谢池渐老梦无痕。荒城烟罩芜平岸，故邸尘封莠上门。大似灵均吟泽畔，合歌楚些与招魂。

这首七律的四联之间，每一联的出句切“秋草”之秋，而对句扣“秋草”之草，构思精巧而意蕴深沉，句句用典却无堆砌拼凑之嫌。颌联上句用子规啼血的固有内涵，而以秋代春，使悲剧意味更为浓厚；下句变“池塘生春草”之生机盎然而归于颓唐寂灭，写得也很有新意。尾联重笔收束，以台湾沦为异域的悲愤以及台海绅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壮烈事迹为着落，展现出凝重的历史兴废之感，是“情发于中而声成文”的完美诠释。

三、吴钟善《东宁诗草》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除了《寄鸿吟社诗草》之外，吴钟善还有《东宁诗草》二卷，收录的是他渡台前后及在台期间的诗作，与前者一起构成了其旅台诗的完整面貌。相比起《寄鸿吟社诗草》，因为并不局限于社友的

①②④ 王国璠：《林公鹤寿传略》，见《板桥林本源家传》，林本源祭祀公业1984年发行，第71页。

③ 案：吴钟善《自台北至台中车中作》（《守砚庵诗稿》卷六《东宁诗草》下卷）第三首有自注云“社友王君则前家去桃园甚近”，同卷又有《同人摄影台中公园即题诗其上》，其中有句曰“两间亭子一尺图，髯者陈，瘠者苏，俯者张，立者吴……千秋六人同”，“俯者张”或即为引介吴钟善父子赴台的张羹甫，推究诗意，似其亦为寄鸿吟社中人。据此则寄鸿吟社之诗侣，应不止于吴钟善《寄鸿吟社诗稿自序》中所列七人。

联吟唱和,《东宁诗草》的内容更丰富,题材也更全面,更能够充分地展现吴钟善当时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对台湾诗歌发展的贡献。

在林鹤寿、林柏寿昆仲的倡议和组织之下,民国七年(1918)冬,刚刚结成的寄鸿吟社诗侣一行六人,有台中、台南之游。吴钟善因而作《二林子邀同诸友作台南访古之游喜而成诗》曰:

表海雄藩旧东土,人民犹是城郭古。开山英雄吾里人,捣蜃坚城下一鼓。今年三渡鲲海东,赤嵌明灭疑可睹。浩歌激越悲扣舷,大波掀天鱼龙舞。二林夫子今机云,久执牛耳骚坛主。凭眺遗封涕泗流,岳岳延平溯初祖。当时义声宋两河,此日零落楚三户。风景不殊甲子非,中夜叹息膺频抚。南北千里一日程,连袂已得人逾五。自矜游福天所丰,岂惟诸君勇可贾。只应痛哭秉钧人,如此江山轻一睹。

这首诗有对台湾现状与历史的感怀,有对台湾风光的描绘及对此番南游的概述,还有对吴氏本人喜悦与感喟交杂的内心世界的表露,可作沿途诗作之总序观。

《自台北至台中车中作》组诗十首,是吴钟善等人该次南下之旅的起笔之作,其第一首云:

晓发台城驿,轻车戛铁轮。两旁行退树,一路逆来人。渐觉市喧远,喜迎山色新。清游兴何极,未觉苦风尘。

这首诗写作者与友人们的行程、途中风光以及抑制不住的愉悦情绪,写得活泼灵动,没有通常的写景诗那样集中、刻意的景物描摹,只是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点,却格外清新喜人。尤其作者写到了新式交通工具火车,以及因火车疾速行驶而造成的特别的景观,新事物与旧风格完美融合,营造出了“两旁行退树,一路逆来人”这样既有新奇趣味又特具古典美感的诗歌意境,若以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理论来衡量,实在是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吴钟善“得江山之助”的行旅诗歌,也因此而自标一格。

《东宁诗草》中最有价值的诗歌作品,首先就是展现吴钟善对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与思考的一类,其次则是描绘台湾奇特风土的一类。

在《东宁诗草自序》中,吴钟善对台湾的历史沿革与其纳入中国行政管辖的具体进程作了实事求是的文献考察,指出台湾“孤悬海表,山高土肥,最利垦辟,人所争趋,不归民必归番,不归番必归贼,或且启外人拦入之心”,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日本侵略者通过《马关条约》“不沈一船,不饮一弹,坐收奥壤,雄视一方”,中国却陷入了“江浙撤其藩篱,闽粤失其外府”的不利形势之中。^①不得不说,这是非常富于政治洞见的高明之论。旅居台湾近三年,吴钟善一方面对“形势视世变而殊,人心因沧桑而异,义声寂灭,故老飘零”的现实感到格外痛心,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自信地表示:“闽海东流,台山西向,地茁回龙之脉,天生内顾之形,泱泱乎表海雄风,又焉知果无其日也哉!”^②《东宁诗草》中的怀古感时之作,正是以吴钟善关于台湾的历史的洞悉、未来的期望以及他内心对这块热土在时隔六年之后依旧“眷怀畴曩,未能忘情”的深沉情感为基础的。

在《东宁诗草》所收的怀古诗作之中,作者所咏怀的对象,有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克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有郑氏降清后毅然自经殉国的宁靖王朱术桂及其守义从殉的五位王妃,有被誉为“台湾文献初祖”的明遗臣沈光文,有乾隆时平定林爽文之乱而终被冤杀的名将柴大纪等等,以古体居多,往往充然大篇,叙事详尽而寄慨遥深,堪称台湾三百年之诗史。如这首《谒郑延平祠》:

造物蕴宝几千年,付必其人非漫然。毗舍耶国海东偏,一跃世界名山川。轰轰烈烈谁与传,卓哉延平为之前。大鲸东渡波掀天,红毛西去雀避鹑。新国岁月旧国延,君已遗失臣节坚。尉佗倔强南海堞,气折陆生言譏譏。河西窦融图自全,纳土终归新主贤。王生国运丁连遭,孤军起义张空拳。大江南北来旬宣,瓜步旌旗百里联。直捣金陵下楼船,铁人藤甲森戈鋌。以一当十百当

①② 吴钟善:《东宁诗草自序》,《守砚庵文集》卷三,晋江吴氏桐南书屋藏版,1941年嘉年印刷铸字有限公司出版。

千，兵势嗟如夔与蚘。咫尺长江不可沿，天命已去人无权。彩云南望万里滇，零丁故主终不旋。回师海外驱腥膻，罪臣忍自图安便？周家开国卜涧瀍，汉京重赋东都篇。共滕遗民户籍编，往烈不数吴越钱。宁终海外一局蜷？英雄无命星离躔。即今祠宇凌云烟，赤心终古霄汉悬。遗臣遣播来骈阗，巍巍名节相后先。宁靖王祠连屋椽，王能殉国王非孱。岁时伏腊荐管弦，东庑西庑各豆笾。神之来兮白云駟，知不化鹤化杜鹃。赤嵌危楼夕阳边，七鲲身浪鸣溅溅。庙貌未改国几颠，千秋长镇蛟龙渊。

这首诗是吴钟善拜谒台南延平郡王祠时所写，题为《谒郑延平祠》，顾名思义，是一篇纪游之作，但作者完全不为一般的纪游诗的形式所限，一开始就强调了郑成功之于台湾的特殊的歷史意义，然后列举历史上雄踞一方的尉陀与窦融，意在阐明郑成功并非如他们一样，仅求偏安一隅、苟且自全，而是以北伐中原、匡复华夏为坚定的信念，无奈“天命已去”，才不得不栖身台湾，以徐图恢复。宁靖王朱术桂的祠宇与延平郡王祠屋椽相连，吴钟善在高度赞扬了郑成功之后，笔锋一转，就将叙述的焦点转移到了宁靖王身上。这样的转折其实大有深意。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就不幸英年早逝，而宁靖王直至清军接管台湾前夕才以身殉国，因此由郑成功到宁靖王，就更完整地展现了台湾在清初的历史进程，也更能揭示出台湾爱国志士前赴后继的不屈的民族意志。全诗最后“庙貌未改国几颠”一句，由怀古收束到纪游的本旨，将视线与诗思一并拉回了现实，而开篇“造物蕴宝几千年，付必其人非漫然”一联的真实内涵，也就比较清晰了：作者追述历史、歌颂英雄，在根本上是要说明，只有如郑成功、宁靖王那般心怀中华故土、秉持民族大义的忠勇之士，才配得上成为宝岛台湾真正的主人。言下之意是，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占领，终究是无法长久维持的。整首诗在开阖变化之中，寓意深微，展示了极为高妙的艺术技巧。

再来看一首《哀东宁》：

赤嵌城头落日青，七鲲身上白波腥。当座南音出丝竹，为君一曲歌东宁。五虎甚时飞入海，化去大鲸三百载。故楼碎壁红初销，断槛古梅香未改。谁识乘桴李茂春，依然皋羽是遗民。新声掩抑家山破，残梦凄凉蝴蝶身。尊酒来经歌哭地，秋前弹尽沧桑泪。宁靖旌旗一角天，太妃香火开元寺。已沈铁柱伏波铭，谁树珠崖汉家帜。破荒民主飞风云，傍午军书署将吏。忽闻海上落舲舳，运际干头剧可伤。时来赤纛中军府，事去黄冠水部郎。忆昔奇功收七日，下濂楼船飞鸟疾。余烬殷墟一鼓歼，受降唐堞三城出。椎牛草地啸么么，饲鸭蓬门呼警蹕。蓝面将军舞铁枪，黑头名士挥神笔。奎章五色下蓬莱，蕞尔扶余郡县开。北里莺花销岁月，南朝风雨上楼台。龟趺沃衍新胥宇，虎榜踰跼旧秀才。但觉红羊随劫化，宁期白雁应谣来。登临独对河山好，太息英雄容易老。来越空江伍相潮，存齐前代田横岛。朝东万水渐声低，犹说群山尽向西。大和干纪悲遗讫，难向高僧讯草鸡。

全诗从台湾的古代神话传说入手，依次提到了明遗民李茂春、宁靖王和郑成功之妻董太妃，但重点却放在近代甲午战争之后。吴钟善热情地歌颂了台湾军民英勇而悲壮的抗击日寇的斗争。“蕞尔扶余”是他对日本的蔑称，而“北里莺花销岁月，南朝风雨上楼台。龟趺沃衍新胥宇，虎榜踰跼旧秀才”四句，则对日本占领台湾以后部分文人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丧失民族气节，颯颜事敌的丑陋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全诗最后部分，以历史上的悲剧英雄伍子胥、田横比况郑成功，并用“草鸡”之典，与开篇之“化去大鲸”相照应，慨叹“英雄易老”，虽然台湾在地理上仍与祖国大陆紧密相连，却再难有郑成功那样的豪杰人物去驱逐日寇，收复旧土。这首诗是吴钟善在与寄鸿吟社的诗友们周历台湾之后，所写下的一首感怀之作，气势宏阔，格调凝重，是他此行怀古伤今之诗篇的完美收官，充分展现了吴钟善强烈而深沉的爱国热情。

除了回顾历史、思考现实之外，吴钟善在这次周游台湾的文化考察中，还对宝岛独特的风物民俗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一形诸诗篇，从而构成了其旅台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风情。

在《自台中赴台南车中偶成》的第三首中，吴钟善这样写道：

气候一何燠，我行倏已南。温带而热带，消息谁与探？农家尚醇朴，风俗旧所谙。车驻闻语声，娓娓多乡谈。秋禾亦已倒，甘蔗黄正酣。犁田不架牛，归粟不用担。机轮能起土，往来走趁趲。阡陌直如弦，遗制井田参。农事昔尝学，穷耕吾尚堪。

这首诗以明朗轻快的格调与质朴晓畅的语言，描述了作者在南行途中所目睹耳闻的台湾乡间风光与劳作场景。他强调“风俗旧所谙”“娓娓多乡谈”，点明了台湾在民间习俗与方言方面与其故乡福建泉州地区的相似，不仅表达出内心的喜悦与亲切感，更道出了台湾文化之与祖国大陆的同源共生、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而“犁田不架牛，归粟不用担。机轮能起土，往来走趁趲”这样运用现代机械的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又令作者倍感新奇。熟稔与新鲜的感觉交织，赋予了吴钟善这一类诗歌特别的欢快轻灵的气息。又如这一首《员林柑》：

南来日啖黄衣果，员林一角钟地灵。风味照座香擘手，不许词客夸洞庭。堆盘颗颗圆三寸，晓来更浸冰清冷。胸蟠热血忽雪化，十载病渴惊初醒。龙阳千头那可拟，亚霜新破秋山青。当年籍贡偶然漏，红尘不羸团金星。董家仙子亦狡狴，但向枝江驰云駟。绀实唐官竞瑞圣，玉露难洗环妃腥。赋诗旌尔甘心氏，苦口大师同德馨。好烦蕉萃酿作酒，日汲春色延修龄。

员林是台中彰化县下辖的乡镇名，其地自清道光年间即以特产员林柑而蜚声宝岛内外。吴钟善在诗中以轻灵、形象而略显夸张的笔调，写出了员林柑色、香、形、味之诱人，典故信手拈来，毫无晦涩之感。“赋诗旌尔甘心氏，苦口大师同德馨”两句，更以拟人的方式，点出了员林柑苦口甘心的独特风味，造语幽默，趣味盎然。结尾一联则提出了以员林柑酿酒的设想。柑橘酿酒始见于宋代湖南，元、明两代却少有所闻，清代则泉州、漳州一带及云南地区都有以柑制酒之事。吴钟善既生长于泉州，清末又曾旅滇探亲，对以柑橘酿酒之法应当是知晓的，他在这首诗中倡议用员林柑为原料以酿酒，不能不说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除了员林柑，吴钟善笔下的台湾特产，还有鹿港香和大甲席，亦各描摹详尽而各具神采。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以生番（未开化的台湾山区原住民）为表现对象的组诗《生番谣四首》。清代渡台文士大多都关注到生番的问题。道光时期曾任噶玛兰厅通判的山东文人柯培元就写过一篇《生番歌》，描述生番恶劣的生存环境，主张对其辈施以王化，大致代表了当时官绅对待生番的一般立场。吴钟善则不然，他的这一组诗，并不抱有多少汉文化高高在上的心理上的优越感，也没有谈论什么对生番的教化，而是以客观的笔调，选取具有鲜明特色的风俗或对象，去记述他于台湾生番的所见所闻和所知所感，冷峻之中，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第一首《插青》前有小序曰：

番俗以草青为岁首，谷种落地则禁杀人，谓行好事，从天公乞饭食。比收稻讫，乃标竹竿于路，谓之插青，逢外人便杀。生番嗜杀，是其特性，前吏台者遇有命案，尝以生番为壑，归日后亦时有杀人之事。对于生番之“嗜杀”，作者当然是坚决反对的，故而诗中有“春草年年鲜血腥，行了好事高插青”之句，贬斥意味相当强烈，但是小序中“前吏台者遇有命案，尝以生番为壑”一句，语意冷峭而特有深意，倒是整首诗的关键所在。第二首《刺纹》说的是生番男女以手足刺纹为美的习俗，诗前亦有小序，说到生番刺纹之后，“众社毕贺，费亦不贲，贫者不任受贺，则不敢更言刺纹”，吴钟善从中看到了生番社会中同样存在的贫富悬殊的问题，并在全诗最后，愤怒地发出了“古来寒门沦下品”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感喟。第三首《口琴》描述了生番的独特婚俗。清代康熙年间福建长乐人林谦光所著《台湾纪略》说台湾生番“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男则出赘于人，女则纳婿于

家”^①，类似于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的赘婚制。《口琴》一诗的小序则叙述得尤为详细：

男子惟女所悦，先遗玛瑙一双，女受之，则夜抵其家，弹口琴挑之。口琴薄铁所制，啮而鼓之，铮铮有声。不谒女父母，晨去宵来，必以星；或留为婿，则授以一帚一锄，佣女家，有子然后归。

从最末“有子然后归”一句来看，台湾生番的婚俗，并不是完全的赘婚制。这段小序对《台湾纪略》的相关内容构成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吴钟善将这种“不谒女父母，晨去宵来”的自由结合，比作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而给予了热情的赞美，并不从程朱理学的立场作迂腐的道德批判。对于一位封建士大夫而言，能有如此胸襟，相当难得。第四首《颈铃》的小序提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因台湾生番“远窜不听约”而“家贻一铜铃，使颈之，盖拟之狗国也”，生番于此则“至今犹传为宝，富者至掇数枚，曰是祖宗所贻”。吴钟善在诗中说“绣衣使者印如斗，不策功人策功狗”，而后先引《诗经·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之语，暗斥以郑和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视台湾生番为狗之不仁，又用《荀子》“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肉”之典，感叹生番受欺辱迫害而不自觉，且反以为美。虽然整组诗仅有四首，但各有其典型意义，且涵盖台湾生番之生产生活、历史现实极为广阔，不但考察深细，可补正文献之阙谬，更重要的是吴钟善在诗中表达了非常丰富而厚重的内容，有对生番残忍嗜杀的野蛮习俗的抨击，有对其社群内部问题的披露，还有对历朝政府在治理生番问题的颞颥失策的愤怒。在与台湾生番相关的文学创作中，吴钟善的这组《生番谣四首》当有其特别的地位。

在结束台中、台南之游，回到台北之后，吴钟善写了一首五古长篇《归自台南奉谢二林子并呈同游诸君》，诗曰：

吾生沦贫贱，好游苦无力。天假一舸东，邂逅毗舍国。声应气与求，挚交出新识。觥觥二林子，剧战骚坛特。大鹏击沧溟，天马脱羈勒。如我本散才，年时学不殖。牵率厕吟社，拈题银烛刻。入夜常见招，日日愁日昃。枯肠鸣春雷，饮以三斗墨。乘兴作南游，千里视瞬息。轻车走长蛇，吊古常伏轼。夕照万峯赭，飞烟千缕黑。逆旅敞轩窗，席地犹古式。劳我终日蹙，强项不可抑。矮几罗奇珍，刀叉不箸食。浑忘长途疲，侑酒有殊色。广幄丈又半，被大床不仄。仰卧酣谈谐，彻旦不容默。黄金买欢娱，天地破荆棘。我不费一钱，馋腹饫贪冒。巍巍赤嵌城，擎天何巖岩。霸迹倏已湮，崇碑巩不泐。缅怀一元子，国亡海外匿。殉节到妃妾，朱明王迹熄。绵绵天府腴，即今沦异域。凭吊一凄然，心伤鼻复塞。归途有余兴，白战互促迫。拈韵独首唱，宿耻负三北。冒险肆造攻，庶几一战克。顿师坚城下，猬缩复虫唧。是真退笔头，枉劳日拂拭。高谊何炯然，作诗罄胸臆。

虽然是对此次台南之行的总结，但作者却从他人台伊始起笔，“牵率厕吟社”以下六句，用相当幽默的笔调叙述了寄鸿吟社成立之初联吟迭唱的热闹景象。之后重点回顾了这次南游的全过程，先写搭乘火车之轻快、沿途风光之旖旎，再写途中宴饮谈谑之欢娱，然后由登览古迹自然转入对先烈的缅怀，诗歌的情绪也一变而为深沉感伤，“绵绵天府腴，即今沦异域”两句，出语平实，却格外动人心魄。整首诗糅合了吴钟善在台期间主要的文学活动和心理感受，既是了解吴氏本人旅台诗歌创作的提纲挈领之作，也可窥见寄鸿吟社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的基本活动情况。

四、寄鸿吟社的解散及其历史意义

相当长时期以来，在台湾古典文学研究视域之中，寄鸿吟社都近乎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于寄鸿吟社不置一辞。廖一瑾所著《台湾诗史》对寄鸿吟社也基本未

^① 林谦光：《台湾纪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有涉及，该书《台湾诗社系年》一节，录诗社二百余家，而寄鸿吟社亦不在其列。书中论及吴钟善与林鹤寿等，也不过是捋扯前人材料泛泛言之，着实令人遗憾。黄乃江所著《东南坛坵第一家：菽庄吟社研究》对寄鸿吟社有相对详细一些的介绍，但其视寄鸿吟社为林尔嘉在厦门鼓浪屿所倡立的菽庄吟社的衍生社团，却颇可商榷。^①实际上，寄鸿吟社与菽庄吟社有很大的不同。寄鸿吟社的核心人物林鹤寿是林尔嘉的从弟，但双方关系并不和睦，为争夺林氏家族财产还一度对簿公堂。^②因此仅仅从成员亲缘关系的角度，并不足以说明寄鸿吟社相对于菽庄吟社的派生性质。尤为关键的一点，是菽庄吟社成立于厦门鼓浪屿，而寄鸿吟社的活动环境，乃是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在文学生态方面，有根本的差别。日本在占领台湾以后，刻意笼络台湾本土文士，包括总督儿玉源太郎在内的日本汉学家热衷于在台湾倡办诗社，组织各种联吟活动，并积极拉拢台湾文士参与其中，台湾文坛的结社联吟风气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走向兴盛，在二十世纪初甚至出现了“诗社林立”的局面。但在繁荣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是日本殖民当局日益严厉的管制政策，以及以“击钵吟”为主要形式的游戏性质的诗歌创作风气的泛滥。林尔嘉之子林景仁在台北创设的东海钟声社，就是专作击钵吟的诗社。相比之下，寄鸿吟社并不打诗钟，游戏性的作品也较少。以吴钟善为例，如前文所言，他的《寄鸿吟社诗草》中命题限韵、联吟赓和的篇什虽多，但绝不入卖弄才学、炫耀辞采之俗套，多有借题发挥、寄慨遥深者，如《落叶》诗第四首之尾联“年来我亦栖栖者，万顷茫然一叶身”，有不尽家国情世之悲。何况集中原本就不乏《吊郑延平》《读魏公子传》那样从题材到内容都非常深刻而严肃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从上文的分析已确然可知，《寄鸿吟社诗草》之外的两卷《东宁诗草》，收录了吴钟善更多感怀今昔、于日本侵略者暗含揶揄而热切期待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可再以其《四十初度述怀》之第八首为证：

妖氛当日炽天槐，割地伤心失赤嵌。属国三城风不竞，遗民廿载恨犹缄。浮天远破鲲身浪，泛月初归鹿耳帆。懒向家人谋一醉，酒痕满渍旧征衫。

寄鸿吟社之得名，按照吴钟善的说法，是“匪卜渐陆之吉，用贞冥冥之踪”，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台湾当时的日本殖民统治坚定的不认同。而寄鸿吟社的核心成员，即所谓“寄鸿七子”，系由五位福建泉州籍诗人与两位台湾籍诗人所构成。前者由大陆渡台，强调台湾为中国固有领土而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浓重的家国意识，自在情理之中。林鹤寿、林柏寿身为台湾世家大族、第一巨富之子弟，而亦以“寄鸿”自命，可见其内心的反日情绪之高亢。林鹤寿有赠吴普霖之诗曰“相期各肝胆，千莫负吴钩”^③，后一句当用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诗意，显然有恢复之志。日本殖民当局自然不能无视板桥林氏在台湾无出其右的巨大影响力，因而一向刻意拉拢，但监控亦无所不在，还趁着林鹤寿与林尔嘉争夺家族财产控制权的机会，派遣里见义正等日本人介入板桥林氏的内部管理。这使得寄鸿吟社从一开始就处在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寄鸿吟社的活动持续了一年多之后，随着社长龚亦隳的逝世而消歇。当然，人事代谢仅是表象。《板桥林本源家传》中所录《林公鹤寿传》述及寄鸿吟社之解散曰：“诃奈日本统制当局对同胞使用汉文，悬有峻法。寄鸿诸子所作，又多系不忘君国、痛念家山者，禁网将及，宜有以避之。”^④是庶得其实。即此而论，寄鸿吟社的诗人们身处已“沦为异域”的台湾，不顾日本侵略者之淫威肆虐而大胆创作讴歌民族英雄、弘扬民族气节的爱国诗篇，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参见黄乃江：《东南坛坵第一家：菽庄吟社研究》第七章，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391页。

② 参见龚洁整理、政协厦门市鼓浪屿委员会编：《林家诉状（日文译稿）》，《鼓浪屿文史资料》（第十辑），2003年版，第73-82页。

③ 林鹤寿：《送柏施归泉州》，转引自廖一瑾：《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④ 王国璠：《林公鹤寿传略》，《板桥林本源家传》，林本源祭祀公业，1984年发行，第72页。

出世人世为家国 读书刻书亦人生

——林尔嘉及其藏书

陈红秋

(厦门市图书馆, 福建 厦门 361012)

摘要: 林尔嘉是享誉闽台的绅商界人物、诗人, 为人重孝爱国, 嗜好吟咏, 喜欢读书藏书。台湾光复后, 他回到台北板桥林家, 他的三姨太高瑞珠无偿捐赠了他留下的7820册顽石山房的藏书给厦门市图书馆。林尔嘉的藏书来源于家藏、自刻及购买, 具有清代诗文集多、涉闽台书籍珍贵等特色。

关键词: 林尔嘉; 读书生活; 藏书特色

林尔嘉(1876-1951), 字叔臧, 谐音菽庄, 是台湾著名板桥林家林维源的次子(长子林怀训早夭^①)。他出生在厦门溪岸陈姓大家, 本是抗英英雄陈胜元嫡孙, 名叫陈石子, 6岁时过继给板桥林家的林维源当继子, 后成为板桥林家的第五代继承人。曾投资倡办漳厦铁路、厦门电灯公司、电话公司, 创办捐助厦门师范学堂、厦门华侨女校、同文书院等。先后出任厦门保商局总办, 兼商务总理, 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 厦门市政会会长等。民国初年, 被举为国会议员、福建行政讨论会会长; 段祺瑞执政期间, 被聘为华侨总会总裁。^②

一、重孝爱国好吟咏

林尔嘉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富裕的绅商家庭, 却没有染上纨绔子弟恶习, 平生最重孝道。他的儿子林刚义在《林菽庄先生诗稿》的《先考菽庄诗稿发刊前言》中回忆: “先考叔臧公尝以‘忠孝’二字作庭训, 严示我辈, 必须终身遵守; 而先考生平所为诗文, 亦多以激发‘忠孝’为第一要义。”^③一直以来流传着一段有关林尔嘉的佳话: 56岁荣誉等身的林尔嘉怀念当年小时候陈家乳母石榴喂饭的情景, 跪求年迈乳母再喂饭一次。^④这张喂饭的世纪影像留存至今, 这样的故事反映了林尔嘉感恩不忘本的心态, 也直接体现了林尔嘉重孝义, 以身垂范的为人教育方式。

林尔嘉很爱国, 甲午战争, 清廷战败, 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 他不愿做顺民, 21岁的他有了自己的思想和选择, 他随父内渡, 终寓居厦门鼓浪屿。他明辨是非, 对时事有明确和坚定

作者简介: 陈红秋, 女, 厦门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① 龚洁:《陈石子是怎样变成林尔嘉的?》,《厦门图书馆声》2012年第5(总111)期,第23-25页。

② 陈红秋:《林尔嘉与〈菽庄丛刻8种〉》,《厦门图书馆声》2006年第(总)71期,第58-59页。

③ 林尔嘉:《林菽庄先生诗稿》//《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一辑》,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1-3页。

④ 陈光从:《陈林望族 两岸情缘》,《闽南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第133-137页。

的判断。袁世凯企图逆流而称帝，福建省很多位高权重的人举荐林尔嘉为福建代表，请他晋京呈奉拥袁为皇帝的“劝进表”，目光敏锐的他将来电撕得粉碎，立场坚定，决不拥袁。^①林尔嘉是个有骨气的血性中国人。面临洋人的欺侮，不逞匹夫之勇，深谋远虑，理性抗争十几年。于1929年印刷散发《为菽庄石桥被毁及私权横受侵害事谨告同胞书》，争取舆论支持，诉诸公堂，争取法律支持，为打赢官司，他让自己的儿子林志宽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最终保护了自己的权益。^②厦门沦日，他避居上海，杜门谢客，不愿屈膝媚日。他盼望抗战胜利，“黄龙待痛饮，啸侣歌太平”等诗文流露了心情。台湾光复，“还我河山偿我愿，登临更上几层楼”，即将回到了阔别五十余年的板桥林家，喜悦的心情，表达在《乙未割台湾，挈眷归原籍龙溪，五十有余年矣。乙酉台湾收复，余旅沪辄思回台，未能立即成行，感赋四绝志之》等诗歌中。

林尔嘉情趣高雅，能入世为官，为国家出力，也能出世，雅好唱和吟咏。1913年仿台北板桥花园，建筑了有名的菽庄花园，藏海补山，寓意深远，作为巧妙利用海景的江南园林，兼具传统与开放性，别具特色。他通晓英、日等语言，诗文兼修。1914年他雅集文人，成立菽庄吟社，影响了台湾甚至全国，可比肩当时上海的南社，吸引了闽台两地的大批文人雅士，留下众多诗篇和佳话。

二、把酒论文乐读书

自古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说，而经世致用之才林尔嘉却不避忌，赞誉崇尚“依然本色旧书生”，喜弄文事。他的原配夫人龚云环，就出身于泉州晋江书香望族龚家。龚家为翰林之家，林尔嘉岳父龚显曾是藏书家，中进士，授翰林编修，任过詹事府赞善。富绅商与书香门第联姻，可知林家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与肯定。

林尔嘉喜爱读书，读书内容广泛。“端居多暇，乃与社侣商量旧学，时或泛览诸子百家之书，旁及近人诗与古文辞，有会心处辄笺记之”。^③“每诵晋唐诗，想见其人焉”，喜读菽庄吟侣所作诗文，收到吟侣诗文，“日作快读，感不绝心”，愉悦、想往的心情溢于言表。林尔嘉曾自刻印《菽庄丛书》6种与《菽庄丛刻》8种，每当他收到新鲜出炉的书籍，都会研读，喜悦之下，写有《读〈菽庄丛刻〉感赋寄沈琛笙沈子石李绣伊三社友》《辛巳元月廿八日，消寒第七期，菽庄吟社寄到丛书第三种〈寄傲山馆词稿〉（傲樵所著），并读傲樵志盛志喜诗，答以一律》等。他也会读佛经，与小妾有“也曾学佛共读经”之语。

林尔嘉的生活离不开阅读。他在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建筑“顽石山房”，用以读书。避暑庐山，闭门谢客，“重理旧业，睡余功夫，时有曾益”^④，除了读书，也就是写诗了。将回板桥林家，喜言“还乡读我书”。在台北板桥林家，则布置了“味吾味斋”读书处，有“味吾味处求吾乐，不妨高卧养天真”诗句。

林尔嘉比较注重理性阅读。自言少年时，“虚牝岁月，殊为可惜”，40岁后，有志向学，清醒地认识到“顾心粗不能治经，才薄不能治史”^⑤，身经厄运，世事沉浮，见多识广，但却不欲纵谈时务，只想潜心旧学。“曾读枫桥夜泊诗，江村一字至今疑”，以怀疑的态度阅读，多有心得，留下《顽石山房笔记》，其实就是读书笔记，留下的“焚余诗稿”，江熙编入《闽四家诗》，其后人辑其诗稿编辑了《林菽庄先生诗稿》。

^① 陈红秋：《林尔嘉其人其书》，《厦门图书馆声》2009年第（总）92期，第47-49页。

^② 陈红秋：《私权横受侵害 敢与洋人叫板——〈为菽庄石桥被毁及私权横受侵害事谨告同胞书〉的故事》，《厦门图书馆声》2015年第2（总126）期，第46-49页。

^{③④⑤} 林尔嘉：《顽石山房笔记》，1942年铅印本。

林尔嘉读书，讲究方法与实用性。吟侣的新鲜诗文，“日作快读”，或恭敬地“焚香百读”。要至欧洲游览，则读《环球地球新录》。《菽庄丛书》的新书来了，则“且浮大白读新书”，真是把酒论文乐读书。

三、散尽黄金半买书

爱读书的人，必注重藏书。沈琇莹在《顽石山房笔记》的序言中写道：“菽庄主人尝语琇莹曰，‘少年时，好为无益之事，载籍极博，不喜涉猎’”^①，笔者认为，“载籍极博”当指林家藏书广博。《顽石山房笔记·汲古阁歌》曾提到“予故家在东宁板桥，其中汲古书屋颇有藏书”^②足以证明。关于林尔嘉藏书来源，学者江林宣《菽庄吟社与林尔嘉藏书》认为林尔嘉顽石山房的藏书部分来源于林维源内渡时所带回的板桥林家的书籍。“先子尝为吕西村先生刻书于此（汲古书屋）。较之毛氏汲古阁，未免自伤寒俭。甲午之役，又散佚殆尽。”^③笔者以为，《汲古阁歌》中的这段话，可以佐证林维源汲古书屋藏书散佚，部分流传至菽庄花园顽石山房。除此之外，顽石山房藏书来源还有二：一是自著、自刻书，如上述的《顽石山房笔记》《菽庄丛书》《菽庄丛刻》等。二是自购书。林尔嘉成长于家道殷实的绅商家庭，想要购书不在话下，颇带点自夸的“平生也解惜三余，散尽黄金半买书”的诗句当为明证。

“林尔嘉父子都极喜欢收藏古董、金石和图书。他家从台湾内渡时，就带回不少文物图书。单就图书而言，顽石山房的藏书至少有万余册。”^④林尔嘉的藏书至少上万册，这是江林宣先生的判断。因为后来林尔嘉回到台北板桥林家，留下的书籍，由其三姨太高瑞珠于1957年3月27日无偿捐给了当时的厦门市图书馆鼓浪屿中山图书馆，共计700种7820册。这批书大部分为线装书，钤“菽庄赠书”朱印。据笔者揣测，林尔嘉读书处有多个，明确的有菽庄花园的顽石山房，板桥林家的味吾味斋，他还曾居住上海十几年，经常到庐山度假……爱读书的林尔嘉应该都会在这些地方置办读书处。顽石山房藏书至少上万册，其中近8000册捐给厦门市图书馆，那么带到板桥林家及后来购置的呢？由于资料有限，无从得知，但林尔嘉在板桥林家的藏书至少应该也有个可观的数目。

谈及赠书特色，据报载，其所捐书籍“有不少是明朝的版本和抄本手稿，其中有虞世南辑的《北堂诗钞》、彭兆荪著的《小漠觞馆文集注》、徐坚著的《初学记》、归有光搜集的《诸子汇函》、梅鼎祚辑的《书记洞诠》等一百六十二本；还有《闲诗纪事》《三山志》《天池草》《菽庄观菊》《南北史摭华》等手稿和抄本等五十一本”^⑤。笔者进一步总结了如下几点特色：

1. 赠书经史子集丛都有。这批赠书“有中外文资料，内容涉及各学科门类”。^⑥笔者参加古籍普查平台著录，利用平台著录的钤印线索，辑录了一份馆藏林尔嘉古籍赠送书目，至少有138部2593册（发现有些古籍钤印漏著录）。其中经部26部324册、史部23部333册、子部7部66册、集部52部396册、类丛部29部1473册、新学1部1册。

2. 珍贵古籍不少。明代湛若水撰的明嘉靖十二年（1533）陈陞刻本一百卷的《圣学格物通》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珍贵古籍有明正德十一至十四年（1516-1519）刘洪慎独斋刻十六年重修本《文献通考》（存36卷）、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刻本《临川先生文集》、明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597-1599）汝南郡刻本《书记洞诠》、明天启（1621-1627）刻本《诸子汇函》、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晋安郑开极刻本《石斋先生经传》、清康熙刻雍正补修本《文章练要》、清乾隆

①②③ 林尔嘉：《顽石山房笔记》，1942年铅印本。

④ 江林宣：《菽庄吟社与林尔嘉藏书》，《福建图书馆学刊》1996年第2期。

⑤⑥ 佚名：《林菽庄夫人高瑞珠献出珍藏书籍七千余册》，《厦门日报》1957年3月27日第2版。

十三至十四年（1748—1749）万卷楼刻本《春秋大事表》、清抄本〔淳熙〕《三山志》等。

3. 闽台特色古籍有价值。林家闽台两地都是有声望的家族，藏有不少闽台两地内容的古籍，如蓝鼎元《鹿洲全集》等，其中以吕世宜手稿及真迹最具价值。吕世宜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名重闽台两地的文学家、书法家、金石家，曾为板桥林家西席，林尔嘉藏有他的《爱吾庐书课》《经传子史集览》等手稿，《西汉古镜记》《火神庙记》《吕母墓志铭》等书法真迹。

4. 清代诗文集多。古籍赠书中集部达52部，是种部数最多的，这与林尔嘉喜好诗文的兴趣，是一致的。其中唐宋明人诗文集10部，清代诗文集42部，有侯方域的《壮悔堂文集》、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吴伟业的《梅村集》、袁枚《小仓山房文集》、洪亮吉的《洪北江全集》（79册）、纪昀的《纪文达公遗集》、顾炎武的《亭林文集》、钱谦益的《初学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等。

5. 类丛部古籍册数最多。类丛部古籍都是大套书，类书有《渊鉴类函》《玉海》《古事比》等。上百册的汇编丛书有《昭代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自著之属的丛书有《春在堂全书》《曾文正公全集》等，后者有2套。

闲暇时，读书藏书吟咏，是林尔嘉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寻找其脉络，则看到他的别样精彩的人生。

（责任编辑：林日杖）

（上接第66页）

文节集》卷三《乞休再疏》）。因此，即使是认识到时局已不可挽，政事已不可为，依然坚持以乞休的形式结束仕宦生涯，而不愿“不辞径归”，这一方面是想全身全节而退，体面地归乡，另一方面也是“欲以纲常令共之大道理，捍兹已决之隄防，而以去留操纵之大辔衔，归之至尊之掌握”^①。因为在恪守礼义、感激皇恩的李廷机心中，得到圣命告老还乡，既保全臣子之义，又彰显皇权之威，这才是正常的致仕程序。在“非常”的政局中坚持正常的致仕程序，过程必然是曲折而漫长，乞休而难休。

李廷机入仕途三十年，“生平孜孜砢砢，惟以忠君爱国济人利物为事”（叶向高《祭李九老》）。他为人谨慎持重，恪守礼节，寡交慎言；他人阁时已经60多岁，从政经验丰富，处事能力突出。但在明末危局中，依然被卷入万历时期的党派之争，在人言纷至、年高体衰的处境下，不得已多次乞休，多年乞休，虽有明哲保身之嫌，但他的经历与选择，在晚明诸多大臣仕宦生涯中具有一定的共性，前文提到的赵志皋、沈一贯、朱赓、叶向高等阁臣都曾因故多次上疏乞休，这是政治生态恶化的信号，也是晚明士人仕宦困境的写照。

（责任编辑：林春香）

^① 李廷机万历四十年正月初五日《乞放疏》，《李文节集》卷七误作“万历三十年”。

谢肇淛游踪年表

张明琛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谢肇淛是晚明代表作家之一。《小草斋文集》所载游记多达三十六篇, 谢肇淛的游记在晚明自成一家。研究谢肇淛的游记, 得先弄清楚他的游踪。游踪一类的年表过去似没有人作过。撰表的方式有点类似普通的年表。不过通常的年表载述的是谱(表)主一生的各种事迹、交游、作品和著作等方面。本表不作面面俱到的载述, 仅仅载述谱(表)主的行游踪迹和相关的游记作品; 而为了使描述谱(表)主的行游踪迹所有据, 有时也适当交代其行游踪迹的背景, 如上春官、官职的变动等。

关键词: 明代文学; 晚明作家; 谢肇淛; 游记年表

谢肇淛(1567-1624), 福建长乐人, 居会城福州已经十多代。父谢汝韶, 家福州朱紫里。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举人。授钱塘教谕, 历右府左长史, 有《天池山人存稿》。肇淛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 二十年(1592)进士, 授湖州司理、历东昌司理, 短暂任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 转都水司郎中, 督理北河, 驻节张秋; 又以水部郎镇桃丘, 授正郎。水臣秩满, 擢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兼金事分巡金沧道。擢广西按察使, 晋广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有《小草斋集》《小草斋文集》《五杂俎》《北河纪》《永福县志》《鼓山志》《支提寺志》《太姥山志》《长溪琐语》等。

《明史》称谢肇淛与邓原岳、徐火勃、曹学佺等重振风雅。曾与三山(福州)诗人结红云社、泊台社、春社。晚明闽中诗人曹徐谢鼎立, 曹为曹学佺、徐为徐火勃、徐燧兄弟, 谢即谢肇淛。肇淛诗风韵婉逸, 清圆俊朗, 为一大家。谢肇淛还善书, 世人以为其书法作品宝逾珠翠。当今多种明代诗歌史或晚明诗歌论著均对谢肇淛有较高评价, 而其文很少人研究, 游记更少。检《小草斋文集》, 谢肇淛游记共计三十六篇, 其中上春官一篇, 山东、京城五篇, 江浙、安徽、江西九篇, 赴滇任途中及滇中所作九篇, 余下的十二篇作于福建本省, 占三分之一。

要研究谢肇淛的游记, 得先弄清楚他的游踪。为了较仔细地了解谢肇淛的游踪, 我们尝试作《谢肇淛游踪年表》^①。游踪一类的年表过去似没有人作过。撰表的方式有点类似通常的年表。不过通常的年表载述的是谱(表)主一生的各种事迹、交游、各种作品和著作等各个方面。我们这个《游踪年表》不作面面俱到的载述, 仅仅载述谱(表)主的行游踪迹和相关的游记作品; 而为了使描述谱(表)主的行游踪迹所有据, 有时也适当交代其行游踪迹的背景, 如上春官、官职的变动等。大量纪游诗固然也与游踪有关, 为省篇幅, 本表则不加载入, 但据其内容, 另用自己的文字表述。此表所载游记, 不注出处; 出处请参见本人另撰的《谢肇淛游踪与游记》一文附录本《谢肇淛游记篇目表》(未刊)。

明穆宗朱载堉隆庆元年丁卯(1567) 一岁

七月二十九生。

作者简介: 张明琛, 男,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台湾铭传大学讲师。

^① 本表参考陈庆元《谢肇淛年表》,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 十九岁

是岁，王世懋为福建提学副使，拔第一。

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 二十一岁

是岁，与徐燧执经事顾大典；大典试士，首列廩于学官。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二十二岁

是岁，与徐燧同成举人。

十一月，与徐燧一春官赴京，舟次小箬溪、泛剑津，越何岭、塔岭、仙霞、西阳诸岭，次龙丘。登富春山，过武林；过姑苏，访王稚登。于云阳（南徐州）与徐燧守岁。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 二十三岁

元月，元日，泊舟京口。二日，由京口过扬子江。三日，过邵伯埭。六日，经淮阴拜漂母庙。八日，过下邳。十日，过彭城；在彭城见一异镜。十九日，发彭城。廿日至沛，廿一日，渡沙河。廿三日，宿汶上。廿四日，至阿。廿七日，过恩县，暮抵德州。廿八日，过景州。廿九日，宿河间府城下。

二月，二日至郑州，试期益逼，穷日而驰，即有古迹，应接不服。三日至涿州，四日过潞河，日昃入京师。

三月，下第，十六日，离京师，是日宿良乡。十七日，至涿州。十九日，至河间。二十一日至德州。廿三日至阿，登管子三归台。廿四日入兖，二十四日，过邹，低回孟子祠下，夜至滕。廿七日至彭城。

四月，六日过淮阴，题诗漂母庙中。九日，抵瓜州，步至口边观豚戏。十日，渡江。十一日，至毘陵。十二日，陟虎丘。十四日，有娄江之役。十六日，宿吴江顾先生家。二十日，至武林，游西湖，泛舟湖心亭下。拜岳武穆坟。登六和塔，题壁。廿六日，过严陵台。廿八，日泊兰溪，

五月，二日，抵清湖。四日，发清湖，五日，过江郎山，越仙霞岭。六日，至浦城，岭滑甚。七日，在浦城观龙舟。八日，登舟。十日抵建宁（今建瓯）。十一日，过黯淡滩。滩巨险；夜泊吉溪。十二日，至困溪，夜泛白沙。十三日，至家。

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 二十四岁

九月，登鼓山，作《鼓山赋》及诗。

十二月，与陈汝大、陈汝翔、陈振狂、徐燧、徐燦往南台藤山看梅。

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 二十五岁

元月，登九仙山、万岁寺、钓龙台；陈椿等过斋头，观灯，谒马森祠。

九月，望离家，上春官。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 二十六岁

三月，在京城，成进士。

八、九月间，南归：过河间、经古道、东平遇雨、登阿城；过邵伯、舟泊扬州，九日抵兰陵。

九月，入闽，到家。

十月至十二月，拜吴兴司理。

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 二十七岁

三月，在湖州任。登岷山。

四月，游玉磬山怀故乡。到临安，作《游西湖四记》。

五月，入钱唐，作《游雷峰记》。

七、八月间，新病，拟游道场山，以雨作不果。

九月，登岷山怀往岁石鼓之游；登道场山。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 二十八岁

春，登爱山台，过王村禅寺。

十一月，望夜同徐燧碧浪潮看月

十二月，除日，自樵李归省。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 二十九岁

二月，往余杭。

三月，次盐官县。登盐官秦径山。

七月，有钱塘松陵之行。

九月，与邓原岳游道场山，过孙一元归云庵。作《游道场山记》。十月至十二月，先是拟与徐火勃游岷山，以幼弟殇，不果；旋即与徐火勃、顾长卿、世卿游之，作《游岷山记》及诗。

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 三十岁

元月，同郑琰、陈价夫钱唐孤山寻梅。同郑琰、白仲游净慈寺。

五月，与郡寮登黄龙洞。于吴兴作《游黄龙洞记》。七、八月间，汪肇郃招游法相寺，偕郑琰诸子游龙井，游灵隐寺、虎跑泉、登吴山三茅峰。偕陆履素转运、郑琰山人登北高峰，游天竺寺。偕郑琰、震卿、陈价夫、钱象先登南高峰。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 三十一岁

四月，道场山访僧不值。

九月，九日郑琰兄弟邀登南高峰。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 三十二岁

三月，游虎丘、过寒山寺、游慧山寺、登镇江金山、弘济寺、雨花台高座寺、登真州城楼。夏，与藏懋循、袁中道真州游天宁寺，銜江舟夜听雨。

九月，三日，同真州诸子闲步江边。

十月，游黄山，作《游黄山记》及游山诗。游白岳，作《游白岳记》。

十二月，重游天宁寺，作《重游天宁寺记》。

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 三十三岁

二月，离真州入都，调东昌司理。

三月到京。

四月，京郊行。是月或下月入东郡。

七、八月间，登青州城。

九月，游杜陵池。登泰山，作《登岱记》及诗。

九、十月间，登太白楼。

冬，行部棣州诸邑。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 三十四岁

元月、二月间，在东昌司理任。行部诸邑。到郟城，登光岳楼。

三月，在郟城，见桃杏诸花。

九月，在卢县道中，至历下。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 三十五岁

秋，在东昌司理任，登青州云门山，过希夷洞，登超然台，行次大岷。

十一月，客青州。

十二月，除夕，客平原。

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 三十六岁

七月，怀吴中诸友。初度客清源。

十一月，有东莱之行。早发肥城。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 三十七岁

三月，新甫道中。

五月，游方山灵岩寺。作《游灵岩寺记》。

六月，往蛇丘。

九月，登济南华不注山。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 三十八岁

三月，往郟城。

夏，饮朱太守园中。

夏秋间，梦武夷。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 三十九岁

是岁，擢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欲求归省，未果。

三月，往郟城，归途，登峰山，作《登峰山记》及诗。迁南比部。

四月，经阙里，作《游阙里记》。

秋，在金陵，游莫愁湖。集王园。集秦淮水阁。

九月，九日清凉台征会，登高，遂至乌龙潭吴园，共二十三人。雨花台送梅子马。

冬，谒宋监门郑侠祠。登朝天宫。

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 四十岁

三月，集南京木末亭

四月，泛秦淮。发金陵，经滁、平原、临城等。

六月，至京。

七月，回南京，夜坐燕子矶；登金山寺。过吴门，过吴兴重游岷山。登上方寺望太湖。过闽
 赣分水关，雨中过武夷山，由建溪至大横驿。于剑浦放舟，过困溪，至芋江驿。抵家已八月。

八月，报转司马郎，不之官。

十月，父汝韶卒。

十二月，除日，过积芳亭。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 四十一岁

是岁，家居。

六月，过千佛殿石上乘凉待月。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 四十二岁

元月，上元日，游福州西湖镜澜阁。

五月，与徐火勃、马欵、陈价夫等结红云社，作《餐荔约》。

八月，与徐火勃、周千秋、蒋子才游鼓山。

是岁，作《鼓山志》新稿。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 四十三岁

元月，二日，与丘伯几过镜澜阁。

二月，由会城福州出发，与周千秋、崔世召过白鹤岭、罗源白塔废寺，游泉庵、玉湖庵、金峰庵、游太姥山。谒太姥墓、游国兴废寺、宿摩霄庵、迭石庵，望仙桥、圆潭庵。作《游太姥记》。

三月，太姥山归，过宁德，与周千秋游霍童山支提寺，作《游霍童记》。回会城。

四月，补工部屯田司主事，转员外郎，管节慎库。北上，经困溪、建州，往武夷。

五月，游兴田驿元真庵。与周千秋、徐火勃、蒋子木等游武夷。作《游武夷山记》。由武夷入江西铅山，游铅山石井寺。冬，除夕前三日，拜屯田郎。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 四十四岁

是岁，在京，任工部员外部。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 四十五岁

二月，转本部都水司郎中，督理北河，驻节张秋。

三月、四月间，以屯田持节归里，过圯桥、桃源、淮阴、露筋祠、度钱塘、过紫岭，经崇安、下建溪。

五月，二十三日，到家。

八月，新筑泊台成，招社友游，与会者十五人，作《泊台社集记》。

八月至九月，与潘从参、徐火勃、陈鸣鹤、王昆仲、林元达、林叔竇等七人，仆二人由洪江往游方广岩，便道谒宋陈襄、明王偁故居及陈襄古灵祠庙，有诗。于永阳（今永泰）九天岩怀陈益祥。作《游方广岩记》。

九月，与马歙、徐火勃、郑正传、吴雨、周千秋等游圣泉寺。作《游圣泉寺记》及诗。

十月，与徐火勃、吴雨等游雪峰寺。游鼓山白云洞。作《游雪峰记》、《游鼓山白云洞记》及诗。

十一月，八日，与徐火勃等游金鸡山；既望，又同游升山。作《游金鸡山栖霞庵》《游升山记》及诗。

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 四十六岁

元月，过神光寺。与徐火勃等游宿猿洞，作《游宿猿洞记》。

春，与诸友集积芳亭。又与云郡守喻政、徐火勃等集桑溪禊事，作《桑溪禊饮序》及诗。

四月，与徐火勃等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作《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记》。又集越山庵。

八月，十六日发，北上。过南昌，游滕王阁怀、铁柱观，过徐桥徐孺子故居。至九江，游东林寺，作《游东林寺记》。从浔阳渡江。

九月，六日，至黄梅；九日，寓太湖。又过桐城、舒城汉文翁故里。渡淮河、宿州风沙、重、过符离渡、过彭城、亚父冢，入齐界、滕阳晓发，谒孟庙、渡汶河，过平原，至桃丘。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 四十七岁

是岁，以水部郎镇桃丘。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 四十八岁

四月，以河臣职，护送福藩，作《护送福藩行记》。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 四十九岁

春，由桃丘浮舟至淮，过下邳黄石公庙、淮阴、彭城，抵吕梁。

四月，在安平。

夏，授正郎。

秋，欲到天津望海，风雨不果。

冬，至北河、清源。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 五十岁

春，发安平。

夏，归家。

八月，游永阳山水，作《游永阳山水记》及诗。

十一月，北上，渡江。

十二月行至德州、除日客河间。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 五十一岁

元月，客河间。

五月，莲华庵避暑

是岁，视屯田篆，在京参与祭山陵。作《山陵记》。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 五十二岁

秋，擢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兼佥事，分巡金仓道。赴滇参藩滇南。

九月，八日，风雨作，憩安德。于荏山遇雨，东平山行，过邹鲁，过彭城、凤阳。

冬，久滞信州。腊月发信州，翌年三月至滇。作《邮纪七十七首》。入滇行踪如下：信州，兴安，弋阳，贵溪，安仁，东邻，进贤，查溪公馆，丰城，新喻，分宜，袁州、萍乡，醴陵，荷塘，长沙，宁乡，益阳，龙潭驿，龙阳，武陵，桃源，郑家驿，新店，界亭，马邸，辰州，船溪，辰溪县，山塘，怀化，罗旧，沅州，便水，晃州，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兴隆，平越，新添，龙里，贵阳，威清，平霸，安顺，安庄，关岭，顶站，安南，新兴，普安，亦资孔，平夷，白水，曲靖，马龙，易龙，杨林，板桥，滇城，安宁驿楼，禄月表，禄丰，广通，楚雄，吕合，沙桥，普溯，云南，定西岭，赴州，大理。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 五十三岁

二月，过湖南桃源县，作《游桃源洞记》；过新息亭，作《新息亭记》；过辰州，作《辰州诸洞记》；过镇远，作《镇远诸洞记》；又作《双明碧云二洞记》《宁碧玉泉记》《青华洞记》。

四月，游鸡足山，作《游鸡足山记》记及诗。

六月，观火把节。

七月，西洱河观舟戏。

十一、十二月，东北行部，过观音山驿、鹤庆道中望雪山、过鹤庆、饭鹦哥铺、宿金沙江、渡金沙江、过顺州、北胜州、宿达旦哨，过宾川州、乌龙坝。作《东北行部记》。

万历四十八年、明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庚申（1620） 五十四岁

三月，北上入贺。四月过乌撒；五月，寓阁鸦，客路濂，夜虎入室；六月，渡长江；七月，渡河。北上途经：禄丰、松林驿、炎方驿、沾益、傥塘、可渡驿、乌撒、瓦甸、黑张、七星关、周泥、毕节、归化、阁鸦、金鸡、奢香、水西、谷里、六广、龙场、阳明洞、沙木站、乌江、遵义、三渡关、龙泉、路濂、思南坡、武陵、竹林寺、江陵、张居正故居、襄阳、南阳、博望、叶县、襄城、新郑、郑州、渡黄河、卫辉、邺城、丛台、顺德、滹沱河。九月，光宗薨。

十至十二月间回滇。途经：定州，黄河，巩县，洛阳，陕州，鼎湖，潼关，渭水，泾水，咸阳，马嵬，秦岭，栈道，梁州，武关，褒城，五丁峡，朝天岭，阆中，安岳，泸州、永宁。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元年辛酉（1621） 五十五岁

春，参藩滇南。渡澜沧江，登永昌城。

夏，擢广西按察使。别滇。

夏、秋间，过杉关入闽归家。

九月，在福州，过积芳亭。曹学佺招同社友石仓园登高，主客十余人。离闽，之粤西。

十一、十二月间，到桂林。

天启二年壬戌（1622） 五十六岁

元月，在广西按察使任。

秋、冬间，游七星岩栖霞洞。

天启三年癸亥（1623） 五十七岁。

春，晋广西右布政使，寻晋左布政使。

秋，登尧山。

天启四年甲子（1624） 落五十八岁

是岁，大计，行至至萍乡，卒于官邸。

谢肇淛出游的原因，和明代绝大多数士人差不多，一是游赏家乡所居地及周边地区的景观；二是仕宦之地及周边的景观；三是上春官及赴任所途经及周边的景观。谢肇淛的游踪除了上述三个方面，还有一次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避谗真州，与友朋避暑，集天宁寺（故是冬有《重游天宁寺记》之作）；友人潘之恒邀其游黄山和白岳山。这次出游在点偶然，他却为我们留下《游黄山记》和《游白岳记》，就游记而言，是“意外”的收获。明代黄山题咏和游记很少，故谢肇淛这篇《游黄山记》便显得比较重要。还有一次有计划的出游，即万历二十七年（1609）春游宁德霍童山支提寺和福鼎的太姥山。

万历二十七年（1609）游霍童、太姥，除了两篇游记之外，谢肇淛一路还作了许多纪游诗，这些纪游诗一方面可以和游记互证，相互发明；另一方面，亦可补游记之不足，特别是一路的行踪。一般说来，纪游诗都是路途所作，故较多采用近体诗的形式，短小易作，随处可作。游记则不然，必须等到这个行程走完，再对过往的所见所闻加以回顾、整理、去取和概括。所以纪行诗有类于游记最初的写作素材、或者写作“笔记”。上文我们提到谢肇淛由信州（今江西上饶）入滇一路所作的《邮纪诗七十七首》，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组大型组诗每个诗题基本都是地名，将这些诗的地名连缀起来就是谢肇淛的入滇游踪，把各诗的内容连缀起来，便是一篇韵文的“游记”。我们推想，也许谢肇淛在入滇途中，已经有所规划，准备入滇之后如果稍得闲，作一篇《入滇记》亦未可知。

万历四十八年（1620）暮春，北上入贺。谢肇淛由云南出发，途经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到北京。九月，光宗薨。冬，谢肇淛由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四川回滇。往返都作了很多纪行诗，由此我们才知道他的行踪游迹。云南到北京，返程道途比往程难险，但是路程可能会略短一点，如果抛开急于赶路的因素（一般说来归途会比较从容），谢肇淛的出发点是往返尽可能不走相同的路线，这是老于行旅者通常的选择，不同道途，可以看见更多的风光，考察不同地区的文物古迹，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何况，越秦岭，循栈道而行，过梁州、武关至阆中，古称蜀道难，谢肇淛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一机会。此时他已经年过半百，而游兴仍然浓厚不减当年。

谢肇淛入滇后进入了升迁的快速道，四五年间由左参政，迁至左布政使，由云南调往广西。广西本为山水窟，谢肇淛以他生花之笔，估计写的作品也不会太少。我们今天见到的诗文集，粤西的作品很少，诗只有数篇，游记连一篇也没有。我们推测，天启元年（1621）谢肇淛升迁广西归省，可能就是这一次他把滇中的诗文稿带回家，因此，他的子弟编集时这部分相当完整。天启四年（1624）大计，谢肇淛病故于江西萍乡途中，广西诸作亡佚殆尽。我们也就不太知道他在桂林等地的游踪，看不到他的游记（同样是闽人，同样在粤西任职三四年的曹学佺，他在粤西写下的游记多达三十篇，因此我们推测谢肇淛应也写过一些粤西游记），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责任编辑：丁翔）

序两篇

陈庆元

王振汉《廉隅清节蒋孟育》序

一九九六年，我的《福建文学发展史》出版，此书论列的是福建历代重要的作家、流派和讨论某些区域文学史全局性的问题，挂一漏万。今天称作闽南的漳泉两地，进入重点研究视野的不过欧阳詹、王慎中、李贽数人而已，而且是浅尝辄止。《福建文学发展史》脱稿之后，我着手研究的是晚明晋江作家黄克缙，其《数马集》刻本传世极少，一九九七年由广陵书社影印出版，由我撰写前言。龙溪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为经世致用之作，颇受海上交通史家的重视。早年我治六朝文学，曾在郑州大学古籍所见到一部张燮《七十二家集》（有残缺）影印本，故对张氏有较多的留心。一九九九年，沈葆楨后人、台大沈冬教授，在李亦园教授的带领下，到泉州研讨泉州学，席间，我请沈教授代为留意藏在台北的《群玉楼集》。沈教授是位有心人，回台不久，便为我影印邮来，让人感动不已。《群玉楼集》是现存张燮诗文集最晚的一部，之前所作、流传至今的还有《霏云居集》和《霏云居续集》，部分留传下来的还有《藏真馆集》。以个人之力，搜集张燮诸集费时费力，依我的个性，既然对张燮的研究有兴趣，开了头，一定要坚持下去。张燮的研究有一个较庞大的计划，包括全集的整理、年谱长编、以张燮为主的漳州玄云十三子研究等等。年谱长编和“十三子”的研究，涉及到上百位晚明泉漳人物，特别重要的也有二三十位。于是，又得着手搜集相关的别集，读方志。“十三子”的别集，除了张燮的数种，迄今见到的只有郑怀魁的《葵圃集》、高克正的《木天遗草》、陈翼飞的《长梧集》和蒋孟育的《恬庵遗稿》数种。当我得知台北藏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恬庵遗稿》影印本，欣喜若狂：一则蒋孟育是出生在龙溪的金门人，《金门志》有传；二则蒋孟育之集为张燮所编，张氏并为之序；三则此集多达三十六卷，收录了许多与泉漳人士往来的书牍和诗歌，内容十分丰富。

研究张燮不能不读蒋孟育的集子，不能不对蒋孟育有较多的了解。但是限于精力和时间，对蒋孟育的研究，肯定不可能像研究张燮那样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甚感遗憾。恰好这几年投到我门下的博士生有好几位来自家乡金门，出于对故乡的热爱，他们的选题多不离金门古代近代文学和文献。在金门的博士生中，王振汉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是中文系、所，古文基础相对其他同学好。蒋孟育的《恬庵遗稿》没有整理过，没有标点本，研究几乎处在空白的状态，无所傍依，没有较好的古文基础，绝对作不了这个课题。经过审慎考虑，我建议振汉领走这个课题。蒋姓在金门户籍数很少，蒋孟育的名字在金门也很少人听说过，更遑论读《恬庵遗稿》了。大家都知道蔡厝有蔡复一，知道蔡复一卒后赠兵部尚书，却不知道浦边有蒋孟育，不知道蒋孟育卒后赠吏部尚书；蔡复一（部分）文集有学者整理研究，蒋孟育的研究在王振汉之前没人问津，相差也太大了！振汉从事蒋孟育的研究，张皇金门历史文化，发掘金门文献，经过数年努力，完成了研究蒋孟育的博士论文，同时还完成了《恬庵遗稿》的标校工作，振汉将两者合而为一，名曰《廉隅清节蒋孟育》，获得金门县文化局补助，即将出版。此书出版之后，相信蒋孟育在金门不再寂寞，相信更多人能知道《恬庵遗稿》。读《恬庵遗稿》，振汉功莫大焉！

其实，蒋孟育在金门不太为人所知，也有它的原因：林豪《金门志》卷十《人物志》二《蒋孟育传》曰：

蒋孟育，字道力，号恬庵；浦边人。入龙溪庠，万历戊子举人，己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终养归。起补，历国子监祭酒、南吏部侍郎。古心谦德，无贵态；操守廉洁，始终如一。在吏部时，其子履决，不能补，相视笑曰：‘吾父子何贫也。’终以清节著。卒，赠尚书，赐祭葬，谥“文介”，祀乡贤。所著有《台阁文献选粹》等书若干卷。

“入龙溪庠”四字，隐约道出其缘由。蒋孟育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金榜题名，然《龙溪县志》《南靖县志》《漳州府志》或说他是龙溪人或说他是南靖人。张燮《通译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恬庵蒋公行状》一文则明确说蒋氏“其先为同安之浯洲人”，则孟育为金门籍无疑。据振汉考证，孟育之父嘉靖间移居龙溪，以《毛诗》教授诸生，孟育当出生于此地。孟育之父早年离开金门，孟育也不是出生在金门，蒋姓在金门又不是大姓，故金门人知之不多，也就情有可原了。

蒋孟育父移居龙溪，孟育生于龙溪并“入龙溪庠”，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金门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发展（无论是内陆、台湾或者南洋），我们都不要忘记他们。金门乡先贤中还有一位入了他籍而成了进士的重要人物林鈇。鈇，字实甫，号鹤台，瓯隩人。由龙溪籍举万历四十年（1612）乡贡，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历国子监司业，迁祭酒监。现在金门当地知道他的人也不是太多。在大家的记忆中，许癩是会元，廷试二甲第一名，如果从廷试的名次看，林鈇的一甲第三名还略高于许癩。林鈇这位以他籍举乡贡、廷试进入一甲的金门人，似乎也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应当让金门民众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往昔旧志，大多讲金门人从哪里来，较少讲金门人又到哪里去；讲内陆的官员在金门的建树，很少讲金门籍的官员在内陆的作为；讲金门人内陆的座师是谁，很少讲金门人在内陆有多少故吏门生。振汉进行田野调查，在漳州市区发现一座“两京馱历”蒋孟育的牌坊，这座牌坊系明崇祯四年（1631）、即蒋孟育卒后十二年所立。我们知道，蒋孟育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会试分考官、三十四年（1606）为浙江乡试主考官，这座牌坊为孟育的门生故吏所立，门生故吏都是当时游宦于福建会城、泉漳和莆田的地方官员，包括龙溪县知县徐耀、同安县知县曹履泰。振汉对建此座牌坊的蒋孟育门生故吏作了一一考证，蒋孟育在内陆培养了这么多的人材，实在不简单。蔡复一晚年任贵州巡抚并节制四川、云南、湖南临近贵州的郡县，以羸弱之躯统帅三军，病卒于军中。过去的文学史，总是说蔡复一尽弃其学而学竟陵。钟惺且不论，万历四十四年（1616）蔡复一驻守辰阳，时为诸生的谭元春拜蔡为师，蔡为之延誉。此后十年，谭元春始终执弟子之礼。蔡复一卒，谭元春连续作《送少司马蔡师闽衬文》（《谭元春集》卷二十六）、《武陵侍少司马中丞师祭公黔衬五首》（《谭元春集》卷十四）、《敬夫师易名祭葬后未即入闽展拜伤怀作歌》（《谭元春集》卷十二）以吊之，师生情谊之深，读之令人动容。

我一向主张研究一位历史人物，如果他有诗文集和相关著作，应当从标校诗文集入手，从研读其著作入手。当代某些所谓学者专家，研究历史人物，不读相关的诗文集及其著作，而是忙于搜集当代的研究论著，从中摘取他认为有用的“材料”，连缀成文成书。我建议振汉，如果有可能，趁便标校《恬庵遗稿》。刚开始，振汉觉得“头大”，当他进入研究的实质阶段，反而受益甚多。上文说过，蒋孟育的集没有整理本，附在振汉论文之后的标校本，也就成了世上第一个标校本。别人读博，完成的是一篇论文，是一个成果；振汉完成的，实际上是两本书：一本论文和一本古籍整理著作，是两个成果。我坚持这样要求学生，有好几位学生也照我说的去做，但是真正落实出版的，目前也就只有振汉一位。研究古代文史，必须先读懂古书；要读懂古书，必须从句读开始。谁想绕过这一关，谁就会吃苦头。当然，振汉初次作标校工作，也许未必尽善尽美，但有了这第一步，将来可能会越做越好。

蒋孟育研究工作虽然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还是认为振汉的研究工作尚未完全结束。《金门志》著录蒋孟育的《台阁文献选粹》，此书一般都以为失传了，我以为不妨继续查找。明兴，台阁文风鼎盛，历二百五十年之久，蒋孟育编台阁文粹，有无重振台阁诗文雄风的用意？振汉还考得蒋孟育或注或评的两种骆宾王的文集，并且得知这两种著作都藏于日本。在信息非常发达的今天，获得这两

种文献似乎不太艰难。崇祯间，龙溪张燮整理包括骆集在内的初唐四子诗，不知蒋、张的喜好是偶然的巧合，还是闽南人对初唐诗有所偏好？种种问题，似都可以加以探究。

振汉这部《廉隅清节蒋孟育》的著作得到金门县文化局地方文献项目的补助，即将出版。文化局推出这个补助项目，凡是喜爱金门地方文献的专业或业余的文史工作者，无不以手加额，以为吕坤和局长甚有远见。振汉请序已经有些时日了，我答应他八月初到金门之后交稿。入住金门大学之后，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看一本博士论文。今天，已经到了最后的期限，希望不影响本书的出版。

2016年8月10日于金门大学学人一舍

吴伯雄标点本《莆阳文献》序

二十多年前，撰著《福建文学发展史》，接触较多莆田（含仙游）文献，惊叹莆田文献的博大精深。福建第一位有作品传世的诗人郑露，梁、陈间莆田南湖人。唐代第一位有文集传世的作家欧阳詹，成进士之前在广化寺苦读十年，深受莆田文气溉泽熏育。晚唐五代律赋三大家王棨、黄滔、徐夔，黄、徐为莆田人，王棨则为仙游临县福唐（福清）人。宋代是福建文学辉煌的时期，柳永、张元干、刘克庄都是这个朝代成绩卓著的大词人。但是柳永（崇安人）除了词，他作寥寥；张元干（永福人）词以外的作品，数量不多也没有太大影响。而莆人刘克庄则有《后村大全集》传世，其诗自成一家，《后村诗话》则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讲宋诗，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位莆田人蔡襄，《四库》馆臣曾说其诗仅次于苏、黄，亦是宋诗中一大家。以上仅就文学方面而言之，如果讲到宋代的史学，人们自然要提到莆田人郑樵的《通志》。

读莆田作家别集，常为莆人的气节所感动。明武宗欲南巡，莆田人武选郎中黄巩（1480-1522）等上疏劝阻，武宗大怒，巩遭廷杖，削职为民。另一位莆田人工部主事林大辂（1487-1560）也参与劝阻，却未加罪，别人以为侥幸，而他却感到十分耻辱，上书武宗曰：“兵部武选清吏司郎中黄巩等六人同下诏狱，及将吏部等衙门官员俯伏待罪阙下，独如臣等不及，臣等窃实耻之。职虽各有所司，然食禄均有国忧。众皆越职触罪，危言敢谏，臣等何人，不能一言以效死耶？”他不仅主动请求处罚，而且针对朝廷的言路发了一通意见：“臣谓陛下宜赏进言者，而罪不言者。盖进言者忠君爱国，奋不顾身者也。言者虽出位，纵不赏，犹当宥之。不言者虽不罪，实当罢之，而邪正分而赏罚明，而国家定矣。”（《待罪上言》，见《莆阳文献》卷十三）敢于直言的臣子也许越位，即使没有奖赏，也应当宽宥他；对于未能直言的臣子，即使不加罪，也应罢黜他。这样才能做到邪正分明，国家安定。上书的结果可想而知，林大辂下锦衣卫，被贬到偏远的宜陵去了。闽县人郑善夫作《送林以乘谪夷陵》二首其二有句云：“水部青云志，忧君双泪流。”忧君即是忧国，令人感叹唏嘘。

嘉靖四年（1525），也就是武宗驾崩不久，莆田人郑岳（1468-1539）所编的《莆阳文献列传》收录了林大辂的这篇文章，当时大辂尚在世。岳，字汝华，号山斋，南湖先生郑露后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为户部主事，历江西巡抚，官至兵部侍郎，以忤大珰族弟侄，又以议礼忤旨，夺俸，家居十五年，卒。著有《山斋集》等。《莆阳文献》编辑缘起，主要有二端。其一，莆阳文献，起于隋，兴于唐，盛于宋，历代既久，遗文散落，故应搜掇而荟萃之，以备一郡之典籍。其二，人物传记，事述与郡志县志，时有互歧，亟待细核。郑岳所编《莆阳文献》，诗文十三卷。诗文文体区分为赋、诗、杂文；诗又分为古、律各体，文则区隔为序、记、铭、赞、题跋、奏疏等。传原本七十四卷，后倭变书毁，重镌本附柯维骥所作《郑山斋公传》一篇，计七十五卷。《莆阳文献》有嘉靖、万历两种刻本。嘉靖本为原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莆人黄起龙重刻。起龙，亦莆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黄起龙补了嘉靖本未列之传十六篇，还订正了原本的某些讹误，整齐其体列。万历本卷首有嘉靖三年（1624）林俊原序、嘉靖四年（1625）郑岳原序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凤山

九十一樵人原湖侯清《重刻莆阳文献序》、黄起龙《重刻莆阳文献后序》。诸序之后有《凡例》，此《凡例》当为黄起龙重刻时所作。数条《凡例》所言，为编辑、校雠之原则。其实，编选原则还有一条，即选文的标准。郑岳之序曰：“文以载道也。文不本于道，艺焉尔矣。”所选之诗文，“道”为其本。所谓道，至重者为家国人伦，其次则关涉莆郡山川精英。郑岳此编，诗文仅十三卷，精于采择，去其芜杂，庶几可传，经得起历史检视。《莆阳文献》，收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对黄起龙的增补有所批评，如某人当增，某篇当补，可供读者参考。

嘉靖四十四年（1565），莆田知县徐执策在县衙前木坊制二匾，书曰：“莆阳文献”、“海滨邹鲁”。或许“莆阳文献”与“海滨邹鲁”，平仄失对，万历十六年（1588），时任知县孙继有将其改为“壶兰雄邑”、“文献名邦”。平仄没大问题，但“海滨邹鲁”深厚的文化内涵却不见了。四川阆中人陈尧佐（963-1044）《送王生及第归潮阳》诗：“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海边邹鲁”四字原是对潮阳（今广东潮汕）的褒赞。莆田令徐执策将其移来赞誉莆田，也十分合适。福建沿海不少县市，都自称自己也是海滨邹鲁，但不知这些县市的历史根据何在？以我有限的阅历，莆田明朝嘉靖就有这个说法。至于“文献名邦”，在福建似乎是莆郡的“专利”，未见他地与莆争雌雄。莆郡仅拥有莆、仙两县，人口也远非福、漳、泉可比，而宋明两代的进士人数远远超过漳州，而不逊色于泉州与福州，著作的数量与质量，“文献名邦”四字，当之无愧。如果细细究其来历，郑岳的《莆阳文献》的“文献”二字，也有重要的根据。莆田人编辑文献，由来已久，唐末莆人黄滔辑有《泉山秀句集》，是现在我们知道的第一部福建人所辑的文献汇编（已佚）。黄璞所著《闽川名士传》^①，则是第一部闽人的传记集。晚明，闽人编辑区域性的地方文献和撰写当地的名人传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晋江人何炯（1506-？），嘉靖二十六年（1647）进士，编选《清源文献》；闽县人邓原岳（1655-1604），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编选《闽中正声》；闽县人徐燧（1661-1599），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编选《晋安风雅》；龙溪人张燮（1573-1640），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编选《清漳韵苑》（似未竣）；曹学佺（1574-1646），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编选《闽集》（收入《石仓十二代诗选》）；陈鸣鹤，怀安县（今福州）人，与徐燧兄弟、谢肇淛攻声律，著有《东越文苑传》。明代闽编辑地方文献，追源溯流，郑岳《莆阳文献》或为肇始。

二三十年来，我指导过的硕博士论文，部分关涉到莆阳历史人物和文献，如徐夔、宋珏、黄仲昭、《莆风清籁集》等，限于条件，均未成书出其版。我自己也曾点校过《蔡襄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每次到莆田讲学，不论讲何题目，我总是倡导整理莆田文献。我甚至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既然莆田是文献名邦，莆田市属大学不妨办个文献专业，而且把这个专业当作学校的特色专业加以建设，文献名邦办文献特色专业，名正言顺，谁曰不然？我还想起嘉靖间徐知县“莆阳文献”那两个匾，如果重新制作“海滨邹鲁”“文献名邦”新匾，悬挂在图书馆大楼前，也许会成为莆田的一道风景。当然，图书馆内还应藏有尽可能完善的莆阳文献及其整理本。

吴伯雄博士，亦莆人，热爱乡邦文献。一日，出《莆阳文献》标校稿问序，曰：“即付梓。”吾欣然喜，文献名邦有后继者矣。伯雄，受业于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王先生亲口对我说过，他喜欢莆籍学生；莆籍学生勤奋。伯雄为“80后”，年正富，推动莆田文献建设有责焉！窃以为伯雄不妨联络有志于文献的莆友或喜爱莆田文献的其他朋友，一道努力，重振文献名邦雄风。我于伯雄有厚望！

2016年8月13日夜于金门县农试所小木屋

（作者：金门大学讲座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陈颖）

^① 黄璞，侯官（今福州）籍，迁居莆田。《闽川名士传》一书已佚，辑本见陈庆元《〈闽川名士传〉辑考》（国家图书馆《文献》2003年第1期）。